

芝加哥经济学派

[美] 蓝尼 · 埃布斯泰因 (Lanny Ebenstein) ◎著
苏娜◎译

雅各布 · 瓦伊纳 | 弗兰克 · 奈特 | 亨利 · 西蒙斯 | 米尔顿 · 弗里德曼
乔治 · 斯蒂格勒 | 亚伦 · 戴雷科特 | 弗里德里希 · 哈耶克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芝加哥经济学派

作者:[美]蓝尼·埃布斯泰因

ISBN:9787508669465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人意料。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些思想统治。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术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致当代自由主义者

序

这部作品论述了起源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政治思想的发展，是我在经济政治思想史方面所著的第十本书，也是我专门讨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五本书。承蒙读者厚爱，备感荣幸。

我从2008年开始创作此书。在此期间，美国以及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鉴于此，我在结尾处提出了芝加哥自由市场传统在当前形势下的延伸思考。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7年一场关于他的良师益友亨利·赛门斯的讲座上说道："比起盲目追随某人的准则，对他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的探究是更加真实的致敬。"注本书则提出，通过恢复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来实现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中更大的经济平等。希望读者多加关注和支持。

本书所推荐的政策与传统芝加哥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在当代的应用一致。我呼吁回归到早期芝加哥学派关于适当的政府和经济政策的思想上，特别是赛门斯对更大公平和累进税收重要性的观点。本书倡导的政策实际上是那些在战后至1980年期间美国实施的政策。当时，尤其在累进所得税率达到最高值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国内外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发展的巅峰。

和之前的大部分学术作品不同，我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区分开来，强调了他们各自在七八十岁时所持的激进的新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些思想与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所表达的观点大相径庭。应该摒弃两人后来的观点，转向他们早期更加温和的立场。和几年前相比，现在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去评价两人的职业生涯。我希望，尤其是青年弗里德曼和晚年弗里德曼的区别能成为文学中的准则。当弗里德曼转向拥护政策时，包括安格斯·伯金、布莱恩·多尔蒂和威廉·鲁格在内的许多作者呼吁人们关注他渐进的激进化。

我对当代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对保守主义也颇有微词，不过我希望这是合理和公平的。我关注的焦点是强调公共政策的芝加哥经济思潮。芝加哥经济学在公共政策方面成果卓绝。我希望，通过展示和剖析若干世纪以来很多经济学家的思想，能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独立的和衍生的贡献。正如芝加哥大学基于历史观点所理解的那样，古典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需要一种强大的平等主义元素。这种平等主义元素通过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获得。

我关注最多的芝加哥经济学家有J.劳伦斯·劳克林、雅各布·瓦伊纳、弗兰克·

奈特、亨利·赛门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亚伦·迪雷克托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我首先对他们的前辈（从亚当·斯密到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等人）展开论述。我希望，这些论述加上后面的文献篇，能够提供和当代文献一致地看待亚当·斯密的全新视角。我之所以强调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容置疑，我希望能对他们的思想和发展进行崭新的阐述。

感谢这些为我之前的作品提供过采访的人们。本书中也包括了这些相关的采访内容。感谢莱斯特·戴尔瑟、托马斯·索威尔、萨姆·佩兹曼、史蒂芬·斯蒂格勒和埃德温·米斯。我还采访了米尔顿和罗斯·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尔、艾伦·沃利斯、D.盖尔·约翰逊、拉里·斯亚斯塔德、拉里·哈耶克和亚瑟·塞尔登。他们都已辞世。我与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米德、罗伯特·福格尔等人有过信件交流。他们也都已故去。最近，有机会采访了乔治·舒尔茨并和大卫·斯托克曼进行了交谈。闲暇时，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查阅了相关档案，尤其是一些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相关的档案。

此外，我还要感谢与我在共同领域辛勤耕耘的许多学者。从他们的著作中，我受益匪浅。这些学者包括：安格斯·伯金、罗斯·埃米特、J.丹尼尔·哈蒙德、克莱尔·哈蒙德、乔治·纳什、约翰·范·奥弗特韦德、罗伯特·李森、菲利普·米卢斯基、罗伯特·范·霍恩、托马斯·斯泰普尔福德、谢莉尔·卡斯珀、马克·斯考森、马尔科姆·卢瑟福、唐纳德·温奇、罗伯特·史纪德斯基和已故的沃伦·塞缪尔斯和亨利·斯皮格尔。每月与我共进一次早餐的好友约翰·巴斯比、鲍勃·卡西、约翰·凯、彼得·麦克道格尔和斯坦·罗登以及我的老教授汤姆·施罗克、纳尔逊·利希滕斯坦和杰瑞·詹姆斯在结论部分提供了建设性的思想，给我启迪。感谢艾伦·布拉德肖为手稿所做的工作。本书的错误和瑕疵与这些人无关。也许会有很多人对本书所阐述的古典自由主义、当代自由主义和当代保守主义持否定态度。我希望说服他们，或者被他们说服。

蓝尼·埃布斯泰因
加利福尼亚 圣巴巴拉
2015年7月20日

---

1. 蓝尼·埃布斯泰因（主编），《不可或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华盛顿：瑞格纳瑞出版公司，2012），p.149。

引言
芝加哥经济学之历史背景

如果我们对芝加哥经济学的由来进行深入挖掘，会发现其最重要的根源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头几十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以及英国政治哲学家和功利主义创始人杰里米·边沁（1748—1832）的作品中。斯密和边沁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边沁很多灵感都是从斯密那里获得的。两人与伟大的约翰·洛克（1632—1704）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一道，成为辉格党最初的古典自由主义队伍中最伟大的四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们也是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最伟大的四位自由主义作家和思想家。

斯密的著作促使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真正进入人们的视线。在斯密的作品中，国家经济被视作一种独立自主的自我维持的制度。它由政府构建但不由政府决定和指导。在斯密之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斯密精辟的见解包括以下几点：当双方参与贸易时，均从中获益；比起利他主义，明智的利己主义是更为可靠的社会基础；比起不太复杂的经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使得更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经济活动、收入和财富在道德层面是有益的。斯密采纳的是完全现代化的方法。正如边沁所说，利他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假设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指数是衡量对错的标尺。"注

至关重要的是，斯密和边沁坚称个体在体验幸福的权利上是平等的。因此，他们支持民主政策（边沁比斯密更甚之），支持一种能让财富总额和个人所获财富及收入数量达到最大化的经济体系。斯密和边沁对待平等主义者的态度都是温和的。他们不是极端的平等主义者，但是他们认为，当时的时代需要更多的收入和财富平等，这对于提升人类幸福指数至关重要。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存在一个庞大的贵族阶级。这个阶级毫无生产力，却能坐享其成，不劳而获。他们力图改变那样的世界以及那个阶级的状况。他们属于今天所说的政治左翼派。斯密追求的是国家财富，即所有人的财富，而非一小撮阶层的财富。

斯密，尤其是边沁，和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的继承者们一样，并不惧怕推动政府履行其职责。他们明白，要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标准，政府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他们支持通过政府行为来创造标准。他们倡导政府公共工程和学校，认为政府在货币机构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同时也赞成新兴的福利国家活动。人们普遍认为斯密、边沁和一般的

古典自由主义者是极端反对政府活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伟大的经济思想历史学家雅各布·瓦伊纳认为，在《道德情操论》（1759）中，斯密“在上帝的指导下，以自然和谐秩序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他的道德体系”。[注]在《国富论》（1776）中，斯密把这个观点运用到经济范畴。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斯密眼中的世界是一个上帝力图创造出最大的幸福的世界。

斯密在《国富论》中最伟大的见解是劳动分工，我们今天也将其称作劳动专业化。他所举的著名的别针制作的例子至今记忆犹新。可以将其看作量化经济学的开始。如果一个人要去干别针制作过程中所有的工序，“他可能一天也就勉强做出一枚，肯定不可能做出二十枚”。但若采用分工流水线的方式来做，“十个人……可能一天就能做四万八千枚”。[注]使得国家财富产生成为可能的不是其他任何因素，恰恰是劳动分工。在欠发达经济体中，由于分工不明确，个人生产力也就更加有限。

此外，最有效的劳动分工需要自由的市场和重要的私有财产权利。如果没有自由的市场，人们之间的贸易交往受到限制，经济就不会有应有的繁荣。同样，如果没有重要的私有财产权利（无论是什么，并非全部），人们也就没有创新和尽可能去提高工作效率的动力。应该尽可能地让国内国际市场自由开放。市场越大，劳动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越大，全民的生活水平也就越高。

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倾向于让这些最能充分利用资源、生产效率最高的人来掌控资源。他们能在特定的任务中提供最好的服务，或者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特定的产品。该市场并不总是完美运行，但绝大多数时间是。和民主一样，虽然自由市场是一个不尽完善的制度，但它是我们所拥有过的最好的制度，能确保我们以最有效的方式生产出最多样化、最高质量的商品并提供最好的服务。

斯密的智慧在于，他发现只要允许人们互相交换商品和服务就能鼓励经济生产。“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造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不是和他们的人性交谈，而是和他们对自身的爱交谈。”[注]正是这份社会自然的利益和谐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为他人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社会也就更加富有，总体经济也才会更加繁荣。

斯密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社会中的财富和收入应尽可能均衡分配，因为国家财富不是其他，正是组成它的所有个体财富的总和。斯密的理论体系反对不平等，除非有必要创造更多总产量，并且能分配给社会全体成员更高的收入和财富。他和启蒙运动以及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致，提倡本质

上的人人平等。他尤其反对导致财富集中的土地继承相关法律。他在《国富论》中评论道："完全为自己，从不顾及他人，这似乎是人类在每个时代里的卑鄙格言。"[注]他认为商业、土地所有和官僚阶层在道德本质上不可靠，相关的评论贯穿《国富论》始终。

斯密支持旨在使全体民众而不只是其中一小撮群体获益的政府行为。瓦伊纳这样概述斯密的观点："当政府行为促进了社会整体福利时，是正常的，因而是有益的；但当它伤害了社会的总体利益时，则是不正常的，因此是恶劣的。"[注]在《国富论》中，斯密认可以下领域的政府角色：参与货币制度；检定诸如"盘子上的英镑标记和亚麻及羊毛布匹上的印戳"[注]等生产实践；要求支付工人现金而非货物形式的规定；关于各种垄断的规定；包括街道清扫在内的卫生标准；提高公共卫生标准以阻止疾病传播；包括高速路、桥梁、运河和港口的修建与运营在内的公共工程；政府对公园的所有权和运营；专利和出版权法律；房贷规定；利率规定（他认为最大利率应为5%）；邮政服务运营和提供公共教育等。

瓦伊纳注意到，在"很多情况下，斯密支持政府对个人行为的限制，这些限制不涉及公平和防卫。其唯一的目的是提高个人行为对资本的投资、商业过程和劳动力雇佣的指导性"。[注]斯密赞同用税法来削弱包括烈性酒消费的一些现象，而且支持对豪华车辆征收高于货车的养路费，借此，"很容易让富人（可能）的懒惰和虚荣为救济穷人做出贡献"。[注]他提倡对租赁协议做详细的规定，以及对这些被政府提高了价值的土地征收高于平均水平的税收，且支持累进税制。在《国富论》中，他写道："让富人为社会开支做贡献是合理之举，贡献值不但和他们的收入成比例，而且应当高于此比例。"[注]斯密认为，存在一只自然自发秩序的"无形之手"，它能使总体幸福最大化。这只"无形之手"包括推动公益和社会平等的重要政府行为。[注]

但是，仅仅或者主要把斯密描述成国家福利萌芽期的支持者却并不准确，尽管他的确是。斯密的主要贡献是阐释了一个系统，该系统不由政府控制和引导，就能获得最大的经济生产力和经济生产总值。他的作品均完成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他于革命的第一年去世了）。他可能并未预想到这次革命能给社会带来的实际变化。若是他能活得更久一点，必定会支持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斯密备受早期法国革命领导人的敬仰。他支持美国革命。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并非宗教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温和的自然神论信仰者。他寻求的是今生的最大化幸福和最高生活标准（两者在他看来同义）。

斯密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削减政府和传统观念的作用。政府和风俗习惯对经济活动的禁令极大地削弱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斯密认为，他的首要目标是构建一个自然的自由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是建立在私有财产、自由交换和显著政府作用基础之上。在该系统中，经济生产总值能够达到最大化且分布均衡。他的重点是政府作用，政府通过政策和行动的相融并济，能够给人们创造最好的生存环境。

斯密最亲近的也可能是最要好的传记作家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曾写道：“斯密相信，基于对人类本性和人类历史的观察，建立一门真正的人类科学是可能的。这门科学不但能够解释不同类型社会中的社会政治组织原则，还能解释开明的统治者遵循的政体和立法原则。这些统治者想让国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幸福，想让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富强。”[注]因此斯密主张的绝不仅仅是政府的不作为或小作为。芝加哥托马斯·索威尔和詹姆斯·布坎南也非常赞同该观点。索威尔指出：“于斯密而言，平等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注]布坎南说：“一个原原本本的亚当·斯密和现代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相距甚远。”[注]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亚当·斯密、里卡多和马尔萨斯的作品中没有‘放任主义’这个词。这样的观点也从未以教条的形式出现在这些作者身上。”[注]极端反政府主义的观念与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哈耶克的“伪”个人主义[注]）更加类似，而不是英美的历史实用主义传统。在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之前，伟大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在呼吁政府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他们是宗教上的左派——不可知论者、温和的自然神论信仰者、无神论者或是谦逊的基督教徒。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某种科学家（最初被称作“哲学家”），会遵循真理的引导，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当中不存在教条主义者。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明确表明了他的功利主义立场：

> 有观点认为，神圣的上帝在永恒之中用仁慈和智慧设计并管理着宇宙这个大机器，从而能始终创造最大化的幸福。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为崇高的观点。……管理宇宙大系统，关心所有理性和感性的人们的普遍幸福，这不是人类的事，而是上帝的事。上帝分配给人类的是一项更为微末的任务，即关心其自己、家人、朋友以及国家的幸福。这项任务与人类薄弱的力量和有限的理解力相匹配。[注]

和后来的功利主义者一样，斯密寻求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

杰里米·边沁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斯密。边沁所激励和领导的英国功利主义者最后都成为斯密最重要的拥护者。他们在民众面前和国会上捍卫着斯密提倡的经济改革。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功利主义者与其他改革者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成功地确立了自由择业、自由交换土地、国内自由贸易以及对外自由贸易。[注]这段时期还形成了许多重大的立法。其中，改革后的《谷物法》取消了对外国粮食征收的禁止性进口税；《英国济贫法》减少了济贫中的费用。

边沁的另外一项努力是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享有选举权。他认为，民主扩张和健全政府扩张事实上如出一辙。1832年的《改革法案》取消了人口稀少的“有名无实选区”的席位，为新的城区提供了代表席位，扩张了公民权。在边沁去世的前几天，议会通过了该法案。历史上，以民主与重要的政府角色为一方，自由市场与最大经济生产总值为另一方，这双方息息相关，携手前行。

和斯密不同的是，边沁在多年后的著述中，更加高亢地支持能够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活动。在芝加哥瓦伊纳最具权威性，他指出：

> 在英国，大部分源于边沁的系列改革令人印象深刻。这里我仅列出部分：多数领域的基本法改革；监狱改革；包括成年女性在内的普遍选举权；自由贸易；殖民地政府改革；贸易联盟合法化；政府负担的大众教育；自由言论和自由宣传；无记名投票；行政部门任人唯贤；废除高利贷法；普遍财产登记；地方政府改革；商业航运的安全代码；卫生改革和政府负担的预防性医药；系统性搜集统计资料以及对穷人的自由正义。[注]

瓦伊纳认为，边沁是一位“成功的社会改革家。在历史上，除了卡尔·马克思外，他比任何人都更成功”。[注]

其他芝加哥学者也赞同瓦伊纳对边沁的高度评价。如亨利·赛门斯写道：“斯密，特别是边沁，是杰出的现代民主政治哲学家。”[注]乔治·斯蒂格勒称其为“伟大的边沁”。[注]哈耶克认为：“杰里米·边沁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注]弗里德曼在评论斯密思想在英格兰的传播时写道：“边沁、里卡多、詹姆斯·穆勒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人积极地致力于这些思想的传播，并促进它们在政治上的发展。”[注]赛门斯则这样描述他自己的政策方针：“我尝试要说的所有观点，在边沁和边沁主义者那里都有更好的陈

述。”[注]

边沁模式的本质和核心是功利观。功利像太阳，他的其他思想则像行星绕着功利旋转。他在早期的一部未发表的手稿中写道：“幸福是所有人类行为和人类思想的目的。为什么是幸福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呢？这是针对那些有时似乎竭力对它表示质疑的人所说的。”[注]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的开篇，边沁写道：“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个至高无上的主人之下：痛苦和快乐。它们指出我们应当做什么，同时决定我们能够做什么……它们控制着我们的行为、话语和思想。”[注]

边沁和他的芝加哥继承者以及今天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一样，强调世俗功利的最大化，即最大化的人类幸福。实际上，由于可实证的功利最大化原则是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础，后人把边沁看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引述“边沁的格言”：“每个人都指望就是其中之一，没有一个人不这样认为。”[注]平等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古典自由主义模式的基础。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分化为极少数超级富裕的创造者和大量贫困的工人和穷人的社会。然而，美国的现实情况是数以千万的人正在步入这样的社会。实际上，这也是很多当代自由主义作家和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或许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尖锐的、不平等的经济秩序。这是两大主要政党的一个含蓄甚至明确的目标。可以说，社会正实践和经历着极端的不平等。然而，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社会，但可能是一个当代自由主义或者当代保守主义的社会，也就是说，当代自由主义者和很多保守主义者把追求不平等作为他们的最高现实目标。

当代自由主义的伟大化身艾茵·兰德描写过这样一段人物独白。主人公凝视着城市的灯火，喃喃自语道：

> 看看它，一个崇高的成就，不是吗？一个英雄的成就。想想成千上万的人为创造它而努力，数百万的人因它而获益。据说要没有从古至今遍布四周的十二个人的灵魂，所有的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如若果真如此，便会有两种可能的态度：一种态度是这十二个人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都被他们灵魂洋溢出的华丽瑰宝滋养，我们很高兴地怀着感恩和手足情谊接受这些瑰宝；另一种态度是这十二个人通过绚烂的成就让我们看清了自己。我们比不上也保持不了他们的成就。我们不想接受他们免费赠送的辉煌。如果山洞和木棍是我们创造力的极限，那么沼泽旁边的山洞和钻木取到的火就好比摩天大楼和霓虹灯。[注]

很多（可能大部分）的当代自由主义者都深受兰德和她激进的、不平等主义思想的影响。于是，他们和他们的保守派盟友们认为，在一个合适的理想社会中，人们之间获得和持有的收入和财富非常不均等，比如当代美国，在整个政治领域中，人们听不到任何一个代表平等的词。事实上，当人们之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拉大时，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对政府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的批评，而当代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这种批评尤甚。年轻时候的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以及赛门斯都倡导通过大量的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来减少经济不平等，但兰德及其追随者们对平等的渴望并不是古典自由传统的一部分。

继赛门斯及一系列英国古典自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后，芝加哥经济学家通常提倡旨在为所有人而非一小撮人带来最高生活水平的公共政策。从斯密到现在的所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目标都是使每个人的幸福最大化，并且认为人们拥有平等的体验幸福的权利。即使在老年时期，弗里德曼也不时地表现出他的平等主义情结。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指出："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被划分成了'有'和'无'两个阶级……如果被分为两个阶级，我们这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就不能维持下去。"实际上，当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差距远小于现在。

可能更多的学生是通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1859）了解古典自由主义的。穆勒是颇有造诣的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之子，而穆勒父子俩都是边沁的学生和门徒。

19世纪后半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在政治、哲学和经济学领域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新兴高校体系的权威教科书。《论自由》曾经是，也将继续是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最好论据，是个人主义的高亢赞歌。《代议制政府》（1861）影响了议会改革。作为议员的穆勒提出了赋予女性选举权的法案，这比最终通过的类似法案早了半个世纪。穆勒的《自传》（1873）影响了社会改革。《功利主义》（1861）一直是鼓舞人心的道德文章。创始于1884年的英国费边社是最有影响力的智囊团之一，其早期成员都读过穆勒的著作。

穆勒尤其强调天才的重要性。他认为，和全人类相比，仅有寥寥无几的天才所做的尝试是对既有惯例的改进，因此这些极少数天才是世界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就会停滞不前。

强调天才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多芝加哥经济学家的赞同。除此之外，穆勒还支持通过运用世俗功利最大化原则使所有人以及最终一切所有有知觉的生命都过上高标准的生活。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功利主义者。120多年来，追

随穆勒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们一直信奉着这个信条。无论他们在技术、哲学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分歧，芝加哥经济学家和普通经济学家一样，绝大多数都坚持功利主义世界观。

穆勒预测，一个实现所有人的更高生活标准的社会是有可能达到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他在1861年预见性地写道：

> 任何人，只要他的观点值得片刻考虑，都不会怀疑世界上大部分有积极因素的罪恶可以自动移除。若是人间世事继续进步，这些罪恶最终都会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暗示煎熬的贫穷可能完全消失……那些最棘手的敌人、疾病，也可能被无限地减少……同时，科学的进步承诺未来将会更加直接地征服这些可恶的敌人……总之，在很大程度上，所有人类苦难的根源几乎全部被人类的关爱和努力战胜。注

穆勒是一位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他相信理性的对话能说服社会。他是首批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他在职业生涯中并未过多地参与直接的政治活动，但是却对公众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他在不同学科的著作中所阐述的关于道德和经验主义的论辩。这些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宗教学等。

在18—19世纪期间，除了斯密、边沁和穆勒，还有其他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家和思想家。19世纪最后几十年影响力最大的可能是科学领域。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以其他书籍从未有过之势在知识界横空出世。或许只有《圣经》和《古兰经》才有和它旗鼓相当的影响力。达尔文对以上帝为中心的宇宙观提出挑战。更确切地说，他认为，有生命的万物都可以被解释为自然的进化过程。凯恩斯指出："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财富、商业和机械都是自由竞争的产物，自由竞争创建了伦敦。但是达尔文主义者则更进一步——自由竞争塑造了人……可以把适者生存的原则看成对李嘉图经济学的归纳和概括。"注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经典的《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是达尔文主义国家。英国将达尔文推向了世界，但是美国极其迅速地接纳了达尔文主义，并与其惺惺相惜。"注霍夫施塔特补充说："在所有人当中，赫伯特·斯宾塞做了最大胆的尝试，试图使演化的启示在生物学之外的领域系统化。他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远远高于在他自己的祖国。"注

达尔文为人类意识灌输了一个全新的宇宙观。过去，人们认为上帝直接创造了地球上生物物种的最终形式。人们相信，人类所知道的现存的动植物种类多半就是它们曾经有过的唯一物种。然而，在近代早期（16—19世纪），越来越多的化石和其他灭绝物种的遗骸被逐渐地发现。另外，地质学家和其他人士在不同的地方辨别出过去不同的气候，并且推测地球的年龄远远超过《创世记》中所说的6000年。为什么会这样？

达尔文的贡献如此巨大。人们很难透彻理解或掌握它。其他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自然进化思想，但是达尔文的著作却是最包罗万象，最有说服力并且最具独创性的。达尔文世界闻名，他的《物种起源》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注

很快，达尔文的观点被用在了人类社会中。以达尔文学说为前提，赫伯特·斯宾塞是19世纪最为倡导限制政府作用的哲学家。这种姿态和大多数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战线的前辈们不同。斯宾塞父母的祖先都是英国和法国的新教徒、持异议者和反叛者。斯宾塞在他的自传中指出，他对政治、宗教和社会权威的蔑视可以追溯到其家族长期珍视独立和异议的传统上。1848—1853年，他担任《经济学家》杂志的副主编，后来成为全职的自由撰稿人和公共知识分子。

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影响，1873年斯宾塞在穆勒去世后写道："对于我来说，似乎没有必要再去详述穆勒先生的成就，也没有必要坚决主张他对他所处时代思想的广泛影响。事实相当明显，也得到了所有尽晓前半世纪思想发展的人们的认可。"注英国经济学家亨利·法思德在两年前便指出："过去20年，所有在我们两所大学中的任意一所待过的人都会注意到，穆勒先生的作品最有力地影响了几乎所有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注达尔文自己也在《人类的演化》中评价穆勒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注

在讨论政府的功能时，斯宾塞关心的不是政府应该做什么而是政府不应该做什么。他认为，政府仅有两项适当的活动，即维持秩序和司法行政，其目的也仅仅是保卫人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政府没有权力促进宗教、控制贸易和商业、鼓励殖民地化、帮助穷人或者实施卫生法案。斯宾塞是最极端的19世纪放任主义的倡导者。

斯宾塞深受达尔文的影响，但其实真正创造"适者生存"术语的人是斯宾塞而不是达尔文。斯宾塞将达尔文主义运用到社会中，并由此得出自然选择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在斯宾塞看来，富有的人自然比不那么富有的人更适合生存（一个近些年在美国卷土重来的观点）。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富人天然的优势把他们领向成功；而穷人天然的劣势导致了他们的失

败。对穷人任何形式的救济和支持都只能使得他们更弱小。正如凯恩斯所言，“社会主义对市场的干预不但不明智，而且不虔诚，阻止了我们自己从原始的淤泥里挣脱向前的强大进程”。注

受斯宾塞思想的影响，创建了芝加哥大学的约翰·D.洛克菲勒曾解释说，“大型商业的发展只是适者生存。……美国丽人玫瑰只有去除长在它周围的初蕾才能变得光彩夺目、芬芳四溢，给拥有它的人带去欢乐。这不是商业中的一种邪恶趋势，而只是一项自然和上帝制定的法则”。注斯宾塞自己也认为：“我只是把达尔文先生的观点运用到人类身上。……只有这些向前的人……最后才能生存。……（这些人）一定是他们同代人的精英。”注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是斯宾塞在美国的主要学术门徒，他写道：

> 生存的挣扎旨在反对自然。我们从吝啬的自然手中夺取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同伴是和我们争夺这些贫乏供给的竞争者。因此，竞争是一种自然法则。自然是完全中立的，她屈服于这些最坚决有力地攻击她的人。她对适者进行奖励，从而不会有其他任何顾虑。那么，如果存在自由，人们从自然那里获得的东西与其工作成正比，人们的拥有和享受与其状态和行为成正比……倘若我们不喜欢这点，并且尝试去修复它，那仅有一种途径。我们从更好的人那里拿来东西送给更差的人。我们处罚这些做错事的人，把罚金扔给这些做得更好的人……以此方式，我们减少了不平等。我们赞成不适应者的生存，我们通过破坏自由来完成。注

萨姆纳也指出：“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为某项工作自然选出来的社会代理人。他们获得高薪，生活奢侈，但是这对社会来说是笔好买卖。”注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成功的商业是适者生存的表现。不成功的工人则是被淘汰下来的不适者。事实上，大经济环境或偶然性在决定经济成败的过程中不起作用。对放任主义产生的奖惩进行干涉违反了道德和物理法则，绝对做不得。通过政府改善或提高贫困群体的生活标准将只会增加穷人的数量，并且迫使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当中。同样，给予成功者更少的资源将会影响他们的事业发展。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作品是芝加哥大学创立初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几十年）美国经济保守派利益集团的科学信条。

18—19世纪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功利主义者、古典自由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都是极其世俗化的。生活的目的是使世界上人类的幸福最大化。因此，他们倾向于不用自然权利术语为市场辩护。在他们那里，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利都是人为制定。

穆勒在《论自由》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说："我放弃任何源于抽象权利观点的有利论据，这种论据与效用无关。我认为效用是所有道德问题的终极标准。"[注]著名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哈耶克的一位导师，他跟其他人一样，在《古典传统中的自由主义》（1962）中论述了自由主义的物质方面——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不过就是推动外部物质福利发展的观点"。[注]布莱恩·多尔蒂是《理性》杂志的高级编辑，对这段话评论道，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功利主义的；米塞斯支持经济和个人自由，不是因为任何精神和形而上的权利原则，而是因为他相信，通过理论和观察可以证明，自由主义保证了所有人的最大财富和物质富足"。[注]

在当代美国社会，继续高举传统古典自由主义大旗的经济学家有：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学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约翰·洛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埃德温·坎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韦斯利·米切尔、雅各布·瓦伊纳、弗兰克·奈特、莱昂内尔·罗宾斯、亨利·赛门斯、保罗·萨缪尔森、赫布·斯坦、中青年时期的哈耶克和年轻时候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还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拉里·萨默斯、罗伯特·莱西、詹姆斯·赫克曼、本·伯南克和珍妮特·耶伦。实际上，和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相比，可以认为已故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新无政府主义立场在策略和方法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弗里德曼。哈耶克在别的作品中严厉批判了"建构论唯理主义"。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想要获得的社会和经济改变的范围来看，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方向，但是比任何古典自由主义者都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

老年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尤其是弗里德曼）对自己是激进分子的状态毫不避讳。他们拒绝循序渐进的变化过程，代之以全面重组社会的革命性提案，很少去关注过渡问题。弗里德曼后来提倡的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新无政府主义社会，这样的思想在芝加哥大学建立时期（一个世纪以前）更加流行。因此，弗里德曼的思想是一种回归。

---

1.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牛津：巴兹尔· 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48），p.3。
2. 雅各布·瓦伊纳，《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格伦科：自

由出版社，1958），p.215。

3. 威廉·埃布斯泰因和艾伦·（蓝尼·）埃布斯泰因，《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读本》第6版（沃斯堡：哈考特学院出版社，2000），p.495。
4. 威廉·埃布斯泰因和艾伦·（蓝尼·）埃布斯泰因，《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读本》第6版（沃斯堡：哈考特学院出版社，2000），p.494。
5. 迈克·林德，《福地：美国经济史》（纽约：哈珀出版社，2012），p.49。
6. 雅各布·瓦伊纳，《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p.234。
7. 雅各布·瓦伊纳，《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p.237。
8. 雅各布·瓦伊纳，《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p.241。
9. 雅各布·瓦伊纳，《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p.243。
10. 雅各布·瓦伊纳，《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pp.243-244。
11. “政府功能”雅各布·瓦伊纳，《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pp.231-245。
12. 尼古拉斯·菲利普森，《亚当·斯密：启蒙人生》（纽黑文：哈佛大学出版社，2010），p.2。
13. 杰拉尔丁-奥德里斯科尔（主编），《亚当·斯密与现代政治经济》（埃姆斯：爱荷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79），p.5。
14. 杰拉尔丁-奥德里斯科尔（主编），《亚当·斯密与现代政治经济》（埃姆斯：爱荷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79），p.117。
15. 埃布斯泰因，《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读本》，p.797。凯恩斯补充道：“当然，亚当·斯密是一位自由贸易家。他反对18世纪对贸易的很多限制。但是从他对《航海条例》和《高利贷法》的态度来看，他并不固执己见。他有关‘隐形的手’的著名篇章所反映的哲学理念更接近于（威廉）帕雷的思想，而非放任主义经济教条……”亚当·斯密提倡“明显而又简单的自然自由体系。这源自他对世界秩序的有神论和乐观主义的看法”（同上）。
16.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p.1。
17. 雅各布·瓦伊纳，《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pp.234-218。

18. 这些成功的改革请参见瓦伊纳的《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p.227。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是功利主义者让斯密的改革结出了硕果：

1808年10月，詹姆斯·穆勒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个国家在宣传有益的政治经济学学说时有很大的困难”，这让人感到惊奇和遗憾。在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至1817年（李嘉图发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期间，英国没有任何一本完整的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著述。亚当·斯密是唯一的权威，但很少被人们注意［埃利·哈列维，《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5），pp.264-265］。

当然，哈列维的作品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

19. 雅各布·瓦伊纳，《边沁与穆勒：功利主义背景》，《美国经济评论》（1949年3月），p.362。家父是瓦伊纳在普林斯顿时的同事。瓦伊纳在刻写“边沁与穆勒”单行本时致信家父：“雅各布·瓦伊纳对威廉·埃布斯泰因诚挚的问候”（现为作者保存）。据笔者所知，家父不认识弗兰克·奈特，但是他们都在有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研讨会上做了发言。卡尔·J.弗里德里希（主编），《自由，惯例4》（纽约：阿塞顿出版社，1962）。家母是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但没有修学经济学。母亲家人和校长罗伯特·哈钦斯略微熟悉。

20. 瓦伊纳，《边沁和J. S.穆勒》，p.362。

21. 亨利·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p.105。

22. 乔治·斯蒂格勒，《经济学布道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p.143。

23.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p.107。

24. 安奈利斯·安德森和丹尼斯·巴克（主编），《展望九十年代的美国》（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88），p.457。大卫·弗里德曼写道：“一个更加正确的自由主义版本应该归功于边沁而不是罗尔斯。”［“自然权利”，《解放的加图：一本辩论期刊》（2012年4月6日）］。

25.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325。

26. 艾伦·蓝尼·埃布斯泰因，《最大幸福原则：审视功利主义》第6版（纽约：加蓝出版社，1991），p.45。

27.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J. H.伯恩斯和H. L. A. 哈特主编（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82），p.11。

28.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论自由》《代议制政府》（1863；重印；伦敦：J. M. Dent & Sons出版社，1972），p.17。

29. 艾茵·兰德，《源泉》（纽约：普卢姆出版社，1994），pp.281-282。

30. 例如，詹姆斯·多恩，《平等、公正和自由：宪法视角》，《加图期刊》（2014年秋）。

31. 迈克尔·阿尔伯特，《参与型经济：生活在资本主义之后》（伦敦：维尔索出版社，2003），p.70。

32. 穆勒，《功利主义》，p.14。

33. 埃布斯泰因，《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读本》，p.796。

34.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修订版（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5），p.4。

35.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修订版（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5），pp.4-5。

36. 哈耶克强调，达尔文在形成其生物学理论时受到古典自由主义作家的影响。这些作家包括马尔萨斯和斯密。西尔维娅·娜莎指出，马尔萨斯的作品“给予了查尔斯·达尔文和其他进化论创始人灵感”［《伟大的追求：经济学天才的故事》（纽约：赛门斯·舒斯特出版社，2011），p.4］。

37.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生平和著作》（波士顿：杰姆斯·R.奥斯古德出版社，1873），p.38。

38.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生平和著作》（波士顿：杰姆斯·R.奥斯古德出版社，1873），p.74。

39.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纽约：普卢姆出版社，2007），p.157。

40. 埃布斯泰因，《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读本》，p.796。

41. 埃里克·F.戈德曼，《命运的结合：现代美国改革史》（纽约：年代图书出版社，1977），pp.71-72。

42.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展望：一部批判史》（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87）p.121。

43. A. J.贝京格，《美国政治思想史》（夏洛茨维尔: Ibis出版社），p.405。

44. 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展望：一部批判史》，pp.122-123。

45.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论自由》，（伦敦：企鹅出版社，1988），pp.69-70。

46. 布莱恩·多尔蒂，《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现代美国自由主义运动的自由史》（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7），p.83。

47. 布莱恩·多尔蒂，《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现代美国自由主义运动的自由史》（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7），p.83。

第一章
洛克菲勒的大学与政治经济系

从19世纪的最后十年至今，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研究机构。其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机构，尤其是在经济学和物理学领域。这些获奖者多数是它现在的或者曾经的学生、研究者或者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以调侃的口吻对潜在的获奖者们说：“到芝加哥大学去吧。”[注]

芝加哥大学创建于1891年，1892年正式开课，其发展程度可以和任何一所高等教学研究机构媲美。首任校长威廉·雷尼·哈珀是位圣经学者，一名精明的学术管理者。他受到了芝大的主要捐助者和创始人——标准石油公司约翰·D.洛克菲勒的强大支持。

洛克菲勒于1839年出生于纽约力奇福德镇的一个富裕家庭。1854年，在他上高中的时候（能上高中的人当时还寥寥无几），他在一篇作文中描写道，“残酷”的南方奴隶主让奴隶们在“灼热的烈日下劳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能自诩为自由的国度”？[注] 1860年，他为亚伯拉罕·林肯竞选总统投票。1870年他创立了标准石油公司，并在20年间成为美国首富。在经历了极富争议的职业生涯后，他把精力投向了慈善事业。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洛克菲勒认为他能够在医学研究、科学和教育领域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那时候，科学和宗教不像现在这样存在分歧。实际上，最虔诚的宗教教徒通常也是最支持科学研究的人。

19世纪后期，美国高等教育迎来了一次扩张潮，这是一个大学教育蓬勃发展的时代。多年来，洛克菲勒一直对建立一所和其信仰有关的重点学院或综合性大学饶有兴趣。1877年，芝加哥神学院浸信会联盟为了在芝加哥重建一所大学联系到他。在洛克菲勒做出在芝加哥建立一所重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决策中，哈珀是核心人物。时年31岁的哈珀是浸信会联盟的一位旧约学者。洛克菲勒很快便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他后来这样描述哈珀：“一个朋友和伙伴，在日常生活中，和他的交往比和其他任何人都愉悦。”[注] 1887年，哈珀致信洛克菲勒：“在这片大陆上，没有什么事业比在芝加哥或芝加哥附近建立一所大学更加伟大。”[注]

为什么对芝加哥情有独钟？建于1837年的芝加哥是典型的美国城市，而非由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或西班牙人创建。到1890年，芝加哥的人口达

到一百多万，成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坐落于著名的1893年世界博览会旧址，该博览会旨在庆祝哥伦布的首次美洲之旅400周年。芝加哥大学则是建立在世博会的部分展览场地上。20世纪的芝加哥因为有了这所大学更加名声大噪。洛克菲勒担心，大学如果建立在东部地区，容易受到传统学术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建立在芝加哥，则会开辟新路，完全契合时代精神。

洛克菲勒在芝加哥大学创建初期投入了3500万美元，比现在的10亿美元还要多。他特别慎重，不以任何形式参与学校的学术管理。他极少参观校园，也不出席董事会，在学术事务上采取不干涉政策。这位美国首富为学校提供了大量资金，缔造出它的镀金时代。当然，这所新学校既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也遭到了不少抨击。

在公众的观念里，芝加哥大学是洛克菲勒的大学。早期的漫画讽刺了洛克菲勒向其空投大量现金的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的传记作者罗恩·切尔诺写道："连篇的媒体报道将芝加哥大学描述为洛克菲勒的最爱。1903年，《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富裕的洛克菲勒大学。漫画上一位女士高举着印有标准石油公司标志的灯，她的礼服上印满了美元符号。"洛克菲勒和1929—1951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以及1946—1976年在那里执教的弗里德曼一道，成为迄今为止公众心目中和芝加哥大学最有渊源的三个人。

芝加哥大学位于芝加哥南部，靠近市中心和密歇根湖。它在1892年10月1日正式开课。当时没有举办任何的纪念仪式。芝大在开课初期即步入正轨，就像仿佛早已投入运行一般。洛克菲勒向哈珀提供资金并嘱咐他创建一所全新而伟大的大学。哈钦斯的传记作者哈利·阿什莫尔说："芝加哥大学没有受到强加给早期东部兄弟院校身上的狭隘的大学义务传统的束缚，摆脱了塑造新近建立的州立大学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它模仿欧洲中心国家的高等教育，把对学术研究的关注放在首位，把推进人类知识的进步作为公开的使命。"

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后来尤其是"二战"后的高等教育规模相比还很小。1900年，在美国，18—21岁的年轻人中，只有4%的人进入大学。哈佛和耶鲁各自仅有大约1500个学生。大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到政府部门工作。19世纪末期，美国有几百所大学，其中大部分是地方性和小规模的州立性机构、农业大学、师范大学、技术学院和普通教育大学。这些大学都是由州政府赞助，属于教派或私立性质。所有大学几乎都没有研究生课程，因此还没有"综合性大学"的说法。1850年，全国仅有8名研究生。到1900年研究生数量上升至5700人，1930年4.7万，到

1950年达到22.4万人。[注]

哈珀用洛克菲勒的钱打造了一支出色的教学团队。芝加哥大学教职工的薪酬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几乎是最高的。它无疑属于美国首批“综合性大学”。莫迪默·艾德勒或许是哈钦斯最亲密的助手。他在1941年一篇广受欢迎的名为《芝加哥学派》（并未提及经济学）的杂志文章中评论道，“芝加哥大学被普遍地认为是美国最年轻的机构之一。事实上如果我们去区分本科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它就是一所最古老的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机构”。[注]艾德勒继续说道，在芝加哥大学之前，美国的综合性大学只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克拉克大学。19世纪后半叶，很多美国人由于国内机会太少，从而转赴德国攻读硕士。

芝加哥大学从建立伊始就强调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哈珀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制度规划，包括创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加强图书馆建设，鼓励院系创办期刊，以及从全国招聘顶尖教师。招聘的第一批教师团队中包括九名大学校长。切尔诺写道：“哈珀抢来了大批常春藤教员，以至于那些被他掠夺的对手抗议这是严重违规的行为。”[注]此外，芝加哥大学不歧视犹太人。后来有关本科生而非研究生的数据显示，在20世纪30年代，接近1/3的芝加哥大学本科生都是犹太人。大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认为，因为其他大学限制犹太人数量，所以芝加哥大学成为全国独树一帜的学校。[注]芝加哥大学从一开始就允许男女生同校，这也是高等教育新兴的发展方向。非裔美国人和亚洲人也获允就读该校，但其数量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只占了不到全校人数的2%。[注]

在1895年，艾德勒指出，哈珀说：

> 大学教员仅仅完成所分配的授课和讲座任务是不够的。这些任务固然重要，但如果他们不同时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能对大学之外的思想和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事情上，大学便不能被称为大学……真正的大学是思想的中心。人们在这里思考和人类生活与工作息息相关的每一个问题。对于组成它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首要的义务便是研究和调查。[注]

正如后来艾德勒所说：“芝加哥大学在成立的前10年里，执着地坚持并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使命，这让它获得了相当高的声誉。”[注]

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是早期政治经济系的首任系主任。作为一名优秀的

教师，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应当是“让学生获得独立的能力和工作的方法……而不是具体的观念”。[注]劳克林是金本位的坚定拥护者。他为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提供了实用而广泛的学术上的重要支持。他和共和党关系密切。

芝加哥经济学院历史学家约翰·范·奥弗特韦德认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人的古典主义观点是劳克林经济学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穆勒的观点。”[注]劳克林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878—1888年在哈佛任教。在此期间，他是放任主义的支持者，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在哈佛他创立了一个政治经济俱乐部，萨姆纳是其中的成员。

劳克林在1884年编辑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节略本。由于受到该节略本的影响，美国人把穆勒看作一位严格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然而在英国，由于费边社和其他因素，人们更加强调的是穆勒观点的社会主义性质。《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48年首次出版，1868年推出第六版，也是最后一版。人们应当正确地估计该书的重要性。虽然今天的人们更多的是因为穆勒的《论自由》和《功利主义》而记住了他，但在19世纪，他的巨大影响力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世界经济文献中的一本伟大的经典著作。

劳克林在节略本中强调了斯密的《国富论》。他用一篇“政治经济历史简述”来引出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劳克林说：“亚当·斯密的最大成就是对原理连贯而全面的把握。”《国富论》是“后来政治经济领域中所有讨论和发展的基础”[注]。他进一步阐述道：“亚当·斯密开启了政治经济历史上的一段崭新时期。”[注]关于穆勒的著作，他写道，这本书“涵盖了整个政治经济研究领域，是迄今为止已出版的相关著作中最具明晰性和系统性的一本著作。”《原理》是相关主题的“最为系统的著作”[注]。

这本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节略本，从很多方面来说，是在展望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未来而非回顾过去，该书针对美国读者特别是大学生。有趣的是，劳克林在节略本中运用24张统计图片来阐述穆勒的观点，并将穆勒的观点延伸到对美国情况的关注上。劳克林对当时萌芽的经济理论数学化现象未持任何正面之辞。在引言里，他这样评论穆勒和其他人：“W.斯坦利·杰文斯教授反对上述所提及人们的观点。他将数学程序用于政治经济学中，但是没有新的收获。”[注]一直以来，区别于统计数据展示的对经济理论相对非数学化的展示，是这里所讨论的大多数芝加哥经济学家们的典型特点。

斯密认为，政府对产业的调控计划是站不住脚的。指导个人如何使用资本的做法要么有害要么无用。他指出，倘若一个国家的邻国繁荣起来，这个国家也会变得更加繁荣。[注]在劳克林看来，自由市场需要庞大的私有部门。然而，自由市场并不排斥重要的政府作用，事实上它们往往协调一致。在工业时代及近些年的民主社会中，自由市场和政府发挥的重大作用历史性地携手前行。当然，政府的作用也并非万能。

洛克菲勒在公众中树立了芝加哥大学的声誉。劳克林在最初的24年中担任政治经济系主任。毫无疑问，在新生的经济学学科中，芝加哥大学树立了保守派的口碑。劳克林和很多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出色继承者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强调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在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历史性概括中，他敏锐地观察到："通过讨论货币以及金银向欧洲的异常流动，人们可以瞥见政治经济学的首道微光。其中，金银的流动是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开发导致的。"[注]

在1916年以前，劳克林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此后他继续参与学术和公共活动，直到1933年去世。他有很多年没有参加新兴的美国经济学会组织。然而该学会使得芝加哥人和经济学领域的其他人产生了早期的专业分歧。这种分歧曾经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长期存在。但现在不再是这样的情况。劳克林在其终身教职生涯中曾经聚集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些曾经出现在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包括：索尔斯坦·凡勃伦、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约翰·莫里斯·克拉克和雅各布·瓦伊纳。他们都成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劳克林强烈倡导在芝加哥建立一所商学院。他还创办了《政治经济学期刊》。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他在早期的经济学课本《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1887）中论述道："基督徒的品格是工业进步的基础。一个人如果获得自我掌控的能力，学会如何使用个人力量去达到既定的目标，并且认为未见的未来的美好超过可见的眼前享受……他就有能力抵达一个远好于其人生初始的地方。"[注]在经济思想历史学家理查德·艾伯林看来，劳克林"为接下来几百年的系部发展奠定了基础"。[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初使用的系名是"政治经济学系"而不是"经济学系"。虽然有关政治的论述至少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就已经存在，但是有关经济学的主要著作直到17世纪左右才真正产生。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指出，社会生活和社区秩序的目的是"舒适地生活"，本质上这是幸福的功利性标准。约翰·洛克在其革命性著作《政府论（下）》中将个人幸福作为社会秩序的目的基础，为今天的个人财产提供了最好的辩护。著作中还做出了其他贡献，包括阐明了价值的劳动理论。但是霍布斯和洛克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政治相关的。

16—19世纪，民族国家层出不穷。尤为重要的是，在这段时期当中，时代精神变得更加世俗化、个人主义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人们加快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economics（经济学）”这个词来源于两个希腊词——eco（意思是房子）和noms（意思是法律）。经济学最初指的是家务管理艺术。久而久之，该词具有了更加普遍的内涵。1767年，第一本在标题中使用“政治经济学”的英文著作问世——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探究》。九年后，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在斯密的著作出版之后，其他人的作品也沿袭同样的方向。这些人包括：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詹姆斯·穆勒、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这些人物都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密切联系和关注公共政治及公共福利。和其他人相比，马尔萨斯更多地指出了经济学的阴暗面。他认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由于人口过剩和资源有限造成的贫穷是不可避免的。[注]达尔文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影响，提出以下观点：只有少数个体能够繁衍，生存需要竞争。当时的经济学理论几乎都是文字的形式，而不是数学或几何的形式（虽然李嘉图指明了数学形式的方向），并且关注国家政策。古典经济学的目的是将新生的经济，从政府和社会管理的桎梏中以及传统和税收这些阻碍商品和服务自由交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18世纪，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国际学科。很多经济学家来自德国、法国、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以及18世纪末期的美国和英国。英国被公认为经济学理论的领导者。在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形式和几何方式的呈现变得更加明确。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替代。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学向微观经济学的转化，同时经济学的数学化和专业化也不断深化。到20世纪30年代，“政治经济学”消亡，“经济学”处于统治地位。

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不仅是美国第一批拥有研究生课程的大学科系之一，还是美国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系。在此之前，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及政治社会科学合并在一起。劳克林的著作写于“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过渡的时期。和在他之后的很多经济学家相比，他的著作更多地保留了对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的强调，这和他的一些最优秀的芝加哥继承者的著作一样。

芝加哥大学从创建伊始就和很多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有联系。托斯丹·凡勃伦或许是20世纪前25年最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在起伏不定的职业生涯中，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时间长于在其他任何机构。凡勃伦的职业生涯中充斥着性丑闻。他好色无度，以追求异性为乐（在芝加哥的时候，曾横跨大西洋，对一位女生穷追不放而遭到强烈批判）。虽然如此，他依然在

学识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最著名的《有闲阶级论》（1899）猛烈地抨击了商业广告、富人和“炫耀性消费”[注]。他是《政治经济学期刊》的首任主编。他被认为是新兴经济学制度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为运动提供了启示。制度运动采用一种结合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式，而不是理论的数学方式。

凡勃伦十分反对当时既存的秩序。他认为，那样的秩序被富人操纵，和穷人对立。他在《既得利益与普通人》（1919）中写道：“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们控制着市场，由此控制着这些不得不依靠市场进行买卖活动的人们的生活条件。”他同时还说道：“文明国家的人口分为两个主要阶层：富有之人和贫困之人。”[注] 或许，他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更加谴责这样的观点，即富人有权拥有或应该拥有巨大的财富，并对财富精打细算。他还提出广告浪费的理念，该理念是20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对资本主义否定式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社会派作家斯图亚特·蔡斯在提到凡勃伦时说道：“他的论点很简单。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们不会主要为了有用的目的去使用社会给予他们的盈余。他们不会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去过更加智慧、更加有判断力地生活，而是力图向其他人证明他们有盈余。”[注]

虽然现在人们对凡勃伦的贡献有着不同的评价，他的盛名也不复存在，但是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他受到了高度推崇。商业编辑维吉尔·乔丹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说道：“凡勃伦对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政府政策的影响可能大于其他任何美国思想家。人们如果不了解凡勃伦和他的思想，就不能充分理解这个国家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很多顶级学术顾问都熟悉或曾经读过凡勃伦的著作。

凡勃伦受到斯宾塞和萨姆纳的影响，其中萨姆纳是凡勃伦的老师。达尔文的进化演变论犹如晴天霹雳降临学术界。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写道：“社会中人的生命，和其他物种的生命一样，是生存的斗争，是一种选择性适应的过程。社会结构的演变是制度的自然选择过程。人类制度已经取得的进步和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被泛泛地理解为最优秀思维习惯的自然选择。”[注]然而，和达尔文社会主义者不同，像凡勃伦这样的经济制度主义者，强调人类能动性在决定社会方式和规则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秩序的结果并不一定反映自然秩序。

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是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经济学，更笼统地说，是社会科学里的一位领军人物。他是劳克林的博士生，也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米切尔后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并且创立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或者任教的经济学家们都曾经与这个机构有着密

切的联系。出生于1874年的米切尔在几个机构的很多领域都颇有建树，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担任了数年的研究部主任。任职期间，他指导过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项目。这些经济学家受到他着重经验主义和统计测量的研究方法的影响。[注]米切尔的主要个人研究领域是经济波动，他的《商业周期》是该领域多年来的重要著作。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经济思想历史学家，卒于1948年。

米切尔通过讨论货币的使用，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辩护：

> 它是复杂价格体系的基础，个人必须要调节自己谋生的行为去适应这个体系……拥有卓越的挣钱能力的个人在各行各业中崭露头角……新的领导者找到很多机会去剥削利用他人；但是，一般来说，努力挣钱的人是整个社会消费者的奴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货币经济中，这些能最有效地为有购买能力的消费者生产出他们所青睐的商品的人，逐渐引领了商品制造活动。这些人持续的领导能力取决于其效率的保持。[注]

在米切尔看来，资本主义存在的正当理由是它的技术效率。它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体系。

米切尔在芝加哥大学的很多弟子并不迷恋标准的新古典理论。正如托马斯·斯泰普尔福德所评论：“米切尔在1924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的就职演说是他所做的一段更加著名的有关方法论的陈述。在演说中，他对新古典主义理论嗤之以鼻，认为它不过是躺在扶手椅上的哲学家们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勾勒出一种基于广泛实证研究的经济学新视野。”[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是米切尔的学生。哈耶克来自维也纳，1923—1924年在纽约读研究生。弗里德曼在20世纪30—40年代，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来进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虽然米切尔极为有效地运用统计数据，但他反对经济理论数学化。在经济论证中使用数字数据和统计数据与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化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不是今天使用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必须对这一点相当清楚。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在大部分职业生涯中用“自由意志主义”来表示这里提出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但是他们俩，尤其是弗里德曼，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发激进。当代政治经济自由意志主义意味着本质上消除政府监管。古典自由主义一般不涉及一定程度的政府监管，但是它赞成削弱政府监管，赞成地方层面的直

接服务而非国家层面的间接服务，以及私人主动性而非国家控制和国家层面的政府活动。古典自由主义认为繁荣且公平的现代社会为政府活动提供了广阔而适当的空间，它还肯定了秩序井然的经济和社会中更多平等的重要性，并且努力推动平等。

对比而言，当代自由主义常常代表古怪的蒙昧主义、狭隘性、脱离实际，坦白地说，还有学识的浅薄和对数据的操纵。当然，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也不是当代自由主义所独有。当代自由主义是一种死板的教条，敌视新思想。哪里有正式的信条，哪里就有歪曲正式信条的人。当代自由主义者多年来固守着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不重视新的思想和不同的观念。对他们而言，实用性毫无意义。事实上，很多当代自由主义者对他们不切实际没有关联性的思想颇感骄傲，认为没有理由在任何事情上妥协。他们是空想家，经常活在一个虚构的国度“Libertania”中，并且为这个国度而努力。

新信息和新环境对很多当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几乎没有影响。首先，他们认为，考虑和参考不同的观点没有意义。其次，很多当代自由主义者仿佛相信，一些思想拥有持久的价值就意味着所有的公共政策立场都无法改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必须指出，很多当代自由主义者是意识形态的怪人甚至是江湖骗子。他们质疑对手的动机和品质，用漫画讽刺其思想。他们的作品，即使另有打算，由于本质上缺乏学术性和实证性，也只是挑起争端而已。而且这些作品在论述上存在片面性，在内容上偏向感性而不是理性。

詹姆斯·赫克曼或许是今天古典主义派的主要芝加哥经济学家。他对一些经济学家这样评论道：

> 很多聪明人的一大弱点是他们往往不能把契合他们个人意见的观点和真正的智力与创造力区别开来。芝加哥的一群二线经济学家之所以获选，更多的是由于他们的温顺而不是创造力和独创性。他们还有很多尚待改进之处。他们通常对政治极端狂热，漠视数据和理论。然而，他们赞成大师们的观点，从而作为传播真理的弟子或门徒而备受尊重。注

1981年，保守派作者罗素·柯克认为：“本十年典型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特点是缺少幽默感、狭隘、自以为是、未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无趣。”注政治科学家和参议员约翰·伊斯特写道：“新意识形态的自由意志主义具有反政府特征，像是一头扎入盲目、混乱、让人迷茫的无政府世界中。”注布林

克·林赛或许对当代自由主义者持最为开明和包容的态度，他对自由党特别评论道："过度理性主义和空想化，以至于不能迎合大众思想，它很快陷入古怪的沉默，沦为政治上的摆设。"[注]

这些话很尖锐，但是充满生机与活力学说的标志。该学说力图结合其他的观点，更准确地说，去吸收这些观点。杰出的约翰·洛克认为："宽容是真耶稣教会的主要特性标志。"[注]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说，尤其是经济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学说，不是假装在任何问题上永远百分之百正确，也并不武断专制。相比而言，死板的教条不需要崭新的见解。所有的思想都在演变发展。

在很多，甚至是绝大部分的当代自由主义者眼中，认为其他的思想、价值和观点可能会有价值或者应该被考虑的想法是不可理喻的。当代自由主义在知识上墨守成规，排斥新思想和新信息并且蔑视实践相关性，但是过去的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从前，古典自由主义者真诚、恭敬而且周全地对其他不同的思想或略微不同于他们自己的思想进行评议和探讨。他们认为，与实际情况的关联性是理论和公共政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对当代自由主义进行延伸性探讨的目的是强调它和大多数历史芝加哥经济学家的古典自由主义在政策和本质上的巨大差异。这里使用的"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和"当代自由主义（contemporary libertarianism）"大为不同。具有良好愿望的知识分子们有可能因为与其意见相左而改变思想。他们向来这么做。

亨利·赛门斯在《放任主义的积极方案》（1934）中写道：

> 自由主义者们不能聪明地或充满希望地反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实验。他们也不应当害怕它可能会有的成功……自由主义者关于降临的厄运的预言，除了世界大战，和所有的社会问题如何能被解决的青春期般激进的见解一样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政治经济体系的建立，不是和语言的形成完全一样，也不是完全不一样。歇斯底里不适合自由主义者，他们必须对社会进程和自由的坚固性有信心，因为他们的那种社会完全不能通过革命和反革命去推进。一个自由主义者仅仅像叛教者一般尖叫（或绝望）。[注]

约翰·莫里斯·克拉克是约翰·贝茨·克拉克之子。贝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屈一指的美国经济学家，他有时被称作继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后的"美国马歇尔"。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通常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举足轻重

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和贝茨都是新古典主义者，他们将现代边际效用理论融入一种本质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当中，支持政府的重要作用。约翰·莫里斯·克拉克于1915—1926年在芝加哥任教，之后到了他父亲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制度主义者。他将自己的工作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紧密结合。1928年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保罗·霍曼认为，约翰·贝茨·克拉克、索尔斯坦·凡勃伦和韦斯利·米切尔(注)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三大巨头，其中除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均与芝加哥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人们能够对早期的芝加哥经济学发展窥见一斑。

早期和芝加哥大学有联系的其他经济学家包括：赫伯特·达文波特、查尔斯·汉迪、阿尔文·约翰逊、罗伯特·霍克西、里昂·马歇尔和沃尔顿·汉密尔顿。马歇尔从1916年劳克林退休后到1928年的这段时间担任政治经济系系主任，他关注的焦点是商业。达文波特是早期芝加哥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一位有着彻底理论倾向的教师。他将主观主义元素引入价格理论中。汉迪也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和达文波特一样，他在理论上影响了脱颖而出的弗兰克·奈特。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教师约翰逊，成了社会科学温和左派的领军人物。霍克西是一名极左派的劳动经济学家。汉密尔顿是一名早期制度主义者。

早期和芝加哥大学有联系的其他领域的杰出学者包括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约翰·杜威，社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天文学家乔治·E.海耳，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耳孙（美国第一位科学诺贝尔奖得主），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和政治科学家查尔斯·梅里亚姆。随着时间的推移，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占地约25个街区的面积。中间有一个八到十个街区大小的长条形公园将校园分成两部分。公园中有一条主干道穿过。大部分校园坐落在公园的北部。校园中有很多引人注目的超大型哥特式建筑。芝加哥大学一经成立，平时的在校生人数通常约为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研究生。

经济历史学家约翰·内夫（他后来创建并主掌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认为，政治经济系从劳克林那里获得了致力于追求意识形态和哲学多样化的决心。内夫在1934年写道：

> 1895—1930年，相当一部分在经济学思想上有重要影响的人，从索尔斯坦·凡勃伦到雅各布·瓦伊纳……都曾经作为成员或学生，与政治经济系有联系。当人们和他分属完全不同的派别时，劳克林常常选择其中最优秀的人士……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这个国家经济学系中一位最保守的系主任管理着在政治上最自由，在经济学上最不正统的一个系。(注)

经济思想历史学家马尔科姆·卢瑟福认为："对于大部分经济学家来讲，'芝加哥经济学'和'制度主义'这两个词清楚地表明了该学科研究的两种互相对立的方法。"然而，卢瑟福同样写道："截至1918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在不同时期包含了几乎所有和制度主义运动有最密切联系的人物，例如凡勃伦、霍克西、米切尔、汉密尔顿和约翰·莫里斯·克拉克。因此，芝加哥大学完全可以被看做我们所知的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之地。"[注]

经济思想历史学家A.W.科茨认为，在劳克林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系系主任期间（1892—1916），该系成为"经济学异端的主要中心和滋生地"。[注]斯蒂格勒同样强调知识多元化是该系的早期特点之一。[注]很明显，芝加哥经济学系在历史上是一个十分多元化的领域。在弗里德曼看来，这是因为该系从一开始就坚持"知识质量，把知识质量当作教员选聘的唯一标准"。[注]

劳克林除了强调知识质量，还重视研究与教学。从经济学系的角度来看，劳克林为芝加哥经济学留下的遗产包括知识质量、知识多元化、对实际问题和公共政策的关注以及高质量的教学。他对芝加哥经济学保守主义观点的贡献来自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坚持和对共和党的依赖。科茨指出，虽然存在经济学教师团队的知识异质性，但是由于洛克菲勒和劳克林的影响，早期的芝加哥大学享有"经济保守主义中心的盛名"。[注]

在21世纪，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1897年，洛克菲勒在芝加哥大学一次罕见的致辞中谈及他对该大学的贡献："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好的投资。"[注] 1991年，大学成立100周年之际，和大学有联系的60多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超过25人。之后，又有另外20多人获奖。2014年官方统计的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得主数量为89人，涵盖全部六个奖项。自1969年开始评选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有28位芝加哥大学学生、研究者和教师获得该奖项。在很多学科上，芝加哥大学拥有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多的杰出思想家和学者。芝加哥大学尤其主宰了经济学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内夫早在1934年就写道，芝加哥大学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很多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自创立伊始，芝加哥大学在美国经济学领域就独占鳌头并最终引领了世界经济学。

---

1. 威廉·布赖特和巴里·T.赫希（主编），《诺贝尔之路：18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第4版（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4），p.66。

2. 罗恩·切尔诺，《洛克菲勒传》（纽约：年代图书出版社，1998），

p.68。

3. 罗恩·切尔诺，《洛克菲勒传》（纽约：年代图书出版社，1998），p.308。

4. 罗恩·切尔诺，《洛克菲勒传》（纽约：年代图书出版社，1998），p.307。

5. 罗恩·切尔诺，《洛克菲勒传》（纽约：年代图书出版社，1998），p.310。

6. 罗恩·切尔诺，《洛克菲勒传》（纽约：年代图书出版社，1998），p.493。

7. 哈利·S.艾什莫尔，《不合时宜的真理：哈钦斯传》（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89），p.57。

8. 约翰·S.布鲁伯克和威利斯·鲁迪，《转型中的高等教育：美国高校历史》第4版（新不伦瑞克，新泽西：业务出版社，1997），p.378。

9. 约翰·S.布鲁伯克和威利斯·鲁迪，《转型中的高等教育：美国高校历史》第4版（新不伦瑞克，新泽西：业务出版社，1997），p.193。

10. 莫蒂默·J.阿德勒，《教育改革：开放美国思想》（纽约：科利尔出版社，1990），p.23。

11. 切尔诺，《洛克菲勒传》，p.317-318。

12. 威廉·H.麦克尼尔，《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大事记1929-195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p.53。

13. 威廉·H.麦克尼尔，《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大事记1929-195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p.52。

14. 阿德勒，《教育改革：开放美国思想》，p.24。

15. 阿德勒，《教育改革：开放美国思想》。

16. 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见伊特韦尔、米尔盖特和纽曼主编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7），p.139。

17. 约翰·范·奥弗特韦德，《芝加哥经济学派：芝加哥大学如何汇集那些革新了经济学与商业的思想家们》（芝加哥：阿加特出版社，2007），p.48。

18. 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主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纽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1885），“引言——政治经济史简述”。

19. 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主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纽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1885），“引言——政治经济史简述”。

20. 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主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纽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1885），“序”“引言”。

21. 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主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纽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1885），“引言”。

22. 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主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纽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1885），“引言”。

23. 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主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纽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1885），“引言”。

24. 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政治经济学要素》（纽约：美国图书出版社，1887），p.349。

25. 理查德·M.艾伯林，“米尔顿·弗里德曼与芝加哥经济学派”《自由人》（2006年12月），p.2。

26. 关于马尔萨斯在给经济学贴上“沉闷科学”的标签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精彩阐述，见西尔维娅·娜莎，《伟大的追求：经济学天才的故事》（纽约：赛门斯·舒斯特出版社，2011）。

27. 托斯丹·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纽约：现代图书馆出版社，1934），p.68。

28. 托斯丹·凡勃伦，《既得利益与普通人》（纽约：维京出版社，1946），p.160。

29. 托斯丹·凡勃伦，《既得利益与普通人》（纽约：维京出版社，1946），p.xiv。

30. 托斯丹·凡勃伦，《不断变化的秩序》（纽约：维京出版社，1934），封面。

31. 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的主要趋势》（新不伦瑞克：业务出版社，1990），p.136。

32. 早期对凡勃伦的关注使米切尔踏上了统计方法之路。米切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越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意识到凡勃伦的作品对其他经济学

家的影响甚微……我常常发现，唯一正确的答案在于用统计数字说话。”见大卫·塞克勒，《托斯丹·凡勃伦与制度主义者》（博尔德：科罗拉多联合大学出版社，1975），p.103。

33. 蓝尼·埃布斯泰因（主编），《不可或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华盛顿：瑞格纳瑞出版公司，2012），pp.126-127。

34. 托马斯·A.斯泰普尔福德，“民主党积极经济学：米尔顿·弗里德曼、制度主义和历史科学”，见罗伯特·范·霍恩、菲利普·米卢斯基和托马斯·A.斯泰普尔福德共同编写的《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最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pp. 6-7。

35. 威廉·布赖特和巴里·T.赫希（主编），《诺贝尔之路：18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第4版（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4），pp.321-322。

36. 卡尔·T.博格斯，《小威廉·F·巴克利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起》（纽约：布鲁斯伯格出版社，2011），p.139。

37. 乔治·W.凯里（主编），《自由与美德：保守与自由之辩》（威明顿：美国校际研究所出版社，2004），p.85。

38. 布林克·林赛，《丰盛时代：繁荣如何改变了美国政治与文化》（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7），p.319。

39. 约翰·洛克，《论宽容》（1689；重印，牛津：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1946），p.123。

40. 亨利·赛门斯，《自由社会经济政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p.318。

41. 保罗·D.霍曼，《当代经济思想》（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28）。

42. 约翰·U.内夫，“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1850-1933）”，见《政治经济学杂志》（1934年2月），p.2。

43. 马尔科姆·卢瑟，《美国经济学制度主义运动，1918-1947》（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p.125。

44. A. W.科茨，“‘芝加哥学派’的起源？”见《政治经济学杂志》（1963年10月），p.489。

45. 乔治·斯蒂格勒，《不受管制的经济学家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3（1988）］，p.22。

46. 蓝尼·埃布斯泰因（主编），《不可或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p.35。

47. 科茨，“‘芝加哥学派’起源？”，p.492。

48. 切尔诺，《洛克菲勒传》，p.325。

第二章
古典自由主义者雅各布·瓦伊纳

雅各布·瓦伊纳——朋友口中的Jack和家人口中的Jake，1892年出生于蒙特利尔。他的父母是从罗马尼亚移民到加拿大的犹太人。他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读本科，后来进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在那里成为弗兰克·陶西格的得意门生。陶西格是当时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1916年，年仅24岁的瓦伊纳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后，他开始跟随陶西格在华盛顿的美国关税委员会任职，后来进入美国航运局，在那里一直待到1919年，之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瓦伊纳年轻时就被认为是经济学领域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如经济思想历史学家亨利·斯皮格尔所评论，虽然瓦伊纳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政府部门担任顾问，他“最重要的还是一名学者”。斯皮格尔还敏锐地发现，在瓦伊纳职业生涯的早期，经济学界“从本质上说是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所建立”。[注]

瓦伊纳的贡献包括20世纪20—60年代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历史领域的一系列广泛的著作。他是一名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者，受到古典穆勒和马歇尔经济学的滋养。和他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继承者不同，他认为自由主义，通常也包含经济学，是一种不断演变的而非静止的信条；他还认为，自由主义对一个时代有益的制度和政策在其他时代未必有益。此外，更重要的是，和他的一些最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的继承者相比，他支持政府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他认为现代社会中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实质性的政府存在，并对此深信不疑。他绝非这里称作的当代自由主义者——新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事实上，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瓦伊纳始终如一不断地反对当代自由主义的立场。他认为这种立场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或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几乎毫无价值。[注]

保罗·萨缪尔森在1970年，即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的第二年，获得了该奖项，他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位美国人。萨缪尔森在1931—1935年间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在1991年芝加哥大学成立100周年之际，萨缪尔森在回忆瓦伊纳时这样写道，“芝加哥学派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三人为一个学派，是萨缪尔森认为的第一个芝加哥学派，这里论述的是该学派。第是奈特、瓦伊纳和赛门斯的学派”。该学派提倡利用市场，但是建议用再分配的税收和转让来缓和放任主义体系下最糟糕的不平等现象；该学派讲求实效地赞成用信贷和财政政策领域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减弱周期性波动的振幅。”[注]“二战”刚结束时詹姆斯·布坎南还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研究

生，他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也提及“最初的、弗里德曼之前的‘芝加哥学派’”。

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直到“二战”后才获得明确的认可，第一个芝加哥学派的视角和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观点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家迪特尔·普勒韦认为：“一个明确的芝加哥版的年轻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这和老一辈芝加哥学者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唐·帕廷金是1941—1947年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后来成为博士生。他认为，瓦伊纳和奈特的观点不像他们“年轻的同事和追随者”的观点那样“教条主义”。应当认为，一些芝加哥人后来的作品明显地背离而非继续了历史的芝加哥观点。在历史上，以瓦伊纳和其他人为代表的芝加哥渗透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哲学、政策和精神。

瓦伊纳信奉古典自由主义。1983年尤金·罗特温写道：“主要在战前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和战后的芝加哥学派迥然不同（战后芝加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总的来说，战前早期学派的立场较之战后学派更为温和折中。”罗特温呼吁人们关注瓦伊纳的一些论述。这些论述确立了其在古典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位置。尤其是，由于很多当代自由主义者将极端的反政府立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从明显的演绎前提，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行为学”中获得这些立场），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瓦伊纳关于恰当而全方位的政府作用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内在价值。

瓦伊纳在1927年做了一场名为“亚当·斯密和放任主义”的讲座，纪念《国富论》发表150周年。在这次讲座中，被萨缪尔森认为在经济学界已经“世界闻名”的瓦伊纳总结了斯密的立场，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 亚当·斯密不是一个教条式的放任主义提倡者。他洞悉了各种不同的政府活动，并且准备将这些活动做进一步扩展……他把为公共福利服务的能力归功于个体主动权，该主动权是以竞争的方式来促进个体目的……但是即使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里……斯密发现自我利益和竞争有时候对它们应该去服务的公共利益存在危险性。他准备让政府对其实施一些控制措施……他不相信放任主义总是对的或者总是错的。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在那个时候，每所相互竞争的学校都深信自己，相信只有自己知道这条唯一通向经济真理的道路。回归到《国富论》中的折中主义、好脾气、常识性以及承认这些对事情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只是部分错误的意愿。这样的回归让人耳目一新。

后来，瓦伊纳于1959年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第二次“亨利·赛门斯讲座”上说道：

存在各种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自由。这些自由在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的模式中相互依存。这些模式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加强、相互对抗和冲突的。某些特殊的自由对于心理构造和物质环境不同的个体来说有迥然不同的意义。即使在某种普遍意义上自由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至高无上并绝对地有益处，但是仍然有必要（通常也很难）去弄明白建立或保持一种特别的自由对整个自由体系来说是一种添加还是删减。此外，特殊的自由不但可能会与其他自由，还会与除了自由之外的其他价值，例如个人和国家安全、繁荣、国内的和平与秩序以及公平等相冲突。做决策的悲剧性因素通常不是来自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是来自彼此之间真正价值的斗争。

瓦伊纳在这里还说道：“我会很小心地避免使用放任主义这个词来表示这些肆无忌惮的无知的反对者而非倡导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即哲学无政府主义，或者是对任何政府权力和活动的反对。”注

瓦伊纳大力肯定民主的内在价值：

如果自由指的是免予强制的自由，那自由世间难寻。但是如果这种强制要和自由主义一致，它必须来自自然之力。如果强制需要通过某些“权威”的人和机构来执行，不管这种权威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必须通过我们认为的民主政治进程来获得，这种进程来自权威所针对的个人。这些个人能以集体的方式自由地收回这种权威。因此，权威的实施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需要不断地获得公众的承认和认可。注

和一些认为个人财产是自由社会唯一显著特征的学者不同，瓦伊纳认为民主也很必要。在这方面，他将自己和一些当代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这些当代自由主义者是态度越发冷淡的民主支持者。

瓦伊纳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比其他的一些芝加哥继承者更为温和。他还写道：

我认为，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府活动领域没有被经济自由主义的创

> 始者们充分地强调。即使在美国，这个领域也是相当紧迫。对于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来说，该领域或许构成了一个健全的自由主义社会规划过程中最重要的单一要素。这个领域就是克服个人的惰性。这种惰性是教育不足、健康状况差、营养不良、区域隔离、糟糕的传统，及首当其冲的现代社会的恶性循环的运行造成的。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贫穷滋生贫穷，并将贫穷传递给孩子，从而切断他们通往健康、知识和合理教育的通道。
>
> 自由主义国家的主要积极经济功能是发现个体身上未开发的生产能力穴口（可能不只穴口，而是大片的范围），以及通过非强制性的手段提升他们对自己和对社会的服务能力。这种功能离不开教育、保健工作、指导和补助……[注]

经济思想历史学家罗伯特·范·霍恩、菲利普·米卢斯基和托马斯·斯泰普尔福德在《创建芝加哥经济学》（2011）的引言中写道：“战后芝加哥学派的创始者们（包括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亚伦·迪雷克托）迅速背离了曾经让他们的芝加哥大学导师们神采奕奕的古典自由主义。”[注]研究奈特的著名学者罗斯·埃米特认为：“芝加哥学派主要是一种战后现象。”[注]弗里德曼学者J.丹尼尔·哈蒙德写道：“在‘二战’结束后很短的时间之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全体教员就被转化了。”[注]另一位经济思想历史学家戴维·莱德勒认为：“归根结底，20世纪60年代末的芝加哥货币传统更具单一性，更加有特色，是一个人（弗里德曼）的思想和能量的产物，不是在战争期间能够见到的任何东西。”[注]这样的论述再一次证明了战前战后芝加哥经济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同质性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安格斯·伯金在其精彩的著作《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2012）中写道：“和同时代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职业生涯后期中改变了观点），以及大萧条时期提出奥地利经济波动理论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其他经济学家相比，芝加哥经济学家，包括瓦伊纳、奈特和赛门斯对那个时期的事件做出了更为温和的反应。三人都快速谴责过度的放任主义，并且不同程度地接纳即将有的公共工程项目、累进税收制、社会保险以及有力的反倾销政策。”[注]马丁·布朗芬布伦纳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一名研究生，早在1962年就写道：“有两个而非一个芝加哥学派，雅各布·瓦伊纳的离开和亨利·赛门斯的去世是这两个学派间的分水岭。”[注]这预示了萨缪尔森后来的评论。

瓦伊纳在1946年去普林斯顿大学之前曾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对此他

在1969年给帕廷金的一封信中写道：

> 直到我离开芝加哥后……我才开始听到有关“芝加哥学派”的传闻。这个学派参与到为争取放任主义和“货币数量论”的有组织的战斗中，同时反对“不完美的竞争”理论和“凯恩斯学说”。我对此保持怀疑态度，直到我在1951年参加了一个由芝加哥大学教授们发起的会议……我从那时开始愿意去考虑“芝加哥学派”的存在性（但是这个学派不局限于经济学系也不包含整个系）……但是我绝不是有意识地去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注]

在1969年给布朗芬布伦纳的另一封信里，瓦伊纳回忆道：“我几乎没有和同事们，也绝对未曾和学生们讨论过同事们所教授的东西。事实上，我只是模糊了解他们所教授的大意……那时我参与不足，兴趣不高，之后又因为记忆力的衰退，使得我在描述初期的‘芝加哥学派’时力不从心。”[注]在1967年的一封信中，瓦伊纳写道，当在芝加哥时，“我认为我从未意识到有一个‘芝加哥学派’，当然我也未意识到自己是任何‘学派’的成员。我只是意识到自己是在‘新古典主义’的传统中”。[注]

埃米特在评论1969年瓦伊纳写给帕廷金的信时说道：“最多只能说，一个有组织的芝加哥思想学派是在1945年之前逐渐出现的。”埃米特还认为，“‘学派’一词确实只能用于战后的芝加哥，甚至可能是在1950年以后的时期，”[注]芝加哥经济学比“芝加哥学派允许的一般性解释要更加多样化”。[注]经济学家亚瑟·布鲁姆菲尔德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芝加哥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据他回忆道：“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时，从未听说或感觉到一个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存在。相反，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时个别教师思想和兴趣的多元化。”[注]经济学思想历史学家唐纳德·温奇是瓦伊纳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一名学生。他认为瓦伊纳“不能被归纳在任何明显的学说和意识形态的分类之中”——温奇特别说明，瓦伊纳不是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成员。[注]

事实的真相是，在1946年秋天米尔顿·弗里德曼、亚伦·迪雷克托和艾伦·沃利斯这些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生重新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之前，经济学芝加哥学派还未出现。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诞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特别是，倘若弗里德曼没有回到芝加哥，也就没有普通大众和学者心目中的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伯金提供了以下关于20世纪30年代期间瓦伊纳、奈特和赛门斯思想的描

述，并将这些思想和其他一些欠温和的观点并列对照。这三个芝加哥学者都渴望让自己的方法疏离他们在奥地利和伦敦的同事们的更为极端的思想。1938年奈特在评论罗宾斯的《经济规划和国际秩序》时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面对着一幅近似于全世界范围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设想的放任主义画面。”（奈特）评论道，“幻想普遍自由和手足情谊。但愿政府停止制造麻烦，政治家辞职并死去，警察的职能除外”。在1937年给沃尔特·李普曼的信中，亨利·赛门斯用更加激烈的言辞表达他的不满。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莱昂内尔·罗宾斯“关于合适的政府行为范围的见解通常疯狂的极端”，赛门斯写道：“总的来说，他们对自由事业的贡献可能是一种帮倒忙的行为。”与罗宾斯的友情让瓦伊纳在语气上稍微缓和些。但他也在私人通信中表达了同样的关切，那就是伦敦经济学院需要一个“稳定化影响”来对抗其经济学家们“在分析方法和前提选择上的教条主义倾向”。瓦伊纳认为米塞斯的著作是“真正古怪而奇特的经济学”，奈特则发现其“有点急躁和教条化”，经常简直就是“与事实相悖”。[注]这里必须要清楚的是瓦伊纳、奈特和赛门斯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瓦伊纳的立场和左右两派流行的观点均不同。很多民主主义者和同时期的自由主义者都提倡政府管理和经济调控。这是在早期新政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字母表机构”的目的，包括《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两部法案赋予政府前所未有的权力去控制和调节很多私人经济决策。根据《全国工业复兴法》，行业和企业不能降低价格、增加生产或削减工资。事实上这是在剥夺私人企业在经济大行业中的价格和生产的决定权，并将其转交给政府。同样，《农业调整法》确立了农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这是新政中瓦伊纳、奈特和赛门斯强烈反对的部分。他们懂得自由波动的价格和利润是最理想经济活动的基础。他们知道政府不能运行一个生产型经济，政府对经济决策的过度控制不但对经济产生反作用，也违背了个人自由。

然而，当涉及大萧条面临激进的国家财政货币政策时，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这时，包括瓦伊纳在内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以及几乎整个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学界都呼吁激进的和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20世纪30年代早期最重要的芝加哥经济思想历史学家J.罗尼·戴维斯写道：“弗兰克·H.奈特、亨利·赛门斯、雅各布·瓦伊纳和他们的芝加哥同事们，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早期都在为使用庞大而持续的赤字预算来和当时大规模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作斗争。”[注]在提倡激进的政府财政货币政策的态度上，芝加哥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与他们在伦敦和维也纳的同事截然不同。这些同事在大萧条严峻的政治经济危机中采取的是政府不作为的战略或政府不干涉的途径。当然，美国的大萧条比其他国家都要严重。此外，瓦伊纳和芝加哥的其他人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他们反对任何国家征收关税，认为那样做会适得其反。

瓦伊纳颇具先见之明。虽然学术界对他和后来弗里德曼关于大萧条的观点

的相似性程度存在争议，但是在1933年2月，瓦伊纳这样评论当时人们普遍对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持的异议："自大萧条以来，银行信贷余额总量的净增长从来没有维持到四个月；相反，政府和联邦储备银行的运营远不足抵消会员和非会员银行的信用收缩。从1929年底以来一直没有银行信贷的净通货膨胀，在这期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比较连续的且前所未有的信用大收缩（着重后加）。"[注]早在1933年，瓦伊纳就把1929—1933年的这段时期称为"大收缩时期"。后来弗里德曼也倾向于这样描述该时期。

1932年，瓦伊纳指出："除非一个不时被迟来的通胀和通缩的顺势疗法间断并因宣布无能而合理化的漂移方案可以被接纳为央行政策的合理成分；否则的话，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相比，美联储并未向外界展现更多制定一贯政策的能力。"[注]他还指出："虽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做出了比其他央行机构更多的努力去建立一个以稳定为目的的信贷控制方案和方法，它却在关键时刻发现自己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目的相悖。"[注]这几乎就是后来弗里德曼对美联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角色的描述。弗里德曼后来问道："有了解我作品的人去读瓦伊纳的评论而没有发现它们和我的《货币史》之间的直接联系吗？……我自己读了瓦伊纳的论述，很震撼地发现它是多么精准地预示了《货币史》针对大萧条时期的主要论点。"[注]

弗里德曼回忆其特别受到瓦伊纳课程的影响："毫无疑问，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知识体验就是上雅各布·瓦伊纳第一季度的经济学理论课程。它为我打开了一个我未曾意识到其存在的世界。它使我意识到了正式经济理论的美和力量。"[注]其中那些力量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理论。瓦伊纳是位"伟大的老师"，弗里德曼回忆，"他使我认识到经济理论不是简单地由一套脱节杂乱的命题组成，而是一个连贯的有逻辑的团结一致的整体"。[注]

萨缪尔森回忆瓦伊纳"著名的"经济理论研究生课程："由于其知名度，它被认为是当时美国开设的最好的经济理论课程。"[注]萨缪尔森还写道："在我于芝加哥大学上学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它的经济系是美国最好的，[注]没有比雅各布·瓦伊纳更伟大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了。"[注]

瓦伊纳完全是伟大的英美古典主义自由政治经济传统的一部分。该传统认为，以私营经济为主体，充分有效地结合政府，可以达到最佳政体形式。当然这种政体在学术上并不完全一致，在结构和成果上也并不完美。瓦伊纳在价格理论课程上对价格体系及其协调作用的强调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虽然后期他并未坚持经济理论的数学化革命，但他是20世纪早期经济学领域微观经济学运动的一位领导者。他对经济理论的过度数学化往往保持怀疑态度并且强调真实、实际生活的实证性和相关性。

瓦伊纳在芝加哥大学一直待到1946年冬季学期，随后他搬到了普林斯顿大学，部分原因是他和妻子可以离孩子们近一些。在普林斯顿，他开始对宗教感兴趣，有些像在芝加哥时候的奈特，但是他在宗教上采取一种不同于奈特的更加系统化的方式。瓦伊纳的最后一本主要著作是《宗教思想和经济社会》，在瓦伊纳去世后该书的前四章于1978年发表。

在这本书里，他追溯了基督教的历史及其对经济学的影响，涵盖早期的基督教教义和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出现之间的联系。他强调早期基督教思想中的来世理想世界。关于现代的发展，他写道："新教教义通过强调在《福音书启示》翻译过程中的个人自由意识，不但强调了教育，还促进了自由检查习惯的养成——这些都有益于公民自由发展和经济文化的进步。"注

温奇认为，瓦伊纳"是其所在时代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及学者"。注1950年一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报告指出，瓦伊纳"是该领域中最为杰出、最为刻薄的争论者"。注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瓦伊纳去世后的一篇回忆录中称其为"当时我们学界的全能型人才"。注瓦伊纳不是单一领域的专家，他涉及的领域覆盖20世纪经济学的大部分范围。

罗宾斯回忆他在20年代末和瓦伊纳的第一次私人交往："他对我来说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学家，是我所知道的在思辨、思维中最为敏锐的一个人。他拥有一系列广泛的学识，实用的信息，和对事实复杂性的尊重，这些都是我之前从未遇到过的。"罗宾斯同样指出："瓦伊纳对纯分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丰富了应用经济学文献。他在任职期间担任公务员和顾问。他是一名伟大的教师和学者。"注罗宾斯在自传里补充道："如果让我评价他的个人品质，我不知道应该更多地强调什么：他的正直和独立？他辩论的热情和才智或者他在天主教判断上的节制？我确信，在我们每次见面时滔滔不绝的聊天中，我从他那里获得的学识和实践智慧比过去四十年中从其他任何同事身上获得的都多。"注

在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加里·贝克尔是瓦伊纳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本科生。他说："在普林斯顿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一位之前在芝加哥任教的教授——雅各布·瓦伊纳。他是当时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他……在普林斯顿教授研究生课程。虽然我当时在完成本科学业，但我在那里上了很多研究生课程。我上了两门瓦伊纳教授的研究生课程并且非常喜欢它们。"注贝克尔补充说道："瓦伊纳强调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相关性，并主张用历史的和其他实证的证据来检验理论。因此他带来的影响比奈特更加长久。"注

埃米特认为，“瓦伊纳是美国20世纪主要的经济理论家之一”。[注]他称瓦伊纳为“经济学大师”，并指出“瓦伊纳对经济思想史的贡献包括对亚当·斯密坚持严格放任主义的重新评价和对宗教与经济学关系的重新审视”。[注]经济思想历史学家马克·布劳格认为，“瓦伊纳明显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历史学家”。[注]斯皮格尔认为，瓦伊纳关于经济思想历史的著作“举世无双”[注]。

罗特温敏锐地洞察道：“与后来视政府为自由首要敌人的芝加哥学派不同，瓦伊纳（认识到来自强制的自由本身就是政府强加约束的产物）至少同样关注如何保护个人不受其他个人或私有机构的强制约束。”罗特温注意到，瓦伊纳和后来芝加哥学者在观点上的“根本不一致性”在于他们各自对经济世界和社会的总体看法。他补充道：“瓦伊纳的总体看法和对政府活动严格限制的背景彻底不协调。”[注]

瓦伊纳是布鲁姆菲尔德的论文导师。布鲁姆菲尔德回忆道：

> 关于瓦伊纳个人总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可能很多在芝加哥大学上过他著名的价格理论课程的人仍然记得他，主要因为他对学生很粗暴（据我所知，其实他并非如此，他在普林斯顿课堂上时已经变得温和了很多）。有些人认为他十分傲慢，认为他经常会用不必要的尖锐刺耳的评论或过分批判的评价引起人们的反抗。然而，大部分和他私交很好的人却有很不一样的看法。就像我自己，可以坦率地说，我认为杰克·瓦伊纳是我知道的最为善良、体贴，最有启发性和最具智慧的人之一。[注]

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威廉·鲍莫尔是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时的同事与瓦伊纳结识。他印象里瓦伊纳是善良的、热情的、风趣的，最重要的是慷慨地用自己的能量和时间帮助他人。[注]从瓦伊纳所受尊重的程度可以看出，他受到很多著名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几十年来，作为一位备受尊重的同事，他和世界上很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们保持着广泛的通信往来。

除了学术界的工作，瓦伊纳还多年担任美国财政部、国务院及美联储顾问。此外，他还就社会保险的创立和贸易问题提出建议。他在1939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并在1962年获得享有盛名的弗朗西斯·A.沃克尔奖。该奖项早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每五年颁发一次。瓦伊纳和奈特一起担任了18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主编，期刊总部位于芝加哥。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和大部分主要在共和党政府服务或由其任命的芝加哥自由主义继承

者们不同，瓦伊纳主要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利·S.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服务。

在1964年的一篇文章《作为“福利国家”的美国》中，瓦伊纳总结道：“和其他任何竞争体制相比，福利国家是真正值得人们为其斗争并献身的。因为，虽然它在理论和实践上还不完美，但总体上比其他社会体制提供了更多保护并扩大了人类自由和现世繁荣，消灭大众痛苦，提升人的尊严和道德的希望。”注 在1965年一篇关于亚当·斯密的文章中，瓦伊纳写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到，一个伟大国家的改革者和立法者是最伟大最高贵的人物。”注 瓦伊纳和凯恩斯、哈耶克及其他人一样，相信知识分子的思想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瓦伊纳把他理想中的最佳社会秩序的特点描述为：“有一个完全自由和竞争的市场。这种市场可以在福利国家的环境中获得。这样的福利国家消除了大范围的贫穷，驯服了商业周期，创造了平等的机会，允许存在私有财产、允许家庭和人们之间在能力和动机上的生物性差异。这样的乌托邦比起放任主义更接近于现代‘福利国家’。”注

---

1. 亨利·斯皮格尔，“雅各布·瓦伊纳”，见伊特韦尔、米尔盖特和纽曼主编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7），p.812。

2. 有趣的是，弗里德曼在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序言中列出一些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同事和朋友”。弗里德曼“将该书所表达的哲学理念归功于他们”。弗里德曼列出的这些人包括奈特、赛门斯、明茨、迪雷克托、哈耶克和斯蒂格勒。瓦伊纳未被列入其中［《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2），p.xvi］。

3. 保罗·A.萨缪尔森，“雅各布·瓦伊纳”，见爱德华·希尔斯主编的《怀念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p.538。

4. 詹姆斯·布坎南，“前言”，见弗兰克·奈特，《自由与改革：经济学与社会哲学文集》。

5. 迪特尔·普勒韦，“引言”，见菲利普·米卢斯基和迪特尔·普勒韦（主编），《自朝圣山之路》（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p.29。

6. 唐·帕廷金，《芝加哥传统论文集》（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81），p.44。

7. 尤金·罗特温，“雅各布·瓦伊纳与芝加哥传统”，《政治经济史》（1983

年夏），p.265。

8. 萨缪尔森，《雅各布·瓦伊纳》，p.534。

9. 雅各布·瓦伊纳，《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8），pp.244-245。

10. 雅各布·瓦伊纳，《经济学知识史文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pp.219-200。

11. 雅各布·瓦伊纳，《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p.122。

12. 雅各布·瓦伊纳，《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p.134。

13. 罗伯特·范·霍恩、菲利普·米卢斯基和托马斯·A.斯泰普尔福德（主编），《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最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p. xix。

14. 罗斯·艾米特（主编），《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埃尔加指南》（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2010），p.3。

15. J.丹尼尔·哈蒙德，《战后芝加哥价格理论发展》，罗斯·艾米特（主编），《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埃尔加指南》（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2010），p.7。

16. 戴维·莱德勒，《芝加哥货币传统》，J.丹尼尔·哈蒙德，《战后芝加哥价格理论发展》，罗斯·艾米特（主编），p.77。

17. 安格斯·伯金，《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p.15。

18. 马丁·布朗芬布伦纳，《有关“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杂志》（1962年2月），pp.72-73。

19. 帕廷金，《芝加哥传统论文集》，p.266。

20. 亚瑟·布鲁姆菲尔德，《雅各布·瓦伊纳诞辰一百周年：对其生平和著作的回顾》，《经济文献期刊》（1992年12月），p.2058。

21. 亚瑟·布鲁姆菲尔德，《雅各布·瓦伊纳诞辰一百周年：对其生平和著作的回顾》，《经济文献期刊》（1992年12月），p.2058。

22. 罗斯·B.埃米特，《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功？》，见沃伦·J.萨缪尔斯、杰夫·E.比德尔和罗斯·B.埃米特主编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宾利：JAI出版社，2008），p.48。

23. 约翰·范·奥弗特韦德，《芝加哥学派》（芝加哥：阿加特出版社，2007），p.9。

24. 亚瑟·布鲁姆菲尔德，《雅各布·瓦伊纳诞辰一百周年：对其生平和著作的回顾》，《经济文献期刊》（1992年12月）p.2058。

25. 唐纳德·温奇威廉·J.鲍莫尔和艾伦·范·西勒，“雅各布·瓦伊纳”，《社会科学国际大百科全书》第十八卷，《传记补充》，戴维·L.西尔斯主编（纽约：自由出版社，1979），p.783。

26. 伯金，《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p.35。纳什同样指出，一些人认为，米塞斯对他自己所提倡的事业有负面的影响。这种影响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他引用了赛门斯1944年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由于米塞斯的极端性，他“或许是自己自由主义事业最大的敌人”[见《美国保守知识分子运动》（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76），p.351]。

27. 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评论家的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1972年10月），p.937。

28. 罗伯特·J.戈登（主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框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p.166。

29. 罗伯特·J.戈登（主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框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p.165。

30. 罗伯特·J.戈登（主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框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p.165。

31. 罗伯特·J.戈登（主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框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p.167。

32. 萨缪尔森，《雅各布·瓦伊纳》，p.543。

33. 保罗·A.萨缪尔森，《雅各布·瓦伊纳，1892-1970》，《政治经济学期刊》（1972年1-2月），p.6。

34. 迈克尔·森伯格、阿隆·A.戈德斯曼和拉尔·兰姆拉坦，《保罗·A.萨缪尔森：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纽约：乔治宾多出版社，2005），p.16。

35. 威廉·布赖特和罗杰·兰塞姆，《学术文人》第3版（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8），p.226。

36. 威廉·布赖特和巴里·T.赫希（主编），《诺贝尔之路：18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第4版（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4），p.70。在对瓦

伊纳的讣告中，弗里德曼称他是“我们时代以及所有时代的一位伟大的导师和学者”[见《悼念雅各布·瓦伊纳，1892-1970》，《美国经济评论》（1971年3月），p.247]。

37. 雅各布·瓦伊纳，《宗教思想和经济社会》（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78），p.176。

38. 唐纳德·温奇，《知识历史学家雅各布·瓦伊纳》，见沃伦·J.萨缪尔斯（主编），《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第1卷（格林威治，康涅狄格州：JAI出版社，1983），p.2。

39. 约翰·麦克唐纳，《经济学家》，《财富》（1950年12月），p.111。

40. 莱昂内尔·罗宾斯，《雅各布·瓦伊纳，1892-1970》（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pp.1-2。

41. 莱昂内尔·罗宾斯，《一位经济学家的自传》（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1），p.200。

42. 卡伦·伊尔丝·霍恩，《通往智慧之路：和十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对话》（切尔滕纳姆，英国：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2009），p.139。

43. 加里·S.贝克尔，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政治经济学杂志》（1993年10月），p.761。

44. 加里·S.贝克尔，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政治经济学杂志》（1993年10月），p.761。

45. 罗斯·B.埃米特（主编），《1892-1945芝加哥经济学传统》第6卷（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2）pp.vii-viii。

46. 罗斯·B.埃米特（主编），《1892-1945芝加哥经济学传统》第6卷（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2），p.vii。

47. 罗斯·B.埃米特（主编），《1892-1945芝加哥经济学传统》第6卷（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2），p.vii。

48. 亨利·斯皮格尔，《经济思想发展》第3版（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p.642。

49. 罗特温，“雅各布·瓦伊纳与芝加哥传统”，pp.266-267，p.278。

50. 亚瑟·布鲁姆菲尔德，《雅各布·瓦伊纳诞辰一百周年：对其生平和著作的回顾》，p.2082。

51. 威廉·鲍莫尔，《雅各布·瓦伊纳在普林斯顿》，《政治经济学杂志》（1972年1-2月），p.12。

52. 罗特温，《雅各布·瓦伊纳与芝加哥传统》，p.277。

53. 约翰·雷，《亚当·斯密生平》（该书的引言用的是雅各布·瓦伊纳的文章）（费尔菲尔德：奥古斯都·M.凯利出版社，1977），p.31。很难想象，很多当代自由主义者从非常积极的角度提到改革者与立法者。再一次呼吁人们关注当代自由主义者与斯密、瓦伊纳及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分歧的程度。

54. 罗特温，《雅各布·瓦伊纳与芝加哥传统》，p.277。

第三章
芝加哥大学之前的弗兰克·奈特

事实上，很难（至少对于本书作者而言）理解弗兰克·奈特曾经受到的，以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受到的，来自原来一些学生和其他人的极大的尊重。奈特通常被认为是战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导者和前辈。同事眼中的奈特是一个粗暴无礼的人：他嘲讽他人的工作，这种行为放纵、欠考虑且毫无益处。虽然他很聪明甚至可以说是才华横溢，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没有一种真正的学说或具体的公共政策建议可以完全归因于他的贡献。他的作品与其说是关于经济理论或公共政策领域不如说是哲学领域。他幽默感十足；他在家庭中很冷漠；他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更多的是通过他的一线教学经历而不是他的著作。至少本书的作者认为，他出版的作品几乎没有实在的持久的价值。

20世纪40年代中期，芝加哥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唐·帕廷金，对作为教师的奈特进行过最好的描述。在1972年奈特去世时，他这样写道：

> 什么是一位伟大老师的标志？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在课堂上传达的自身的品质：个人的诚信、对知识的好奇心、对学生的激励、谦卑和广泛的兴趣。
>
> 其次，他传递给学生的真知灼见和理解力——看待事情的新方式。这些见解经常是他的原创，即使不是，也反映了他的判断力，判断出什么是现有知识中重要的从而值得人们去强调的部分。一位伟大的教师的标志还包括：他传递给学生的知识始终很重要。这些知识在很多年以后还继续指导着他们的思想，同时这些学生反过来也认识到这些知识的重要性并希望继续把它们传递给自己的学生。
>
> 鉴于上述各个方面，弗兰克·奈特是一位伟大的老师。[注]

人们对于奈特的祖先了解甚少。他的儿子贺拉斯写道，奈特来自一个“有多位成员都是牧师的家庭”[注]。在当时，牧师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奈特的两个兄弟都上了大学（后来分别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他们的母亲会希腊文。她用希腊文指导儿子们考上了大学。

童年的奈特对宗教深信不疑，但他后来成为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在他的一生中，包括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从与后来的情况略为不同的视角），极力反对天主教。在成长过程中，他是一名原教旨主义者和一名福音派的普利茅斯弟兄会成员。普利茅斯弟兄会也被称为基督教会，和基督会有联系。从神学方面看，普利茅斯弟兄会在过去和现在都秉承着最严格的基督教观念。《圣经》是准确无误的上帝的语录。《圣经》里的每一个词都真实而准确。人们应当把生命的每一时刻都献身于上帝并投入他的道路当中。

奈特很聪明，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不能接受一个虔诚的原教旨主义世界观。他对宗教的反映是一个在科学突飞猛进时代里的理性主义者的反映。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绝对主义，而且把它变成了科学的世界观。他不遵循基督教的道德教训。他是一个哲学的享乐主义者，把最大化的快乐幸福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他是英语国家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传统的一部分。这种传统源自霍布斯。霍布斯创造了很多重要的现代生活社会观念。

有一个故事被人们经常讲述：一次，奈特和弟弟妹妹们在教堂签下承诺书，保证今后虔诚地去教堂礼拜后，奈特领着他们来到家里的谷仓后面，以被迫签订的承诺书不具约束力为由带头烧掉承诺书。这个故事有不止一种解读：它可以也通常被理解为描述了年轻时候的奈特是多么的不虔诚；当然还有其他可能的解读。奈特具有一种相当强烈的新教徒自由意志观念。他大概每周日都去教堂礼拜，一直坚持到上大学。甚至后来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及孩子都是唯一神教派教会的成员。虽然这个故事清楚地说明了他像其他人一样缺少对宗教权威的尊重，但这也同样例证了一种激昂的新教徒观点：自由意志和选择高于一切。

1905年秋天，20岁的奈特为读大学做准备上了一年半高中。他颇有点属于大器晚成型：31岁获得博士学位，42岁才到芝加哥大学担任永久教职。和后来的情况不同，在当时，人们更可能在更年轻时获得这些荣誉。

奈特最初就读的是田纳西州哈里曼的美国大学，这是一所普通学院。贺拉斯·奈特写道，在他父亲入学时，“他的天文学教授是个牙医，家政学老师是某人的管家”。[注]美国大学的确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弗雷德里克·克什纳，圣经学院和现代语言的系主任和教授。克什纳是一位宗教上的保守主义者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克什纳对奈特以及整个奈特家族都有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在奈特就读期间不幸倒闭（按照贺拉斯·奈特的说法，它有“野心勃勃的大计划，资金上却捉襟见肘”[注]）。之后，奈特跟随克什纳到了田纳西州的密立根学院。克什纳在那里就任新的学术职位。后来，奈特的弟弟梅尔文师从于克什纳。梅尔文和奈特一样，在克什纳搬

到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时，跟随其从密歇根到了得克萨斯。奈特的另外一个弟弟布鲁斯，也就读于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

克什纳是基督会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基督会是十八九世纪美国复兴运动的一部分。复兴运动力图重建原来耶稣传教活动几十年之后的教堂。克什纳的一些作品现在还被放在基督会的网站上。这些作品包括一个有关“基督教洗礼之地”的章节、一本《基督教联合会序曲》、对《托马斯·坎贝尔宣言与致辞》的解读以及对一本有关坎贝尔著作的序言（托马斯·坎贝尔是基督会的创始人）。这些作品表明克什纳是一个考虑周全、宽容大度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在当时那个高等学院稀少的年代里，他还差点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除了神学领域的工作，他还教授外语，包括德语和法语。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

1905—1907年，奈特在美国大学学习了两年。每年学费125美元，宿舍费每月1美元。除了上自己的课，他还是数学、科学课的助教和教职员秘书。在美国大学时，他还以通信的方式学习了芝加哥大学的两门课程——物理和三角函数。这是他和芝加哥大学的第一次接触。在美国大学待了两年后，他在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博览会上担任作品指导秘书。

1908年，他进入同样位于田纳西州的密立根学院学习。克什纳在美国大学倒闭后也来到了密立根，并担任院长。约瑟夫·道夫曼是20世纪中期美国首屈一指的经济思想历史学家。道夫曼认为，奈特是一个“个人业务部”。[注]虽然他自己还是个学生，却帮助教授记账、速记、打字和商法。1908年，奈特在密立根遇到了后来成为其首任妻子和前四个孩子母亲的密涅瓦·奥南·谢尔本，他们于1911年奈特毕业时结了婚。两人的儿子贺拉斯后来在参观密立根时有下面的论述：“学院占地135英亩，其校园很美。学院对男女学生的行为和饮酒执行严格保守的基督教标准。”[注]毫无疑问，这些标准在弗兰克和密涅瓦还是学生的时候更为严格。

在奈特就读期间，密立根学院开设了文学、科学和哲学等课程。奈特和密涅瓦一起上了哲学课程。贺拉斯称其父母是“聪明的学生”。[注]和美国大学一样，密立根和基督会也有联系。1910—1911年的课程目录上记录奈特上了拉丁语、英语、法语、数学、哲学、新旧约历史和基督教教义与政治等课程。和在美国大学就读时一样，奈特在密立根也担任教职员秘书。

1910年奈特在密立根学院第一次上经济学课程。当时用的课本是查尔斯·杰西·布洛克著的《经济学研究导论》。布洛克是20世纪前叶哈佛大学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奈特在美国大学和密立根学院所上的包括礼仪课程在内的所有课程中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人们通过奈特当时在和谐福音书上所做的笔记，可以清楚地了解其后来在本科时所持的观点。虽然这些笔记表明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但并不一定就说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至少在当时还不是。很明显，奈特在和这些问题作斗争。下面的内容来自《新约》，并附上奈特手写的评论：

> 马克8:34：“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对个人和人类有什么影响？功利主义对善的标准与理想主义标准对抗。有无任何的理想主义标准在功利主义标准之上？（奈特标注下划线）
>
> 马太7:12：“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但这不是圣经的全部也不是它最好的部分……
>
> 马太14:20：“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没有任何浪费。基督是节俭的。
>
> 路加19:44：“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对无知的惩罚和对蓄意的犯罪一样。罪恶和错误有什么终极的区别吗？
>
> 约翰15:12：“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基督没有给真正的命令。注

奈特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读过的东西做大量的注释和标注。

在奈特从密立根毕业的时候，克什纳写道：“从敏锐的洞察力的角度来看，或从能够让人在一眼之间‘洞悉事物’的罕见能力来看，他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他补充道，奈特是大学里最博学的学生，最好的速记员，并且拥有“实用的经营能力和技术知识”。注

奈特学术生涯的下一站是田纳西州大学。他和密涅瓦搬到那里并于1911—1912年在那里求学。1913年，28岁的弗兰克在此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专业是德语，写的是关于格哈特·霍普特曼的硕士论文。19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霍普特曼是一名德国剧作家，他发起了现代德语文学的自然主义运动。多年以后，据一位教授回忆，奈特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但是太过悲观，受叔本华的影响过深”。注1912年至1913年期间，奈特上了一门经济学课程和两门哲学课程。这些课程强调了经济思想史以及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人物。

奈特明显地对德国兴趣浓厚，并且希望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到那里学习，然而，期望中的经济支持未能兑现。1913年他获得奖学金去康奈尔大学学习哲学，之后很快从哲学转到了经济学。在康奈尔他获得了学术上的绽放，并于191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奈特在这短短的几年里所掌握的经济理论知识的深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注

奈特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的故事经常被人效仿。就像他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之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艾尔文·约翰逊所讲述的：

> 奈特来自田纳西，边境州的饮食让他消化不良并总是一副悲观的表情……我发现他是我教过的学理论最聪明的学生。当我在阐述一些理论细节时，他充满怀疑的双眼中那道灰色的光就会投向我，仿佛在说，“我一点也不信”。有时候他会有力地抨击我的立场……
>
> 在一个春日里，奈特带着一脸罕见的悲伤来找我。“博士，”他说，“我想……我在哲学专业学得很好。但是（詹姆斯·）克雷顿把我叫去，极度严厉地斥责了我，说我完全不适合学习或教授哲学；说事实上我应该放弃教任何东西的想法，因为照我的态度来看对我是弊多利少。我到（弗兰克·）梯利那里寻求安慰，他把我说得更加糟糕。”
>
> 我震惊了。两个头脑如此清醒的哲学家会在像奈特这样有前途的学生身上犯这样的错误？我没法相信，我就直接去找了克雷顿。
>
> “奈特？”他寒心地说：“并不是他完全没有能力。他那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让他批判所有的哲学价值。作为一个老师或作家，他将会……毁掉他所接触到的所有真正的哲学精神……我们哲学界和他将无任何瓜葛。”注

约翰逊是20世纪前叶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和公共知识分子。除了教学，他还是《新共和杂志》的主编和纽约社会研究学校的共同创始者。该组织自建立到“二战”爆发的这段时期里，援助了很多移民到美国的犹太教知识分子。约翰逊的自传中包含了上述回忆内容。在约翰逊的自传出版后，奈特向其致信寻求更多的细节。约翰逊回复道：“我了解你这样的人，你来自一个每个人都带着怀疑一切想法的恶臭环境。你怀疑我的叙述，对我来说很好……但是你的专业教授们……对此不喜欢。”注

理查德·霍威强调了约翰逊在奈特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奈特在1913—1914学年学习了约翰逊的两门课程：“经济思想史”和“价值与分配”。霍威

认为，奈特“或许的确欣赏约翰逊教授的课程”。霍威写道：

> 这两门课程的主题成为奈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教授最频繁的主题……和后来的奈特一样，约翰逊经常谈及其他一系列问题。他从来不在过去的经济理论上多费口舌，为此他为学生布置阅读三种语言的课本。他让学生的钱花在刀刃上。按他自己直言不讳的让人难忘的评论来说，给予学生在其他地方不能碰到的课程，即使在他自己的书里，也让学生能有更大的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注]

仅在约翰逊“经济理论史”一门课程中，奈特就做了一百多页单倍行距打印的笔记。

> 人类喜欢把自己的同胞当成某种历史文献。如果这种文献没有破译的可能则是不实用的。
>
> 我们所有困难的根源是我们宣称从理论上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中年人通过地位的幸福概念避免了这一点。
>
> 休谟是一位很好的传统哲学家，不因自己无知而骄傲。在所有曾经撰写过英文散文的人当中，休谟是最值得一读的。他使用通俗易懂的英语，不做假设不做作。他用16页纸的篇幅对货币理论进行了相当完整的阐述。
>
> 穆勒和亚当·斯密是仅有的伟大的古典经济学作家。从斯密时代到1850年期间，最好的古典经济学著述就在穆勒那里，这一点依旧正确。[注]

奈特在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生涯中的主要项目是他的毕业论文，“商业利润理论”[注]。在论文的改写发表版《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的前言部分，奈特写道，“1914年春天，艾尔文·约翰逊博士建议了这个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在约翰逊离开康奈尔后，研究主要在阿林·A.杨格教授的指导下完成”。[注]杨格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同时担任美国统计学会和美国经济学会两个学会的会长，曾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康奈尔大学以及其他许多院校任教。在收到论文终稿后，他致信奈特：“无疑这是经过我手的最好的论文。我猜想，它应当对确定你的经济学家声誉有很大帮助。我怀着钦佩和愉悦的心情读完了这篇论文，的确从

中获得了很多知识上的启发。”[注]在书出版时，奈特致信杨格：“再次感谢您对该书慷慨的评价，我再一次清晰地认识到，本书大部分的优点都应当归功于您。如果当时条件允许我更充分地采纳您的建议，书会写得更好。然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些建议丢弃。不管我今后做什么，它们对我都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注]杨格随后给奈特回信：“我越来越被我们所持立场的根本稳固性打动，即我们都认为社会科学必须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注]

1916年6月，《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在康奈尔大学得到了认可。次年，奈特将其递交到当时一个顶级的经济学论文比赛上，该书在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奈特在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之后1917—1919年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由于他的童年是在距离芝加哥仅100英里的地方度过，因此毫无疑问，他早就了解芝加哥大学并把它作为首选的学术场所。

奈特后来获得的修订论文的机会或许比其教书经历更加重要。他在发表版的前言里写道，在芝加哥大学，他在约翰·莫里斯·克拉克的编辑监督下对论文进行了彻底的修订；他从和查尔斯·汉迪的讨论中获益良多；奈特同样致谢瓦伊纳：“芝加哥大学的雅各布·瓦伊纳教授亲切地审阅了整本书。”[注]

很明显，瓦伊纳和奈特之间从未有过任何职业嫉妒和竞争，但是他们也非密友。伯金认为：“20世纪20年代奈特在爱荷华大学时，他们（瓦伊纳和奈特）有特别密切的通信往来……他们并不是很亲密的朋友。在战后瓦伊纳转到普林斯顿大学后的数年里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注]瓦伊纳是那些在1927年强烈支持为奈特在芝加哥大学提供一个职位来代替约翰·莫里斯·克拉克的人之一。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让奈特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哈耶克认为，这本书“成了一部经济理论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教材，它的地位保持了多年，其实该书写作的初衷并非如此”。[注]埃米特认为，这本书确立了奈特作为美国著名理论家的声誉。[注]奈特力图修改和创建经济理论来检验并解释利润产生的方式。他的主要观点是：利润不是生产成本和风险的结果，利润的来源是不确定性，是模糊的。不像风险，是可知可测可保险的。利润来自对不确定情况的正确猜测。

奈特遵循一种源于美国商业历史的经济学传统，强调企业家的重要角色：“论文对自由企业理论做的特别的技术贡献是对企业家或企业角色的

全面的和更加仔细的探究。”[注]成功的企业家拥有长时间的有效的经济洞察力，这是其利润的来源。

奈特认为他自己和穆勒一样，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坚持经验是所有推理的根本。奈特还说他是一个“逻辑上的激进经验主义者，也就是说，就理论推理而言，认为在直接的经验事实之上的所有问题都是不可知的”。[注]和瓦伊纳的作品预示了弗里德曼关于货币理论的作品一样，奈特的作品在方法上勾勒出一些弗里德曼作品的轮廓。当弗里德曼在“积极经济学方法论”中概括出他的方法论时，奈特早在三十年前就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写道：“科学的目的是预测未来，旨在使我们的行为明智。”奈特在此指出了“做准确预测”[注]的重要性。弗里德曼类似的陈述是：“积极科学的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理论’或‘假设’。这个‘理论’或‘假设’能够获得与未被观察到的现象相关的有效的和有意义（即不平凡的）的预测。”[注]奈特认为，“对于可能作为一种狭义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区分期望的结果和可取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注]这一点也和弗里德曼的观点相似。

类似地，奈特还预示了弗里德曼关于数学在经济学中恰当地位的观点。在谈到经济学家们关于理论观的意义和作用的不同观点时，奈特说：“在一个极端上，我们有数学经济学家和纯理论家。对他们而言，在一个从少量的被假定为普遍法则的前提演绎而来的封闭系统之外，没有什么是科学的。在另外一个极端上，有一种强烈的并可能是不断增长的倾向，即完全否定抽象和演绎，坚持一种纯客观的描述性科学。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注]奈特还说道：“数学经济学家通常首先是数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他们倾向于将数据过度简单化并且低估假设和生活事实之间的分歧。其后果是，他们不能将相关的描述以实用经济学家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展现出来，也不能让这些实用经济学家们认识到他们的陈述和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注]奈特和芝加哥大学其他人一样，反对经济学数学化。1921年，他做出不准确的预测：“数学经济学……对大家来说，除了少数首倡者外，很可能只是一种狂热的崇拜。大家对其一窍不通。”[注]

他无疑是一位聪明的精英分子：“有一件事很清楚……从公正分析和批评的意义上来说，大众‘想得’很少……吸引从众者的东西一定是简单且浪漫的；他们最喜欢的准则是‘我相信它是因为它不可能’，最喜欢的政策是政治迫害。”[注]弗里德曼认为，奈特班里三分之二的学生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注]奈特阅读广泛，虽然关心中欧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大部分的阅读来源是英美经济学传统的文献。他引用观点最多的经济学家包括密尔、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约翰·贝茨.克拉克。奈特提供了精彩的历史分析和深

刻的观点。例如，在有关经济理论中利润观的发展上，他评价道，在19世纪，这主要和新型的商业组织通常使用新技术而获得的实际增长盈利相联系。他指出，第一个“美国利润领域的显著发展标志是弗朗西斯·A.沃克尔将军的著作”。沃克尔是19世纪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也是美国经济学会首任会长。

奈特观点的最终结论是支持自由市场。他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因而支持能让企业蓬勃发展的制度，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奈特在支持放任主义的过程中毫不武断。他承认政府发挥的重大作用，这种作用不但体现在给予夜警国家自由主义的最低限度，还体现在其他广泛的领域中。不完美的男男女女们通过相关讨论以及不完美的制度不完美地决定了这些领域的范围。他的怀疑论和精英主义使得他对民主政府能否提供社会弊病的解决方案深表疑虑。但是他同样相信，考虑到人类的缺点，民主自由的言论有希望获得任何可能存在的进步。此外，国家权力的集中，无效且专横。

奈特关于斯密的观点和瓦伊纳的类似，奈特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

> 真正的放任主义经济学家容许某种例外，这种例外开辟了一条更加违背原则的道路……这尤其适用于运动的伟大使者亚当·斯密。所有个人自由主义者已经意识到限制个人自由和国家行为的必要性……当然，国家通过税收来获取相关支持。税收政策的自由主义概念总是更倾向于平等化……此外，自由主义总是毫无异议地接受这样的教条，即社会中的每位成员都有权利在由社会总体支付费用的情况下按照某种最低标准生活……亚当·斯密和其他自由主义者认识到，为年轻人提供教育和提供各种不同程度的活动来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科学、艺术、大众文化的进步是国家的合法功能和任务。

奈特还说：“斯密并不教条化地提倡政府对经济事务采取不干涉的政策……我们无法辨别，在后来19—20世纪的情况下，他对工厂行为、社会保险尤其是以促进平等机会为目的的措施上会有何种可能的态度。这些新型法规的目标并不违背他的主要惯例，或者和他的一般经济哲学相冲突。”奈特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正如我们所知，代替专政的无非就是整体上的民主，按照我们熟悉的路线，尽力去解决专政带来的问题。民主意味着通过思想和行为上的合作去促进道德、智力和美学等各方面的进步。这些进步的基础是物质和技术的进步，同时受到渐进主义的限制并且夹杂着幽默和娱乐的成分。这种结合诠释了自由主义的意义。”以上文字是对自由主义信条很好的论述。毫无疑问，他希望《风险、不确

定性和利润》一书能从专业上给予他帮助。1919年，在该书出版前，奈特成为爱荷华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教授经济思想史。1922年，在该书出版后，他成为教授。

了解奈特、瓦伊纳和亨利·赛门斯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件有趣的事。很难证明这三人自觉地形成了一个学派。伯金再一次提供了最权威的论述：

> 虽然有些他们的学生会继续把可追溯的连贯性归因于他们在芝加哥的时光，但是奈特、瓦伊纳和赛门斯三人之间并未表现出多少亲密关系，也并未意识到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团体……某些学生、同事及后继者们将这些战争期间的芝加哥经济学家随意地归类成一个团体，但是人们只能通过反驳该团体的挂名成员的相反的影响来接受这个术语。
>
> 在他们的私人交往中，相互之间并未表现出多少热情。实际上他们并不相信彼此的观点可以联合，而是表现出对彼此世界观的怀疑。
>
> 早在1925年，瓦伊纳就对赛门斯的能力持保留意见……在赛门斯和奈特从爱荷华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后，瓦伊纳对他的年轻同事的印象更加僵化……至少有一次他（瓦伊纳）对赛门斯的任职投了反对票。……注
>
> 在宗教观方面，从奈特1922年给克什纳的信中可以窥见其当时的观点：
>
> 我正在读伯金的《耶稣的伦理》，我想读很多这类的书。我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即西方文明的精神和基督教对立（原文如此），也弄不明白如果它不是这样怎么会是西方文明呢。在我看来，问题是如果人们不放弃物质和科学的进步（我是不愿意放弃的），还能在基督教的道路上走多远。我希望世界足够成熟有序，这样人们就能既遵守基督教原则又能过得相当体面……但是我看不是这样。
>
> 我决心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当地的教会。我想要有某种宗教上的联系，虽然这些人实际上几乎和任何人一样教条、固执己见……但至少他们理论上保持一种寻求真理的态度。注

他的观点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完全生活在这个世俗的、理性的和功利的世界上。今生就是全部，人们应当寻求最大化的今生幸福或世俗的功利。知识和科学的进步是改善人类生活的万能钥匙。民主的政府之所以合理不是

因为它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而只是因为它是最不糟糕的政府形式。基督教教条和其他教条一样，是无稽之谈、是寓言、是迷信。与之前诉诸谎言和虚伪的陈述相比，人类能更加完整、清楚并准确地看清事情的真相。

人类是多样化的。在信念和理性的斗争中，奈特站在了理性一边。

---

1. 唐·帕廷金，《芝加哥传统论文集》（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81），p.24。
2. 贺拉斯·S.奈特，“父亲的早期教育”，部分基于唐纳德·杜威的论文（1986），p.2。感谢罗斯·弗里德曼为我提供一份该手稿的复印件。
3. 贺拉斯·S.奈特，“父亲的早期教育”，部分基于唐纳德·杜威的论文（1986），p.2。感谢罗斯·弗里德曼为我提供一份该手稿的复印件。
4. 贺拉斯·S.奈特，“父亲的早期教育”，部分基于唐纳德·杜威的论文（1986），p.2。感谢罗斯·弗里德曼为我提供一份该手稿的复印件。
5. 理查德·霍威，《弗兰克·奈特和经济思想史》，见沃伦·萨缪尔斯（主编），《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第1卷（格林威治：JAI出版社，1983），p.182。
6. 贺拉斯·奈特，《父亲的早期教育》。
7. 贺拉斯·奈特，《父亲的早期教育》。
8. 贺拉斯·奈特，《父亲的早期教育》。
9. 霍威，《弗兰克·奈特和经济思想史》，p.165。
10. 詹姆斯·布坎南，《弗兰克·奈特》，见爱德华·希尔斯（主编），《铭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p.247。
11. 乔治·斯蒂格勒，《悼念弗兰克·奈特》，《美国经济评论》（1973年12月），p.1047。这篇讣告常常被误认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写。
12. 贺拉斯·奈特，《父亲的早期教育》。
13. 贺拉斯·奈特，《父亲的早期教育》。
14. 霍威，《弗兰克·奈特和经济思想史》，p.165。
15. 贺拉斯·奈特，《父亲的早期教育》。
16. 霍威，《弗兰克·奈特和经济思想史》，p.170。
17. 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波士顿：米夫林出版公

司，1921），p.ix。

18. 查尔斯·P.布利奇，《阿林·杨格：逍遥的经济学家》（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5），p.121。

19. 查尔斯·P.布利奇，《阿林·杨格：逍遥的经济学家》（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5），p.121。

20. 查尔斯·P.布利奇，《阿林·杨格：逍遥的经济学家》（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5），p.162。奈特后来改写了杨格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有关经济学历史的文章。改写后的文章收录在《论经济学的历史与方法：论文选集》（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一书中。

21.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p.ix。

22. 安格斯·伯金，《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p.42。

23.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7），p.198。

24. 罗斯·B.埃米特（主编），《1892-1945芝加哥经济学传统》第6卷（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2）p. vii。

25.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p.ix。

26.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pp. 8，201。

27.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pp. 16-17。

28. 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p.7。

29.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p. x。

30.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pp.5-6。

31. 帕廷金，《芝加哥传统论文集》，p.25。

32. 帕廷金，《芝加哥传统论文集》，p.14。

33. 帕廷金，《芝加哥传统论文集》，p.xxviii。

34. 来自罗斯·弗里德曼与作者的交谈。

35.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p. 31。

36. 弗兰克·奈特，《自由与改革：经济学和社会哲学论文集》（印第安纳

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82），pp.61-62。

37. 奈特，《论经济学的历史与方法》，p. 9。

38. 奈特，《自由与改革》，p.478。

39. 伯金，《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pp.41-43。

40. 贺拉斯·奈特，《父亲的早期教育》。

第四章
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学与奥地利经济学

哈里·约翰逊后来回忆道，当他1959年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的时候，在那里，“虽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已经明显地崛起，但与20世纪30年代伟大的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瓦伊纳相关的回忆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不断达到新的发展高度。然而20世纪30年代似乎是最令人兴奋的时期：在当时，一大批优秀的老师和学生聚集在芝大。除了瓦伊纳和奈特，有影响力的杰出教师还包括保罗·道格拉斯和亨利·赛门斯。学生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缪尔森、乔治·斯蒂格勒、亚伦·迪雷克托和艾伦·沃利斯。这是一个恒星般的团队：位于第二层的师生在名望和天赋上几乎毫不逊色于第一层的师生。

奈特于1927年加入芝加哥大学，他当时已经是教授级别，比瓦伊纳到芝大晚11年。奈特比瓦伊纳大7岁。奈特因《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成了学术界热捧的对象，按照萨缪尔森的说法，据“可靠的传闻”注，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都对奈特感兴趣。奈特和瓦伊纳是一个优秀的双人组合。罗斯·弗里德曼回忆，他们俩有时候教授同一门课程，学生会同时上两人的课，因为他们的授课方式迥异。瓦伊纳是头脑清晰的经济学家和教师，而奈特是魅力四射的哲学家和怀疑论者。

芝加哥著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是奈特30年代早期的一名学生。他有下述回忆：

> 奈特喜欢抱怨发牢骚，在讨论时和斗牛犬一样固执；他犀利且敏感，能格外敏锐地捕捉到他人和自己立场的矛盾。虽然他总是抱怨他人的错误，但也从未停止坦白自己的无知。当他指出一些东西不可能是真的时，总是一副怒气冲冲确定无疑的样子，但是当涉及他自己主张的真理时，他谦卑至极。

希尔斯同样回忆了1932年奈特所做的一个讲座：“他讲座的要点是主张自由主义原则——个人的自由、理性的选择和行为、解决政治分歧的理性讨论，以及作为最具成效的、最自由的和社会上最有益的经济生活组织模式

之间的竞争模式所起的作用。”[注]

按照他的学生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的说法，对奈特来说，“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教条、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和制度、主流道德规范以及被接受的神圣或世俗文本的翻译。所有东西都是批判性审查的潜在对象，外部影响告知评价性的判断，但审查最终独立于外部影响”。布坎南还描述奈特总是乐于“质疑任何权威”。[注]

瓦伊纳和奈特都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但是他们有不同的方法论和论证观。瓦伊纳主编，他们合著了《政治经济学期刊》。他们虽然都不是经济系主任，但却在学术上持续领导了一个广泛的群体。这个群体包括：现代自由主义者和未来的议员保罗·道格拉斯、统计学家和实证经济学家亨利·舒尔茨、奈特的追随者及古典自由主义者赛门斯、货币导师劳埃德·明茨、系主任和劳动经济学家哈里·米利斯、经济历史学家约翰·奈夫以及奈特的弟子亚伦·迪雷克托。

J.罗尼·戴维斯在其权威的《新经济学与旧经济学》（1971）中提出，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经济学家的根本观点是公共政策建议上的凯恩斯主义。事实上，他们有时比凯恩斯自己更像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倾向于用货币政策解决30年代早期经济滑坡的问题，而芝加哥经济学家在当时倾向于更多地关注财政政策。就财政货币政策而言，芝加哥经济学家和其他地方经济学家一样，建议预算赤字、增加政府支出以及扩张性货币政策。然而，芝加哥经济学家却不愿意把它们当成永久性的政策（认为它们只是在大萧条的紧急情况下具有临时合理性），赞同通过削减税收而不是增加支出带来的预算赤字；赞同在商业周期过程中税收收入和政府支出持平；反对政府机构对经济实施更多的控制。上述芝加哥政策建议一直持续了多年。事实上，芝加哥及其他地方经济学家建议的扩张性财政货币行为成为全世界用来对抗大萧条的政策。30年代，芝加哥经济学家处于主流地位，但他们并不是脱离了该学科其他人的一个独立学派。

比起后来，在20世纪初期，经济学领域更多地强调商业周期的问题。“二战”之前的经济与后来尤其是1983—2008年这段时间的经济相比要动荡得多。在1983—2008年的这段时间里，全球经济似乎消除了与经济活动中的波动相对的定期的商业。

瓦伊纳、奈特和芝加哥的其他人在对大萧条的政策回应上丝毫不教条化。1932年，包括加菲尔德·考克斯、亚伦·迪雷克托、保罗·道格拉斯、哈里·吉登斯、弗兰克·奈特、哈里·米利斯、劳埃德·明茨、亨利·舒尔茨、亨利·赛门斯、雅各布·瓦伊纳、切斯特·赖特和西奥多·英特马等在内的十几位芝加哥经济学家签署了一份关于经济政策的备忘录，呼吁用预算赤字来对抗大萧

条，用反周期的预算盈余来缓解商业周期的极端后果。在1931年和1932年，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聚集芝加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参加了首场会议，他基本同意论文作者们的政策建议。在一位作者展示完其论文后，凯恩斯评论道："在我看来，分析格外精彩并且非常有帮助……我没有什么要补充，也没有什么要批判的。"

1933年，亨利·赛门斯和其他芝加哥学者针对货币改革提出著名的"芝加哥计划"。这个计划包括银行业的百分之百储备金要求和每年按照规定的固定货币供给扩张。该计划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力，同时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评论文章。赛门斯是一位卓越的奈特追随者，他是奈特在爱荷华大学的学生，并在1927年跟随奈特到了芝加哥大学。1934年赛门斯发表了《自由主义的一个积极计划：对一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些提议》，他在标题中就高举自由主义大旗并且力图在新政盛行的时代维护"自由"的传统意义。当时，国内的国家计划方兴未艾；国外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受到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冲击。

随着《自由主义的一个积极计划》的问世，一个"芝加哥"研究生团体开始有意识地将他们的视角视作独树一帜的观点。虽然按照后来的标准，《自由主义的一个积极计划》似乎在政府活动的恰当范围上做出了过度的妥协，赛门斯却得到了很多同时代学者没能把握的正确要领：经济自由是全面系统自由的关键组成部分。私人财产是自由之根本，正如自由言论之于选举权。艾伦·沃利斯记得《自由主义的一个积极计划》是一部"虽然小，但（思想）取之不尽"的作品。赛门斯的方法，即鼎盛时期的芝加哥传统所遵循的方法，包含着强大的经验主义内容：事实至关重要；将事实和价值分开是可能的；经济学具有潜在的科学性就在于它能把事实和价值分开；经济理论应当符合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用事实印证理论并且产生新的假设；预测是经验主义的精髓。

经验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人们通过观察世界，得出相关正式或非正式的预测，从而很快认识到自身观点存在的错误和缺陷。实用主义观点不会绝对地依赖于某些规则和视角，从而值得力荐。赛门斯写道："这个国家真正的敌人是这些管理式经济或国家计划的天真的提倡者。"在大萧条的极端环境下，他不提倡政府采取任何的袖手旁观政策。当然，每一种政府行为都会影响经济，问题是应该有何种经验主义的影响和何种道德的影响。

政府构建起制度框架，让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都在框架的范围内进行，政府不能简单地不干涉了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对此很清楚，至少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如此。政府的每一个行动，甚至包括看似的不作为，都会产生影响。至于政府的影响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在经验主义和道德

上都存在分歧。处于最佳时期的芝加哥方法强调经济理论探究的经验主义本质和对公共政策领域的建设性、递增性以及实用性的提案。芝加哥学者认为，规范的建议应当基于对世界尽可能准确的经验观察。倘若我们的建议基于错误、不相关或非事实的经验猜测，则不可能有多大用处和多少价值，甚至可能起反作用。

在大萧条早期，芝加哥学派技术经济学思想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立场更接近于凯恩斯的观点。弗里德曼回忆，“二战”后不久，他在和阿巴·勒纳的一场辩论中开始意识到芝加哥和奥地利两个学派在经济学方法上存在的差异。[注]勒纳是20世纪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当时那里的主流观点是：大萧条是早期不良投资造成的结果；只能通过清算让这些“不良投资”问题自行解决；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

哈耶克的阐述则更加深入，他引入一个错综复杂的资本生产和利率系统。在该系统中，即便是稳定的价格也会引起周期性的萧条。[注]1932年6月，他在《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的前言中写道：

> 当然，毫无疑问，当前一个通货紧缩的过程正在继续。这种通货紧缩的无限持续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但无论如何不能就此臆断通货紧缩是造成我们困扰的最初原因，或者说我们应该通过强行增加货币流通来抵消通货紧缩的倾向从而克服这些困难。没有理由假定危机是由货币当局蓄意的通货紧缩行为引起的，或者假定通货紧缩本身根本不是一种次级现象，是一个繁荣留下的产业失调引起的过程。[注]

这种分析很不准确。实际情况远非哈耶克所说的那样——1929—1932年间有一个“蓄意的信贷扩张政策”[注]，实际上美联储追求的是货币紧缩政策。同样，他在1934年4月的一篇期刊文章上错误地论述说，美联储“在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反应迹象后，立刻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成功地将本该自然结束的繁荣期延长了两年。当危机最终（在1929年）爆发后，美联储用了几乎两年的时间有意地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做尝试，阻止正常的清算过程”。[注]

或许是哈耶克的奥地利经济观，尤其是其方法论，阻碍了他看清大萧条时期的经济活动。和米泽斯一样，他的方法论观点的核心是一种让人诧异的思想。用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哈耶克认为，“事实在理论确定与理论检测的过程中并不真正具有相关性。事实在阐释说明理论的时候有用，但是不

能用来检测理论，因为我们将这些不证自明的论题作为经济学的基础。这些命题之所以不证自明是因为它们关乎人类，而我们就是人类。所以，我们拥有最终知识的内部来源，没有任何检测能否决这种……‘行为学’”。注哈耶克认为没有事实能驳倒他的商业周期理论，这不是经验性信息在理论中的角色。在面对数千万的人因失业而穷困潦倒时，人们没有选择，只能什么也不做。

相比之下，凯恩斯和芝加哥经济学家都提倡积极的政府财政货币政策。在大萧条的灾难面前，二者在政策建议上几乎完全一样。另外，奥地利学派建议政府不采取任何行动，他们错误地认为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毫无裨益，只会带来危害。

回顾一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立场普遍受到经济学界的摒弃，这和政治哲学或公共政策所受到的待遇截然相反。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职业生涯的晚期写道：

> 不管1929年之前繁荣的遗传因素是什么，从错误预期滋生出不恰当投资的意义上来说，它们的后遗症是彻底深陷入巨大的通货紧缩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横扫了一切恒定不变的要素，否则在这种情况下或许能提供一种我所认为的解释的框架。理论不足以论证事实……面对当时冰冻般的通货紧缩，认为首要的根本任务是记录下错误的投资以及通过促进人们储蓄的意向和减少消费压力来缓和资本市场的观点是完全不合时宜的……以我当时认为有效的方式去对待随后的发展，就像因为其最初的问题是过热而反对给一个掉进冰池的醉汉提供毯子和兴奋剂一样不合适。我将永远把与凯恩斯争执的这方面视作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我如此反对这些或许能够缓和当时经济困顿的政策，这于我而言将永远是个深深的遗憾。注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哈耶克关于经济活动和政府合适政策的观点与实际情况不符。他声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实施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此，他犯了经验性的错误。事实上，那时的美联储反反复复灾难性地升息。大萧条后，直到70年代中期，“现代美国奥地利运动”在纽约大学产生以及近年来在乔治梅森大学的兴起，作为经济理论（与政治哲学相区别）一个公认实体的奥地利学派才再次被人提及。

赫伯特·斯坦恩是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任职期间经济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斯坦恩正面评价了赛门斯的影响，认为他提倡的公共政策是有利的：“赛门斯设想在政府和市场之

间存在劳动分工。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政府则负责维持整体的稳定，保持市场竞争性和避免收入分配极端化。”斯坦恩还说道，赛门斯“强调使用累进所得税来减少不平等，一是因为减少不平等非常重要；二是因为和其他为减少不平等而普遍提出的措施相比，累进所得税更加符合自由经济的特点”。[注]斯坦恩同样评论道：“在我看来，所需条件最少的原则是政府不应当干涉市场核心，即相对价格的决定以及劳动力与资本在各种产业间的分配。”[注]

在1934—1935年间，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艾伦·沃利斯和霍默·琼斯（琼斯是奈特的又一名学生，他在弗里德曼入职芝加哥大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成为联邦储备系统的一名重要官员）共同编辑了奈特文集。斯蒂格勒在他的回忆录中评价道，奈特“因一本有关经济理论的精彩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以及一本极具煽动性的哲学文集而名声大噪”。[注]这本哲学文集指的是1935年出版的《竞争伦理学》。

当然，除了弗里德曼、沃利斯、斯蒂格勒、亚伦·迪雷克托、保罗·萨缪尔森、赫伯特·斯坦恩和霍默·琼斯，还有其他一些学生也在这段时期进入了芝加哥大学。他们之中有一些更加杰出的学生脱颖而出，包括罗斯·迪雷克托（亚伦之妹，嫁给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艾伯特·哈特、肯尼斯·鲍尔丁、葛莱格·刘易斯以及稍微后期的马丁·布朗芬布伦纳和D. 盖尔·约翰逊。哈特从芝加哥毕业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研发出一个更加公平的所得税代码。鲍尔丁成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并在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刘易斯于1939—1975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后来进入杜克大学。布朗芬布伦纳因教学而出名，但说到他的兴趣和任教的机构，可以看出他的职业生涯具有多样化的特点。约翰逊从1944年开始直到2003年去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职，他是农业经济学中的一位泰斗级人物，同时担任包括教务长在内的各种行政职务。

20世纪30年代是经济以及经济学学科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二战”后，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统治了整个学科，而芝加哥却是唯一的例外。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事实上所有的经济学家在大萧条的紧要关头都曾呼吁一个能够更加广泛地干涉政府的角色。芝加哥经济学家将这种增加的政府活动看作临时的政府干涉，看作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自然良性的事物秩序的一种偏离，这是他们和其他地方经济学家相区别的关键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经济条件的改善，芝加哥经济学家被确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反对者和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在历史上，芝加哥经济学家在一般情况下或从理论上说是不被认为是反对政府的。

20世纪30年代不存在“芝加哥经济学派”，瓦伊纳和奈特从不认为自己归属

于某个学派。赛门斯曾努力尝试在芝加哥创建一个志趣相投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小组，但直到1946年其英年早逝之前也未能获得成功。战后，这些30年代的毕业生的回归促进并明确了芝加哥经济学派在五六十年代及70年代的创立。但在30年代末期，无法预测芝加哥经济学将何去何从。

---

1. 伊丽莎白·约翰逊和哈里·约翰逊，《凯恩斯阴影：理解凯恩斯、剑桥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牛津：巴兹尔·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p. 151。

2. 保罗·A.萨缪尔森，《雅各布·瓦伊纳》，见爱德华·希尔斯主编的《铭记芝加哥大学：导师、科学家和学者》（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p. 536。

3. 爱德华·希尔斯，《知识分子群像》（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pp.31-34。

4. 詹姆斯·布坎南，《弗兰克·奈特》，见爱德华·希尔斯（主编）《铭记芝加哥大学：导师、科学家和学者》（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p.244。

5. J. 罗尼·戴维斯，《新经济学与旧经济学》（埃姆斯：爱荷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71），p.112。

6. 艾伦·沃利斯，《乔治·斯蒂格勒》，《政治经济学杂志》（1993年10月），p.775。

7. 亨利·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p.41。

8.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两位幸运者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p.40。

9. 商业周期历史学家罗伯特·戈登评论道，“奥地利学派创建的特定形式下的货币投资过度理论是一种高度严谨的解释。其理论上的微妙性及与现实的不相关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商业波动》第2版，（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61），p.358]。

10.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纽约：奥古斯都·M.凯利出版社，1996），p.19。

11.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纽约：奥古斯都·M.凯利出版社，1996），p.20。

12.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价格与生产》（纽约：奥古斯都·M.凯利出版社，1967），p.162。

13. 对弗里德曼的采访（见附录）。弗里德曼在另一次采访中谈到奥地利经济学的实际影响："我认为，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给世界造成很大危害。如果你回到30年代，那是一个关键时期。在伦敦，哈耶克、罗宾斯等奥地利经济学家坐着说，你只能让经济低谷退出；你只能让经济自愈；你对此无能为力；你只会让它变得更糟……我认为，英国和美国对这种旁观政策的鼓励只能造成危害。"［基恩·艾普斯坦，《市场先生》，《胡佛文摘》（1999，No.1）］。

14. 莱昂内尔·罗宾斯，《一个经济学家的自传》（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1），pp.154-155。

15. 赫伯特·斯坦恩，《亨利·赛门斯》，见戴维·L.西尔斯（主编），《社会科学国际大百科全书》第14卷（纽约：麦克米伦和自由出版社，1968），pp.334-335。

16. 赫伯特·斯坦恩，《另一方面……：经济学、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论文集》（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出版社，1995），p.244。

17. 乔治·斯蒂格勒，《不受管制的经济学家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p.181。

第五章
亨利·赛门斯与累进税收制

因遭到经济系的排斥，亨利·赛门斯于1939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1942年当他成为副教授时，他同时教授经济学和法学课程。他在“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为学派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他其中的一部分贡献是培养了学派所需要依靠的人际关系。1981年，在30位芝加哥大学当时在校的和之前的教员和学生之间有过一次讨论，一些参加者这样回忆赛门斯的贡献：

> 艾伦·沃利斯：赛门斯对我个人有很大的直接影响。我当时和米尔顿以及乔治一样是研究生……他认识很多人，有很大的个人影响力。我想那或许至少和课程所学知识一样重要。
>
> 亚伦·迪雷克托：我从未上过他的课，但是我深受他的影响。
>
> 沃尔特·布鲁姆：我了解他是因为基本上每周都和他在汉利酒馆喝次啤酒。
>
> 米尔顿·弗里德曼：以下是很重要的一点：亨利是一个非常爱好社交的人，他在这些社交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注

赛门斯出生于1899年。在米尔顿·弗里德曼、亚伦·迪雷克托和艾伦·沃利斯回到芝加哥后，他发挥了重要作用：把这些将在“二战”后组成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人聚拢在了一起。这些人和奈特、劳埃德·明茨、特德·舒尔茨以及其他人一起，成为新兴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及其他部门自由—保守主义派的核心。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于1950年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弗里德曼和奈特参加了哈耶克的研讨会。斯蒂格勒于1958年回到芝加哥。

可惜的是，在芝加哥学派开始形成的时候，赛门斯自己却无法在场。他1946年死于过量服用安眠药。人们常常认为他死于自杀，但这可能是个误解。赛门斯没有留下遗书。他在1941年结婚，结束了长时间的单身生活。1944年，他和妻子有了一个女儿。按照经济思想历史学家谢莉尔·卡斯珀的说法：“从1945年开始，赛门斯患了胃溃疡和失眠症。”注在1983年的一次采访中，哈耶克评论道，有人说赛门斯有“这样的习惯，每次睡不着

时都要服用更多的（安眠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注]伯金记录道，赛门斯的妻子“告知验尸官，在他死前数月，为了治疗严重的失眠，他服用的药品剂量就已经在不断增加，她认为他不会故意过量服药。”[注]芝加哥地区的报纸将赛门斯的死称为意外。

赛门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想建立一个芝加哥学派。他力图建立一个本质上明显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学派。他认为自己在政治哲学和经济学上隶属于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阵线。在《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该书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前言中指出，他的“根本立场可以被刻画为严格的自由主义（libertarian），或者是从欧洲大陆的意义上来说的自由主义（liberal）；并且打算遵循以下人物的学术传统：亚当·斯密、穆勒、门格尔、布伦塔诺、西奇威克、马歇尔、费特、奈特、洛克、休谟、边沁、洪堡特、托克维尔、布克哈特、阿克顿、戴西、巴克和哈耶克等”。[注]

伯金认为，赛门斯是“第一位将自己称作‘自由主义者’的著名经济学家”。[注]1945年赛门斯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他自己的“政治信条”。他在其中一个名为“自由社会主义”的章节中阐述了以下思想：

> 人们第一次做出不仅仅是消极革命运动的努力。在这种微薄的努力下，现代社会主义获得了深深的觉醒。知识分子们最终开始面对起草积极提案的任务和为革命之外的行动制定一份可理解的纲领的任务。他们的积极处方有效且又自相矛盾地集中体现在“分权社会主义”的名称中。……
>
> 社会主义必然反过来被自由主义严重破坏。因为二者是在自由讨论世界中同时出现的东西，受到同样罪恶的催化作用的影响，并受到同样愿望的引导。事实上，不难理解除了避免所有的对话外，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维持巨大的思想差异的。
>
> 现代社会主义者公开承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和工业垄断。这也是自由主义者主要关注的事情。[注]

在赛门斯看来，斯密和边沁的“特别见解”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必须广泛地分布政治和经济权力。为达到该目标，经济控制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国家并且通过合作的过程进行。这个过程只需要数量相对较少的匿名参与者”。[注]斯密和边沁由于未能预测出当代环境，因此他们不能充分地意识到，一直以来，先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将大量的资源移交给相对较少的

人。除非政府介入均衡收入和财富；否则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变成低效不公的裙带财阀资本主义。

斯密、边沁、穆勒和赛门斯都以不同的方式批判富人。正如之前指出，斯密受到法国革命早期领导人所崇拜。他在1780年的一封信中，认为《国富论》是“我给予整个英国商业体系的一记重击”。[注]边沁更是蔑视权势。1822年他写道，“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将某个人的，不管加上或不加上相对少数的其他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实际结果和目标，那么‘效用理论’对政府来说就很危险……”[注]然而，他认为大多数政府的目标都是如此。穆勒原来是社会主义自由论者。他在《政治经济原理》（1848）中提出了平等主义的观点（经济学家现在称为“边际效用递减”）。他说道：“比较拥有适当财产的人和财产五倍于前者的人的幸福，若权衡后者多余五分之四的财产带来的享受，则两人的幸福感所差无几。”[注]赛门斯强调竞争，他认为，只有通过瓦解富人的权力并且重新合理分配他们的资源才能实现竞争性的社会。

乔治·斯蒂格勒这样评论赛门斯，“他的大部分方案对于社会主义及私人企业资本主义都很协调”。[注]赛门斯认识到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注]两种观点都追求为多数人谋求最大化利益的功利主义目标。古典功利主义者将人类的利益定义为幸福，即最高质量的快乐和最低质量的痛苦之间的最大化顺差。每个个体的幸福都应该受到同等重视。赛门斯和其他大师所掌握的古典自由主义是一个平等主义的信条和方案。

赛门斯最负盛名的同时期作品《自由主义的一个积极计划》写于大萧条最严重和新政开始实施的时候。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时的人比后来的人能对政府活动做出更多的让步。该书本质上反对新政。赛门斯同时还发现，古典自由主义论辩过程最终引起了社会上人们更大的共识和妥协，包括那些之前持迥异观点的人。

1934年12月底，艾伦·沃利斯和乔治·斯蒂格勒就《自由主义的一个积极计划》致信《纽约时报》的编辑。他们指出，赛门斯的书“杰出且具有建设性意义”。在这两周前，他们在写给《纽约时报》一封后来被发表的信中也提到，赛门斯的书包括“具体实用的社会政策提议”。两封信中留的地址都是芝加哥大学。[注]在第二封信中，他们写道，赛门斯的作品是芝加哥大学的公共政策手册，人们可以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获得。

因此，一些年轻的芝加哥学者和其他人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提及一个已明确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是可能的。然而，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有段停滞的时

期，直到1946年弗里德曼、迪雷克托和沃利斯回到芝加哥大学。他们三人都是在1936年之前相继离开了芝加哥大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30年代早期开始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研究生学习的年轻人起初是温和的左派。他们是诺曼·托马斯（温和）社会主义者。弗里德曼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当他读本科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自己描述为社会主义者”。[注]他们即使不完全支持罗斯福的具体政策，也支持他的总路线。他们阅读《新共和国》《国家》以及其他类似的刊物。事实上，在给《纽约时报》的原信中，沃利斯和斯蒂格勒两次提到“不完美竞争”理论，并且颂扬了“罗宾逊、张伯伦、英特马、斯拉法、哈罗德”等[注]政治经济左派人物。当时，年轻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们还不是教条式的古典主义者。

芝加哥很多经济学作者都强调，瓦伊纳、奈特和赛门斯的作品和战后由弗里德曼、迪雷克托和斯蒂格勒领导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作品不同。瓦伊纳、奈特和赛门斯都允许经济中的政府干预，但干预方式和芝加哥继承者所采纳的方式不同。他们三人都关心社会平等问题和不完美垄断性竞争。直到1960年，当时在普林斯顿的瓦伊纳才说：“今天，垄断在西方世界市场中如此盛行。在我看来，如果认为自由竞争市场的优点可能是我们现在已有的东西，或者可能在将来有幸拥有的东西，这样的讨论纯属贬义意义上的空谈。”[注]当时还没有学者关注后来成为芝加哥经济学派标志的货币政策。

保罗·萨缪尔森等人称赛门斯和其同事是“最早的”芝加哥学派成员。比起后来的继承者，他们的公共政策建议更倾向于对平等的考虑，并提倡在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加入更多的政府参与。事实上，这些继承者在早期职业生涯中也更加强调这些传统的芝加哥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赛门斯颂扬社会、政治及经济平等的美德。他写道，一个“自由交易社会……需要并允许逐步缓解不平等的现象；事实上，它提供了充分平等的最大可能性”。[注]

赛门斯认为，关键的一点是，在私营部门创造财富后，政府应当采取均衡措施：“对自由主义者而言，重要的是保护自由交易的基本过程，并在这些过程中加入平等措施，从而影响之后的再次分配而不是生产和商业交易的直接过程。”[注]事实上，所有芝加哥大学“二战”前的经济学家都支持将更大的经济平等作为一种重要且恰当的政府社会目标。

平等主义虽然不是当代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但却属于古典自由主义。事实上，当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大规模的不平等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在这样的社会里，收入和财富都流向工作和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希望看到美国有比当前更大的不平等。当代自由主义者和保守

主义者强调巨额财富继承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和17—19世纪亚当·斯密及其他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通过继承法呼吁更大的社会平等，并且赞颂没有极端贫富的中产阶级社会。

这并不是说斯密、赛门斯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赞成社会中完全的经济平等，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未曾赞成过也不会赞成。平等是众多价值中的一种，古典自由主义不赞成完全的结果平等。但是，一般情况下，它支持能够尽量减少不平等并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机会平等的制度。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既惊恐又厌恶地看待当今美国社会各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比较而言，它赞成具有美国五六十年代特征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式。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快速增长，政府行为受到限制，家庭稳固，但边际所得及房产税率过高。

赛门斯论证说，“所有社会，尤其是自由交易社会，通过或应该通过私人慈善、政府对底层的补贴以及最重要的对上层征税的方式彻底地调整‘交换’（程序）公平的思想”。注 赛门斯等芝加哥学派的“首批”成员支持在自由私人市场中实施累进税收制，从而获得更大的公平。在他们的词典中，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他们支持的是，在一个私人创造管理经济资源的体制内，将收入和财富从富人那里重新分配给穷人和中产阶级。

赛门斯在《自由的明确纲领》中强调，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主要的经济社会顽疾。要根除该顽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实施的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制度：

> 必须对不公平采取实质性措施，这是发展的重要动力；应当认为不公平是邪恶的，并且只有在权宜指令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容忍它的存在……政府反对自由企业体制的主要罪恶体现在国家强加给该体制的产权制度。它是在政治国家的权力范围内定义财产和遗产权，阻止现存的极端不平等，并且在不严重损害制度有效性的情况下仍然可能获得恰当的改变。从实用的意义上来说，现在除了有关税收的安排，产权制度没有太多问题。注

他列举了五条“自由主义纲领的主要要素”。其中第三条是：“主要有关税收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导致整个税收制度的剧烈变化。”注 他主张：

> 我们关于税收制度的提议基于以下观点：1. 减少不平等本身非常重

> 要；2. 累进税收制是一个有效途径，而且是现有制度框架中实现上述目标的唯一有效途径；3. 在竞争世界中，低收入人群利益的实现可以不对高收入人群造成重大损失，只要他们在收入等级中的级别不变；4. 通过税收制度可以大幅削减不平等，同时不会明显降低体制的效率，也不会削弱经济游戏的吸引力。[注]

同时他在脚注里补充说明道："一些学生认为，减少不平等对维护体制的政治稳定性至关重要；其他学生则认为，减少不平等对降低失业以及缓和产业波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注]但这些并不是赛门斯用来拥护更平等政策的主要论据。他支持"把征收个人所得税作为我们整个财政体制的支配要素"，支持"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的剧烈变化和快速进展"。[注]他对房产税收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在政府支出上，他持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他对提供政府服务有如下论述："在支出方面，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民众'自由所得'的持续增加。这种'自由所得'是以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形式存在……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去扩大社会消费范围（医疗服务、消遣、教育、音乐、戏剧等）和社会福利活动范围。"[注]在《自由的明确纲领》结尾部分，他再次阐述道："设计和建立一个庞大的收入和遗产税制度是一项无比伟大和艰巨的事业，值得让这些真正关心不平等的有能力的人们为之全身心地投入。完全可能以政府服务的方式，通过扩大社会福利活动范围来增加民众的'自由所得'。"[注]可以看出，赛门斯是一位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

他在《自由的明确纲领》结尾部分怒斥："没有什么比《国家复兴法案》更居心叵测的了，它创造出一个延迟或阻止经济恢复（或引导人们远离民主）的有效机构。"政府管理经济是问题所在，而累进税收制则是解决方案的关键。关于他提出的措施，他承认"当然，对这里所提出的措施，人们在细节上不可能广泛地达成一致。读者不可能认为所有的措施都是可以接受的"，他写道，"必须坦白的是我自己对很多问题也是疑虑重重"。

他不是一个教条式的空想家：

> 递交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希望促进这些在学术领导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能达成共识。多个世纪以来积攒的宝贵的政治经济自由可能很快会被遗弃，并且不可挽回；经济学学科源于伟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经济学家是该传统的守护者。他们责无旁贷地担起了寻找逃离政治经济思想混乱的途径的任务。[注]

早在1934年，赛门斯就力图使芝加哥大学及其附属机构的各位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和新政政策相反的观点是，应当允许私营成分真正发挥作用，免予受到管制。应当在不损坏和妨碍自由市场秩序的前提下，通过税收和广泛的政府服务实现收入再分配。赛门斯还解释道，他反对“工会的普及、工时的减少和工资率的增加”等调控措施，因为它们对私有经济有负面影响，这和他所提倡的增加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的观点正好相反。他相信，全面征税和政府提供服务的做法不仅和功能齐全且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秩序一致，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在赛门斯看来，政府的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制度是维持一个民主公平的有生产力的市场社会的唯一希望。

哈耶克高度评价《自由的明确纲领》。他在1934年给赛门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对该书表达的精神深有同感。我认为它提出了今天的经济学家应该讨论的问题。”同时，他对赛门斯提出的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表示质疑，赛门斯也欣然接受批评。哈耶克后来回忆道，当他1945年到美国推广《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时，赛门斯成为“我在芝加哥的密友”。《通往奴役之路》在1944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此次行程中，哈耶克还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克鲁格·梅纳德以及查尔斯·梅里安一起参加了一个难忘的芝大广播圆桌节目。克鲁格是1940年社会党副总统候选人。曾有人批判说他所倡导的社会中政府不起任何作用，对此，哈耶克在节目上给出了下面的答复：“有很多人……反对计划，并不能说他们通过这样的反对就完全排斥政府的存在。他们的意图是想限制政府的职能。”哈耶克首先反对的是政府管理经济，“不管什么时候，让政府去决定一个东西生产多少，谁去生产……这种社会制度会被竞争制度所替代，而不能和竞争制度相结合”。这时，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关于工作条件、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险的有关立法；认可最著名的新政机构之一——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某些方面的法律法规。他论述道：“我一直说我支持国家保障每个人的最低收入。”他反对《农业调整法案》和“几乎全部的”《国家复兴法案》。他反对“政府管理生产”，即国家经济决策制定中的集权化。

哈耶克和早期芝加哥学派一致认为，在某些经济决策中，政府计划和政府参与会导致效率低下且后劲不足；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理和过度所有是一种固有的压制。无论是美国式的管理还是欧洲式的国有化，当政府力图控制生产细节时，它就在根本上变得低效甚至无效。他们一致认为，应当把生产细节留给私营成分占主体的市场，这一点将他们和经济学界的大部分人区别开来。同时，哈耶克和古典自由主义芝加哥经济学家都赞同重要而积极的政府作用。他们声称，政府可以提供很多服务，稳定经济并且创造出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经济思想历史学家威廉·布赖特和罗杰·兰塞姆慷慨地评价了赛门斯的影响："在动荡不安的罗斯福时代里，亨利·赛门斯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并没有多少名气，这也掩盖了他在塑造经济思想方面的影响。当剑桥大学和越来越多其他美国大学学生在思考凯恩斯主义学说的优点时，芝加哥大学学生听到的是赛门斯对放任主义哲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明确有力的辩护。"注

赫伯·斯坦恩回忆道：

> "二战"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举国上下的讨论和政策都转向了赛门斯方向。不可能再回到战前的消极保守主义。但是由于大幅扩张的联邦预算和债务，加之通货膨胀的经历，凯恩斯美国弟子们的幼稚的扩张主义再也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政策。赛门斯的理念填补了这段空档期的需要。一个"现代保守主义"出现了，它承认政府对总体经济稳定的责任，强烈反对通货膨胀……当需要积极的财政措施时依靠税收的改变而不是改变支出，反对保护主义……并且接受累进个人所得税作为联邦收入的主要来源。注

古典自由主义和收入财富平等之间不存在矛盾——事实上，古典自由主义要求通过累进的所得税和房产税实现实质性的所得和财富均衡，同时对不同的劳动、努力和风险保持激励，并给予不同的奖励。赛门斯提倡，在社会和经济中，政府应当合理地采取推进公平（或者至少是最小化不平等）的政策。古典自由主义强烈要求累进税收制。

美国经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获得突飞猛进的增长，当时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很高，超出了八九十年代以及21世纪这些年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上述相关内容将在结论部分做进一步探讨。这似乎是在反驳低边际率和经济快速发展之间存在直线相关，因为经验关系恰好是在相反的方向。此外，这是一个国际发展趋势。在欧美等国，由于大幅减少富人的最高边际税率并增加工资和营业税，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时造成家庭结构弱化。

赛门斯完全排斥政府在社会和经济中几乎不发挥作用的观点。他和其他早期芝加哥学派都认为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很牵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政府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那它将是一个梦魇之地。赛门斯和洛克、斯密、边沁和穆勒等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同人民而非领导者站在一起。

---

1. 艾德蒙·W.基奇（主编），《真理之火：纪念1932-1970芝加哥法律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期刊》（1983年4月），pp.177-179。
2. 谢莉尔·D.卡斯珀，《亨利·赛门斯》，见罗斯·埃米特主编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埃尔加指南》（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2010），p.335。
3. 布鲁斯·考德威尔，《芝加哥学派、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见罗伯特·范·霍恩、菲利普·米卢斯基和托马斯·A.斯泰普尔福德共同编写的《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最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p. 306。
4. 安格斯·伯金，《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p.241，f.142。
5. 亨利·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p.1。
6. 伯金，《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p.39。使用术语“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来描述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也要归功于迪安·罗素。他在文章“谁是自由主义者”中写道：“这里有一个建议：让我们这些热爱自由标记的人把这个可敬的好词‘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留作自用吧。”[《自由人》（1955年5月1日）]或许这才是该术语更真实的归属，因为它与战后自由主义不相符，大众也还没有读到赛门斯的作品。
7.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p.29-30。
8.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p.177-179。
9. 艾玛·罗思柴尔德，《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p.45。
10.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82），pp.14-15。
11. 蓝尼·埃布斯泰因，《最大幸福原则：审视功利主义》（纽约：加蓝出版社，1991），p.233。
12. 乔治·斯蒂格勒，《不受管制的经济学家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p.149。
13. 见威廉·埃布斯泰因，《从柏拉图到现在的伟大政治思想家》第4版（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1969）：“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

义堡垒的外部入侵者，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二者之间的斗争属于家庭事务。”（p.762）

14. 艾伦·沃利斯和乔治·斯蒂格勒，《赛门斯教授的书》，《纽约时报》（1934年12月24日），p.22。艾伦·沃利斯和乔治·斯蒂格勒，《竞争问题》，《纽约时报》（1934年12月7日），p.12。

15. 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A.巴奈特（主编），《探寻经济学家的内心：和杰出经济学家的对话》（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7），p.120。

16. 沃利斯和斯蒂格勒，《赛门斯教授的书》。

17. 罗伯特·范·霍恩，《重塑垄断和企业角色》，见范·霍恩、米卢斯基和斯泰普尔福德共同编写的《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最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p. 231，n.13。

18.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5。

19.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6。

20.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6。

21.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p.51-53。

22.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57。

23.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65。

24.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321。

25.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p.66-67。

26.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68。

27.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76。

28.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p.75-77。

29. 赛门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p.321。

30. 罗伯特·范·霍恩和菲利普·米卢斯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崛起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诞生》，见菲利普·米卢斯基和迪特尔·普勒韦主编的《自朝圣山之路：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的产生》（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p.142。

31.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哈耶克论哈耶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p.127。哈耶克还这样评论芝加哥经济学家：“我对赛门斯充

满期望。他的死是一个灾难。”（p.144）

32.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哈耶克论哈耶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pp.111-115，121。

33. 威廉·布赖特和罗杰·兰塞姆，《学术文人》第3版（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8），p.208。

34. 赫伯特·斯坦恩，《另一方面……：经济学、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论文集》（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出版社，1995），p.245。

第六章
考利斯委员会与凯恩斯

尽管芝加哥大学在成立后的最初五十年里，就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但使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达到顶峰的却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考利斯实证经济学委员会选址芝加哥大学。考利斯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旨在将经济学和数学相结合。后来的13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十几位当时及后来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曾一度每天都会穿过社会科学研究大楼大厅，因为经济系和考利斯委员会就坐落于大楼四层。

考利斯委员会采取了与之前的芝加哥大学观点不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严格的数学方法。和考利斯委员会相反，战后的芝加哥学者大多强调实证研究。瓦伊纳和奈特都不是实证经济学家，都不曾采用统计法。他们强调经济理论在实际运用中的重要性。后来主要通过弗里德曼和同事及学生们的努力，使得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研究上采取了经验和统计的方法。当瓦伊纳和奈特在学术上领导经济系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和学术界其他人之间在方法论和政治上并没有后来所描述的巨大分歧。

50—70年代出现一个自由主义芝加哥经济学派并非必然，这一点从30年代末与40年代前5年经济系的巨大变化可以看出。芝加哥经济系从来都不是特别庞大，它包括低级职位成员在内通常共约25名成员。在30年代前5年，瓦伊纳、奈特、保罗·道格拉斯、哈里·米利斯、亨利·舒尔茨、劳埃德·明茨、西米恩·利兰和约翰·奈夫领导并影响着经济系。当时亨利·赛门斯和亚伦·迪雷克托还只是初级教员。

到1946年，只有奈特、明茨和道格拉斯还留在系里。道格拉斯已经将注意力转向政治层面，将很快离开学术界。瓦伊纳去了普林斯顿大学。40年代末期的奈特和30年代的奈特俨然已经不是同一个人。米利斯已经退休，而奈夫去了社会思想委员会。舒尔茨和赛门斯已经去世。此外，利兰在1946年离开了经济系。另外一位3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家切斯特·赖特也快退休了。西奥多·英特马在1949年离开了商业学院。还有一些不间断地在基层岗位上发生的变动。

在亨利·赛门斯的文献中，有一封关于成立“政治经济学院”提议的信函。该学院能将一群“传统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聚在一起，并“为各地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提供一个可以获得学术指导和支持的中心”。芝加哥将是建立该学院的合适之地，因为“芝加哥经济学仍保留着一些独特的传统

自由主义内涵和声望”。然而，即便是在芝加哥，“除非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否则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也将“很快被遗弃……在系里我们逐渐成为少数派”。注这封信大约写于1945年。由此可见，至少在当时还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芝加哥学派”。

乔治·斯蒂格勒在回忆录中写道：

> 在“二战”结束时……没有芝加哥经济学派。在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似乎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学略有不同，但是对于大多数重点大学都可以这么说……
>
> 然而，到60年代，业界广泛赞同有一个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存在。在1957年，爱德华·张伯伦撰写了一段有关芝加哥学派的章节。他认为该学派“因热衷于攻击垄断性竞争理论”而与众不同……1962年H.劳伦斯·米勒对该学派及其中心观点……进行了一番描述……通常认为，届时，该学派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并获得广泛认可——也受到广泛谴责。注

保罗·萨缪尔森认为有两个芝加哥学派：

> 第一个芝加哥学派有奈特、瓦伊纳和赛门斯。它倡导利用市场，但是建议税收再分配和转让，从而缓解放任主义体制最糟糕的不平等现象……
>
> 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应当正确地和这些名字：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亚伦·迪雷克托和加里·贝克尔等联系起来，简称为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该学派放弃了赛门斯主义用税收制度改变经济不平等的当务之急……注

罗斯·弗里德曼的哥哥亚伦·迪雷克托可能是在出版物中提及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一人。1946年在赛门斯去世后，他写道，“赛门斯通过其著作和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学，逐渐确立了他自己作为‘学派’带头人的地位”。注马丁·布朗芬布伦纳于1939年在芝加哥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回忆道：“直到我离开芝加哥才听说‘芝加哥学派’。”“二战”服役结束后，布朗芬布伦纳于1947年至1957年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任教。在那里，他得知“芝加哥学派”的意思是“潘格洛斯注加上葛擂梗注，加上作为‘无礼者

盈余'的皮丘姆注、托尔克马达注、萨德侯爵注等人的点缀"。注在首批出版的"芝加哥学派"参考文献中有一篇宝贵的8000字文章，是由《财富》编辑、作家约翰·麦克唐纳在1950年12月写的一篇名为《经济学家》的文章。该文章对当代经济学做了一项受欢迎的调查。

随着明确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形成，弗里德曼和考利斯委员会之间的战争也日趋白热化。与经济学未来相关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新兴的芝加哥学派和考利斯委员会之间盛行。芝加哥学派包括这些在经济系、商业学院、统计学系、法学院和社会思想委员会中惺惺相惜的追随者们。考利斯委员会毗邻经济系，并和经济系共享一些成员。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问题：政策性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因为方法论问题本身很难，因此最好先探讨政策性问题。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20世纪中期近50年的时间里首屈一指的国际经济学家。他耀眼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使其一夜成名。该书猛烈地抨击了"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以及合约的签订者。他预测，向德国要求的过度赔款将不可能兑现，后来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货币改革论》是他接下来的主要著作。这本书收集了他之前三年所著的所有文章。按当代的说法，他是追求国内价格稳定的"稳定剂"，和这些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在内的支持用通货紧缩来恢复"一战"以前英镑的汇率的人们形成对比。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应该首先由国内环境而不是国际环境决定。《货币改革论》出版后，他发起了一场阻止英国按战前平价回归金本位的战斗，但以失败告终。1926年，他写了《放任自由的终结》。该书提出，政府应当而且必须在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中起决定性作用。

他接下来的作品是他有意为之的代表作《货币论》。哈耶克通过抨击该书而在伦敦经济学院赢得了声誉。凯恩斯关注的依然是货币政策，但是他将政府在现代发达经济管理中采取恰当宏观政策的观点扩展到了财政政策领域。英国从来没有从"一战"中恢复过来。在1900年至1920年，英国平均每年的失业率到达3.4%。对1921年至1940年间这代人来说，平均每年的失业率为13.7%。情况不对，是什么呢？

凯恩斯的回答是，英国经济已如患上关节炎的暮色老人。他认为，"19世纪的势力已经走到了尽头，且已精疲力竭"。注像19世纪这样，政府进行最大化生产造成发展不协调的时期已经结束。他的观点是，需要巨额的政府预算赤字来吸收过剩的储蓄。不仅如此，他开始强调，政府一定要对发达经济进行干预。对政府仅仅为商业活动制定规则的自由市场的观点，他持不信任的态度。

凯恩斯接下来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

的经济学论述。在该书中，他继续完善了自己的思想并指明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强调经济学的专业性，即它不被一般人理解。在这种专业背景下，他主要将货币供给变化从总价格变化中分离出来。财政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货币政策现在反倒无关紧要。他建议巨额预算赤字，提倡用高边际所得税和房产税税率来减少过度储蓄。政府为了宏观经济目标应该有庞大、波动的支出，这一点和福利国家不同。

此外，正如爱德华·张伯伦和琼·罗宾逊所修正的，通过纳入有力的政府调控成分，将不完全竞争论增添到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上。不完全竞争理论家认为，在自由市场中，理论家假定的竞争实际并不存在。因此，政府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对私有经济进行调控。

从赞成政府享有对经济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意义上来说，凯恩斯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一次，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他慷慨激昂地问道："我怎么会接受这样一种信仰？它选择淤泥而非鱼，它赞扬粗鲁的无产阶级，贬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后者不管有什么毛病，都代表着生活品质，当然也携带着人类进步的所有种子。"[注]就其个人而言，他不是平等主义者。

他在《通论》结尾部分写道：

> 我认为没有理由去推论，现有的制度严重地误用了正在使用中的生产要素。当然，存在预见误差，但是集权化的决策并不能避免这些误差。在1000万个愿意而且能够工作的人中，有900万人被雇用时，没有证据表明，这900万人有被使用不当之处。对现有的经济制度的不满并不在于这900万人应该承担不同的任务，而是应该为剩下的100万人提供使其就业的任务。现行经济制度的缺点，并不在于已经就业的人如何加以使用的问题，而在于就业多寡的问题。
>
> 因此，我同意……弥补古典学派理论的缺点不是将"曼彻斯特制度"清除掉，而是指出经济力量或经济因素的自由运行所需要的环境，以便实现生产的全部潜力。保证充分就业所必需的中央控制当然包括扩充传统的政府职能。除此以外，现代古典学派理论本身也要求我们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情况。而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对经济力量或因素的自由运行有必要加以限制，或加以引导。尽管如此，仍然会留下广阔的领域使个人在其中运用他们的动力和职能。在这个领域中，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有利之处仍然会继续存在。[注]

凯恩斯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努力争取让政府通过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实

现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反对过度的政府调控，反对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或者对经济决策的管理权。因此，他所做的，是在力图挽救资本主义，而不是更替它。

奈特和瓦伊纳都曾因反对凯恩斯而名声大噪。正如所料，奈特对凯恩斯的批判比瓦伊纳更加尖锐。瓦伊纳倾向于陈述事实，而奈特则是按照个人偏好进行实质性攻击。1936年瓦伊纳在评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写道：“这本书是凯恩斯精彩绝伦、颇具原创性和煽动性的系列著作中的又一力著。这本书让经济学家们获益匪浅。我相信，凯恩斯的著作对我们的长期启示比短期启示更为显著。”[注]他接着继续以平衡的风格对凯恩斯著作的各方面进行分析。

但是，奈特做出了严厉的反应，如同唐·帕廷金所描述：

> 奈特在脚注中公开指出他的文章将“首先在本质上是批判的”，他不仅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甚至大加讽刺。我有机会研究了奈特评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文章。他大概是抱着为写评论做准备的目的阅读该书。书上页边空白处满是用铅笔写的笔记，都是言辞激烈的异议。因此，按凯恩斯的话说，“令人吃惊的是，如果一个人独立思考太长时间，特别是在经济学上，他（她）竟能暂时相信如此愚蠢的事情”。奈特对“书中最好的论述”做了评论，我们知道他想到的是谁。“胡说八道”的咒骂在书的空白处经常出现，有时甚至被语气更强的词代替。[注]

在评论中，奈特写道：“接下来必须对凯恩斯先生的书做出的整体评论是，很难说出作者的意图是什么。的确这样，因为，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一般性问题上常常言不由衷。”[注]

奈特的评论发表在《加拿大经济政治科学杂志》上。该杂志给予凯恩斯反驳的机会，但凯恩斯拒绝回应。他说：“我同意奈特教授两个主要结论，一是我的书让他恼羞成怒，二是他很难理解我的书。”[注] 1940年，瓦伊纳明确提议，在芝加哥大学成立50周年之际，授予凯恩斯荣誉博士学位。奈特严厉否决了该提议：“我认为凯恩斯先生经济学的新重商主义立场……本质上与贩夫走卒为伍，反对经济思想家和分析家为超越并消除这些人的鼠目寸光和偏见所做的努力……在我看来，他的作品和影响具有极度‘反学术’特征。”[注]

奈特对凯恩斯的过激反应与芝加哥考利斯委员会不谋而合。在政治和方法论上，考利斯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凯恩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是不完全竞争理论家。波兰社会主义者奥斯卡·朗吉是委员会在经济系的同盟。朗吉是40年代早期芝加哥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他在战后成为波兰共产党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

考利斯委员会给校园注入了巨大的学术活力。李斯特·戴尔瑟在1952年成为考利斯委员会的一名助理研究员，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他认为："当考利斯在这里时，芝加哥经济学在世界上举世无双。我认为，它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中心。其他机构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注]同在考利斯委员会任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因回忆道："40年代末期，一群真正的精英聚集芝加哥。我想，在经济学上，这样一群人再也不可能聚在一起。"[注]

战后芝加哥经济学没有沿着凯恩斯主义和实证经济学的方向发展，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三位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研究生及当时著名的年轻经济学家于1946年回到了芝加哥大学。这三位人物是：法学院的亚伦·迪雷克托，起初在统计学系后来成为商学院院长的艾伦·沃利斯以及经济系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被证明是考利斯委员会控制芝加哥经济学的主要障碍。奈特学术圈和考利斯委员会之间在政治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朝着干涉主义的方向前进时，部分芝加哥经济学家，当然不是全部甚至可能不是大多数，曾一度更加倾向于自由市场，不再支持政府的干预活动。当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学科大规模地朝着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干预行为的方向坚定行进时，芝加哥经济学的哲学观却选择了一个更加自由主义的方向。

因此，正如弗里德曼所认为的那样，虽然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芝加哥一开始就有一些哲学延续性，并且依照瓦伊纳和奈特的看法，"芝加哥观点"最早在30年代就被人提及，但是直到"二战"后才出现经济学"芝加哥学派"，这和斯蒂格勒的说法一致。到50年代末，弗里德曼、斯蒂格勒、迪雷克托和沃利斯都在芝加哥，另外还有已经退休的奈特和劳埃德·明茨。哈耶克（不是芝加哥经济学家，却是学术界最杰出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在社会思想委员会任职。另外还有许多次要职位上的教员、学生及其他机构的相关教师。

考利斯委员会与弗里德曼及其盟友之间在方法论上的争论或许比政治上的战争更为激烈。随着"政治经济"向"经济学"转型，同时学科的数学化和专业化不断加强，芝加哥经济学家朝着一个更加经验的、历史的和统计的方向发展，而该专业的其他人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弗里德曼等人是国家经济研究局芝加哥经济学韦米切尔分支的学生。此外，瓦伊纳是方法论上的

经验主义者。

在1988年与经济学家丹尼尔·哈蒙德的一次访谈中，弗里德曼指出，在他的学生时期，芝加哥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的区别并不是它的政治方向，而是：

> 将经济学视作一门严肃的学科与将它视作数学的一个分支间的区别……将它视作一门科学的学科与将它视作一门美学的学科间的区别……比方说，当时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在芝加哥，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被用来讨论实际问题，人们能从中获得一些知识和答案；而在哈佛，经济学是和数学相当的知识学科，人们探索起来很有意思，但不能从中获得任何的结论，它不会让你有能力去解决任何问题……我认为这一直是芝加哥与其他地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最近，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个比哈佛大学更好的范例。

加里·贝克尔说：“弗里德曼对理论本身不感兴趣，而是将其作为解释市场行为的一种方式。因此，他的理论是用来解释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他终究是一个出色的统计学家……一个优秀的数据分析师。他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构建这些工作上的技能。”贝克尔还指出，弗里德曼“不懈地探索经济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联”。

弗里德曼写道，他和经济系的其他人都从未从芝加哥的考利斯委员会获益。“考利斯和经济系之间存在许多相互作用”。他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他自己和委员会成员之间并“没有私仇”。1947年2月，弗里德曼在为后来被认为是其在考利斯的主要对手的特亚林·科普曼斯所写的一封推荐信中指出，科普曼斯“具有把握问题本质并简明扼要阐述这些本质的真正能力。他是实证经济学领域发展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极有可能在该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科普曼斯是一位很好的老师，具有使人愉悦的开朗个性”。

1947年8月的《经济统计评论》上发表了科普曼斯的一篇著名文章《无理论测量》。科普曼斯在文章中严厉地批判了阿瑟·伯恩斯和韦斯利·米切尔的国家经济研究局1946年年卷《商业周期测量》。在这之后，弗里德曼以及他的芝加哥普遍同盟者与科普曼斯及考利斯的关系逐渐淡化甚至崩裂。这距弗里德曼为科普曼斯写推荐信刚过去六个月的时间。弗里德曼与伯恩斯及米切尔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科普曼斯在他的评论中指出，由于伯恩斯和米切尔没有现成的经济周期理论，他们对搜集什么样的数据、检测何

种假设没有一个确定的想法。在一篇同时期的会议评论中，弗里德曼提到，“在被泛泛地界定为国家经济研究局和考利斯委员会的两种商业周期调查技巧间，存在断断续续的冲突”。注

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讲述了一则趣闻，关于一次考利斯研讨会对劳伦斯·克莱因的《美国经济波动》（1950）进行的正式的讨论。弗里德曼总结说，整个实证经济学模型构建事业被证明毫无价值。他恭喜考利斯委员会做出的自我牺牲。克莱因论证了这首法语打油诗的真谛：

这只动物很糟糕。

当受到攻击时，它会防御自己。注

很多经济思想历史学家认为，考利斯委员会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梅尔文·雷德写道，从40年代末期开始，“弗里德曼、沃利斯及他们的追随者为一派，考利斯委员会及其支持者为另一派。两派之间展开了为学术领先地位和制度控制而进行的斗争。斗争一直持续到50年代早期，在考利斯委员会离开后才结束”。注经济思想历史学家威廉·弗雷泽写道，到40年代中期，“一场斗争在芝加哥经济系如火如荼地进行。斗争的一方是弗兰克·奈特与他原来的学生，另一方是考利斯委员会及其跟随者”。注

同时，经济系和考利斯委员会之间也不完全处于争执时期。下面这几首歌，由经济系研究生作词，表现出考利斯和新兴的芝加哥学派间截然不同的方法理念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1949年经济系的一场派对上演唱了这几首歌。第一首歌，按照“美国爱国主义者”的曲调唱出来，展现了考利斯观点：

我们必须严谨，我们必须严谨，

我们必须履行我们的角色。

如果我们犹豫或推诿

我们将不能达到目标。

我们必须让制度复杂化

使模型完整

实证经济学带来

统计管理！

我们深奥的研讨会

带来大量的统计学家

但是努力找到

不把代数学看成杂务的经济学家。

哦，我们必须断然催促您

更加倾向数学化

以便我们开发的所有东西

有一天能被应用。注

第二首歌关于米尔顿·弗里德曼，按照吉尔伯特与萨利文的“当我年少时”的曲调唱出来：

当我年少时我任职

在A.F.伯恩斯的监护下。

我彻底了解了我的长官

从头到尾从尾到头

我仔细了解了我的长官

以至于现在我是芝大教授

（合唱）他仔细了解了他的长官

以至于他现在是芝大教授

我彻底击败了凯恩斯主义者

他们破旧的观点现在四处散落

我抓住他们最弱的假设：

“消费函数是何意？”

他们从未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因此现在我是芝大教授

（合唱）他们从未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

因此现在他是芝大教授。(注)

弗里德曼及其盟友与芝加哥的考利斯委员会之间并没有多少公开的争论。这两个群体对经济学的未来有着互不相容的观点：一方将经济学视作一门学科，而另一方则将其看作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芝加哥经济学无法同时维持考利斯委员会与弗里德曼及其盟友这样两个强劲的、相互对抗的动态实体。

帕廷金这样总结他那些年的回忆：“那就是我记忆中的，从我学生时代开始的芝加哥。毫无疑问，总有伟人存在，但是认为当时世界上卓越人物辈出的想法是将过去理想化。但是，说那时有异常多的经济学巨人走过芝加哥大学的走廊却不是一种幻想。事实上，他们是秉持不同观点、处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年龄的学术大师，大大影响了我们这些等闲之辈。”(注)

雅各布·马尔沙克是考利斯委员会在芝加哥时大部分时期的负责人，也是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他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评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在亚伦·迪雷克托的主要努力下，《通往奴役之路》被推荐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迪雷克托30年代末期在伦敦经济学院待了一年，在那里认识了哈耶克）。马尔沙克在推荐出版哈耶克的作品时写道：“到目前为止，正反双方关于自由企业的辩论还未上升到高层次。哈耶克的作品或许能在这个国家开启一个更加学术化的辩论……这本书不容忽视。”(注)

相反，要是换作奈特，他不会推荐出版这本书。奈特在审稿人报告中写道：“从这个国家出版该书的意愿的角度看，我有理由怀疑……作者在处理导致纳粹在德国的独裁统治的事件进程上……过度简单化。我认为，这样的处理容易受到攻击……总之，这本书是一部有才华的作品，但是视野

有限，在处理上多少有些片面。我对它能否在这个国家拥有广阔的市场，以及能否改变很多读者的立场表示怀疑。”[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雅各布·马尔沙克很可能是向芝加哥出版社推荐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决定性人物。

凯恩斯主义在30年代改变了整个英美经济学界。赫伯·斯坦恩曾是30年代中期芝加哥的一名研究生。他回忆道，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凯恩斯的理论与方法……如燎原之火席卷整个学界”。[注]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从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及之后，也不断呼吁人们关注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倾向。

凯恩斯改变了现代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即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从充分就业均衡转向非充分就业均衡。反之，弗里德曼接下来将发动一场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广泛攻击。他认为，不论从短期看还是长期看，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在对经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上都比凯恩斯想的更为重要。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看到了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所起到的积极重要的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凯恩斯认为，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起作用；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是通过货币政策。实证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要被用来推动当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再也没有人假装有能力通过完全平衡的数学等式来预测未来经济。相反，对经济活动的统计展示保持着强劲的活力。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强调财政政策及包括决定性投资乘数在内的相关概念。现在很少有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弗里德曼用货币主义的方法描述大萧条的原因和进程，指出，在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具影响力。弗里德曼的观点已被很多人接受。

亨特·克劳瑟·海克为当时在芝加哥考利斯委员会任职的美国社会科学天才赫伯特·赛门斯所写的传记中提到，“从1932年建立到1956年搬到耶鲁大学，考利斯经济学研究委员会或许是现代经济学数学化蜕变中一所最重要的机构”。[注]面对这样的竞争，弗里德曼成为芝加哥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意义深远。

---

1. 指以无依据的乐观心态看待情况的人。

2. 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人物，指只讲利益，把生活看作金钱交易关系的人。

3. 《乞丐歌剧》中专收贼赃的人物。

4. 西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

5. 法国贵族。活着时，被认为是不足道的二流情色小说家，20世纪，被誉为“伟大的歌德式作家”。

6. 罗纳德·科斯，《芝加哥法律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杂志》（1993年4月），pp.244-245。

7. 乔治·斯蒂格勒，《不受管制的经济学家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pp.148-150。

8. 保罗·A.萨缪尔森，《雅各布·瓦伊纳》，见爱德华·希尔斯主编的《铭记芝加哥大学：导师、科学家和学者》（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p. 538。

9. 亨利·赛门斯，《自由社会经济政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p.v.。

10. 马丁·布朗芬布伦纳，《有关“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杂志》（1962年2月），p.72。

1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纽约：企鹅出版社，1988），p. 254。

12. 罗伯特·史纪德斯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为救世主的经济学，1920-1937》（纽约：维京企鹅出版社，1994），p. 235。

1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纽约：乔万诺维奇出版社，1964），pp.379-380。

14. 雅各布·瓦伊纳，“凯恩斯论失业原因”，《经济学季刊》（1936年11月），p. 147。

15. 唐·帕廷金，《芝加哥传统论文集》（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81），p.299。

16. 唐·帕廷金，《芝加哥传统论文集》（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81），p.300。

17. 唐·帕廷金，《芝加哥传统论文集》（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81），p.300。

18. 唐·帕廷金，《芝加哥传统论文集》（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81），p.301。

19. 蓝尼·埃布斯泰因对李斯特·戴尔瑟所作的采访，2004年6月10日，芝加哥。

20.　　威廉·布赖特和巴里·T.赫希（主编），《诺贝尔之路：18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第4版（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4），p.19。

21.　　J.丹尼尔·哈蒙德，《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方法论的一次访谈》，见萨缪尔斯和比德尔主编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第10卷（格林威治：JAI出版社，1992），p.110。

22.　　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论经济学：论文选集》（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7），pp. 182，186。

23.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两位幸运者的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p.197。

24.　　蓝尼·埃布斯泰因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所作的采访，2004年7月，加利福尼亚，斯坦福。

25.　　加利福尼亚，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弗里德曼档案，folder 4，box 7。

26.　　卡尔·F.克雷斯特，《考利斯委员会对芝加哥实证经济学的贡献，1939-1955》，《经济文献期刊》（1994年3月），p.46。

27.　　罗伯特·M.索洛，《考利斯与宏观经济学传统》，见阿尔文·K.克莱沃里克主编的《考利斯五十周年卷》（1983）。

28.　　梅尔文·雷德，《芝加哥学派》，见伊特韦尔、米尔盖特和纽曼主编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1），p.415。

29.　　威廉·弗雷泽，《权力与思想：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大逆转》第2卷（盖恩斯维尔，佛罗里达州：海湾大西洋出版社，1988），p.706。

30.　　克雷斯特，《考利斯委员的贡献，1939-1955年》，pp.34-35。

31.　　克雷斯特，《考利斯委员的贡献，1939-1955年》，p.35。

32.　　帕廷金，《芝加哥传统论文集》，p.17。

33.　　F.　A.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见《F.　A.　哈耶克作品集》第2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7），pp.251-252。

34.　　F.　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见《F.　A.　哈耶克作品集》第2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7），pp.249-250。

35.　　赫伯特·斯坦恩，《另一方面：经济学、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论文集》

（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出版社，1995），p.220。

36. 亨特·克劳瑟-哈耶克，《赫伯特·A.赛门斯：现代美国的理性范围》（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5），p.124。

第七章 芝加哥经济学派

芝加哥经济学的重要分水岭是在1946年。这一年的3月瓦伊纳离开，6月赛门斯去世，9月弗里德曼、迪雷克托和沃利斯到来。新近的芝加哥经济学历史倾向于强调“二战”后哈耶克在芝加哥学派成立过程中的作用。例如，2009年罗伯特·范·霍恩和菲利普·米卢斯基在他们的作品中写道：“削弱了某些人物的重要性。这些人物包括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瓦伊纳，他们经常赫然出现在（有关芝加哥学派崛起的）民间传说中；作品重新评价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其他人的角色；将一些被忽视的人物（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亨利·赛门斯和亚伦·迪雷克托等）提升到了主要的位置上。”特别是关于赛门斯，范·霍恩和米卢斯基写道：“赛门斯从芝加哥法学院的边缘位置……很快成了芝加哥经济学家群体的核心。哈耶克将该群体想象为精英……这不是白日做梦，因为赛门斯和校长罗伯·哈钦斯的关系很好。哈钦斯能通过多种途径对赛门斯口中的‘哈耶克项目’给予帮助。”注

赛门斯在被任命到法学院后，从某种程度上渐渐远离了经济系。他保持着和哈钦斯的友好关系。学校其他人，包括瓦伊纳和奈特，都没有像他那样和哈钦斯关系密切。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赛门斯注意到，奈特表现出了从经济学转向哲学的倾向。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对奈特做出如下评价：“他越来越专注于哲学和哲学原理的研究，更不用说对历史学家、神学家和人类学家等人的关注。他不再对具体的经济政策问题感兴趣。”注赛门斯同时在法学院和经济系任职，直到“二战”结束，即他英年早逝的前一年。

毫无疑问，赛门斯和哈耶克试图于战后在芝加哥创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心，该中心力图保持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在学术界中的生机与活力。1946年，赛门斯的去世以及哈耶克的激励鼓舞亚伦·迪雷克托回到了芝加哥。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便得到了迪雷克托的重要帮助，此书对提升哈耶克在美国的知名度至关重要。但这些也只是偶然因素，并非真正原因。

当芝加哥经济学派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现并树立起学术地位时，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其核心与灵魂。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大众心目中与学术界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无论人们是否把他视作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显然都超过了学派的其他成员，以此方面来讲，芝加哥学派就是弗

里德曼学派。

弗里德曼于1912年7月31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他是耶诺·绍尔和萨拉·埃特尔·兰道的四个孩子中最小也是唯一的儿子。弗里德曼的父母均出生于奥匈帝国，后移民到美国，当时他的父亲16岁（1894年），母亲14岁（1895年）。米尔顿为父母的移民背景感到骄傲。尤其是他的母亲，曾经在血汗工厂做过女裁缝。

他从小就有世俗观，在大约成年礼时排斥宗教信仰。由于提前入学并跳了一级，他比班里的其他孩子小两岁。他很矮，只有5英尺2英寸。但是由于他的早熟和热情，身高从未成为其成长和发展的障碍。他高中的时候父亲去世，之后，1928年，也就是他16岁时，进入了罗格斯大学。

弗里德曼在这里得到了成长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罗格斯大学听了阿瑟·伯恩斯和霍默·琼斯两位老师的课。这两位导师在他的人生中起了重要作用，并对之后的国家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伯恩斯后来担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弗里德曼认为，伯恩斯像他的父亲。在职业上，伯恩斯引荐弗里德曼加入了国家经济研究局。这是弗里德曼的职业生涯中继芝加哥大学之后的第二个主要研究机构。后来霍默·琼斯成为美联储圣路易斯分委会的副主席。在该位置上，琼斯为弗里德曼提供了货币理论所依据的很多数据。琼斯曾经是弗兰克·奈特在芝加哥的一名专心致志的研究生。

1932年9月，弗里德曼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一年后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1933年9月，他到哥伦比亚大学（1946年获得博士学位）待了一年，继而回到芝加哥大学，当了一年的研究员。弗里德曼的能力在其年轻的时候就被老师认可并得到充分发挥，届时仅23岁。

他在中途的离开表明，“二战”后的芝加哥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确实是无法预料的。在接下来的11年里，弗里德曼分别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各任教一年。在华盛顿和纽约，各用了五年的时间任职。在华盛顿，他在一个新政机构和财政部任职；在纽约则就任于国家经济研究局和“二战”期间的统计研究小组。战争期间，他帮助建立了序列分析，并带着任务访问了测试原子弹的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乔治·斯蒂格勒和艾伦·沃利斯都曾在统计研究小组工作过。沃利斯是小组组长并帮助弗里德曼确保了他在华盛顿的第一个工作职位。“二战”后的第一年，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共享同一个办公室。

保罗·道格拉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他注意到，“二战”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其他系教员的氛围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我如此深爱的大学已经物是人非。”他回忆道，“舒尔茨去世了，瓦伊纳走了，奈特已公开表示

反对，且他的随从者似乎随处可见”。芝加哥经济学派诞生了。

初期，弗里德曼及其新兴的派系与考利斯委员会相关经济学家为另一派系的双方间存在强烈的理论分歧。弗里德曼记忆中的考利斯委员会研讨会“令人振奋，我和系里的其他成员定期活跃地参与其间”。考利斯成员也同样参加系里的研讨会。弗里德曼评论道，经济系从某种程度上从考利斯那里获益，因为其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但是考利斯委员会与弗里德曼之间存在严重的方法论分歧。考利斯强调，用带很多数学等式的复杂的实证经济学模型来表现经济理论。而在弗里德曼那里，仅有一种判断经济活动模型和理论的标准：它们做预测的能力。弗里德曼认为，20世纪经济学的数学化变化不是一种有益的发展。这是芝加哥经济学观点的关键内容。虽然他相信，精通数学对经济学和认知能力有一定帮助，但他并不同意过分强调用数学模型展示经济学理论。他在1949年给剑桥大学的C.W.吉耶博的一封信中写道：“马歇尔对构建‘探索具体真理的引擎’很感兴趣；如今，我们似乎对搭建严格抽象的欣赏沉思的模型感兴趣，但这毫无用处。”

弗里德曼认为，“围绕一个理论的‘假设’不是去问这些假设在描述上是否‘现实’，而是应当问这些假设是否充分地接近当前的目的。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判断理论是否起作用来回答，即理论是否得出足够正确的预测。”他补充道：“对理论的检测是看其解释事实以及预测经济环境变化后果的能力。抽象性、概括性和数学的精确性——这些都是次要的，它们自身也要通过实际应用来检测判断。”他谴责道，在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性、概括性和数学的精确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目的本身”。再次重申，他仅支持一个理论有效性的评价标准：预测的能力。

语言的意义在于人们能用它来描述现实世界的事件。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是，对未来经济活动做出清晰的预测是可能的。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人们预测的方向进展，则应改变其世界观，即关于世界的理论。他认为，太多的经济学家操着一口毫不相干的玄奥难懂的数学语言，其内容匮乏。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保持着上述立场。心怀善意的聪明人往往意见相左。他们该如何解决分歧？答案是，做预测并且搜集事实。他在2003年的一封信中评论道，虽然数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但当代经济学走极端，对数学“过度强调”。约翰·范·奥弗特韦德认为：“弗里德曼极度批判复杂的数学建模。”

1949年，弗里德曼针对为大众和科学领域观众写作的不同点发表了如下评论：“发布大众消费数据是勉为其难的，可以理解，因为这些数据往往误差很大，从而被人误读……不幸的是，良好的公共关系可能是蹩脚的科学。对于数据分析，基本的一点是有数据总比没数据好。”弗里德曼还指出：“统计分析的真正问题，是对所有可用的数据乱抓一气。”

对信息的统计描述与用数学方程式展示经济理论进而预测未来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弗里德曼认为，在各种理论创建和实际经济活动的描述中，信息统计至关重要。事实上，精确的数字对做预测有益，也有助于评价理论。他进一步评论道：

> 当然，出版中的选择不可避免。没有人能够或者应该展示搜集到的全部数据。但是，在我看来，至少在这些主要针对科学领域读者的出版物中，作者仅仅因为信息“可能被误读”或“弊大利少”就抑制信息的做法极不妥当。科学工作的根本前提应当是学识胜过无知；恰当使用出版材料不仅仅是平衡不可避免的误用。科学工作者的职责，是在时间、空间和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完整、准确而精密地呈现数据，而不是把自己当成检察官。没有人能提前预测某种信息有什么用或没有什么用。在科学的历史上有着很多这样的例子：最初认为价值很少或没有价值的材料却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弗里德曼认为，考利斯理论和20世纪的很多经济学理论都是无谓的重复，缺乏解释性和预测性且数学性太强。在谈到和考利斯委员会的交往时，他说自己“绝对不是考利斯的信徒和追随者。考利斯认为，理解世界运转的途径是构建大型的实证经济学模型。我提出检测他们的工作，以防他们建立幼稚的模型、提出幼稚的假设。事实上，我是反对他们在芝加哥的所作所为的主要批判者。”唐·帕廷金对弗里德曼向来未存好感。帕廷金讲述了一个他记忆深刻的关于弗里德曼参加考利斯研讨会的轶事：在研讨会上，弗里德曼提出一个有效的建议。他认为，“对实证经济学模型预测效果的最低限度的检测方法是，看该模型是否好于一个‘幼稚的模型’，即认为未来和过去一样”。帕廷金时常在想，这是否是弗里德曼“一时冲动想出来的，符合他的风格”。

人们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如何判断谁的观点更准确呢？弗里德曼给出的答案是预测，并称预测是万能钥匙。应当用经验预测的准确性去对科学理论进行评价。这种准确性包括，正确预测的数量与预测的精准度。如果一些理论提供了更多更准确的预测，且这些预测一定是关于感知上的物质世界，便被称为更好的理论。

弗里德曼有一篇关于方法论的研讨会文章——《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该文章最初名为《经济学和预测及政策的相关性》注，是被引用多次的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针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型过于脱离现实而没有用处的抱怨，他对自己的立场做了如下精彩的概述：

> 这就好比说，原子物理学不设法对事物在现实中的运行方式进行经验性分析，而是去分析，如果事物大部分是空的，其间只有小部分被原子填满，这样的情况下事物如何运行。古典经济学确实力图去解释事物在现实中如何运行，至少在大师们那里是这样。这种尝试不是通过对事物进行字面上的描述，而是通过假设。假设人们迫切追求自己的利益，且这种利益是将从逆境中挤出来的货币收入最大化，事物就会如愿运转。对该假设正确性的检测，和原子物理学一样，并非它是否如实地描述了个别的人或物，而是它是否对普遍的现象得出正确的预测。注

J.丹尼尔·哈蒙德创作了大量关于弗里德曼与其方法论的论著。他注意到，弗里德曼"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被认为是致力于标准实证经济学之外领域的研究"。注他从根本上向经济学界宣布弗里德曼方法论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判断科学相关性和准确性的唯一标准——预测。

在芝加哥，弗里德曼主要关注的是货币理论和政策。他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演变和发展。按照沃利斯的说法，弗里德曼在芝加哥时，起初仅是名学生，一个温和"诺曼·托马斯型"注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弗里德曼对早期的政治学习记忆较模糊，在十几岁时似乎对政治并没有什么想法。他最初是想成为一名保险精算师。在2006年去世前几个月，他回忆道，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受到大萧条的影响：

> 1932年当我从本科学院毕业的时候，这样的事实使我困惑：有闲置的机器和无业游民，但是你没法将他们聚在一起……起初我的兴趣是去揭开大萧条真正的谜团和疑惑，尝试去理解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情况，这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我也从中逐渐开始学会一些东西，掌握了一些知识。之后，我的兴趣是观察其他人了解同样的事情并采取恰当的行动。注

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他采用了传统的观点，即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并且货币政策不能阻止大萧条。战后，他持有相反的观点：大萧条是

糟糕的货币政策的一种症状；财政政策几乎没有办法去修复它。但这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来说仍是未知的事。他采取了时代的立场，甚至在财政部的大会上证明战时的通货膨胀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得到控制。[注]

弗里德曼的货币著作始于1948年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个项目。该项目的目的（他在当时的一个备忘录中写到）是调查“货币和银行现象在制造周期性波动，以及加剧或缓解其严重程度或者决定其特点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注]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商业周期之类的事情。从经济活动的规则及循环波动的意义上来说，“我的确相信，经济中短期的波动只不过是随机冲击的累积。我认为不存在商业周期。”[注]

在1998年，他和一位采访者的对话如下：

> 问：本·伯南克说过，商业周期模型应该对战后和战争期间的经济情况进行解释。我们不需要有两套模型来解释它们。
>
> 答：我同意这一点，但是我更进一步。我认为没有诸如商业周期这样的东西（即一个循环的盛衰周期）。我认为存在经济波动（也就是，充分就业中存在偶尔的失业）。
>
> 问：噢，是摆动模式吗？
>
> 答：对，这就是适合战争中和战后（时期）的单一模型。[注]

除了质疑不可避免的商业周期，芝加哥经济学家在“二战”后不久还被认为对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理论持反对态度。垄断竞争理论加固了根本的凯恩斯主义体系，它解释了为什么古典自由主义的恣意竞争立场在实践中不起作用。特别是，由于过度的广告，有很多消费者只是虚荣心作祟，与效用最大化毫无关联。这一论点被托斯丹·范伯伦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相继提及。

在本质上效率低且不公平的经济中，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巨大的作用。相反，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却普遍反对凯恩斯主义和不完全竞争模型。当其他经济学家对政府表示全力支持时，芝加哥学派却依靠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解决方案。芝加哥学派和经济学界少数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论模型和政策方法。芝加哥经济学家，尤其是弗里德曼，提出了有关大萧条和货币政策作用的新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并不全部来自芝加哥经济系，在商学院、法学院和其他地方也有他们的身影。但是，他们成了芝加哥经济学的主导性因素。在此不得不提哈耶克的地位，哈耶克在1950—1962年加入社会思想委员会，奠定了他在芝加哥存在的重要意义。在经济学理论问题上，他从来不是一个芝加哥经济学家，他的奥地利经济学观点使得他做出的经济分析不同于其他经济主义者同僚。然而，在公共政策和哲学上，哈耶克和多数芝加哥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相似的。包括弗里德曼、奈特、迪雷克托和斯蒂格勒等人在内的很多芝加哥经济学家都是朝圣山学社的最初成员。该学社每半年举办一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

芝加哥是反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据点，这一点在1950年12月《财富》中的一篇文章——《经济学家》中得到了证实。《财富》主编约翰·麦克唐纳所写的这篇文章精彩地描述了战争刚结束后的美国经济学界。首先出场的是弗兰克·奈特，他是“反凯恩斯主义者与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在系的系主任”，同时也是当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当时的经济学界范围很小，与如今的发展没有可比性。美国约有5000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其中3000多名在大学任教。奈特还被称作“美国正统的古典经济学派的伟大导师和政界元老”。(注)

麦克唐纳写道：

> 自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和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提出相关理论已经过去了17年。该理论从下面的命题开始：产业市场既不是纯粹竞争的也不是完全垄断的，而是同时包括竞争和垄断元素的混合体，在经济分析中也要这样认为。距离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相关理论已经过去了14年。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不会自动运转并且自动保持充分就业，必要时需要采取一定措施使其运转。

麦克唐纳还指出，“‘凯恩斯革命’的影响为日益壮大的国家提供了经济事务方面的支持，”(注)因为强调财政政策通常会涉及政府支出。

麦克唐纳最早使用了关于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一词：

> 关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发展的方式，人们可能有这样的印象：这是一场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之间的战争。当芝加哥保持着正统的堡垒时，哈佛的阿尔文·汉森坚持凯恩斯理论，并成为其在美国的主要拥护者。汉森和奈特都是有影响力的导师和经济学著作的作者。

> 一些杰出的、年轻的古典主义者如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和已故的亨利·赛门斯等人来自芝加哥学派。该学派曾有机智风趣的经济哲学家雅各布·瓦伊纳。汉森的哈佛研讨会上的成员包括保罗·萨缪尔森等。然而，凯恩斯的影响并未本土化，而是席卷了除芝加哥之外的整个学术界。[注]

很多参与者与权威人士都清楚，在1950年之前，芝加哥经济学派很少被提及。1938—1940年D.盖尔·约翰逊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他从1944年一直到2003年去世都任经济学导师。2001年在被问到“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是否被使用时，他回答说：“我认为，直到50年代它才会被提及。”为什么？“弗里德曼和它息息相关。”[注]

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名称在50年代以前未曾被使用。在记录1947年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他引用了记者约翰·达文波特后来的评论：与会者包括“一些后来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人”[注]——就是说，当时他们还未被称作芝加哥学派。

资深芝加哥经济学家莱斯特·戴尔瑟认为，“应该说，芝加哥学派的概念在‘二战’以后才出现”。它“不是自古就有，实际上是从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开始的，而不是在他们之前出现的”。[注] 1960年到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并且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成为永久教员的萨姆·佩兹曼也同意上述观点。加里·贝克尔同样认为，“芝加哥经济学派”这个名称在战争结束之前可能还未被使用。

亨利·斯皮格尔是一名精明而博学的经济思想历史学家，他写道：“当瓦伊纳在芝加哥任教时，‘芝加哥学派’这个名称还未被广泛使用。”[注]很明显，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经济思想史作品中没有提及“芝加哥学派”。这些作品包括约瑟夫·熊彼特的巨著《经济分析史》（1954）、约瑟夫·道夫曼的《美国文明的经济思想》（多卷本）以及保罗·霍曼的《当代经济思想》（1928）。显而易见的是，60年代之前的《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期刊》中也未提及“芝加哥学派”。

斯蒂格勒在同期的一篇评论（评论了1962年劳伦斯·米勒的文章《论“芝加哥经济学派”》）中写道，米勒没有“真正去研究是否存在‘芝加哥学派’这个论题……而只是简略地概括了我的朋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注]当弗里德曼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保罗·萨缪尔森写道，“对于每个一流的经济学流派来说，如果没有向全体教员介绍有益的芝加哥观点，都会有匮乏和片面的感觉。这个新的事实归功于一位伟大的导师——弗里

德曼”[注]。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梅尔文·雷德是芝加哥的一名学生，后来成为那里的一名教员。他写了一些关于芝加哥经济学历史的文章。雷德指出，自1946年弗里德曼在芝加哥任教后，他“很快接任了系里一个派系的学术领导权，并且开始强有力地攻击其他人的思想与观点。他在辩论中的气势和论点内容奠定了芝加哥经济学至少四分之一世纪的基调和公众形象”。雷德还描述了五六十年代芝加哥的“弗里德曼时代”。当时，“源源不断的关于货币、方法论、价格理论、消费函数与公共政策提案等内容的论文使芝加哥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家们忙于对各种弗里德曼观点做出反应。这段时期我是一个局外者。在芝加哥以外，弗里德曼思想的力量非常强大；在芝加哥一定更强”。[注]范·奥弗特韦德认为，“毫不夸张地说，从1946年弗里德曼回归至1976年离开之间”的30年，“可以被称为‘弗里德曼时代’”。[注]

约翰·D.洛克菲勒的孙子大卫·洛克菲勒20世纪30年代末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他在2002年的回忆录中做了有趣的评论：

> 芝加哥“经济学学派”在过去50年名声大噪，没有丝毫恶名，因为它坚定不移地提倡市场并强烈支持货币主义。这些理念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紧密联系。如今，他的观点是芝加哥学派的象征。该学派非常教条化地坚持政府完全不能干涉市场……我深信，他们（瓦伊纳和奈特）会拒绝被划分为今天狭义的芝加哥学派成员。[注]

战后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是弗里德曼学派。在大众与学术群体的心目中，弗里德曼的立场与该学派紧密相关。当大部分经济学家青睐于越来越大的政府作用时，他相信，自由市场是这个时期最有效的经济制度。他不信任政府，依靠货币数量理论来解释总体价格。此外，他强调，用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来影响经济活动。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将这些笼统的观点和琳琅满目的具体公共政策提案结合起来。

加里·贝克尔、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索威尔等很多人都记得，弗里德曼是一位出色的导师。贝克尔回忆道，弗里德曼在课上强调“谨慎地提出问题，关注实证的含义，在可能的时候用真实的数据检测它们”。[注]实证主义是弗里德曼理论体系的核心。

卢卡斯有如下回忆：

> 根据我的经验，弗里德曼课上讨论的性质很独特。他不叫学生的名字……使得我和很多同学只能间接地体验直接与弗里德曼交战的紧张气氛。我不是担心被开除，没有研究生会被开除……而是担心在弗里德曼的敏锐与清晰面前暴露自己的困惑。他会让一个特定的学生参与对话，一旦参与便不可能逃脱……诸如“嗯，我得想想”之类的退出理由没有用。弗里德曼会说：“我们现在一起想想。”(注)

1969年12月19日，弗里德曼出现在了《时代》杂志封面上。在这个月，《财富》杂志也刊登了关于他的一篇文章。1970年1月，他又登上了《纽约时报杂志》封面。他成为媒体的超级明星，也把芝加哥学派带到了大众心目当中。1964年，他高调地参与了巴里·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他在《新闻周刊》上开辟了专栏。1971年，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道：“如果你要让我说出我们时代最富创造力的社会政治思想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注)

实际上，弗里德曼的职业生涯分为两个范畴，弄清这点很重要。一方面是作为一名职业学术经济学家，他在诸如弹性国际汇率、消费函数、货币理论、货币历史、方法论以及自然失业率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或许是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公众心目中，他的政治立场与芝加哥学派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弗里德曼之后，与战后芝加哥学派密切相关的同时期经济学家是乔治·斯蒂格勒。他又高又瘦，幽默感十足，于1958年才重返芝加哥任教，直到1991年去世。当时距弗里德曼退休离开芝加哥去旧金山和胡佛研究所已经过去了15年。在对斯蒂格勒的回忆中，弗里德曼推测，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位著名的喜剧家，这绝对不是恭维的话，因为弗里德曼也很幽默。斯蒂格勒比弗里德曼高一英尺。当他们都在芝加哥时，被大家称作“微观先生”（斯蒂格勒）和“宏观先生”（弗里德曼）——针对他们各自关注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也是就他们各自的身高开的玩笑。

斯蒂格勒的确是个有趣的人。美国前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劳工部长乔治·舒尔茨回忆说，斯蒂格勒有“诙谐的才智”。(注)1981年在芝加哥大学一场法律和经济学大讨论上，斯蒂格勒妙语连珠，俏皮话不断。谈到亨利·赛门斯时，他这样说：

> 确实是他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应该是政府中最重要的机构。这话应该刻在他的墓碑上。（笑声）

在评论有关赛门斯在经济系任期内的争议时，他说：

> 奈特持钦佩至极的观点说，“任何关于他的瑕疵的讨论都是对我的个人攻击”。（笑声）有层次的交流，谢天谢地，在教师会议上我还从未面临过。（笑声）

说到弗里德曼，他评论道：

> 米尔顿教的是一门强大的极富影响力的价格理论课程，他自己是这么说的。（笑声）

另一段妙语是：

> 当罗纳德（科斯）表达他的谢意时，我想起了莱斯利·斯蒂芬曾经说过的话。他说他从未理解，为什么要将这些学派未能制约的人们的出现归功于学派。（笑声）注

最初，斯蒂格勒是作为经济思想历史学家而赢得了声誉。1941年，他的学位论文《生产和分配理论》获得出版。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开始关注包括微观经济学理论与产业组织在内的其他课题。关于知识的传播，他这样写道：

> 伟大的经济学家是对学术界有整体影响的人。如果他们的学说没有给科学界普通人的思想和知识带来太大的改变，他们就能做到这一点。人们要去理解并采纳完全陌生的观点是绝对不可能的……通过纯粹的展示技能去创造一时的狂热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当思想满足更加持久的科学标准时，才能对科学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注

斯蒂格勒是一位知识分子精英。经济思想历史学家罗伯特·李森认为，他在经济学上有极高的影响力：“斯蒂格勒总结道……三分之二被调查的文章实质上都毫无价值。通常，在任何领域都仅有约6位真正一流的学者……学界共识（可能不靠谱）的达成不是通过学界的‘全民投票’，而是只能依靠学界中的精英群体。”注

爱德华·尼克哈写道，斯蒂格勒在芝加哥的那些年里“培养了相对较少的学生。人们经常听到对弗里德曼作为一名课堂教师的影响力的颂扬，而对斯蒂格勒作为教师的评价则褒贬不一。简单地说，无论斯蒂格勒对芝加哥事件有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弗里德曼的影响不会完全一样”。

J.丹尼尔和克莱尔·哈蒙德编辑了一本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两人有关价格理论的通信往来的书，此书阐释了两人早期的关系。哈蒙德夫妇清晰地透露道，在1950—1980年，芝加哥弗里德曼经济学派的崛起和盛行并不是注定的。他们引用了一封1946年11月弗里德曼在芝加哥任教的最初几个月后写给斯蒂格勒的信。在信中，他提到当时经济系投票决定是否给保罗·萨缪尔森提供职位一事。他说：“我们还不知道事情的结果。但不管怎样，我很担心那意味着我们失败了。凯恩斯主义者打算利用选票。奈特很痛苦，说他想退出，不再积极参与系里的活动。（劳埃德·）明茨、葛莱格（·刘易斯）与我都对此很沮丧。”哈蒙德夫妇写道：“如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4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时，是怎样把在这里任教当成梦想的工作……但是这些信件却表明，他在芝加哥大学最初的几年里是茫然无助的。”

1946年斯蒂格勒代表弗里德曼与他自己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关于他俩的一篇有关租金控制的文章，文章将由经济教育基金会（FEE）发表。在信中斯蒂格勒写道：“我们认为不平等糟糕透顶。”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的文章再三写道：“对于那些人，比如我们，甚至想要更多的平等。”FEE提议删掉“比如我们”几个字，对此，弗里德曼写信提出反对：“如果省略这4个字，我们肯定会被人理解成反对更多的平等。”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在文章的草稿中还写道：“个人所得税……对于减少收入的不平等非常适合。”

年少时的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与当时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样，认为更大的收入和财富平等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目标，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他们认为，更大的收入和财富平等将与一个正常运行的自由市场社会共存。

“二战”后，斯蒂格勒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几场报告。在报告中，他表达了一些关于经济平等的思想：

> 忽略资源不平等而去大力反对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是一个对精神病学家的恣意的补贴。我们应该更加关心导致巨大收入差距的资源所有权。我们应当争取通过扩大教育体系、促进劳动力流动、消除劳动力垄断

> 以及向贫困儿童提供医疗护理等措施来使得劳动力收入更加平等。我们应当力图通过消除垄断和征收高额遗产税来使财产所得更加平等（并且更少）。

在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其技术经济理论强调实证相关性以及对公共政策的强烈关注。与弗里德曼一样，斯蒂格勒对经济学的数学化转向表示怀疑："我们在早餐时不说符号，不在报纸上阅读符号，也不用公式向女士求婚。少数人靠着他们的专业化和天资获得对数学的掌控，使其成为第二天性。他们仅仅在证明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上犹豫，就像我们选择词语一样。但他们是数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与弗里德曼一样，斯蒂格勒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主要出发点是它与手中任务的适合度和相关性，而不是它好辩的复杂性。斯蒂格勒赞成市场和政府，这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一致。他支持在经济中广泛使用价格和利润制度。他认为，上述立场与广泛的政府活动之间不存在矛盾，这些政府活动包括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

年轻的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同样遵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很多同时期的人不同，他们发现，私有制、管理与控制不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哈耶克的启发，他们开始认识到古典社会主义必要的政治专政本质。这种本质被定义为对经济生产方式的政府所有与政府管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三人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和后期都被认为是最保守的经济学家，这反映了时代的大方向，体现了知识范式与框架的力量。

年轻的弗里德曼认为，关于社会更大平等的问题，不是是否可取而是能否实践的问题。他在1948年2月致信斯蒂格勒，就后者在伦敦讲座上所讨论的平等问题写道："我不知道哪里强调平等的后果是对收入再分配的重视而不是资源分配。理由是，关注资源分配能更好地支持平等。"斯蒂格勒明智地注意到："现代经济体系使进攻性的税收制成为可能。公司形式的优势，独资经营者的减少以及文字记载的激增使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完全不可能的税率成为可能。"

在理性的话语能否改变社会这一问题上，斯蒂格勒比弗里德曼悲观，他认为经济学家提供的话语不存在可能性。他在1964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上如是说："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通常很小。影响之所以小，是因为他在对比国家与私人企业能力时缺乏专业知识……因为缺乏真正的专业知识以及信徒般的狂热，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的演变几乎没有影响。"

斯蒂格勒指出了赛门斯关于更加平等的收入与财富分配思想的重要性。赛门斯认为，应当有一场“为了收入平等的大运动……收入平等主要依赖于个人所得税……收入应当包括资本收益、遗产以及礼物——所有增加人们对资源的相对掌控的东西。这种强烈的平等主义要素将赛门斯与多数保守主义者区分开来。事实上，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赛门斯是一个懂得价格理论的现代自由主义者”。(注)

20世纪50年代之后，弗里德曼、斯蒂格勒以及芝加哥的其他学者不再强调平等，也不再强调需要政府干涉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他们转而关注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尤其是弗里德曼，经常以各种方式加大对政府的批评力度。但是对此却鲜有实证支持，远不及他自己和其他芝加哥人在其他时间、其他领域作品的实证支持。换句话说，在其反射性的反政府偏见中，弗里德曼芝加哥经济学派（至少在普通大众面前演说的时候）变得更加偏向于意识形态而缺乏科学性。

---

1. 罗伯特·范·霍恩和菲利普·米卢斯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崛起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诞生》，见菲利普·米卢斯基和迪特尔·普勒韦主编的《自朝圣山之路：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的产生》（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pp.140,143。

2. 罗伯特·范·霍恩和菲利普·米卢斯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崛起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诞生》，见菲利普·米卢斯基和迪特尔·普勒韦主编的《自朝圣山之路：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的产生》（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p.145。

3. 保罗·道格拉斯，《成熟之时》（纽约：乔万诺维奇出版社，1972），p.128。

4.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两位幸运者的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p.197。

5. 埃布斯泰因对弗里德曼的采访，2004年7月，加利福尼亚，斯坦福。

6. 布鲁斯·考德威尔认为：“虽然弗里德曼大部分的文章与当时的逻辑经验主义一致，但他沉溺于预测并坚持‘假设的现实主义’无关紧要，这和逻辑经验主义不一致”[《超越实证主义：20世纪的经济方法论》（伦敦：乔治·爱伦·爱文出版社，1982），p.184]。我与考德威尔有过一次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对话，见我对考德威尔的《哈耶克的挑战》（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所写的书评。考德威尔的回复和我的回复见2005年第一期《NYU法律与自由期刊》，pp.304-312。我在回复中写道，“预测是科学论

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预测就没有科学”，我把自己的立场描述为“预测实证主义”（pp.304-305）。

7. 米尔顿·弗里德曼给C. W.吉耶博的信（1949年，2月1日），加利福尼亚，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弗里德曼档案，folder 6，box 6。弗里德曼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谈道：“我回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谈论的经济学：把结果翻译成英文，烧掉数学。我认为过于强调数学本身”［见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A.巴奈特（主编），《探寻经济学家的内心：和杰出经济学家的对话》（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7），p.132］。关于本人对经济学数学方法论的观点，见艾伦·（蓝尼·）埃布斯泰因，《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贫乏》，《自由》（2003年4月）。

8. 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p.15。

9. 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p.91。

10. 米尔顿·弗里德曼给作者的信（2003年3月27日）。

11. 约翰·范·奥弗特韦德，《芝加哥经济学派:芝加哥大学如何汇集那些革新了经济学与商业的思想家们》（芝加哥：阿加特出版社，2007），p.27。

12. 米尔顿·弗里德曼，“评卡托纳与费希尔”（1949年8月28日），见加利福尼亚，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弗里德曼档案，folder 2，box 40，pp.1-2。

13. 米尔顿·弗里德曼，“评卡托纳与费希尔”（1949年8月28日），见加利福尼亚，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弗里德曼档案，p.3。

14. J.丹尼尔·哈蒙德，“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方法论的一次访谈”，见萨缪尔斯和比德尔主编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第10卷（格林威治：JAI出版社，1992），p.109。

15. 唐·帕廷金，《芝加哥传统论文集》（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81），p.16。

16. 威廉·弗雷泽，《权力与思想：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大逆转》第1卷（盖恩斯维尔，佛罗里达州：海湾大西洋出版社，1988），p.3。

17. 约翰·麦克唐纳，《经济学家》，《财富》（1950年12月），p.111。

18. J.丹尼尔·哈蒙德，《理论与实证：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经济学中的因

果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p.41。

19. “沃利斯在罗切斯特大学的日子”，与威廉·H·梅克林的采访录音文本（罗切斯特大学图书馆，罗切斯特，纽约，1976），p.40。

20. “《自由选择》：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对话”，《最初》（2006年7月），pp.5-7。

21. 蓝尼·埃布斯泰因，《米尔顿·弗里德曼传》（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p.43。

22. 哈蒙德，《理论与实证：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p.1。

23. 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A.巴奈特（主编），《探寻经济学家的内心：和杰出经济学家的对话》（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7），p.143。

24. 兰德尔·E.帕克，《对大萧条的反思》（北安普敦：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2002），pp.54-55。

25. 麦克唐纳，《经济学家》，《财富》（1950年12月），p.113。

26. 麦克唐纳，《经济学家》，《财富》（1950年12月），pp.113，126。

27. 麦克唐纳，《经济学家》，《财富》（1950年12月），p.128。

28. 埃布斯泰因对D.盖尔·约翰逊的采访（2001）。

29. 约翰·达文波特，见弗里德曼，《回忆录》，p.160。

30. 蓝尼·埃布斯泰因对李斯特·戴尔瑟所作的采访，2004年6月10日，芝加哥。

31. 亨利·斯皮格尔，《雅各布·瓦伊纳》，见伊特韦尔、米尔盖特和纽曼主编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1987），p.813。

32. 乔治·斯蒂格勒，《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1962年2月），p.70。

33. 保罗·A.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新闻周刊》（1976年10月25），p.89。

34. 梅尔文·W.雷德，《芝加哥经济学：永恒和改变》，《经济文献期刊》（1982年3月），pp.10，32。

35. 范·奥弗特韦德，《芝加哥经济学派》，p.27。

36. 大卫·洛克菲勒，《回忆录》（纽约：兰登书屋，2003），p.88。

37. 爱德华·希尔斯（主编）《铭记芝加哥大学：导师、科学家和学者》（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p. 143。

38. 威廉·布赖特和巴里·T.赫希（主编）《诺贝尔之路：18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第4版（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4），p.281。卢卡斯提到他与弗里德曼在方法论上的差异程度："我热爱(萨缪尔森的)《基础》。跟我同一战线的多数人一样，我将该观点内化为，如果不能为经济理论问题创建数学模型，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认为，数学分析不是经济理论研究很多方式的一种，它是唯一方式。经济理论就是数学分析，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只是图片和言谈。"（p. 279，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39. 史蒂文·F.海沃德，《里根时代》（纽约：兰登书屋，2001），p. 524。

40. 蓝尼·埃布斯泰因对乔治·舒尔茨所作的采访（2013年9月30日）。

41. 艾德蒙·W.基奇（主编），《真理之火：纪念1932-1970年芝加哥法律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期刊》（1983年4月），pp.177-178，211，219。

42. 罗伯特·李森，《凯恩斯主义的衰落：芝加哥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学》（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0），pp.52-53。

43. 罗伯特·李森，《凯恩斯主义的衰落：芝加哥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学》（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0），pp.51-52。

44. 爱德华·尼克哈，《乔治·斯蒂格勒、商学研究生院和芝加哥学派的中坚人物》，见罗伯特·范·霍恩、菲利普·米卢斯基和托马斯·A.斯泰普尔福德（主编）《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最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p. 117。

45. J.丹尼尔·哈蒙德和克莱尔·H.哈蒙德（主编）《芝加哥价格理论：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的信件，1945-1957年》（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6），p. 5。

46. J.丹尼尔·哈蒙德和克莱尔·H.哈蒙德（主编）《芝加哥价格理论：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的信件，1945-1957年》（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6），pp.4-5。

47. J.丹尼尔·哈蒙德和克莱尔·H.哈蒙德（主编）《芝加哥价格理论：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的信件，1945-1957年》（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

2006），p.19。

48. J.丹尼尔·哈蒙德和克莱尔·H.哈蒙德（主编）《芝加哥价格理论：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的信件，1945-1957年》（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6），p.21。

49. J.丹尼尔·哈蒙德和克莱尔·H.哈蒙德（主编）《芝加哥价格理论：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的信件，1945-1957年》（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6），p.148。

50. 乔治·J.斯蒂格勒，《关于经济问题的五场报告》（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0）。

51. 乔治·J.斯蒂格勒，《关于经济问题的五场报告》（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0），p.42。

52. 米尔顿·弗里德曼，见哈蒙德和哈蒙德，《芝加哥价格理论》，pp. 78-79。

53. 乔治·斯蒂格勒，《斯蒂格勒论文精粹》（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86），p.343。

54. 乔治·斯蒂格勒，《经济学布道者和其他文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p.130。

55. 乔治·斯蒂格勒，《经济学布道者和其他文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p.169。

第八章
学术界的芝加哥经济学家

20世纪50—70年代，弗里德曼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其他成员最终在学术经济学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高度认可。弗里德曼对大萧条货币根源的再概念化和对浮动国际汇率的持续主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准确地描述了通货膨胀的货币根源，同时明智地强调，货币政策对国家经济活动的影响大于财政政策。作为一名学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950年，学术期刊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及芝加哥经济学派。马丁·布朗芬布伦纳评论道，“所谓的芝加哥经济政策学派的学术之父是弗兰克·奈特，但是最著名的宣传员是《自由社会经济政策》的作者亨利·赛门斯”[注]。1957年，爱德华·张伯伦抨击了“反垄断竞争的芝加哥学派”[注]。

1962年，劳伦斯·米勒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论“芝加哥经济学派”》。文章很好地展现了芝加哥经济学派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学术界的地位。米勒在文章中写道：

>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芝加哥经济学派”是一个响亮且富有深意的名字。然而学派里的很多人指出：这个名字没有实质的内容；一定意义上来讲，芝加哥人没有组成一个学派；一个优秀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和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这篇论文的论点是：芝加哥人确实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小组，他们有着一系列共同的态度及兴趣。这些态度和兴趣将他们与经济学界其他人区别开来。[注]

从本质上看，这是弗里德曼的观点。斯蒂格勒可能会说：芝加哥学派的内容与现实成反比，这意味着过度强调芝加哥经济学家间的共性程度。但是，斯蒂格勒会附上这样的态度：一个学派于“二战”后产生，弗里德曼是它的主导因素。斯蒂格勒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 瓦伊纳教授和他的学生……证实道，在早期阶段（20世纪30—40年代早期），没有见到过该名称，也没碰到有人认为存在一个特别的芝加哥学派。大约在1950年以前，我也没有发现有关这个说法的任何线

索。接下来5年中也没有对该学派的广泛的认可。

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普遍认可有一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只有掌握了学派的中心理念才能确定它的起源……政策主张是学派更为普遍认可的要素，很明显，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学派主要的缔造者。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弗里德曼在1946年阴差阳错地成为芝加哥大学教师。当瓦伊纳作为主要价格理论家的位置空缺出来时，斯蒂格勒获选了。当时的弗里德曼主要是一名统计学家，不在经济学家之内。他出版的主要作品也比斯蒂格勒少。然而，以校长E.C.科尔韦为代表的学校管理部门介入并否决了对斯蒂格勒的任命。在芝加哥大学，学校管理部门否决系里教师的任命晋升推荐是很常见的现象。1938年，虽然经济系一致同意哈钦斯的主要对手——经济学家哈里·吉登斯获得终身职位，但被学校管理部门驳回了。注

斯蒂格勒的位置后来提供给了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于1946年秋天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同一年初，也就是弗里德曼成为芝加哥经济系成员之前，哈耶克被临时推荐担任系里的一个职位。但这个想法不可行，因为哈耶克没有处在经济理论的前沿。哈耶克在1950年作为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来到芝加哥大学，这也是其艰难且旷日持久的离婚过程的结果。

米勒在196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弗里德曼等现代芝加哥学者集中攻击政府对市场的干涉，这表明，他们背离了早期的芝加哥立场。"注同样地，威廉·鲍莫尔在1983年指出："20世纪30—50年代的芝加哥……在政治哲学和分析方法上，没有依附任何的党派路线。它欢迎纯理论、实证分析、文学创作与数学经济学；也欢迎自由主义者、中立者和社会主义者……它和后来的芝加哥学派几乎毫不相关。"注

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的特点之一是，它曾一度由这些曾在一起读研究生的人组成，这些人后来成为同事并在一起养家糊口。芝加哥大学和其他重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不同的地方在于，很多教职员工住的地方离校园仅有几步之遥。地理位置上的邻近，加上20世纪60年代前入职的教员间建立的长期深厚的关系，促进了芝加哥经济学不同观点的形成。

显然，在公共政策方面，弗里德曼的思想等同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思想，具体持续的时间是从1964年他参加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开始，1966年在《新闻周刊》上开辟专栏，一直到获得尼克松和里根总统的认可。1964年8月《新闻周刊》上一篇名为《戈德华特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描述了共和

党总统候选人与一些经济学家的一次会面：“这群知识分子小组中领头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位能言善辩的辩手。即使在保守主义圈子里，他也与众不同。作为芝加哥大学‘保守主义学派’大师，他的权威研究……和极富争议的理论让他名声大噪。”注其他芝加哥学者没有出席这次会面。文章称弗里德曼是芝加哥“保守主义学派”的一分子。这表明，经济学“芝加哥学派”一词虽然在1964年被学术界提及，但还未盛行。

1958年斯蒂格勒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对此，他这样写道：“我回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经济学界。弗里德曼是世界经济学中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消费函数》引发了经济数据统计分析的彻底变革；他的有关货币主义的著作是对凯恩斯主义学说最有力的抨击。”注自1935年弗里德曼、霍默·琼斯、斯蒂格勒和艾伦·沃利斯主编的《竞争伦理学》开始，之后的70多年里，弗里德曼一直是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和弗里德曼及斯蒂格勒打过交道的其他经济学界的主要人物有：保罗·萨缪尔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和詹姆士·托宾。这些人的职业生涯并未在芝加哥大学度过。这些经济学界的大师们对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者作品的高度认可表明，不论他们同意与否，芝加哥学派都获得了极高的专业声誉。

保罗·萨缪尔森在1947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第一枚克拉克奖章。他在1970年，即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办的第二年，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美国人。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1948）和非常成功的教科书《经济学》（该书在1948—2001年间再版了17次，最后8次的再版是与威廉·诺德豪斯合作完成的）大大影响了经济学界。在1976年第10版的《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对弗里德曼做了相关论述。这种讨论经常在脚注中进行，关注的是弗里德曼有关消费函数的著作。他将弗里德曼刻画为一个当代自由主义者：“所有政治派别的人们都应该读一读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书逻辑性很强，论述细致并有说服力。它阐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虽然人们再三斟酌后会对书中提出的立场褒贬不一，但是这一点说得恰到好处：‘如果没有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必须把他创造出来。’”注

在《经济学》的不同版本中，萨缪尔森关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观点极力向弗里德曼靠近。就像马克·斯考森所指出的，萨缪尔森在1955年的版本中写道：“如今，很少有经济学家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作为控制商业周期的灵丹妙药。”注 1973年，萨缪尔森的观点是：“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很重要”。注 1995年，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写道：“财政政策已不再是美国主要的稳定性政策工具。在可预见的将来，稳定性政策将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执行。”注经济学家托德·布什霍兹指出，在1985年版的《经济学》

中，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承认，“早期凯恩斯主义从‘对货币的再发现’中获益。货币固然重要。很多凯恩斯主义者在早期对财政政策的角色过于热衷，不合理地降低了货币的重要性。”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没有提及任何始作俑者的名字。[注]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可以称得上是三位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加尔布雷斯在经济学界没有得到与其大众知名度相称的认可。他未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6年，弗里德曼在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一次讲座上讨论过加尔布雷斯。研究所主张废除国有化与普遍减少政府作用，并提倡更加自由的市场。这奠定了60—80年代它在英国及全世界主要智囊团的地位。

在1976年的讲座上，弗里德曼对加尔布雷斯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加尔布雷斯私人财富对公众赤贫的理论在政府支出的统计数字面前显得荒谬至极……要从加尔布雷斯标准中获得可检测的假设无比困难。加尔布雷斯的阐述宽泛笼统，他从整体上对世界做出论断。但是从这些论断中很少能得出可检测的假设……如果我们想更好地了解他，就把他当成寻求皈依者的传教士而不是寻求真理的科学家。”[注]同年夏天在新英格兰时，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斯经常会相互拜访。当加尔布雷斯出任印度的美国大使时，两人也曾见过面。

加尔布雷斯在《新工业国家》（1967年）中做了如下脚注：“人们普遍认为，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教授是美国最卓越的两位保守经济态度倡导者。”[注]在他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经济学展望》（1987）中，加尔布雷斯写道：

> 弗里德曼或许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人物……弗里德曼是一个健谈的小个子男人，在辩论和讨论当中特别坚决。毫无疑问，他经常会在学术上攻击更加弱势的学者。他是古典竞争市场主要的美国支持者。除了糊涂的政府不明智地加以干涉外，他始终牢牢抓住上述理念，让其以丝毫无损的形式存在。在经济学历史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时代让步给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时代。[注]

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士·托宾在耶鲁大学度过了其整个职业生涯。在1955年考利斯基金会（之前的考利斯委员会）搬到耶鲁后，他成为基金会主席。他最初对弗里德曼有点冷漠，因为当考利斯委员会搬离芝加哥的时候弗里德曼有些怨气，虽然托宾当时并未在芝加哥。托宾忙于和

弗里德曼的各种论战，尤其在货币理论与政策领域。1970—1971年，弗里德曼和托宾等人，就货币理论进行了交流。

托宾强烈批判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当得知弗里德曼教授所认为的他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关键理论区别时，我非常惊讶……弗里德曼的‘理论框架’未能给短期更不用说长期的货币主义立场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注]托宾在1965年对《美国货币史》（1963）的评论中，批判了弗里德曼的理论：“我们不知道货币是什么，不管它是什么，货币存量应该以每年3%～4%的比率增长。”[注]弗里德曼在1971年对托宾的回应中说道，他的很多批评“让我彻底迷惑。我们俩所说的东西似乎南辕北辙。我不同意他所说的内容，更不同意他强加给我的观点。”[注]弗里德曼指出，托宾的一些观点缺乏经验性的证据。

1969年的一篇文章《芝加哥传统、数量学说与弗里德曼》引发了一场关于货币历史的争论。在文章中，唐·帕廷金认为，弗里德曼关于芝加哥货币数量理论传统的陈述是错误的。该说法被哈里·约翰逊在1970年美国经济学会做的理查德·艾利报告上用来指控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大为震怒。约翰逊认为：

> 弗里德曼在凯恩斯独裁的黑暗时期里，制造了一个芝加哥大学的口述传统。据称，该传统使得一小群发起者保存了对基本真理的理解……唐·帕廷金最近突然力图搭建起前凯恩斯正统说教与货币主义反革命运动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为时已晚……中途的秘密圣地上没有一直亮着的寂寞的光，鼓励虔诚者聚集，并等待真相可以安全地向大众揭示的那一天……不过，人们在谴责用来推动经济理论革命与反革命的学术狡辩技巧时不能太过挑剔。[注]

约翰逊的讲座彻底激怒了弗里德曼。李森概括了当时的情况：“托宾利用其作为主席的特权邀请（约翰逊）做了1970年艾利报告。托宾主持了这场人们热切期盼的会议。约翰逊的讲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目的似乎是蓄意彻底击败弗里德曼。”[注]1972年，弗里德曼参加了一个有关其货币理论的座谈会，受到了帕廷金和托宾等人的批判。在研讨会参会文章的初稿中，弗里德曼描述帕廷金是一位“伤心的求爱者”并且攻击了“建立在哈里·约翰逊薄弱基础上的诽谤”。[注]在审阅人的建议下，弗里德曼在文章的发表版本中删掉了这些话。

2001年，关于学术历史的问题，弗里德曼说道，他“对究竟发生了什么深

感困惑……没有什么利害攸关的事”。

1962年，艾伦·沃利斯离开了芝加哥大学，成为罗切斯特大学校长。之后，乔治·舒尔茨继沃利斯之后成为商业学院院长。不像斯蒂格勒和沃利斯、舒尔茨与弗里德曼在学术上的关系及私人关系都很一般，但在更大的国家政治舞台上，他们的想法一致，他和弗里德曼都来自芝加哥，并同在胡佛学院待了40多年。舒尔茨是芝加哥学派中对学派有最直接现实影响的一位成员。他担任过劳工部长、管理和预算委员会主任、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以及里根时期的国务卿。艾伦·沃利斯是舒尔茨的一位助手，在政府和学术界从事过各种杰出的工作。舒尔茨帮助威廉·赛门斯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并推动了保罗·沃尔科克的职业发展。舒尔茨也是赫布·斯坦之友。

特德·舒尔茨、斯蒂格勒与弗里德曼三人分别于1960年、1964年和1967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他们三人中，弗里德曼于1967年首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在1979年因为在农业经济学中的杰出贡献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勒则在1982年同样斩获该奖。这时，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已经回到欧洲。

其他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在芝加哥大学当过学生、研究者或导师的学者包括：保罗·萨缪尔森（1970）、肯尼斯·阿罗（1972）、特亚林·科普曼斯（1975）、赫伯特·西蒙（1978）、劳伦斯·克莱因（1980）、杰拉德·德布鲁（1983）、詹姆斯·布坎南（1986）、特里夫·哈维默（1989）、默顿·米勒（1990）、哈里·马科维茨（1990）、罗纳德·科斯（1991）、加里·贝克尔（1992）、罗伯特·福格尔（1993）、罗伯特·卢卡斯（1995）、迈伦·舒尔斯（1997）、罗伯特·蒙代尔（1999）、詹姆斯·赫克曼（2000）、丹尼尔·麦克法登（2000）、爱德华·普雷斯科特（2004）、罗杰·梅尔森（2007）、里奥尼德·赫维克兹（2007）、托马斯·萨金特（2011）、尤金·法玛（2013）和拉尔斯·彼得·汉森（2013）。在20世纪，那时，进出芝加哥大学的伟大经济学家比其他任何机构的都多，这样的说法也只是保守的陈述。芝加哥经济学家引领了世界。

---

1. 马丁·布朗芬布伦纳，《当代美国经济思想》，《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期刊》（1950年7月），p.487。

2. 爱德华·哈斯丁·张伯伦，《走向更一般的价值理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p.296。

3. H.劳伦斯·米勒，《论“芝加哥经济学派”》，《政治经济学杂志》（1962年2月），p.67。

4. 乔治·斯蒂格勒，《不受管制的经济学家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

学出版社，2003），pp.148-150。

5. 玛丽·安·德鲁巴，《罗伯特·M.哈钦斯：教育家肖像》（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p.160。

6. 米勒，《论“芝加哥经济学派”》，p.67。

7. 威廉·J.鲍莫尔，评论唐·帕廷金的《芝加哥传统论文集》（1983年12月），p.1082。

8. 《戈德华特的经济学家》，《新闻周刊》（1964年8月31日）。

9. 威廉·布赖特和巴里·T.赫希（主编）《诺贝尔之路：18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第4版（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4），p.85。

10. 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纽约：麦克格劳希尔出版社，1976），p.848。

11. 马克·斯考森，《锲而不舍的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经济展望杂志》（1997年春），p.142。

12. 马克·斯考森，《锲而不舍的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经济展望杂志》（1997年春），p.142。

13. 马克·斯考森，《锲而不舍的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经济展望杂志》（1997年春），p.142。

14. 托德·G.布什霍兹，《已故经济学家的新思想》（纽约：普卢姆出版社，1999），p.241。

15. 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论加尔布雷斯》（温哥华：菲莎研究所，1977），pp.15，23-24，30。

16.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新工业国家》（波士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67），p.124。

17.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展望：一部批判史》（波士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87），pp.271，274。

18. 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框架：和批评者的辩论》罗伯特·J.戈登主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pp.77，88。

19. 亨利·斯皮格尔和沃伦·萨缪尔斯，《当代经济学展望》（格林威治，康涅狄格州：JAI出版社，1984），p.246。

20. 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框架：和批评者的辩论》，

p.143。

21. 哈里·G.约翰逊，《凯恩斯主义革命与货币主义反革命》，《美国经济评论》（1971年5月），pp.9-11。

22. 罗伯特·李森，“帕廷金、约翰逊和弗里德曼的影子”，《政治经济史》（2000年冬），pp.746-747。

23. 罗伯特·李森，“帕廷金、约翰逊和弗里德曼的影子”，《政治经济史》（2000年冬），p.753。

24. 罗伯特·李森，《凯恩斯、芝加哥与弗里德曼》第1卷（伦敦：皮克林与查托出版社，2003），p. x。

第九章
法律经济学与政治哲学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的贡献超出了经济学范畴，进入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范畴中。法律经济学与政治哲学领域为芝加哥的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确立法律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一个独特领域的运动导火索是亚伦·迪雷克托，他是罗斯·迪雷克托·弗里德曼的哥哥。

在撰写有关芝加哥经济历史的文章时，梅尔文·雷德“对芝加哥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如爱德华·列维和罗伯特·伯克）在学术上对亚伦·迪雷克托强烈表达的感激之情感到震撼。迪雷克托似乎对20世纪30年代至1982年的芝加哥经济学主要人物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注罗纳德·科斯认为：“迪雷克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在法律和经济学上，他深刻地影响着一些学生和同事的思想……”注乔治·斯蒂格勒在1974年写道，“在当今大部分的芝加哥经济学政策意见形成过程中，迪雷克托和弗里德曼是主要的学术力量。”迪雷克托“在芝加哥学派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注

迪雷克托1901年出生于查特鲁斯科（当时属于俄国，现今属于乌克兰）。1914年，他随家人移民到了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1921年，他获得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接着把他的妹妹罗斯也带到了耶鲁。罗斯在那里完成了她的本科生学业。后来她在1932年以研究生身份进入经济学系，在那里遇到了米尔顿。

罗斯本身就很出色。坚韧而顽强的她，比起崇拜米尔顿，更加崇拜弗兰克·奈特。她多年后回忆道：“能和弗兰克·奈特密切合作是我三生有幸。一些朋友认为，和一个如此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会是一种负担。但是他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谦虚，更重要的是，他很有人情味，我从未感受到丝毫的紧张。”注

亚伦·迪雷克托在1934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进入华盛顿的财政部工作。1937年，他到英国做论文，并在伦敦经济学院和罗宾斯及哈耶克成为朋友。“二战”期间，他在华盛顿的多家政府机构任职。他一直保持着与芝加哥大学的联系。他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获得出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在美国一举成名。

1945年春天，哈耶克访问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赞助下进行巡回讲

学。哈耶克在美国时，保守派沃克尔基金会的哈罗德·卢诺找到他，想让他专门写一本针对美国本土的《通往奴役之路》。该提议遭到了哈耶克的拒绝，因为他打算组织一次由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在1947年成功举办，由沃克尔基金会承担大部分费用——近一半的与会者是美国人。基金会补贴了他们的参会费和交通费）。

虽然哈耶克不能亲自在美国指导一个古典自由主义项目，但是他鼓励沃克尔基金会在芝加哥大学以同样的方式支持亨利·赛门斯和亚伦·迪雷克托。罗纳德·科斯认为，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为有效的竞争机制研究出合适的法律及制度框架”。在1946年赛门斯英年早逝后，迪雷克托同意回到芝加哥大学主持项目。哈耶克在1946年致信迪雷克托，“这似乎是唯一的机会，使亨利·赛门斯创造的传统能在芝加哥得以继续传承，这对我而言极为重要”。

与米尔顿、罗斯·弗里德曼和艾伦·沃利斯一样，迪雷克托也是在1946年回到了芝加哥。迪雷克托的公寓在大学附近，紧邻妹夫家。迪雷克托主持的项目名称是《自由市场研究》，项目组成员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弗兰克·奈特和西奥多·舒尔茨等人。

迪雷克托的主要观点是，美国经济的特点不是垄断竞争，因而法律就不能基于这样的假设。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因为它为自由市场在主流学术经济学中的复苏铺平了道路。经济思想历史学家罗伯特·范·霍恩写道：

> 在短短十年（1946—1956年）时间里，芝加哥的自由主义内容经历了激烈的变革。迪雷克托和其他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及皈依者不再视垄断为民主的大敌，更不是一种要用美国反垄断法的大锤来击碎的力量。反之，他们认为，垄断不会对市场的运转造成危害，而是糟糕蹩脚的政府活动所造成的一种可以忽视的症状。

关于垄断竞争和财政货币理论的新的学术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为芝加哥的公共政策新观点铺平了道路。

与某些学术人物一样，迪雷克托进行更多的是口头交流，因此他的影响不像其他人那样有据可寻。他创办了《法律与经济杂志》，并担任了5年的主编。里查德·艾伯林认为，迪雷克托“最大的影响是他的教学……他在教学中改变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和律师对政府监管及反垄断法对市场竞争影响的看法”。

弗里德曼这样评价他的妹夫：

> 如果你翻阅我的价格理论书，会看到，在书的后面有我给学生的问题汇集。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出自亚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不同于奈特和瓦伊纳。可以说，他如瓦伊纳般精通经济理论并坚信经济理论的真实性。但是我认为，他确实有瓦伊纳和奈特没有的想法，那就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兴趣，特别是这些产业组织领域的问题。这使得他创立了整个法律经济学领域。[注]

20世纪50年代在芝加哥的卡尔·布鲁纳回忆道，迪雷克托“表达了一个如何用价格理论来理解我们所在世界的精彩见解”。[注]斯蒂格勒评论说，在苏格拉底讨论中，迪雷克托的“影响力几乎超越所有我曾见过的人”。[注]弗里德曼同样认为，迪雷克托“虽没有撰写很多东西，但他对其他人有很大的影响”。[注]一位他曾经的学生韦斯利·利贝勒记得，迪雷克托像“卡通漫画《莱尔·阿布纳》中的角色，不得不被关起来的‘秃头伊格’……因为不管什么时候你……看着他，都会不得不说出实话”。[注]有时候迪雷克托被人开玩笑地称作芝加哥“诚实的亚伦”。莱昂内尔·罗宾斯认为他是一个“十分有教养的人”。[注]

保罗·萨缪尔森说：“亚伦·迪雷克托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引导我学习了经济学。”[注]萨缪尔森还说道，迪雷克托是一个“从未发表过任何重要著述的人，但是他依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事实上是他将第一个由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瓦伊纳和保罗·道格拉斯等人组成的非常折中的芝加哥学派转变成第二个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学派”。[注]米尔顿和罗斯·弗里德曼将他们的回忆录献给“哥哥和导师”[注]亚伦。亚伦在2004年逝世，享年102岁。

罗纳德·科斯在1910年出生于英国并曾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他同样也是法律经济学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最著名的“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合法权利和产权的初次分配无关紧要。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后，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将以最有效的方式分配资源，因为资源会不断地以最高效和最优的方式被使用。在科斯的思想中，同样重要的还有这样的观点，即产权的确立及其形式是必要的前奏，进而塑造了市场交易内容。科斯继迪雷克托之后担任了19年的《法律与经济杂志》主编。他的学生史蒂文·张指出：“有些人认为，一个风华正茂的天才不应当去担负一项如此

耗时的任务。”[注]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任职（1964—2013年）直到去世。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22）是芝加哥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虽然其奥地利技术经济理论和方法论未被认可，也被当成芝加哥学派的一员，但是他对一些芝加哥经济学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说起自由市场原理时，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很多人都承认他在该领域的影响。

20世纪有两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哈耶克在维也纳出生长大。“一战”中，十几岁的他参加了保卫奥地利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哈耶克回到家并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在那之后，他开始受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影响。米塞斯在著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划”（1920）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运转的问题。“很多社会主义者从未认真地对待过经济学的问题，”他说，“他们也从未尝试去清楚地了解，究竟什么是决定自由社会特点的条件。他们非常随意地批判了自由社会的经济结构，同时忽略了将同样苛刻的敏锐性用到对有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的讨论中。”[注]

他举了一个例子，完美地阐述了其主要观点。这个例子描述了用自由波动的价格来引导经济的重要性。他说，

> 这位社会主义导师想要建一座房子。现在，可以采用很多种方法。每种方法对这座房子将来的使用都有一些优势和劣势，并且使房子有不同的可使用年限。每种方法都需要建筑材料和劳动力的支出。导师应该选择哪种方法呢？他不可能将需要花费的各种材料和各种劳动力归纳为一个共同的标准。因此，他不能对这些方法进行比较。[注]

“社会主义，”米塞斯总结道，“废除了理性经济。”[注]

哈耶克深深地被米塞斯的论证所吸引。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尝试去阐明米塞斯提出的问题。哈耶克早期的经济学著作遵循奥地利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活动中资本结构变化的重要性，尤其是构建不完全资本结构的可能性，这种不完全资本结构是储蓄不足和人为压低利率的结果。哈耶克的有关技术经济理论的著作并没有普遍（除了奥地利传统中的经济学家）受到人们的认可。布鲁斯·考德威尔是哈耶克作品集的主编，关于哈耶克早期商业周期理论方面的著作，他这样写道，“应该认为它主要有古文物般的价值”。[注]

关于哈耶克在政治和纯哲学领域的著述，却得另当别论。在这一点上，人

们认为哈耶克做出了影响芝加哥人的重要贡献。其中一些人成为古典自由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国际协会——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哈耶克通过参加社会主义辩论从而进入了政治哲学领域。他认为，未来活动受到价格指导，而不是由过去发生的事情所决定。

哈耶克对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异于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他不是把社会看成一个“组织”，而是把它当成一种“秩序”。通过这种区别，他想表明的是，社会不像军队那样，为了某种目的而组织起来；社会是一种制度，它的目的是满足其成员各自的愿望。社会是一种支持型制度，没有特定的目的。其意图是，允许成员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好的社会并不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引导最多的社会，而是尽可能使它的每位成员都实现其梦想和抱负的社会。

1936年，他在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经济学和知识》中写道：

> 存在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劳动力分工问题极为相似，或者同样重要。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存在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前者却完全被忽视。但是，对我而言，前者似乎才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存在于大脑里的不同碎片知识组合起来并得出相关结论。这些结论如果是人们刻意得出的，就需要指导思想方面的知识，单独某个人无法拥有这样的知识。对于这个核心问题，经济学比其他任何社会科学都更接近于答案。在我们能够定义的条件下，人们自发的行为能够引起资源的分配。虽然没有人对这种资源分配进行设计，但却可以理解成似乎是按照一个特别的计划来进行。注

为了让价格发挥其魔力，必须要保护私有财产，如果没有私有财产，就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价格。米塞斯的学生贝蒂纳·格里夫斯认为，对于米塞斯而言，“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关键因素不仅包括价格，即经济主体没有价格不能进行计算，还包括私有财产，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价格”。注把资源配置给更能有效利用它们的人。在这一点上，完整的三位一体：利润（profits）、价格（prices）和财产（property）非常重要。虽然社会主义者可能会对此表示嘲笑，但它们是知识所馈赠的三个重要制度，这些制度允许了生产性经济活动的发生。

在伦敦经济学院（LSE）任教的时候，哈耶克首次接触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是一位对哈耶克有影响的人物，以及维也纳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早年在LSE任教的埃德温·坎南。注随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

美国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并于1945年安排了哈耶克在美国的巡讲之旅，哈耶克与芝加哥学者们的关系愈发密切。他于1950—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在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之前，还曾多次访问该校。

他在1950年秋天抵达芝加哥，这和他同年夏天的离婚事件密切相关。他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讲述道，他在第一次结婚时是处于“情感疗愈期”[注]；他的真爱，其表妹，在他1923年去美国学习一年之后嫁给了别人。夏洛特·库比特是哈耶克和第二任妻子海琳所信赖的人。她在有关哈耶克的回忆录中回忆道，海琳告诉她，“自己从来没有爱上过第一任丈夫，她嫁给他只是为了孩子……她迫不得已认识了第一任丈夫，因为他频繁到她家里找她。他热烈的求爱让她飘飘然，最后也就选择了嫁给他。当她还在哺育第一个孩子时，哈耶克就责怪她结婚太仓促，并催她离婚”。[注]

哈耶克是在1926年夏天结婚的，这是他从美国回来两年后。直到1934年，多年未相见的他与海琳才见了面。按照库比特对第二任哈耶克夫人对她所讲述的回忆，他们决定“某一天一定要在一起，不管当时是多么的荒唐”。[注]在“二战”前后，哈耶克和海琳保持了一段长期的婚外情。这段婚外情在战争期间因为他不能去维也纳而中断。战后，他们计划双方各自离婚然后再婚。海琳的丈夫同意离婚，然而却在离婚生效的几天前去世了。哈耶克的第一任妻子不同意离婚。于是，1950年春天，在赴芝加哥的途中，哈耶克在费耶特维尔的阿肯色大学待了一学期，因为那里有宽松的离婚法律。他的离婚请求在1950年7月13日获得同意。一个月后他在维也纳娶了海琳。

他想在美国寻求一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来实施他们的离婚再婚计划。哈耶克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接受芝加哥提供的工作职位，起初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离婚和再婚财务上的可能性。我对离婚和再婚已经期盼很久，战争迫使我将其推迟了多年”。[注]

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跨学科组织。哈耶克在委员会的头衔是社会与伦理学教授。罗纳德·哈默威是哈耶克的一名学生，他回忆道：

> 他气宇轩昂，行为令人无可挑剔，并带着一种绅士般的学者风范。坦白地讲，我觉得他有点儿太正式。后来我逐渐喜欢上了他并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见过他好几次，但总觉得我们之间有一堵墙，不管多薄，都能把我们分开。事实上，我一直称呼他为教授，即便是在最后成为教授好多年见到他的时候，那时我已经40多岁了。[注]

哈耶克在芝加哥时期的著作是《自由宪章》（1960）。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一心想让该书成为他的代表作。在距《自由宪章》一个世纪以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论自由》中写道："和整个人类相比，如果只有极少数人的经历被别人采用，将会是现有实践上的进步。但是这极少数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没有他们，人类生活将成为一潭死水。"[注]哈耶克同意穆勒的说法，他在《自由宪章》中说道："比起所有人都能利用的自由，百万人中只有一人能利用的自由，对社会更加重要，对大多数人更加有益。"[注]

对此，哈耶克彻底颠覆了数百年来的平等主义思想。产生于自由市场秩序中适当的不等，或者说社会成果的多样性，不但不会阻碍进步，反而恰恰是引起和构成进步的因素。他认为，进步的产生为阶梯状：首先，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获得某项新产品或服务，随后其他人获得，最后整个社会获得。昨天的奢侈品成为明天的必需品。阻止一部分人提前获得新产品和服务的做法会终结人类的进步。

此外，个体也具有多样性。这也是哈耶克最赞同穆勒的地方。他在《自由宪章》正文结束的时候提到穆勒："除了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文章《论自由》开头所引用的威廉·冯·洪堡特的话之外，我们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措辞来结束本书。'这些篇章所论述的每一个论点都直接指向一个宏大且主要的原则，即丰富多彩的人类进步绝对重要。'"[注]哈耶克强调，虽然"现代潮流是削弱人们之间先天性差异的重要性，将所有重要的差别都归因于环境"，事实上：

> 个体的人从一开始就彼此迥异。即使所有人在相似的环境中成长，个体差异的重要性几乎不会减弱。事实上，"所有人生而平等"的说法根本不正确。我们或许会继续使用这个神圣的词来表达这样的理想：所有人应当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受到同等对待。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种平等的理想能够或应当具有何种含义，我们首先需要将自己从实际平等的信念中解放出来。[注]

哈耶克认为，在自由最大化的社会中，导致社会结构多样化的并不只是天生的个体差异，还有人们不同的品位和偏好。有人喜欢更多的收入，有人偏爱更多的闲暇。在人的一生中，人的收入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而变化。要求获得一致的理想社会成果的想法是错误的。

《自由宪章》传递的重要信息是：新的和未预见事物的出现和发展需要自由。关于人类本性，哈耶克认为，个体的思想有限且微不足道。发展通常

是幸运的意外和突破的结果。市场的优点不在于它的正确性或者是能获得预期的结果，而是和其他制度相比，市场更能得到有益的成果。自由市场承认个人的弱点。政府和法律是必要的，但很容易被误用。因此，恰当的社会目标不是对权力的正确引导，而是限制权力，特别是对任意权力的限制。

财产是自由的必要堡垒，也是个人幸福的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创造私人空间和受保护的范围。米塞斯认为，自由浮动的价格是正常运行的经济秩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私有财产对价格至关重要。哈耶克将米塞斯的观点扩展到政治观点上。他认为，如果没有私有财产，人类就是奴隶。没有任何“政治”自由能够脱离“经济”自由。作为个体的人们如果没有拥有一块地或一份事业的权利，也就没有了选举的权利。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密不可分。

来自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们通常在其他机构也榜上有名。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布坎南在“二战”结束后就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学者，言辞颇具先见之明，表述清楚准确。作为弗兰克·奈特的学生，布坎南尊崇并效仿奈特。他指出，奈特是“行为的榜样。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奈特的地位从未被替代，甚至没有丝毫的动摇。当我尝试着评析自己的发展时，我发现，要是没有接触到弗兰克·奈特，很难想象我会成为什么样子”。[注]

布坎南的职业生涯非常成功。他和戈登·图洛克合著了《同意的计算》。在书中，他支持有限政府，其依据是：人类不完美；政府官僚倾向于个人利益而不是大众利益。这样看来，布坎南与美国创始人詹姆斯·麦迪逊的观点如出一辙。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除了对人性的最好的思考外，政府本身是什么？……构建一个被人管理、管理人的政府，最大的困难在于：首先必须使政府有能力管理被管理者；其次迫使它管理自己。”[注]布坎南评论说，人类不完美性的补救方法之一，是普遍采用犹太—基督教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是真正自由社会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注]

布坎南领导的弗吉尼亚政治经济学派被认为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个分支。弗吉尼亚学派的主要人物——布坎南、图洛克、沃伦·纳特和劳特利奇·瓦伊宁等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布坎南的重要性源自他在发展公共选择领域中发挥的显著作用。本质上，布坎南等人的观点是，无论是当选的还是民间的公务员，都应当被看做与其他人一样，在经济中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这种观点重视制度。布坎南强调政府发展的趋势。他长期支持将平衡预算作为缩减政府和鼓励经济发展的途径。布坎南和图洛克还写道：“人的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认识到这一点，人就能以下面的方式建立自己与同

伴的联系，即有效地最大化社会相互依赖带来的互惠互利。”[注]布坎南与他的导师弗兰克·奈特一样也是一位纯粹的功利主义者。

多年来，芝加哥经济学家关于法律经济学的思想有实质性的进展。在20世纪30年代，瓦伊纳是主要力量。他与亨利·赛门斯一样，高度关注大公司的不完全和垄断性竞争。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迪雷克托等人在调查庞大的企业运营带来的实际效应时发现，不完全和垄断性竞争很少涉及经济效率的损失。因此，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的努力，在法律上，很多反垄断法中的反市场偏见逐渐减少。

在20世纪50—70年代，经济学思想更加关注自由市场政策。在这样的转变中，迪雷克托等芝加哥人重构了美国商业关于垄断与寡头垄断及其影响的事实本质。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外，加上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的重构，人们呼吁并要求进一步弱化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

---

1. 梅尔文·W.雷德，《芝加哥经济学：永恒和改变》，《经济文献期刊》（1982年3月），p.7。
2. 罗纳德·科斯，《芝加哥法律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期刊》（1993年4月），p.247。
3. 乔治·斯蒂格勒，《不受管制的经济学家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3），p.158。
4.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两位幸运者的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p.50。
5. 科斯，《芝加哥法律经济学》，p.247。
6. 科斯，《芝加哥法律经济学》，p.247。
7. 罗伯特·范·霍恩，《重塑垄断和企业角色》，见范·霍恩、米卢斯基和斯泰普尔福德共同编写的《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最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pp. 228-229。
8. 里查德·艾伯林，《货物和思想市场上的亚伦·迪雷克托》，《自由人》（2004年11月），p.2。
9. J.丹尼尔·哈蒙德，《理论与实证：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p.114。
10. 阿加·克莱默（主编）《对话经济学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与对手就当前宏观经济学中争议的公开言论》（托托华：罗曼·艾伦赫尔德出版社，

1984），p.181。

11. 艾德蒙·W.基奇（主编），“真理之火：纪念1932-1970芝加哥法律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期刊》（1983年4月），p.185。

12. J·丹尼尔·哈蒙德，《理论与实证：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p.113。

13. 基奇，“真理之火：纪念1932-1970年芝加哥法律经济学”，pp.183-184。

14. 科斯，《芝加哥法律经济学》，p.244。

15. 保罗·萨缪尔森与作者的通信，2005年6月30日。

16. 卡伦·伊尔丝·霍恩，《通往智慧之路：和10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对话》（切尔滕纳姆，英国：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2009），p.46。

17. 弗里德曼，《回忆录》，p.v。

18. 史蒂芬·N. S.张，《罗纳德·哈里·科斯》，见伊特韦尔、米尔盖特和纽曼主编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7），p.456。

19.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主编），《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35），pp.87-88。

20.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经济学论著》第3版修订版（芝加哥：亨利莱格尼里出版社，1966），p.698。

21. 哈耶克，《集体主义经济计划》 （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35），p.110。

22. 布鲁斯·考德威尔，《哈耶克的挑战：一个知识分子的传记》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p.325。

23.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pp.50，54。

24. 贝蒂纳·格里夫斯与作者的通信（1999年2月18日）。

25. 艾伦·（蓝尼·）埃布斯泰因，《埃德温·坎南——自由主义老前辈》（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7）。

26. UCLA口述历史项目，“诺贝尔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1983），p.395。

27. 夏洛特·E.库比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生平》（贝德福德郡，英国：作家在线出版社，2006），p.211。

28. 夏洛特·E.库比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生平》（贝德福德郡，英国：作家在线出版社，2006），p.211。

29.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哈耶克论哈耶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p.126。

30. 罗纳德·哈默威，《在F.A. 哈耶克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加图期刊》（1999年秋），p.285。

31. 穆勒，《论自由》（1859），ch.3。

32.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31。

33.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394。

34.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p.86-87。

35. 詹姆斯·布坎南，《优于耕作及其他文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p.77。

36.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联邦党人文集》（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48），p.265。

37. 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安阿伯：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62），p.303。

38. 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安阿伯：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62），p.306。

第十章
芝加哥的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

《自由宪章》是哈耶克在1960年于芝加哥大学创作的伟大著作，他在书中倡导了被称作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政策。弄清术语很重要，历史上用“libertarianism”来表示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哈耶克自己在《自由宪章》中经常用“libertarian”来描述他的观点。

术语“libertarian”的正确用法已不再是这样。在当代的讨论中，“libertarian”表示一种新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在这样的立场下，人们无时无刻不以各种方式“憎恨”[注]政府；政府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造成危害；人们一有机会就强烈反对政府。实际上，至少这些当选从政的当代美国“自由主义者”拥护上述观点。不论其属于何种党派，他们都支持对富人减税；如果那样做不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也会针对富人反对增税。

此外，当代美国自由主义者与原教旨主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联盟，这种联盟或许牢不可破。原教旨主义者是当代社会中最保守的、非理性的因素。他们把下述观点当成科学事实提出来：世界是6000年前所创造的；上帝将现在的以色列国赐予这些自认为是犹太人的人们；在世界历史中，美国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角色。大概年轻时候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与这些原教旨主义者的信仰毫无瓜葛，另外，对于这些拥护当代自由主义的很多人的社会保守主义观点，他们持反对态度。

当代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不是这些进步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观点。最好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事业成熟期（20世纪50年代两人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以及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所表达的观点描述为“古典自由主义”，哈耶克的观点尤甚。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消极地展现了反对古典社会主义的思想，但在《自由宪章》中，对此进行了积极的阐述。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哈耶克首要反对的是古典形式下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政府所有和政府管理经济生产方式的形式。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主义”的意思不是指福利社会的制度、项目和政策。事实上，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直到老年，他对福利国家的很多方面表示赞同。因此，

把职业生涯早期和中年时期的他看成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比当代自由主义者更为恰当。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几乎全盘否定政府所有的积极作用，这根本不是哈耶克年轻时期以及中年时期的观点。(注)

从1931年抵达英国开始，哈耶克发表了很多言论，论证了他对福利国家的看法，他提倡自由主义公共政策。1933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了就职演讲。在演讲结束时，他阐述了以下思想："孤立当代经济学家，拒绝现代进步主义利用他能提供的知识……我对特殊的历史发展做了概括，这种发展使得经济学家频繁地发现，自己在方法上同一些人并不一致，但是与这些人的目的统一；与其他一些人在方法上一致，但与这些人在目的上大相径庭"。同时，哈耶克还就同他一样的现代进步派和经济学家"共有的目的"(注)展开了评述。

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他所遵循的传统不是这里所指的当代自由主义，而是古典自由主义。他理解并支持政府所起的重要作用：

> 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可以使其成为死板的信条。没有固定且一成不变的规则。特别是，在刻意地创造出一个竞争能在其中尽可能有力地起作用的体系与被动照单全收各种制度之间存在天壤之别。或许，没有什么像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某个粗糙的经验法则僵硬的坚持一样有害于自由主义事业，这种粗糙的经验法则首先就是放任主义原则。
>
> 重要的是，不要将反对……（社会主义）规划与教条的放任主义态度相混淆……成功利用竞争阻止了一定程度上的强制干预……但是认可了其他一些东西……甚至需要一定的政府行为……严禁某些有毒物质的使用，或者在其使用过程中需要特别的预防措施；限制工作时间或要求一定数量的卫生设备，这些做法与维持竞争完全相容……维持竞争与广泛的社会服务体系也并非不相容……竞争的运行不但要求充分地组织一些制度，例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其中的一些制度无法由私人企业来充分提供——但是，它首先依赖于一个合适的法律体系……某些乱砍滥伐的有害影响、一些农业和工厂产生的烟雾和噪音都不能局限于财产所有者。
>
> 创造条件让竞争尽可能有效，在竞争不能发挥效力的地方采取一些弥补措施。去提供服务，按照亚当·斯密的话，"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些服务有利于社会，但是它们的本质是，利润永远不能抵消任何个人的支出……"上述行为为国家活动提供了真正广泛且没有争议的领域范围。可以提供合理辩护的是，不存在任何让国家一无是处的

体系。

在1945年的一次采访中，哈耶克评论道，《通往奴役之路》“并不是真正攻击社会主义者，而是试图去说服他们……我的主要论点是，他们在追逐预期目标的过程中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他还指出：“政府具有提供条件创造较高且稳定的就业水平的重要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所有不同于当代自由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要素都呈现在哈耶克早年及中年时期的作品中，即政府在提供服务、保证所有人的最小经济利益以及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时所起的重大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哈耶克鲜少支持政府。他强调的是，一个建立在私有制、经济生产方式的私营管理和产品与服务的自由交换基础上的制度能够带来多方面的经济利益。但是中年时期的哈耶克并不是极端的反政府主义者。

乔治·纳什是美国著名的现代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他恰当地概括和描述了主宰了保守、自由且主流的共和党政治组织思想的团体与思维定式：“激进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纳什将这个观点的知识根源追溯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穆瑞·罗斯巴德那里。米塞斯—罗斯巴德观点对当代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纳什总结出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口号。“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已经成为共和党、茶叶党、保守—自由主义智囊团等领域的主流。这些口号包括：“无政府主义永恒！让政府吃不了兜着走！MYOB（别管闲事）！离我们远点！我是政府之敌！税收就是盗窃！”纳什还说，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威廉·F）巴克利指出，保守主义者对国家的接受伴随着反对其扩张的‘假设’，但是向资本主义范式在各个范围的教条化使用中说不”。

虽然哈耶克在大部分职业生涯中都是福利国家的支持者，但他与该标签保持距离。他在《自由宪章》中强调有益的政府行为。在书中他对高压政治和税收加以区别：

> 与社会主义不同，福利国家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意义。该术语有时候用来描述以任何方式关注除了法律和秩序维护之外的所有问题的任何国家。虽然有一些理论家要求政府行为应当限制为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但是这样的立场不能取决于自由原则。只有高压的政府手段需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不可否认，存在广泛的非高压政府行为……明确需要通过税收来为它们提供经费。

他还说：“让我们考虑……政府高压手段与这些纯粹的服务行为之间的区

别。高压政治没有参与到这些纯粹的服务行为中，或者仅仅出于需要通过税收获得经费来源的原因而有所参与。”注

他明确地驳斥了被当代自由主义者采纳的观点：

> 当今很少有政府将自己局限在偶尔被描述的“个人主义最小化”当中，“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会提倡这种对政府行为的限制。现代政府都针对穷人、不幸的人和残疾人采取举措，并且关注健康问题和知识传播。没有理由不让这些纯粹服务行为的数量随着财富的普遍增长而增加……毋庸置疑，当我们变得更加富有，社区一直为不能自理的人们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将逐渐增加；政府也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效地并且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地提供帮助或给予引领。没有理由不让政府在诸如社会保险和教育等领域中发挥一定作用，甚至采取主动措施，或者临时性地援助某些实验性的进展。注

对此，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自己也不能用更好的语言来描述。事实上，中青年时期的哈耶克的立场更接近于现今很多民主党人而不是共和党人的立场。现今，一些将自己视作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人轻易地驳斥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涉和参与（不管这种干涉和参与意味着什么）；他们反对政府对学校、家庭、失业群体、老人、病人、残疾人等提供帮助；他们认为，政府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他们应当谨记，上述立场被中青年时期的哈耶克所明确排斥。

他还在《自由宪章》中写道：“天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情况与市政当局小规模提供的类似设施（公园和博物馆、剧院以及运动设施）的情况一致……如果纳税人了解他所需要负担费用的整体范围，并且在决策中能够敲定，总体而言这些问题就无须赘述”；注“认为政府完全无须关心这些事项（包括‘社会保险’和‘教育’）的坚硬立场……合乎情理但和自由毫无关联。”注

《自由宪章》呼吁重要积极的政府作用的相关陈述包括：

> 环境卫生或道路……这些服务是长期以来公认的公共服务领域。注
>
> 政府承担的非强制性或纯粹的服务行为……比如援助残疾人和体弱者。注

> 政府普遍承担的行为……提供一个可靠有效的货币体系……设定度量衡的标准；提供调查、土地登记和统计等所搜集的信息；以及某种教育的支持或者组织。[注]
>
> 明显满足需求的服务，却不能由竞争企业提供，因为要个体受益者为这些服务支付费用是不可能的或者难度太大。这些大部分是……健康服务……以及市政当局为城市居民提供的很多便利设施。[注]
>
> 建筑安全条例……城市里允许的一些建筑条例是可取的。[注]
>
> 对任何一块土地的使用通常会对邻地造成影响，这无疑使赋予所有者为所欲为地使用或者滥用其财产的做法不可取。[注]
>
> 政府行使土地征用权来强制性购买土地……这样的做法极少有争议。[注]
>
> 就从事不同的职业而言，我们的原则是不排除下述可能的合理性：在某种情况下，只允许把工作交付于这些拥有某些特定资质的人。[注]
>
> 原则上，一个自由系统不排斥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则……必须要通过比较总成本与收益来判断这些措施的合理性……这就是被称作“工厂立法”的大部分广泛法规的真相。[注]
>
> 因此，至少原则上与自由系统协调一致的政府行为的范围大小和种类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注]

其他很多人，包括各种保守主义者与当代自由主义者，注意到哈耶克支持古典自由政策的立场，并对其发表了相关评论：

> 戴维·戈拉舍：“对哈耶克而言，主要的区别不是大政府与小政府，而是法治政府与人治政府。在前者中，所有强制性的行为都受到普遍公正规则的束缚；而在后者中，可能会任意地采取高压政治去实现政府目的，或者是政府代表的多数人想要实现的目标。虽然哈耶克并不关注政府获取了更多的国民收入的事实，对于他来说，政府支出的数量和特点是次要问题，这个问题没有直接涉及任何根本性原则。”[注]
>
> 安东尼·德· 雅赛：“税收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是集体拥有物质资源

对抗个人拥有物质资源的一个不完善的措施。认为政府‘除了提出方法’，不需要依靠强制手段去提供服务……的说法听上去像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黑色幽默。要提供的服务是无限的，它们都满足某种需要。应当提供多少服务？我们处在一个意识形态的空隙中。在此，可以同样地容纳最小国、最大国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任何国家。”注

杰弗里·维克斯：“他允许政府有以下恰当的行为，即向这些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自食其力的人提供少量的政府支持。但是他没有指出用什么规则去控制这种政府支持的程度。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甚至让人觉得，在这件事及其他事情上，只要政府支持是平等地针对整个阶级，支持的程度就由政府来决定。”注

汉斯·赫尔曼·霍普：“哈耶克关于市场和国家作用的观点与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不能系统化地区分开来。”注

哈耶克的一些老朋友赞同他的观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评论《自由宪章》时写道：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丰功伟绩是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方案专制特点的关注。现在，哈耶克教授在这本综合性的专著《自由宪章》中，详述并证实了他的观点。在本书的前两章，作者对自由的含义与自由文明的创造性力量进行了精彩的阐述。

不幸的是，此书的第三章让人大失所望。在该部分，作者试图区别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他断言，社会主义在走下坡路，福利国家正取而代之。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福利国家和自由相互兼容。注

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同事莱昂内尔·罗宾斯这样评价《自由宪章》：

认识到社会上有一种未被总体规划的秩序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人比哈耶克教授更加清晰地阐述了18世纪关于这方面的伟大发现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哈耶克的精彩论述本身就是很多崭新见解的源头……差不多被机械性地重复了150年的命题被赋予了之前从未实现的意义和深度。

罗宾斯还说：

从只让政府发挥“夜警”功能的意义上来说，哈耶克教授的态度不是一种放任主义。他对集权政策的批判与一系列以更加系统化的形式开始着手的其他选择一样，都能被看作国家行为的一种自由主义议程……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对哈耶克议程的特定项目的价值和实用性的看法可能存在差异。很容易想到他们各自的看法。但是，这些看法累积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方案。这些把个人自由当做内心事业的人们能够认真地思考这个方案。注

哈耶克在早年和中年的职业生涯中，都支持政府的重要作用。除了在《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章》中提出了相关的观点外，1963年他还在一场关于大卫·休谟的讲座结束时，以赞许的口吻阐述了以下立场：

休谟丝毫没有否认政府同样有积极的行为。与后来的亚当·斯密一样，他知道，只有赋予了政府自主决定权，才能“建成桥梁、开放港口、提高壁垒、形成运河、装备好舰队并且训练好军队；在政府的关怀下，任何带着各种人性缺点的人，通过一种能够想象到的最好最微妙的发明，成为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在某种程度上，能避免这些缺点。”注

然而，在不同于当代自由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下，除了大力支持重要积极的自行决定的政府项目与行为，同样还支持构建一个正派的、人性化的、民主的、公平的和繁荣的社会。正如哈耶克强调的那样，古典自由主义秩序依赖于能够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私有化市场，这个观点对哈耶克影响至深。该市场的基本要素包括私有财产、自由波动的价格和利润。哈耶克精彩地阐述道，价格和利润提供信息，并引导资源流向这些能对其进行充分利用的人们手中。此外，价格和利润取决于私有财产的存在。但是，中青年时期的哈耶克敏锐地认识到，价格、利润和财产不但不与充分的政府行为相冲突，还在这样的行为中得到巩固。

在1946—1976年，待在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所持有的也是这种古典主义立场，对政府的敌意是弗里德曼在后期自由主义立场作品的特点，在早期作品中并不存在。在其196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写道，除了维护法律和秩序以及使合同生效的功能外，“政府有时会使得我们有能力去共同完成一些事情。我们发现，如果分别去完成这些事情，会很困难，花销也更大”。但是他马上补充道：“对政府的任何利用都充满危险，”他还指出：“我们不应当也不能避免以这种方式利用政府。”注他后来还评论道：“就具体的功能而言，不可能一次性讲清楚国家的作用。”

注

这个阶段的弗里德曼认识到，“在经济和其他活动中，首先依赖于自愿合作和私有企业的做法，”注与充分的政府作用不矛盾。事实证明，前者需要充分的政府作用。他欣然接受这些古典自由主义者总是支持的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他接受古典自由主义的所有历史的与当代的元素：民主、个人权利、大量私营企业的经济以及政府的重要作用。他避免极端的古典社会主义（政府所有和对经济生产方式的管理），也避免极端的当代自由主义（完全无政府和极端的反政府主义）。

毋庸置疑的是，即使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也展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在很多曾自诩为古典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人们身上都没有体现出这样的倾向，不包括斯宾塞、米塞斯和兰德等人。弗里德曼列出的具体政府改革提议的清单中不乏一些富有成效的观点。弗里德曼与之前的奈特、瓦伊纳和赛门斯一样，提倡经济互动和经济交易中更多的自由。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观点颇有道理。但对于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出的诸如取消国家公园这样切实的建议就该另当别论了。这是一个乌托邦似的空想。或许它作为一个思想实验是好的，但在近期内不可能付诸实施。总之，至少在20世纪大半个时期，在发达经济体中，明显的私营经济与充分的政府行为并不相互矛盾。

拥护“小政府”或者“低税收”并不一定需要支持所有激进的自由主义和反政府建议。职业生涯后期的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以及现今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了这些激进的建议。有可能在接纳更小更有效的政府和更少的税收时不用去关注限制政府或提倡向富人征收极少税收的极端提议。可能赞成逐步的改革且认真对待过渡问题。可能在支持社会改革时不用去支持革命性变革，无论这种变革是马克思主义方向还是当代自由主义方向。当代自由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主要来自弗里德曼、兰德和米塞斯，而不是源于哈耶克，这正是称赞哈耶克的地方。

《自由宪章》最有名的部分或许是它的后记：“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哈耶克有力地论证道，古典自由主义不应当与保守主义混为一谈。保守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后退的教条、态度和信仰。而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种前进的信条和计划。古典自由主义相信，如果人类能够学到它的教义规则并学以致用，未来就会好于现在。注

哈耶克在描述人们对待科学知识的过分保守态度时，保留了一些对保守主义的严厉批判：“个人认为，保守主义态度最令人反感的地方，是它倾向于拒绝这些获得充分证实的新知识，因为它不喜欢新知识带来的一些后果。或者，更直率地说，就是它的蒙昧主义。”他指出：“我对这些反

对……进化论的人没有丝毫的耐心。”对于哈耶克以及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真理是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和目标，但不能完全实现。他在《自由宪章》的结束部分还说道，古典自由主义认为，“知识的进步是人类努力的一个主要目标。我们期待通过知识的进步去逐渐解决这些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和困难……自由主义者意识到，它是能够创造出新知识的人类成就的精华。自由主义者已经准备好接受新知识”。古典自由主义拥抱着真理。

---

1. 乔治·H.史密斯，《自由制度：古典自由主义历史主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如果人们希望了解多数自由主义者对竞争的激情投入和对政府干涉肆无忌惮的仇恨，那人们应该感谢自由市场的广义概念，它包括的远远不止有形商品”（p.172）；亚龙·布鲁克，见马洛里和伊丽莎白·法克特（主编）《大帐篷：保守派革命的故事》（纽约：Broadside出版社，2014）：“当今的自由主义运动中，有很多人信仰无政府主义。这种信仰不仅表现为直接支持无政府，还包括对政府的仇恨，一种对所有政府功能的仇恨”（p.133）；兰德·保罗（p.133）：“回归到更加自由的保守主义会让我们更加限制政府行为，并采取更多支持自由的政策”（p.133）；“如果老大党（共和党）支持精简政府，我们一定也会对政府心存怀疑”（pp.347，355）。

2. “早期”的哈耶克不是指17-24岁将自己看作社会主义者的哈耶克。我所指的“早期”是自1924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开始一直到两年后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这段时期；从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至后30年为中年时期；老年时期是从1974年直至1992年去世。

3.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 A.哈耶克作品集》第3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p.34。

4.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1986），pp.13，27-29。亨利·赛门斯在1939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出于历史原因，我所请求的政策方案可以被称作放任主义；但是放任主义的现代方案不能是以任何名义的旁观政策”［见谢莉尔·戴维斯·卡斯珀《放任主义在美国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复苏》（切尔滕纳姆，英国：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2002），p.36］。

5.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哈耶克论哈耶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p.116。

6. 乔治·H.纳什，《美国保守知识分子运动》（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76），pp.313，315-316，318。

7.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p.257，222。

8.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p.257-258。

9.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p.375，259。

10.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 258。

11.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141。

12.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144。

13.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223。

14.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223。

15.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p.225，354-355。

16.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229。

17.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217。

18.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227。

19.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p.224-225。

20.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231。

21. 戴维·戈拉舍，《评论》（1992年10月），p.50。

22. 安东尼·德· 雅赛，《文献评论》（1989年春），p.296。

23. 杰弗里·维克斯，“自由控制”，《未来》（1979年8月），p.347。

24. 克里斯托弗·弗雷和罗伯特·内夫（主编），《与哈耶克抗衡》（10:11，1994），p.127。

25.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自由及其对立面》，《基督经济学》（1960年8月1日，1960），pp.1，3。

26. 莱昂内尔·罗宾斯，《哈耶克论自由》，《经济学刊》（1961年2月），pp.69-70，78。

27.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7），p.121。

28.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1982］，p.2。

29.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1982］，p.4。

30.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1982］，p.3。

31. 哈耶克，《自由宪章》，pp.404-405。

第十一章
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弗里德曼

当1962年哈耶克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当时属于联邦德国的弗赖堡大学时，弗里德曼在讲话中说道："关于哈耶克的一件趣事是……在一定程度上，他成功地跨越了两种世界。这个屋里的成员由两种人组成：一种人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对哈耶克在科学领域的工作感兴趣，另一种是因为他们对哈耶克在公众中传播思想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感兴趣。"注弗里德曼的情况和哈耶克如出一辙。

弗里德曼成熟的职业生涯至少包括两个阶段，清楚地了解这两个阶段很重要。1946—1976年，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一名经济学教授，大约在这段时期的前20年，他是一名学术经济学家。从1964年开始，随着他成为巴里·戈德华特的首席经济顾问，开始逐渐地被学术界以外的广大公众所熟知。没多久他就在《新闻周刊》上开辟了一个专栏，此后他的威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在弗里德曼去世后，保罗·克鲁格曼在对其赞美的批判中评论道：

> 作为一名普及者和传播者，他的感染力部分来自他作为一名资深经济理论家的当之无愧的声望。但是，在他作为专业经济学家在工作上的严谨性与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言论上更加宽松的逻辑性（有时让人怀疑）之间有很重要的差异。弗里德曼的理论工作普遍受到专业经济学家们的赞赏，但是人们对他的政策言论特别是他的普及宣传却褒贬不一。注

沃伦·萨缪尔斯是位伟大的经济思想历史学家。他同样认为，弗里德曼的专业工作与他的公共政策主张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萨缪尔斯在评论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时写道："弗里德曼是一位严谨的经济理论家。但他对政治经济事务的思考不是这般严格……（这些）回忆录展示了两个迥异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位是严谨的经济科学家弗里德曼；一位是主张'自由市场'、'有限政府'和'自由企业'的激进主义分子，具有非严谨意识形态的大祭司弗里德曼。"注

挪威经济学家安格纳·桑德默同意这个观点："人们很容易对弗里德曼作为

一名研究者以及作为一名意识形态发言人做出明确的区分。”桑德默补充说：“与他更受欢迎的作品中涵盖的其他领域相比，他的专业知识领域对政策建议提供了更强的实证基础。”例如，货币理论领域中的“政策建议就有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支持”。

弗里德曼在回忆录的结尾部分写道：“我的主业是专业经济学……我的副业是公共政策。”他还写道：“广大公众认识我，是因为我在公共政策上的参与及罗斯与我共同创作的一些关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学的作品。但是，这些只是副业，不是我的主业……公共政策一直是我的一种业余活动。”

弗里德曼在1962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尝试。这本书以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沃克尔基金大会上所做的一系列的报告为基础，它是进入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伟大著作万神殿的最典型的弗里德曼著作。这本书显然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论自由》的后继者。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写道：“对于自由的人来说，国家是个体的集合，国家不能凌驾于这些个体之上。”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和穆勒的知识教父杰里米·边沁说：“社群的利益是道德用语中能够出现的最普遍的表达之一……社群是一个虚拟体，由可以被看做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社群的利益就是组成它的成员的利益总和。”

个人主义是穆勒和弗里德曼政治经济哲学的核心。弗里德曼说：“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对个人尊严的信仰。”穆勒在《论自由》中写道：“个人掌管着他自己，掌管着他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与穆勒一样，弗里德曼强调天才的重要性。他认为，历史上的伟大成就是“个别天才的成果”。穆勒说：“因此，我坚决地坚持天才的重要性。”

弗里德曼准确地把当代古典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传统以及边沁的追随者——英国哲学激进派联系起来：“哲学激进派的后继者们（在此仅列举几位：戴西、米塞斯、哈耶克和赛门斯等）认识到对自由主义潜在的威胁。他们担心，对经济活动持续的集权控制将会验证《通往奴役之路》，就像哈耶克对这个过程精辟的分析所取的名字一样。”

弗里德曼的一般古典自由主义哲学是对永久性问题的充分说明。他的一般自由哲学没有任何瑕疵，因为他对学术经济学有着卓越且有益的贡献。弗里德曼作品中出现的问题与他后来的一些公共政策建议有关，包括他后来对政府的憎恶以及认为联邦政府预算赤字不重要的观点。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弗里德曼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名声大噪，他在学术界已经久负盛名，于1951年获得克拉克奖章。当时该奖章每两年颁发一次，由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给低于40岁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多次出现在芝加哥大学圆桌国家广播节目中，为广大观众笔耕不辍，与全国的学生和观众进行交流。

纳什写道：“20世纪60年代，自由社会的保守主义需要再次获得崭新而切实的阐释。幸运的是，这场运动即将来临，源于光芒四射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冉冉升起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纳什还指出：“《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出版以及弗里德曼作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出现在保守主义阵营中成为战后权利演变的主要里程碑……到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成为全国最受推崇最富影响力的保守主义学者，也是拥有国际声誉的少数学者之一。”弗里德曼作品的一个优点是，作品中“充满了为自由主义项目提供的言之有据的具体备选方案”。[注]梅尔文·雷德写道：“在20世纪第三个25年中，芝加哥学派获得的显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它既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又能为政治保守主义提供理论基础。”[注]

正如之前所描述的，弗里德曼极力反对政府，这完全不值得称赞。与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他支持并发动了国际新自由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罗纳德·里根以及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竞选、管理和政府一同走向了巅峰。这个时期国内的改革与国外共产主义的瓦解不谋而合。

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突然意外的瓦解似乎验证了芝加哥自由市场的立场。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是可取的，而是社会主义根本不可取。不是说人类没有具备使社会主义起作用所需要的美善，而是人类还没有完善的知识储备。价格、利润和私有财产是克服劳动力专业化所带来的知识分工和知识碎片化的必要制度。弗里德曼和哈耶克把社会主义问题从道德问题转化为事实性问题。

弗里德曼认为，对共产主义的决定性的考验是，之前是个别国家的资本主义比例现在远远超越了共产主义部分。作为共产主义建立的基础与根本寄托的制度、观念和信仰非常重要。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这段时期内，弗里德曼的关注点从学术经济学转向了公共政策宣传，同时，他也在国际经济学社会中名列前茅甚至独占鳌头。1967年，他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76年，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此，他感到欣慰的是，经济学专业中的很多问题，尤其是财政货币政策的相对重要性和货币政策的影响等问题，都朝着他的思路发展。

他对大萧条的学术概念重构对公共政策的变化至关重要。在弗里德曼之前，对大萧条的标准解释是，其代表着一场资本主义危机。股票市场的崩溃被看成至关重要的阶段，事实上它的意义微不足道。弗里德曼证明，大萧条的根源是由联邦储备体系引发的货币供给的崩溃。大萧条并没有证明资本主义失灵，它反映的是货币政策的力量。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弗里德曼是国内外主张货币制度改革的主要知识分子。他支持浮动国际汇率，在该领域，他取得了辉煌的知识性及实践性的胜利，将自1971年以来的国际贸易称为弗里德曼时期毫不为过。昔日的异端成为未来的信条。

关于国家货币政策，他坚持一个基本点，即“任何地方的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注货币政策非常重要，它在总价格的决定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弗里德曼希望，没有或者仅有非常有限的通货膨胀。他提出了实现该目标的相关措施，极大地影响了全世界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推荐的货币经济计划，即对外的浮动国际汇率和自由贸易以及国内的稳定货币政策和低通货膨胀率，与世界历史上涨幅最大的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相契合。他对大萧条的再思考至关重要。这种再思考反驳了自由市场无效的观点，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政府的适当作用，尤其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的思考。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弗里德曼首要关注的是通货膨胀。他再三主张用限制货币的方法来控制通货膨胀，并且指出，财政补救对限制通货膨胀不起作用。这些思想也成为新的传统智慧。

弗里德曼同样发挥了主导作用的其他领域包括：由自愿者组成的军队、负所得税、税级指数解释通货膨胀、削减政府支出、降低税收、教育券制度以及毒品合法化等。他提倡尽最大可能使政府服务私有化，尤其是把它作为教育改革的一种途径。在其他国家，他支持对政府所有产业的私有化转变。最终，在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开始支持“夜警”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几乎所有个体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自愿契约的基础上，政府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仅仅体现在“极低的负所得税”注和私人慈善相结合的形式上。

弗里德曼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和末期都关注不平等的问题。他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被划分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技术娴熟的与技术不高的人之间，以及受过教育的与未受教育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如果裂痕继续扩大，我们将陷入可怕的危机当中……我们将会有一场内战。如果被分为两个阶级，我们这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就不能维持下去。”注

大约在半个世纪之前，关于财政货币政策的恰当目标，弗里德曼这样写道：“我相信，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的基本长期目标是政治自由、经济效率和经济权力的完全平等。”[注]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在其他领域指出，经济平等是正常运行的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一个相应的成果。在他和乔治·斯蒂格勒合作撰写的一本反对租金控制的小册子——《屋顶还是天花板——当前的住房问题》（1946年）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屋顶还是天花板——当前的住房问题》中，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寻找更加有效的方式去实现“比现在更大化的平等，不仅是在住房而是在所有产品上”。[注]在1947年朝圣山学社的首次会议上，弗里德曼说道：“自由主义有一个人道主义目标，也是一种进步的哲学。”[注]

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指出，“事实上，与其他任何尝试过的社会形式相比，自由社会趋向于更大的物质平等。”但是他马上接着说，自由主义者将经济平等视作“自由社会理想的副产品，不是它的主要理由”。他还说：“与大众的意识正好相反，另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是，与其他可供选择的组织体系相比，资本主义引发的不平等更少，并且，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地减轻了不平等的程度……单在欧洲国家中，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越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不平等越少。”[注] 对此，纳什评论说，对于弗里德曼而言，“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增长机会并且创造出比其他任何经济体系更少的不平等”。[注]

弗里德曼夫妇在《自由选择》（1980）中写道：

>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收入和财富的严重的不平等，这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愤慨。一些人在奢侈挥霍，而另一些人则饱受贫困的煎熬，看到这样的情况，谁都不会无动于衷。
>
>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流传着一个神话，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即我们所说的机会均等，增加了这种不平等。在这种制度下是富人剥削穷人。
>
> 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荒谬的了。凡是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接近机会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达到过去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在那些不允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里，贫富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注]

弗里德曼关于平等的观点是复杂而微妙的。他十分赞同一个没有严重收入

和财富不平等的社会。1996年，他公开反对美国社会的各种不平等。自那以后，美国在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现象越发严重。他不赞成直接追求结果的平等。他相信，恰当的公共政策能带来经济的日益平等。

作为尼克松和里根总统亲密的公共政策顾问，他既不是全职也未担任常设职位。在尼克松执政的第一年，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的概念成为福利改革讨论的核心。但是他对立法的最终版本持反对态度，因为人们工作比不工作更富有的情况并不会一直如此。所得税抵免是负所得税争论的一种重要的立法衍生。

在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芝加哥经济学家还有赫伯·斯坦恩，他是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的一名研究生。1972—1974年斯坦恩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手下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曾经有段时间，芝加哥人乔治·舒尔茨和斯坦恩分别是财政部长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弗里德曼另外一位老朋友阿瑟·伯恩斯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还有很多其他芝加哥人以及弗里德曼的盟友在其他的政府、学术界以及商业界高层任职。

斯坦恩和亚当·斯密陈述的观点一致。1994年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他对这些打着亚当·斯密旗号的人这样描写道：

>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声明他们对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理念的挚爱。然而，《国富论》表明，他们的守护神对这个观点并不是那么教条和绝对。他对政府和市场的干预表示极大的怀疑，并把对自由市场优点的阐述视作自己的主要贡献……但是他准备在特定情况下接受那个政策或者对它提出限制条件。他判断，这些条件会产生有益的结果，并且不会削弱系统基本的自由特征。[注]

斯坦恩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不是当代自由主义者的先驱。与年轻时候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一样，他承认并肯定政府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的伟大而积极的作用，并指出，试图否认这一点则违背现实。他评论道：

> 我想看到，政府在很多方面有所精简。但是我接受联邦政府将会变强大的事实，我想看到它变得更好……
>
> 这是一个基本前提……目前的预算程序没有很好地分配国民产值。对此，我不只是说国民产值没有按照我认为的优先顺序分配……我认为，我们在投资、教育和对贫民的关心中投入甚少，在医疗保健和非

> 贫困人口的消费中投入太多。但是，我不会将自己的不满当成程序没有起作用的证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优先考虑，不是所有的优先考虑都能被满足。必须要达成妥协，对此我们有一套制度。注

1971年，乔治·舒尔茨就美国实施灵活的国际汇率大力褒扬弗里德曼：

> 米尔顿是名伟大的导师，当我……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思想具有极大的适用性。我大力支持关闭“黄金窗口”，因为那样会让我们远离准固定汇率体系，并将我们引向灵活的汇率。米尔顿已经说服我，这样的体系会更好……我和他有一次深度交谈。我们同意美元浮动并且设法形成一个浮动汇率体系。然而，米尔顿和我都认识到那样做会引发极大的争议。我们试图研究出一个计划，既可能带来我们想要的结果，又能让人安心。米尔顿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提供一个可变汇率制度，并为这个制度穿上了我们更为熟悉的平价制度的外衣。
>
> 然后我把米尔顿的计划递交给总统，总统赞成这个计划。我鼓励总统将计划呈递到即将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会议上，该会议是世界金融界的年度盛会。总统宣称财政部长（舒尔茨）会在第二天把计划交上去。注

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舒尔茨评论了尼克松的智慧，并提到尼克松非常欣赏弗里德曼。注除了与负所得税以及浮动汇率的观点有关，弗里德曼同时还是尼克松总统建议终止草案的委员会主要成员。

弗里德曼与尼克松关系密切，和里根更是如此，他是里根最为欣赏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强调减少通货膨胀、精简政府规模、降低并削减税收以及减少政府管制。这些成为里根以及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信奉的准则和纲要。撒切尔也是弗里德曼的仰慕者。弗里德曼和妻子罗斯撰写的《自由选择》一书成为1980年美国最为畅销的非小说类作品。根据该书为原型，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播出了电视系列片，使得该书接触到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国际读者。

在《自由选择》中，第一章“市场的力量”是最重要的章节之一。在这一章里，弗里德曼阐述道，为了达到允许多方获益的自愿交易目的，市场必不可少。他追随奈特，强调斯密的观点，认为，当交易发生时，它会让双方的境况较交易前有所改善。此外，就像斯密所提出的，“我们的晚餐并非

来自屠夫和面包师的仁慈之心，而是他们的自利之心”。注弗里德曼提出，“经济秩序的产生是各自谋求自身利益的多数人的行为的非意图后果”。注

自利与自私不是一回事。个人的自利是个体自身认为的所有利益，通常，或者多数时候，包括他人的利益。问题是如何协调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去假定，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毫无私心。价格传递着供求关系的重要信息：对此，弗里德曼完全赞同哈耶克的观点。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市场秩序中，利润使更有效运用资源的人们获得更多的资源。个人财产对于价格和利润来说很重要。政府创造出结构，让经济和社会活动能在其间展开；政府还提供至关重要的服务，从而允许社会的存在。弗里德曼同样强调，通货膨胀的其中一种有害效应是它扭曲了价格能够提供信息的事实。他还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货膨胀减少了人们存钱的动机，因为钱在未来将会贬值。

在里根之前的尼克松政府中，弗里德曼任职于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如果里根当选，该委员会则为其准备实施的政策文件。弗里德曼回忆：“一旦当选，里根将实施我们推荐的政策。”注乔治·舒尔茨主持里根经济政策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在里根当选总统12天后，即1980年11月16日，推出了题为“对里根政府的经济策略”的报告。注

在此，弗里德曼等人强调了政府以及政府政策的重要性。“当前由政府政策产生的经济问题……能够通过政策调整得到改善。”注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当时的首要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两位数水平。舒尔茨、弗里德曼及其他人提出的方案中包括了弗里德曼的这些观点。这些观点被纳入了里根主义整体中：

限制政府支出。

减少税收和调控负担。

稳定地执行货币政策，以减少通货膨胀为导向。注

关于减少通货膨胀和鼓励经济活动，报告建议采纳弗里德曼的观点：“稳定货币增长率是控制通货膨胀和为经济增长提供有益环境的一个根本要求。”注

有趣的是，在这份里根经济学的根本性文件中，里根的经济顾问和智囊团成员在1980年间提倡“普遍共享繁荣”(注)。弗里德曼的观点，即强调把更大的经济平等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恰当目标，并没有完全被抛弃。值得一提的还有里根经济学的核心成分——大幅度降低边际个人所得税率，在舒尔茨和弗里德曼的报告中被淡化了。大幅度降低边际个人所得税率的主要灵感来自热情奔放的阿瑟·拉弗。他成功地推广了大幅度降低边际个人所得税率能够增加总税收的观点，可以说，他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经济学家。

值得强调的是，弗里德曼、舒尔茨和其他芝加哥“老卫兵”（弗里德曼除外）最初并不倾向于把大幅度降低边际个人和公司税率作为减少政府支出的途径，即所谓的“饿死野兽”策略。他们不赞同通过削减税率增加税收的“拉弗曲线”。此外，弗里德曼认为，财政政策中的变化，不论其是否可取，对国家经济运行没有太大的影响。拉弗、罗伯特·蒙代尔、罗伯特·巴特雷、裘德·万尼斯基和杰克·康普等人发起了经济政策中供给方面的革命。拉弗和蒙代尔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了很长时间。“供应”经济学是斯坦恩所创，略带贬义。

1981年1月，当选的里根总统给予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平装本首个认可：“极好。”弗里德曼后来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没有其他总统像里根这样坚持致力于推动和维持自由社会的明确原则。”(注)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名声与弗里德曼的声望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内一路飙升。弗里德曼被视作某种重要观点的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马丁·安德森是尼克松总统和里根总统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他说：

> 在这些促进席卷全球的新知识力量形成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米尔顿·弗里德曼或许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弗里德曼通过他的文章、讲座、著作……和电视系列片深刻影响了……人们对自由社会本质的认识。这种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不能仅仅用他的著作或话语来阐释，更多的只能通过他非凡的个性来解释。(注)

芝加哥经济学派和弗里德曼的影响力在里根执政时期达到了巅峰。乔治·舒尔担任国务卿；艾伦·沃利斯是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弗里德曼的学生伯瑞·普林克尔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另一位芝加哥学生威廉·尼斯凯恩也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有数十位里根政府成员都是弗里德曼的学生或同事。

司法部长埃德文·米斯或许是里根最亲密的顾问。他认为，弗里德曼是里根政府的“权威”注。米斯写道：“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在学术顾问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总统对他尤其器重。对于政府来说，他对私人企业、自由市场和税收限制（追溯到加利福尼亚时期）的坚定支持以及他在货币领域渊博的知识都是非常宝贵的。”注

舒尔茨认为，“到目前为止”，对于尼克松和里根政府来说，弗里德曼是比哈耶克影响力更大的思想家。尤其是里根，弗里德曼与总统“本人熟识”。舒尔茨说，在里根政府中，“弗里德曼是一种存在”，一种真实的存在。相反，哈耶克是一个“神秘人物”。注哈耶克对尼克松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尼克松的任期是1969—1974年，之后哈耶克在1974年12月获得诺贝尔奖从而重新被大众熟识。尼斯凯恩回忆，里根“受到弗里德曼等人的影响，认识到通货膨胀一直是一种货币现象”。注大卫·斯托克曼是里根总统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他回忆道，弗里德曼在里根政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注。

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超出了美国范围，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尤为明显。1979年就任的英国首相撒切尔是《自由选择》的一位忠实读者。1980年2月，就在系列片即将在英国播出之前，里根正在美国竞选总统时，撒切尔在英国会见了弗里德曼。系列片播出后，《笨拙》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撒切尔在播放着弗里德曼节目的电视机前面毕恭毕敬地弯着腰。

1988年里根离任时，《新闻周刊》的首席经济记者里奇·托马斯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里根的经济方案：

> 之前有里根经济学，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成为里根经济学上的导师……弗里德曼强调货币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即任何时候，经济中的现金供应和信用循环的稳定增长都是必要的。弗里德曼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关于预算政策的理论，里根从入主白宫的第一天起就采纳并实践了这个理论。
>
> 在弗里德曼看来，关于预算最重要的事情是支出的程度和方向，而不是赤字的大小……在弗里德曼理论的指导下，里根在执政时抛开了赤字的问题……注

弗里德曼强调，与政府支出的数量相比，赤字大小无关紧要，但是他没有

提供支撑该立场的经验证据。他丝毫没有考虑大幅度降低边际所得和房产税率会将收入和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中，也未曾考虑极度不平等的税收政策和持续的赤字支出带来的其他严重后果。注

---

1. 蓝尼·埃布斯泰因，《哈耶克的旅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思想》（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3），pp.168-169。
2. 保罗·克鲁格曼，《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谁》《纽约书评》（2007年2月15日）。
3. 沃伦·萨缪尔斯，《两位幸运者的回忆录》评论，见沃伦·萨缪尔斯和杰夫·E.比德尔（主编），《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第18卷-A（纽约：JAI出版社，2000），pp.242-243。
4. 安格纳·桑德默，《经济学演变：经济思想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pp.417，420。
5.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两位幸运者的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p.xii。
6.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pp.1-2。
7.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82），p.12。
8.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p.195。
9.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论自由》《代议制政府》（1859；伦敦：J. M. Dent & Sons出版社，1972），p.58。
10.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p.4。
11. 穆勒，《论自由》，第3章。
12.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p.11。
13. 乔治·H.纳什，《美国保守知识分子运动》（威明顿：美国校际研究所出版社，1996），pp.189，267，270。
14. 梅尔文·W.雷德，《芝加哥经济学：永恒和改变》，《经济文献期刊》（1982年3月），p.35。
15.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元与逆差：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与国际收支》（英格伍德克里夫：培生出版社，1968），p.18。

16. 米尔顿·弗里德曼给作者的信（2005年6月1日）。

17. “采访米尔顿·弗里德曼”，《技术季刊》（1996年春），最终引用。

18. 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p.134。

19.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屋顶还是天花板——当前的住房问题》（艾维顿·哈得逊：经济教育基金会，1946）p.6。

20. 比阿特丽斯·谢里耶，《米尔顿·弗里德曼科学政治的幸运一致性，1933-1963》，见范·霍恩、米卢斯基和斯泰普尔福德共同编写的《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最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p. 361。

21.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pp.169，195。

22. 纳什，《美国保守知识分子运动》，p. 187。

23.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纽约：乔万诺维奇出版社，1980），pp.136-137。

24. 赫伯特·斯坦恩，《未打亚当·斯密旗号的亚当·斯密》《华尔街日报》（1994年4月6日）。

25. 赫伯特·斯坦恩，《管理5万亿美元的经济》（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pp.2，10。

26. 乔治·舒尔茨，《务实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胡佛文摘》（2006年秋，No.4），pp.13，16-17。

27. 蓝尼·埃布斯泰因对乔治·舒尔茨的采访，2013年8月30日。

28. 威廉·埃布斯泰因和艾伦·蓝尼·埃布斯泰因，《从柏拉图到现在的伟大政治思想家》第6版（沃斯堡：哈考特学院出版社，2000），p.494。

29.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p. 5。

30. 弗里德曼，《回忆录》，p. 390。

31. 《对里根政府的经济策略：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对里根总统的报告》（1980年11月16日）。

32. 《对里根政府的经济策略：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对里根总统的报告》（1980年11月16日），p. 1。我在这里写的是“restrain”，不是“restraining”；是“reduce”，不是“reducing”；是“conduct”，不

是“conducting”。

33. 《对里根政府的经济策略：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对里根总统的报告》（1980年11月16日），p. 2。

34. 《对里根政府的经济策略：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对里根总统的报告》（1980年11月16日），p.10。

35. 《对里根政府的经济策略：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对里根总统的报告》（1980年11月16日），p.2。

36.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的朋友》，《华尔街日报》（2004年6月11日）。

37. 马丁·安德森，《革命》（纽约：乔万诺维奇出版社，1988），p. 172。

38. 蓝尼·埃布斯泰因对埃德文·米斯的采访，1996。在后来的一次接触中，米斯重申了弗里德曼思想对里根政府的重要意义［埃德文·米斯-埃布斯泰因对话（2012年12月7日）］。

39. 埃德文·米斯，《里根那些事》（华盛顿：瑞格纳瑞出版公司，1992），p.127。

40. 蓝尼·埃布斯泰因对乔治·舒尔茨的采访，2013年。

41. 保罗·萨缪尔森，《大通胀及后果》（纽约：兰登书屋出版社，2008），p. 115。

42. 蓝尼·埃布斯泰因和大卫·斯托克曼的对话，2013年4月13日。

43. 里奇·托马斯，《里根经济学的魔力》，《新闻周刊》（1988年12月16日），p.33。

44. 安格斯·伯金对弗里德曼领导的，并以其为典范的古典自由主义向当代自由主义的过渡发表了下面的看法：

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瓦伊纳和亨利·赛门斯……威尔赫姆·卢卜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以及莱昂内尔·罗宾斯……都认可广阔范围的政府干涉。他们认为这种干涉在经济运行和商品分配上起到积极的作用。他们都对自由竞争的效果持保留意见……对放任主义的社会政治可行性表示怀疑。在弗里德曼那里，正如克鲁格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极难”发现他在任何地方“承认市场可能出错或者政府干涉可以达到目的”。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的效力有普遍的信念，甚至超过了19世纪的理论家……他没有处在一个斯宾塞或

萨姆纳的世界中，在那里，为了推动人类更大的进步，自由市场对一些人致以毁灭性的打击。相反，在他所处的世界中，市场毋庸置疑地在各种情况下给形形色色的人们带来收益，表现为以优厚的赏金。他把市场说成是永恒的好东西。［《伟大的说服》（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pp.184-185］。

第十二章
20世纪80年代鼎盛时期与当代自由主义

20世纪80年代开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两位芝加哥大学前教授似乎处在了世界学识界与政治界的顶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弗里德曼的肯定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哈耶克的高度评价一样。分别在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辅助下，里根和撒切尔的权力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达到了巅峰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和苏联发生了巨变，这时候的哈耶克似乎成了预言家。

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在弗里德曼与哈耶克两人中，弗里德曼更受欢迎同时也更有声望。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大受欢迎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之后，有一段时期几乎已经被人遗忘。弗里德曼在60年代成为媒体追捧的超级明星，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名声大噪。

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得他成为第一位因为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获奖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使他重新恢复了活力。尤其在1979年撒切尔成为英国首相后，哈耶克这颗璀璨之星再次冉冉升起。

虽然在哈耶克的一生中，他将美国看作世界文明的领导者，但是弗里德曼比他更加关注美国。总的来说，在哈耶克人生的最后30年中，即从他1962年离开芝加哥前往西德至1992年去世这段时期，说他是一位美国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欧洲人。弗里德曼或许在亚洲也同样拥有更多的读者，他在香港的影响力尤其明显。

在苏联解体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强国。保罗·萨缪尔森在著名的1973年版教材《经济学》中预测，当时苏联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但是到1990年就将能赶上。阿诺德·贝切曼从《经济学》中查找了大量例子，直指萨缪尔森误解了全球宏观经济。贝切曼指出，这本书一直是最畅销的经济学教材之一，在1976年版中，萨缪尔森写道，“人们认为大部分的东欧人都过得很悲惨。这样的观点是一个庸俗的错误”。[注]4年后，在新的版本中，他仅仅去掉了单词“庸俗的”。[注]

正如贝切曼指出，在1985年版的《经济学》中，“整篇文章消失了。他……用一句话取而代之，询问苏联政治压迫是否‘有经济收益的价值’。

萨缪尔森把这个非疑问句看作‘人类社会最为深刻的两难问题之一’。1985年在面对苏联经济一触即发的灾难面前，萨缪尔森的教材中提供了这些段落：‘沉湎于错误会有误导性。每种经济都有其矛盾……关键在于结果。毫无疑问，苏联的计划体制是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注]或许是没有疑问，但是萨缪尔森的确定性完全被摆错了地方。

在1989年版的《经济学》中，萨缪尔森认为，“与很多怀疑论者之前的看法不同的是，苏联的经济证明了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能够运转甚至蓬勃发展”。[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这些特别难对付的人，确实是怀疑主义者！

一直误解了苏联经济的人不仅仅是萨缪尔森。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李·爱德华兹写道，小阿瑟·施莱辛格在1982年访问莫斯科后说道，他发现商店里有更多的商品、市场上有更多的食物、大街上跑着更多的汽车，“除了没有更多的鱼子酱之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有”。施莱辛格说，这些美国人认为苏联处在经济社会崩溃的边缘，他们还准备落井下石推上一小把让其坍塌。这些人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很明显，他指的是里根政府。[注]

1973年，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访问中国后指出：“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创建一个高度有效的经济体制。”[注]中国这时候正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1984年，加尔布雷斯到苏联访问了两个月。他的观点是：“因为苏联体制运行不尽如人意，一些美国人就会说它深陷危机有崩溃的危险。我对此深表怀疑。我认为，称职的观察员不会发表这样的观点。”[注]和萨缪尔森的观点一样，加尔布雷斯的“称职的观察员”也是完全错误的。1989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盛赞了苏联经济的“出色表现”：“今天这个国家的经济成就完全能和美国媲美。”[注]

耶鲁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备受赞誉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写道：“自斯大林晚年开始，苏联以及苏联控制集团取得了十分显赫的经济进步。与西欧相比，苏联这数十年在很多方面有所改变。”[注]虽然肯尼迪同样提到甚至强调了苏联的经济缺陷，但是他全面的分析未能成为分析的标准，甚至在数年之后也如此。

多年来，萨缪尔森、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斯、瑟罗和肯尼迪等人积极地参与到经济与政治的讨论，尤其是学术层面的讨论当中。他们关于“二战”后苏联、东欧、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多年的运行和发展的观点不正确。相反，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看法是正确的：比起指令性和独裁经济，一个主要依靠私有经济来生产绝大多数个人消费品和提供服务的经济制度

更加富有成效。

20世纪后半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全球宏观经济公共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即指令性经济的缺陷）的正确性显而易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所宣扬的新无政府主义也是正确的。事实上，当他们呼吁当代西方发达社会进行彻底的革命性改变时，就已经背离了总体上建议渐进式改变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人们有时呼吁革命，但不会反对古典自由主义或者民主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这是历史上最有效最自由的经济社会体制。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这种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当代自由主义的改变是崭新的。

与其他人一样，凯恩斯在对《通往奴役之路》的评论中批判了后来成为自由主义立场的观点。1944年战争期间，他在一次前往美国的途中阅读此书后致信哈耶克：

> 亲爱的哈耶克，这次旅途让我有机会好好品读你的书。在我看来，它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我们都有最好的理由感谢你精辟地阐述了本需要长篇大论才能说清的道理……从道义上和哲学上来讲，我对你说的话完全赞同，不仅赞同，而且深有感悟……
>
> 我来说一下对这本书唯一的郑重其事的批评。你承认，如何划定界限是一个问题；你同意，得在某个地方划清界限并且不存在逻辑极限。但是对在何处划界限你并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指导，你和我很可能会把线画在不同的地方。我猜你低估了中庸之道的实践性。但是一旦你承认极限不可能，必须得划清界限，你就站在了你自己论点的对立面。因为你试图说服我们的是，当有人朝着计划的方向挪动一小步时，你就必然被带到了一条最终会将你推向深渊的不归之途。注

与很多当代自由主义者、社会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和其他人似乎认为的不同，古典自由主义不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仅仅因为政府对整个经济的控制不起作用，并不意味着没有政府就一定有效。反对共产主义不是支持虚拟的无政府主义和现存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著名的凯恩斯传记的作者罗伯特·史纪德斯基预测，如果凯恩斯能活得更久，他或许会写一部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资本主义，”史纪德斯基写道，“或许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但是放任主义与凯恩斯中庸之道的哲学之间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注史纪德斯基相信，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关于“自由社会能容许多少政府干涉”的讨论“从来没有很好地展开过”。注

事实上，弗里德曼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不断朝着激进的方向改变。他的传记作者威廉·鲁格这样写道：

> 弗里德曼年纪越大越激进。在20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的言辞间对放任主义显得不那么乐观，对国家行为则友好得多……那时，弗里德曼同样直言不讳地表达了经济权力平等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在减少不平等现象中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弗里德曼发现政府行为中存在越来越大的问题……（他）对教育政策、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态度更加激进。他更加赞同教育完全私有化；质疑负所得税在原则上是否合理，更加青睐自由银行制度和竞争性货币。到90年代，他认为政府已经成为“一个自生的大怪物”。注

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布莱恩·多尔蒂、安格斯·伯金和J.丹尼尔·哈蒙德都认同上述有关弗里德曼思想发展的观点。注

与其后来的思想相反，《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的思想更接近于古典自由主义。正如之前所引述的，他在该书中写道：“就具体的功能而言，不可能一次性阐释清楚政府的作用。”他还论述道：

> 多数情况下，对于一位自由主义者来说，最头疼的问题是政府行为家长式作风的根据……然而，假装问题比实际要简单是没有用的。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程度的家长式作风……没有秘诀告诉我们在哪里能够恰到好处地停下来，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力。如果已经具备判断力，就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说服我们的同胞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或者依靠他们的能力来说服我们改变思想。

他进一步阐述道，邻里效应证明了“政府扶贫和为社区中的每个人设定最低生活标准的行为”注是正确的。

关于教育，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说道：“学校制度存在缺点和问题，尽管通过更有效地发挥市场力量还可能获得进一步改善，但无论如何，它增加了美国年轻人可以利用的机会并且为自由的扩展做出了贡献。”他后来还写道：“可以从两个方面为政府对教育的干涉进行辩护：一是存在相当的‘邻里效应’……二是对孩子家长式的关心。”他后来评论道：“我不认为我现在提出的方案……在20世纪之前就是可取的。”注

弗里德曼自1976年退休后长期待在旧金山。他开始提倡完全停止政府对教育的干涉，谴责公共教育体系。“垄断就是垄断就是垄断，”他在1992年的一次教育会议上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美国的学校制度是这个国家仅次于军队的最为社会主义化的产业”。[注]他和罗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可以为义务教育和融资提供理由，但这绝对不是确凿的理由。事实上，（自《资本主义与自由》一出版）经验证据就告诉我们这两者都不合理。”[注]在后来的通信中，他这样评论高等教育：“与写作《资本主义与自由》的时候相比，我越发怀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是否存在任何合理性。”[注]他指出，在其职业生涯中，他关于教育的思想后来“变得更加极端”[注]。

弗里德曼在旧金山度过了漫长的晚年时光。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热衷于做出各种强硬的反政府声明。无论是在何时何地，他都有各种原因反对政府。在芝加哥时，他作为一名学术型经济学家，在活跃的职业生涯中煞费苦心地为自己的立场提供详细的经验支持。这种支持常常表现为统计数据的形式。然而，现在他的论证形式转向范围宽泛、言辞激进的声明，他对这些声明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经验支持。本质上，学术型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成为反政府名人弗里德曼。

他承认，他后期的作品及思想与早期不一致：“我认为，我在货币政策领域所做的工作与我试图去除草案或毒品合法化所做的工作不可相提并论。”[注]他常说，希望人们因为他的学术著作记住他。在2001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对自由主义事业的贡献还未达到价值观的程度……而是通过经验实证……通过推进经济学科学的进步并展示这些进步与经济学政策的关联性。”[注]在他临终前的一次采访中，他评论道：“我其实有两种身份：一是作为一名科学家、经济学家，二是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注]伯金指出，随着弗里德曼“成为一名成熟的经济学家后，他逐渐将注意力从技术工作转向追求成为一名大众布道者”。[注]

哈耶克虽然在早期时对当代自由主义嗤之以鼻，但是同样也在职业生涯的晚期将立场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了当代自由主义。大约在1977年，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1973—1979）第三卷结尾部分中题为“废除政府对服务的垄断”的一节中写道：

> 如果有人更喜欢以其他方式获得服务，那么任何允许使用税收权力来为这些服务融资的政府机构应当把出于这些目的征来的税款归还他们。这适用于现今政府所有的和渴求合法垄断的一切服务。这些服务

的范围包括教育、交通和通信服务（邮政、电报、电话和广播等），也就是所谓的“公共事业”、各种“社会”保险以及最重要的货币问题。唯一例外的是维护和执行法律以及为了防御外敌的武装力量维持。注

人们应该抛开晚年受欢迎的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从而回归到两人早期的学术本身。

詹姆斯·赫克曼或许是当今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最重要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他于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赫克曼在1965年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他受到了当时公民权利运动和其他问题的重要影响。其作品保持着对实证研究的重视和对公共政策的关注。这些重视和关注在他一些同事的作品中已经难寻踪迹。他关于恰当政府作用的兼容并济的立场是针对其他人思想的一剂良药。他在一次自传式的演讲中评论道：“人们有时候忘记了芝加哥深厚的经验主义传统，把芝加哥学派看作一群信奉自由市场有关的特定思想的学者。事实上，重视细致的经验分析以及要求政策提议要有经验依据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特征。”注

他对公共政策提议清晰易懂的必要性做了以下重要的评论：

芝加哥学派……对经济政策的技术官僚设想甚是反感，此设想受到了很多著名学派的青睐。芝加哥学派不支持应当由一位智慧的精英来为大众制定政策的观点，而是认为，如果提出的论点很清晰，普通人也能有很强的知觉判断力。他们相信，真正重要的东西应当以简单有效的方式表达出来。弗里德曼行文流畅、言辞清晰的《新闻周刊》政策专栏是以简单有效的方式表达公共政策的最佳典范。应当教育人们去做出明智的选择，而不是被懂得多做得少的技术官僚们所操控。注

在赫克曼的职业生涯中，其著作涵盖了很多领域。在近期的作品中，他呼吁增加学前教育的机会。他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和历史芝加哥自由市场传统，认为政府既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也不是祸根。相反，好的公共政策基本上是经验观察的问题，即弗里德曼称作的“积极经济学”。注赫克曼在《给孩子一个公平的机会》（2013）中写道：“得天独厚的孩子与弱势孩子之间在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上的差距很早就能体现出来，并且能追溯到恶劣的早期环境上。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成长……因此，社会政策应当关注孩子可塑性强的前几年。”注对此，亚当·斯密、杰里米·

边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雅各布·瓦伊纳、弗兰克·奈特、亨利·赛门斯和年轻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应该都会表示赞同。

---

1. 阿诺德·贝切曼，《华尔街日报》（1994年11月17日），p.A-21。
2. 阿诺德·贝切曼，《华尔街日报》（1994年11月17日），p.A-21。
3. 阿诺德·贝切曼，《华尔街日报》（1994年11月17日），p.A-21。
4. 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3版，（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89），p.837。
5. 李·爱德华兹，《依旧膜拜失败的上帝》，《校际评论》（2004年秋/冬），p.9。
6. J.丹尼尔·哈蒙德的《芝加哥的市场、政治和民主：重视经济学》，见范·霍恩、米卢斯基和斯泰普尔福德共同编写的《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最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p.60。
7. J.丹尼尔·哈蒙德的《芝加哥的市场、政治和民主：重视经济学》，见范·霍恩、米卢斯基和斯泰普尔福德共同编写的《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最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p.60。
8. 爱德华兹，《依旧膜拜失败的上帝》，pp.9-10。
9.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纽约：年代图书出版社，1989），p.429。
10.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40-1946年活动》，见唐纳德·莫格里奇（主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品集》第27卷（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0），pp.385-387。
11. 罗伯特·史纪德斯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为救世主的经济学，1920-1937》（纽约：企鹅出版社，1994），pp.228-229。
12. 罗伯特·史纪德斯基，《为英国而战，1937-1946年》（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0），p. 550。
13. 威廉·鲁格，《米尔顿·弗里德曼》（纽约：Continuum出版社，2011），p. 96。
14. 安格斯·伯金，《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剑桥：哈

佛大学出版社，2012）；布莱恩·多尔蒂，《愈发自由主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http://reason.com/archives/2012/II/20/the-increasingly-libertarian-milton-frie（2012年11月20日）；鲁格，《米尔顿·弗里德曼》，p. 16。

15.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pp.4，34，191。
16.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pp.85-86，96，199。
17. 米尔顿·弗里德曼，《选择的案例》，K.　L.比林斯利（主编），《选择之音：教育改革辩论》（圣弗朗斯西科：太平洋研究中心，1994），p. 94。
18.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两位幸运者的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p.628。
19. 理查德·韦德尔，《为学位而破产：大学学费缘何天价》（华盛顿：AEI出版社，2004），p.127。
20. 布莱恩·多尔蒂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采访，《两全其美》，《理性》（1995年6月）。
21. 布莱恩·多尔蒂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采访，《两全其美》，《理性》（1995年6月）。
22.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作者的通信（2001年9月26日）。
23. 罗塞尔·罗伯茨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采访，《经济学与自由文库》（自由基金：2006年9月4日）。
24. 伯金，《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p.198。
25.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3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p.147。
26. 威廉·布赖特和巴里·T.赫希（主编）《诺贝尔之路：18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第4版（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4），p.308。
27. 威廉·布赖特和巴里·T.赫希（主编）《诺贝尔之路：18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第4版（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4），pp.320-321。
28. 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

29. 詹姆斯·J.赫克曼《给孩子一个公平的机会》（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3），pp.40-41。

结论
芝加哥经济学的应用现状

据说，弗兰克·奈特曾说：“要让不情愿的人们记住新的真理，需要各种反复重申。”注 我希望，通过本书中的反复重申，来引导这些还未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读者们记得以下的观点：

1.“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古典自由主义是洛克、休谟、密斯、边沁、穆勒、马歇尔、坎南、凯恩斯、瓦伊纳、奈特、赛门斯、罗宾斯和中青年时期的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等人遵循的传统。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强调大部分商品与服务生产中的私有财产和自由交换，支持政府有益的、但不是无所不能的作用。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政府恰当的作用包括提供社会服务和很多其他领域的行为，具体包括，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及使用累进税收制来平衡经济效益。古典自由主义方法支持在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的渐进式变化。

相对而言，当代自由主义是斯宾塞、米塞斯、兰德、罗斯巴德和晚年时期的哈耶克及弗里德曼遵循的传统。它提倡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现状的革命性变革。要在各级政府的各个领域大幅度削弱政府功能、减少政府支出，让一个“夜警”般的国家从根本上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当代自由主义除了将其作为一项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外，完全反对激进主义。当代自由主义者坚信，若不是因为某些特殊利益群体的反对，他们激进的经济改革和政府转型计划能够轻易地实现，并能给很多人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当代自由主义支持社会上存在深刻的不平等，尤其反对累进税收制。

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自由主义都反对古典社会主义，即经济生产方式的政府所有和政府调控。二者都致力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古典自由主义对此的态度非常坚定，当代自由主义则不温不火。二者在言论和信仰上有很强的个人权利观。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在财产方面的权利是在某种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当代自由主义者则把个人的财产权利当作一种自然而绝对的权利。古典自由主义为政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承认，政府存在缺点和漏洞。当代自由主义则倾向于憎恨政府，经常与政府为敌。

2.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们大部分的中青年职业生涯中信奉古典自由主义。两人在晚年时期都支持某种形式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弗里德曼，随着他从学术经济学家的主要角色向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角色转换，他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强。在弗里德曼

的职业生涯中，他关心并支持更完全的经济平等。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支持采取累进税收制和房产税收制来获得更完全的经济平等。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他甚至把平等当成正常运行的自由市场秩序的本质特征。

3.亚当·斯密应当被视为“古典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当代自由主义者”。斯密支持政府新兴的福利国家行为和在某些领域的累进税收制。

4.作为学术界和普通大众当中一个公认的有组织的实体，“芝加哥经济学派”几乎是“二战”后仅有的一个标志。它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术成就和知名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今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存在显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年龄和家庭结构基础上的不平等越来越成为美国社会和经济的特点，在有孩子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和财富份额方面尤其如此。虽然其他的社会也存在极大的不平等，但在当今美国，有孩子的家庭获得极少的收入份额和拥有极少的财富份额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异常特征。

人们很难在收入和财富的顶层寻得有着低于18岁孩子的家庭。现在，美国很多儿童，确切地说几乎有一半的儿童，在童年的某些时期经历着贫穷。

当前，全美国低于18岁的儿童中，几乎有1/4的人都生活在贫穷中。注 家中有低于18岁孩子的家庭生活过得尤为拮据，属于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下层。此外，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倾向于少生和晚生的情况。如果这样的趋势在美国持续的话，那么将来只有1/3的孩子是由自己的亲生父亲抚养至18岁。总的来说，孩子的生父和男性们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与抚养孩子的事毫不相干。如果把比例相对较少的抚养孩子的男性与这些根本没有孩子的男性放在一起考虑，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数十年里，美国大约仅有1/4的男性把亲生子女抚养到18岁。

前《华尔街日报》编辑史蒂芬·穆尔不经意间描绘了当前美国社会普遍的不平等现象，他对深受大众欢迎的弗里德曼极为尊崇。在2012年8月曼哈顿研究所一份引人注目的分析报告中，穆尔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收入排在全美前1%的人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2%；排在前5%的人获得国民收入的37%；排在前10%的人获得国民收入的48%。注 而这些收入排在前0.1%，即前1‰的人，获得了国民收入的10%。注 美国有一半的人收入处于底层。他们获得的收入是国民收入的12%。注

这意味着，在2007年美国排在前0.1%的高收入群体所获得的收入几乎等同于排在底层的50%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总和；排在前1%的人获得的收入几乎是底层50%的人收入总和的两倍，注 结果导致不可避免的当代美

国社会的极端不平等。

财富积累更是如此，因为相较于收入而言，它更是不成比例地集中。《美联储消费者金融调查》显示，2010年1%的美国富人拥有大约35.4%的国民财富。[注]在2007年，20%的美国富人拥有大约84%的国民财富，而处于底层的40%的美国人仅持有0.3%的国民财富。[注]由于儿童不成比例地分配在这些占美国一半人数的底层家庭当中，因此实际情况就是，有孩子的美国家庭仅获得了极少比例的国民收入和极少比例的国家财富。所有人应承认这些事实。

当前美国面对的不平等问题并非一直如此。历史上的美国因平等而著名：它的基础性文件《独立宣言》郑重宣称“从人生而平等”。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不可理喻的是，穆尔和其他当代自由主义者以及保守主义者力图使用这里展示的数据来表明：富人缴纳了过多的税，应该减少他们的赋税。这是用来阐明芝加哥经济学家哈里·约翰逊言论的一个极佳的例子。约翰逊说：“快速传播一个新的革命性理论的最有利的情况是，存在一个已经确立的正统观念，而它与最重要的事实明显不符……但是该观念对自己力图解释这些事实的专业能力却足够自信，在努力解释事实的过程中以一种荒谬的方式暴露了自己的无能。”[注]不知何故，只能说让人难以置信，穆尔和其他人居然认为他所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样的立场，即对富人所征收的税率过高。

例如，穆尔评论道：“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即使税率下降一半，富人所缴纳的税额以及在人们所缴纳的所得税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均大幅增加。”[注]这里有几点很重要。正如穆尔所承认的，由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税率的增加，排在前1%的高收入人群在2009年缴纳的税款占全美国联邦税收（而不是单独的个人所得税）的22.9%。[注]社会保险和医疗税率对大部分美国人的影响大于个人所得税。综上所述，他们的国民收入份额在2007年是22%。

最近，穆尔反对税收和收入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是联邦政府层面综合税制的特点，包括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他在呼吁降低向富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时，险些提倡递减税制，即高收入者缴纳的各种税收占收入的比例应当低于低收入者。此外，穆尔认为收入排在前1%的富人在2009年缴纳的税款占所有联邦税收的22.9%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他对这部分富人获取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2%是否公平却只字未提。换句话说，这部分排在前1%的富人获得22%的国民收入就是完全合适的，而让他们去缴纳22.9%的联邦税款就完全不合适。或许他自己毫无察觉，只能说他的论述是虚伪的论述。穆尔认为这样的说法，即“当把包括工资税和个人所得税

的其他税都算上，富人就很容易脱身了”，是“误解”和“谬论”。[注]

更加极端的是乔治·梅森大学的沃尔特·威廉姆斯教授，他是晚年弗里德曼的忠实追随者。威廉姆斯认为，当代美国变得无比卑劣，他几乎要支持暴力颠覆现有的美国政府：“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这些想要控制其他人的美国人与这些想获得独立自由的美国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因此国家的解散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威廉姆斯继续说：“美国人有很多选择，我们可以像绵羊一样屈服于这些蔑视自由和宪法的人或者我们可以抵制、斗争并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去想方设法强迫暴君们尊重我们的自由和宪法。”虽然他继续表明，他“个人更偏爱”[注]的是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但是他与很多当代自由主义者一样，观点明确：当今美国政府如此残暴不公，政府所选派和任命的官员以及体制是如此专横跋扈，因此，应该考虑或者最终追求一种武装暴动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这样的观点荒谬至极。本人认为，当今美国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应当受到谴责，但不至于诉诸武装起义。威廉姆斯认为，美国当前包括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总体性的政策和制度应当使用诸如“斗争并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等字眼去暗示可能的社会方向，用“绵羊”去描述美国人民，用“美国暴君们”去指称当选的官员和政府管理者，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威廉姆斯教授应当放弃使用这些字眼。[注]

另外一位支持严重不平等现象的人物是电视记者兼专栏作家约翰·斯托塞尔。他写道：“的确，今天最富裕的1%的美国人拥有美国国家财富的1/3。1%的人拥有35%的财富！但是，那又怎样？”[注]他从来不认为，1%的人可能拥有35%的财富就表明美国的公共政策出了问题。他还写道，1%的人拥有三分之一的财富这样的情形只有当“人们自由”的时候“才会出现”。[注]

穆尔、威廉姆斯、斯托塞尔等当代自由主义者及保守主义者主张顶层少数富人的福利。他们几乎只是致力于使这些人所占的国民收入和财富份额最大化。虽然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以“水涨船高”的形式来掩盖自己的观点，但这只是他们观点的次要方面。他们切实关心的首要问题是降低富人各种税率。几乎所有的当代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支持这样的政策，即富人在比例上应当缴纳比低收入者更少的税，至少在涉及某种形式的收入时应当如此，这些收入包括红利和资本收益。他们反对继承税（遗产税）。

除了联邦税收，州税和地方税同样变得带有累退性质。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马修·加德纳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最贫穷的20%的纳税者在销

售、财产和收入等各项税收上缴纳的税收占总收入的11.1%。最富有的1%的纳税者缴纳的税收只占5.6%……中等收入家庭缴纳的税更多，平均占9.4%。”[注]此外，在美国，综合税制通过减少房贷利率、退休储蓄以及社保和医疗保险支付上限等规定给富人们带来了比低收入群体更多的好处。[注]近年来美国前400名高收入者缴纳的平均联邦税率不到20%，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了。[注]

对于数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仅仅是在联邦、州和地方层级采取一个和收入成正比的综合税制的举措就能朝着税收公平的方向迈出一大步，因为大量的高收入，尤其是收入最高的美国人与低收入群体及欠富裕群体相比，缴纳的联邦、州和地方税收占其更低收入的份额。当代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认为，现有的综合税制和政府支出政策正在将收入和财富从富人再分配到穷人，这种想法和现实不符。[注]同历史上的美国社会相比，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实际是将收入和财富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再分配到富人，尤其是到超级富人；从年轻人再分配到老年人；从家庭再分配到老年人。

里根政府的税收政策对美国十分不利。大幅度削减个人所得税率和提高工资税的做法完全与最优公共政策相对立，也是引起当前美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现状的主要原因，并且促进了家庭的弱化。[注]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民主党人支持1981年和1986年的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经济复苏与税收改革法案，以及1983年提高工资税的社会保障改革法案。

近数十年来，减少对富人征税加剧了美国经济上的不平等。富人拥有比原来更多的收入和财富，但国家在他们的收入和财富上所征收的税却比1981年之前少。不是因为减少对富人所征收的税收，他们就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而是由于减少在富人的收入和财富上所征收的税收，他们则更有钱，具体表现在收入和财富的形式上。正如80年前亨利·赛门斯强调的，除非有很高的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否则的话，将出现收入和财富的集中。这就是货币在发达经济中的运作方式。

对富人的低边际税率与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二者之间密不可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要求有力的累进所得税和房产税制。认为洛克、斯密、边沁、穆勒等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的观点完全错误。他们所提倡的公共政策完全是出于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目的。他们是民主的倡导者，歌颂中产阶级社会。

当前美国社会极度不平等的实质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证明。穆尔的数据显示，位居前0.1%的高收入群体的人均收入大约是50%的底层低收入群体人

均收入的400倍。[注]同样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处于相对较高百分位数的收入者所获得的人均收入也相对较低。拿美国处于第75到第90百分位数的收入群体做例子，这个群体获得的收入高于3/4到9/10的总人口的收入。这部分收入靠近金字塔顶端的占总人口的15%的群体仅获得了20%的国民收入，[注]仅仅略高于平均值。现在大约有80%的美国人的收入低于平均值，90%的人拥有的财富低于平均值。

当今美国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尤其是在年龄和家庭结构基础上的根本不平等现象并非一直如此。在1950年，美国处于底层的50%的低收入群体获得了大约22%的国民收入，[注]而不是像上述提到的12%。此外，同儿童相比，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

当有孩子的工薪家庭所获得、拥有的国民收入和财富比例很小时，很难想象美国的儿童和家庭过着怎样的生活。社会保守主义者应当考虑采纳其他政策，去替代削减富人纳税、减少穷人所得的社会服务的举措。这些政策或许能给美国的儿童和家庭带来好处。当代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应当避免只让富人更富的经济政策。

笔者认为，如果米尔顿·弗里德曼今天还在世的话，他或许会接受和支持这里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建议的公共政策。在2005年（他去世前一年）的一封信中或许包含了他最终坚持的关于恰当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思想：

> 关于家长主义思想，你提了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人不能负责任地使用负所得税所提供的货币。然而，这些人的数量是由现有的福利机构作用的结果。我同意你说的，如果“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不是1%—2%而是10%—15%的人需要有力的支持”的话，要维持一个自由的社会，即使可能，难度也特别大……
>
> 我认为你的确是对的，我们正从现金支付转向实物支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圣弗朗斯西科，市长针对无家可归的人开展了名为“非现金关心”的项目。该项目并不像我们之前那样，每月为无家可归的人仅提供津贴，而是为他们提供居所和少量的津贴。
>
> 任何福利方案都会抑制人们工作的积极性，负所得税与目前各种福利项目的情况都是如此……问题是边际性的激励是什么……
>
> 这些是关于家长主义思想问题的一些随意的评论。我承认，家长主义思想一定会起作用，问题是以何种方式起多少作用。我不能肯定对此

> 你能做很多评论。我想实物福利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实践中的实际效果通常与预期效果迥异。这里，非预期效果定律起到了作用……
>
> 我一直相信，废除所有具体的福利措施，用极低水平的负收入所得税来替代会是一种进步。正如你所提出的，可能有一些人会陷入夹缝中，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差强人意的慈善。然而，我认为，它将会把这些人的数量减少到这样一个程度，即私有组织和个人将不只是来弥补差额……我认为，假设我们现在就能获得该改变的想法不切实际。我们只能逐步达到目标……[注]

这算是一个有关福利的温和的总结性陈述，这个陈述即使不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也与其相似。从根本上说，弗里德曼是一个左派人物。他认为，应当用事实来指导公共政策，即实证经济学。他是一个赞成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化福利的纯功利主义者，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的观点完全是关于这个世俗的世界。除了2005年就恰当的社会福利政策发表的还算温和的总结性观点之外，他还就同性恋婚姻问题做了下述相关回答："我认为不应该对同性恋者有任何歧视，他们应当与其他人一样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注]在胚胎干细胞被用在科学研究和疾病治疗当中时，他"不赞同……对干细胞研究的道德谴责"，并"反对针对这类研究的立法限制"；[注]他支持堕胎；[注]在外交政策领域，他主张不干涉主义，反对草案；关于移民，他支持在不提供福利的情况下开放边境；他提倡毒品，尤其是大麻的合法化。由此可以看出，米尔顿·弗里德曼不是当代保守主义者。

按照2014年《福布斯》杂志关于最富裕的400名美国人的报道："现在，最富裕的400位美国人持有财富的总值为2.3万亿美元，比一年前上升了13%。"[注]相比而言，最穷的1.3亿美国人，其中包括美国7500万18岁以下的儿童总人数当中的5 000万儿童，拥有的总值不到3500亿，还不到最富裕的400人拥有的总财富量的1/6。[注]

有些社会优于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支持者们所提倡的世袭财阀统治。家父威廉·本斯坦是一位著名的政治科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40—1941年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时与弗里德曼是同事。家父在1954年的一篇关于资本主义的文章里写道：

> 立法行为不能均衡人们的智商。人们在能力、动力与动机上总是存在差异。但是法律通过在比赛开始前去平衡各种条件，能够使得机会的平等变得更加现实。例如，增加遗产税可以减少继承的财富的影响；

累进所得税有利于低收入群体；从护士学校到大学的免费教育使得勤奋的学生比富裕的学生获益更多。换句话说，如果单单考虑能力，机会均等将很快引起延续的不平等。同样还必须考虑需求对幸福的效率原则。[注]

当前美国应当实施的公共政策包括：

1.将前1%的高收入群体的联邦所得税边际税率恢复到50%，将前0.1%的高收入群体的边际税率恢复到70%

2.将1亿美元以上房产的联邦房产税最高边际税率恢复到77%

3.降低一般销售税，增加州和地方层面的其他税收，为州政府提供收入

4.免除债务以及提供更好的方式消除学生贷款债务；降低大学和技术学院学费

5.将健全成年人的联邦最低工资增加到每小时12美元，将最低工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挂钩

6.尤其针对工薪家庭扩大所得税抵免

7.限制公职人员工会，尤其是公职人员养老金，鼓励私营企业员工工会

8.增加能源的国内生产，尤其是天然气

9.降低对经济增长刺激的控制

10.保持永久性的与低通货膨胀一致的低利率货币政策

11.保持自由贸易政策

12.增加高技能人才移民数量

13.尤其针对工薪家庭减少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税

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50—70年代经济政策的一种回归。在此期间，美国的经济发展快，负债少、国民收入和财富得到更加公平的分

配，家庭更加稳固。这些政策的目标不是增加总税收，而是将赋税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那里重新分配到富人和超级富人身上，旨在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繁荣和平等的社会。

在大幅度降低边际所得税率的运动中，或许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运动意图在边际收入和房产税更高的时候带来比之前更大的经济增长。但是正如各政治派别的政治经济学家一致同意的那样，最高边际率更低的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比最高边际率更高的时期更低。加图研究所的大卫·鲍兹在《自由主义思想》（2015年）中写道："我们现在经济的年增长率仅仅只有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年增长率的一半，与在2008年初经济放缓之前的情况类似。"1989年赫布·斯坦恩在里根离任后写道："将我们现有体制下的经济表现与肯尼迪及约翰逊的新经济学时代下的经济表现进行对比很有意义。从1980—1988年，实际GNP增长了26%；从1960—1968年，实际GNP增长了42%……在早期，贫困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在后期并非如此。在减少白种人和黑种人工资上的不平等方面，早期比后期取得了更大的进步。"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克林顿总统就任时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写道："在1981—2011年的30年中，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低于前3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3.6%。"

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多的当代自由主义者接受激进的无政府自由主义宗旨，即用鲍兹的话来说，将政府职能限制在"警察部门、法庭和国防"之内，将各级政府的职能降低90%。绝不能将此看作解决当代社会政府与政策问题的一个保守的、合理的和现实的途径。它不是一个很实用的体系，仅仅适合于处于顶端的少数人。

累进税收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将结果平等作为最终成果和范式的社会。它的目的，是使作为当前美国典型特征的广泛的持续增长的不平等现象获得逆转。是时候重申美国人的基本信念了，即"人人生而平等"。

在《自由宪章》结尾部分，哈耶克引用艾克顿勋爵的话："自古以来，自由的忠实的朋友总是罕见，成功总是得力于少数人。他们凭借与那些秉持着不同目标的援军的联合而获胜；这种联盟是危险的，有时候甚至是灾难性的。"是时候把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产交还给政治、经济和社会左派；是时候让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为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右派的根本改变和改革而努力；是时候恢复在美国处于发展的最好阶段所盛行的累进所得税制，增加对富人的征税。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演变对上述目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彼得·柏特克回忆，奈特的学生詹姆斯·布坎南说：“要让不情愿的人们接受陌生的概念需要各种反复重申”[《生活经济学》（奥克兰：独立研究所，2012），p.28]。

2. 史蒂芬·克莱恩德，《美国的不平等：种族、贫穷和民主诺言的履行》（博尔德：西景出版社，2015），p.48。如今美国18岁以下的青少年当中，约有22%的人生活在贫困当中，其中包括35%的西班牙裔以及38%的非洲裔青少年。当前，美国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中，有超过40%的人来自以女性为主的单亲家庭。

3. 史蒂芬·穆尔，《美国税收制度：谁是真正的纳税人》，《2012热点问题》（曼哈顿公共政策研究所，2012年8月），p.3（图3）。

4. 史蒂芬·穆尔，《美国税收制度：谁是真正的纳税人》，《2012热点问题》（曼哈顿公共政策研究所，2012年8月），p.4（图4）。

5. 史蒂芬·穆尔，《美国税收制度：谁是真正的纳税人》，《2012热点问题》（曼哈顿公共政策研究所，2012年8月），p.4（图3）。

6. 除了穆尔外，其他很多人也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本质。例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今天分化的社会将如何危害我们的未来》（纽约：诺顿出版社，2012）；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逊，《赢者通吃的政治》（纽约：赛门斯·舒斯特出版社，2010）。

7. 迈克尔·坦纳，《不平等的神话》，《国家在线评论》（2014年5月14日）。

8. E. N.沃尔夫，《美国家庭财富新趋势》，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2010）。

9. 哈里·G.约翰逊，《凯恩斯主义革命与货币主义反革命》，《美国经济评论》（1971），p.3。

10. 穆尔，《美国税收制度：谁是真正的纳税人？》，p.5。

11. 穆尔，《美国税收制度：谁是真正的纳税人？》，p.4（图4）。

12. 穆尔，《美国税收制度：谁是真正的纳税人？》，pp.1-2。

13. 沃尔特·威廉姆斯，“分道扬镳”，creators.com（2013年12月30日）。

14. 作者与威廉姆斯教授有过一两次接触。他是一个和善体贴的人，对我的弗里德曼论文集《不可或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给予了积极的认可。

15. 约翰·斯托塞尔，《平等对自由》，《圣巴巴拉日报》（2014年1月8

日），p.A7。斯托塞尔在其他场合还评论道："1976年，弗里德曼因为其在消费分析和货币理论领域的技术性成绩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真正的影响力来自他在书刊杂志上发表的广受欢迎的流行作品。"["米尔顿·弗里德曼日"，creators.com（2007年7月30日）]。这与弗里德曼的观点完全相反，他强调的是自己的学术作品。

16. 约翰·斯托塞尔，《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圣巴巴拉日报》（2015年3月12日），p.A2。

17. 马修·加德纳，《州税改革首要原则——无害》，《圣巴巴拉日报》（2013年2月4日），p.A7。

18. 克里斯多夫·霍华德，《隐性福利国家》（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

19. 大卫·凯·约翰斯顿，《幸运400》，《路透社》（2012年6月6日）。

20. 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遗产基金会和卡托研究所在内的主要保守派和自由派智囊团成员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本人是卡托研究所的兼职学者，但是本人不同意这些观点。

21. 感谢亨宁·博恩对里根政府税收政策的精辟分析。

22. 穆尔，《美国税收制度：谁是真正的纳税人》，pp.3-4（图3和图4）。

23. 穆尔，《美国税收制度：谁是真正的纳税人》，p.3（图3）。值得注意的是，穆尔对2013年开始实施的更高税率所带来的影响做出了完全错误的预测："如果不延续布什时代的税收削减政策并废除奥巴马医改税收政策，那么后果就是……股市走低，实体经济萎缩，美国有可能遭遇与卡特总统时期一样的双底衰退。"（pp.6-7）事实上，从2013年开始，随着税率的上升，股票市场达到历史新高，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同时失业率也大幅度下降。

24. 威廉·埃布斯泰因，《当今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纽约：培生出版社，1954），p.142。

25.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作者的通信（2005年6月1日）。

26.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作者的通信（2005年6月1日）。

27.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作者的通信（2005年6月1日）。

28.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作者的对话（1996-2005年）。

29. “最富裕的美国人”《福布斯》（2014年10月20日），p.16。

30. 沃尔夫，“美国家庭财富新趋势”。

31. 威廉·埃布斯泰因，《当今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p.98。

32. 感谢大卫·毕佛提出的观点。

33. 大卫·鲍兹，《自由主义思想：对自由的宣言》（纽约：赛门斯·舒斯特出版社，2015），p.17。

34. 赫伯特·斯坦恩，《另一方面……：经济学、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论文集》（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出版社，1995），p.50。

35.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今天分化的社会将如何危害我们的未来》（纽约：诺顿出版社，2012），p.298，n.19。该作者单独算出了1948-1980年和1981-2009年两段时期的美国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7%和2.8%。

36. 鲍兹，《自由主义思想：对自由的宣言》，p.283。

37.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p.395。经过学术滋养的艾克顿思想细致而复杂，指向古典自由主义。他还在“古代的自由历史”（1877年）中写道，恰当的政府行为包括“通过促进宗教、教育和财富分配等战胜诱惑的势力，间接帮助人们与生活进行斗争”。他支持把民主作为评价政府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在保守的社群主义传统中，他既强调群体也强调个体：“柏里克利认为，每一个忽视自己在公共事务中作用的雅典人都会损害整个联邦……他的治国工具是演说艺术，通过劝说来治国。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公开的商议来决定，所有的影响都服从心灵的优势。”艾克顿支持政府“在教育和实用科学领域发挥作用，帮助贫穷无助的人，或者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艾克顿，《自由历史及其他文集》（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09），pp.4，10，17]。

附录一 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访谈

（以下作者对米尔顿·弗里德曼进行的访谈发生在1995年10月9日）注

问：就哈耶克个性而言，您如何描述他？

答：他的个性很复杂，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很外向，但是同时又很内向。他不喜欢批判，但他从未表现出这一点。我发现，他关于批判的态度会说："嗯，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现在，我很忙，但是稍后我会就此给你写信。"但他从来不会。

一方面，他不狭隘，不像冯·米塞斯。你无法想象哈耶克去做米塞斯所做的事。比如说，冯·米塞斯3年都不和马克卢普说话，只因为马克卢普在一次朝圣山学社会议上表示支持浮动汇率，而哈耶克不会这么做。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受伦敦学派的影响，伦敦学派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另一方面，莱昂内尔·罗宾斯对哈耶克对待他第一任妻子的方式特别生气，因为这件事从朝圣山学社辞职，并且不再和哈耶克说话。多年后，他们才冰释前嫌，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哈耶克的孩子们起了作用。我想这和他的个性密切相关。

问：您会说他是一个骄傲的人吗？

答：是的，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但是我从来不能理解——我从来没有能够融入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从来没有类似的经历——与他第一任妻子所发生的相关的事情。两难境地是他对待第一任妻子的方式。因为我了解他，和他打过交道，我发现很难使其与他的个性相符。他通常对他人都考虑得很周到；他坚信自己的观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有很大的改变。我确信您也读过，其中一件事就是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品集》中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通信。我认为，哈耶克在这些信件中表现得非常糟糕。凯恩斯表现得像是善良慷慨的叔叔，而哈耶克则像一个傲慢、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人。

（关于《价格与生产》）我得说，我认为那是哈耶克最糟糕的书之一。

我强调一点，我非常崇拜哈耶克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学。我所探讨的不是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在真实世界中的运用或者诸如此类的事，而是他对经济学科学的贡献，这种贡献无关于经济实践以及其他，而且《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有缺陷的书。我认为他的资本理论书不值得一读。我不能说已经读过。（笑声）确实不值得一读。

另外，《通往奴役之路》是我们时代的一部伟大著作。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著述非常出色，我对这些著述只有无限的钦佩。我认为，有了这本书，他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职业——他的正确的专业。他早期的作品旨在作为一门科学的技术经济学文献的一部分，事实上，也是这些作品的特点引起了莱昂内尔·罗宾斯的注意，使得罗宾斯将他从奥地利带到了伦敦。

我从来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些像《价格与生产》一样的讲座会给他们（在伦敦经济学院）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还不能理解这些非常混乱的概念，如生产周期、产品的不同顺序等。

有趣的是，就这一点而言，这与他还未摆脱冯·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的影响有关系。这些方法论观点的核心是：事实与理论的决定及检测无关联。它们和理论的说明有关，与理论的检测无关，因为我们把不证自明的命题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它们之所以不证自明，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人类，而我们就是人类。因此，我们有终极知识的内在根源，没有检测能否决这种……人类行为学。

这种方法论的方法有负面的影响：导致创建任何一种累积的学科都困难重重。如果你总是回归到内在的、不证自明的真理上，人们如何站在彼此的肩上？事实是，在冯·米塞斯发表他的资本理论的五六十年后，没有丝毫的进步。该理论被用在了哈耶克的资本理论中。所谓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仍然在坚持该理论。

它还容易让人们变得狭隘。如果我俩都是人类行为学家，我们不能对某些命题或陈述是否正确达成一致，那我们如何解决这种不一致。我们可以争吵，可以争辩，可以试着去发现对方（论据）中的逻辑错误，但是最终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它，除了争斗——说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另外，如果你采取的方法是：在科学上，我们做的是去为某些事件的结果提供假设，如果我们不一致，我们就试图通过寻找与预测相冲突的实验证据——如果你和我不一致，我们有另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化解我们的不同。我告诉你，我能找到什么事实去说服你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告诉我，我能找到什么事实正好有相反的效果？然后我们出去研究这些事实。

这就是科学进步的方式。

就像我说的，我认为哈耶克起初是一个严格的米塞斯主义者，但是他发生了改变。罗宾斯也曾一度是严格的米塞斯主义者，但是由于英国和后来的美国的氛围更加包容，并且他接触到更多不同的学者，因此他改变了之前的立场。正如我所说的，他从来不会像米塞斯那样狭隘……

（关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总是使我着迷……我赞同他说的很多观点，但是完全不赞同他的方法论与狭隘性。我认为哈耶克与他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反。

我想，我是在1946年或1947年第一次遇到哈耶克。那时他是在一次巡回讲学中经过芝加哥，或者在做与朝圣山学社有关的事情，但是我初次见到他是在第一次朝圣山学社会议上。在那里，我第一次以更加严肃的方式了解他。当然，后来就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的10年里，我经常见到他。哈耶克的第二任妻子海琳和罗斯是很棒的徒步者。我参加了哈耶克的研讨会。

问：您多长时间参加一次他的研讨会？

答：在镇上我定期参加他精彩的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他请来的各路发言者的观点非常广泛。我记得的最好的一次是恩里科·费米做的关于方法论的研讨会，它对我自己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他谈到了测量的概念。我永远不会忘记给我印象最深的陈述，……测量就是做区分……区别越精细，测量也就越精细，这是一个精彩的创造性理念。事实上，这是我记得的唯一一个作为个人研讨会的哈耶克研讨会。我不能告诉你他还另外邀请了谁，但其主要的吸引力是他们吸引来了很多不同系部的人。他不是在经济学系，而是在社会思想委员会。

问：在理查德·科克特的《想非易想》中，有一段引述，说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起草了朝圣山学社的目标。是这样的吗？

答：当然，对此毫无疑问……莱昂内尔是一个很棒的人，具备一种无与伦比的语言使用能力，我从来不知道有人能站起来即兴说出优美的语法、完美的句子。无论如何，会上没有其他人能够像罗宾斯一样很好地调节参与者之间政治上的分歧。在我们花了数天时间讨论这些问题并努力起草一个声明后，莱昂内尔最终接过去起草好一份，我们都在上面签了名。

问：您认为他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吗？

答：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位令人着迷又怀才不遇的人，他不是一位有深刻独创精神的思想家，但他是一位非凡的极富洞察力的文献分析家，他的写

作非常出色。他的一生分两段时期：“二战”之前是一个人，之前被凯恩斯所腐蚀；“二战”后是另外一个人，他成为通晓世故之人——成为艺术学院的董事。我和罗宾斯有过很多接触，比与哈耶克多。你会发现，很难找到一个更正派更可敬更令人愉悦的人，这在他如何看待哈耶克对待其第一任妻子中有所体现。

当哈耶克被召唤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他把她带到了英国，但她从未参与其中。他积极地融入英国的生活中，但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大多时间独自留在戈尔德斯格林照顾孩子，他们在那里有房子。据我所知，她不是很融入，但是对此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无论如何，我的感觉是她不是很开心。实际上她一点也不开心……当时我从罗宾斯那里得知，他把她留在伦敦不管她，她从来没有真正地扎下根来……我只知道，罗宾斯认为他对待她的方式完全让人无法接受……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那时的标准也不是今天的标准。但是按照那时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它也不是那时的标准，而是莱昂内尔·罗宾斯的标准……我相信，他认为只有巨大的愤怒才能为这样的行为辩护，我同意他的观点。你看，我意识到情况的变化。我们有两个孩子，两个都离婚又再婚了。同时，罗斯和我结婚57年了，所以你看到了事情的两面。

问：第二任哈耶克夫人是个聪明的女人吗？

答：是的，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我只见过一次哈耶克的第一任夫人，但不记得是在哪里见过面，是在罗宾斯家里还是其他地方。

亚伦·迪雷克托是让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因素，他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担任了很多年的朝圣山学社代表——学社被纳入伊利诺伊。亚伦担任了多年的秘书。

问：在1956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前言中有些迹象表明该书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

答：其实，他在那里说的是，出版商拒绝出版是因为他们顾虑书的内容。

问：您认为有很多的阻力吗？

答：毫无疑问。你知道，你是一个年轻人，你不了解1945—1960年或1970年的舆论倾向。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因为那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我们有相同的经历。我在1962年出版《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是17年以后了。现在这本书卖到了近100万册。除了《美国经济评论》外，没有任何的美国出版物对它进行评论。不可思议的是，那时候——我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在学术界非常有名——很难想象在同样位置的某个人写的一本书

不会有任何的出版物对其进行评论——《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的唯一原因——你知道哈耶克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当诺贝尔奖在经济学领域设立奖项的时候，其规则是不能5年都颁给瑞典人。那是第6年。他们很想把奖颁给米达尔。但是米达尔是左派，他们担心自己成为靶心——这是我的重构，我不能给你任何的书面证据——他们担心自己将成为猛烈抨击的对象，所有他们决定将米达尔与哈耶克，左派和右派联系起来，抵消批判。

问：似乎是做出了重大突破——

答：对哈耶克有极大的影响。毫无疑问，使他恢复了活力。这种认可——我个人从来不能理解，以个人的观点。它会有什么影响吗？就像我过去被问到该问题的时候经常说的，比起瑞典的7个人现在碰巧做出的决定，我更关心的是，50年以后的经济学家将如何看待我的工作。

问：在《哈耶克论哈耶克》中的一篇文章里，哈耶克讨论了他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并且他将您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称作“与凯恩斯一样危险”的作品——

答：他是对的！（笑声）有那么大的方法论差异。正如我所说，他从一定程度上弭合了这种差异。米塞斯绝不会写出《自由宪章》。《自由宪章》是哈耶克向芝加哥学派的倒戈。这是他的作品中唯一大量提及绝对经验的书。如果你看一看他在《自由宪章》中谈到的主题范围以及展开讨论的方式，就会发现与他的大部分书相比，风格完全不同……

关于哈耶克如何谈论他自己对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这是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对芝加哥学派没有直接的影响；他不是系里的成员。你知道，卢诺提出来资助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担任10年的教授职位。我想事情是这样，管理层问经济系是否愿意为哈耶克提供一个职位，他们拒绝了。我那时候在那里是在低的职位上。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参与到那项决策中。但是回想一下，我认为他们是对的。

问：奈夫在自传里说，经济系不想要哈耶克是因为《通往奴役之路》。

答：这与那本书没有关系。他们不想要他，有两点：第一点，他们强烈地认为他们应当选择自己的成员，而不是外界指派给他们的成员。与名字无关，他们会对管理层提供的任何建议做出消极的反应。第二点，他们不赞同他的经济学。《价格与生产》，他的资本理论——如果他们环视世界找一位经济学家添加到团队当中，他们的选择不会是《价格与生产》的作

者。就《通往奴役之路》而言，完全没有起作用。事实是，在意识形态上，系里大部分人都是站在哈耶克一边。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全国闻名，在专业领域里独树一帜，因为它提倡自由市场。因此，《通往奴役之路》会是一大优势，而非劣势。不，我确信，他们拒绝他的根本原因是下面两方面的结合。一是10年后他们得从自己的基金中来承担责任——他不是他们选来加入到系里的。再者，他们不想让管理层来操控系里的成员……哈耶克的自由市场完全符合条件。有人，别误解我——在系里，可能有比自由市场人更多的凯恩斯主义者。但是在那时，没有。在那时候，我认为没有。

问：更早呢，会有吗？

答：后来有。让我告诉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去寻找可能的最好的凯恩斯主义者，因为我们认为还没有足够卓越的凯恩斯主义者。我们聘用了哈里·约翰逊。大约一年后，他成为一名芝加哥（经济学家）。事实是，他是被改造的。这是持对立观点的人们到了芝加哥后容易发生的情况。那是我的观点，如果哈耶克没有到芝加哥，他绝不会写出《自由宪章》。如果你看这些脚注，当然，取决于哪一章。我努力找一个他讨论租金控制和公共住房等的典型例子。

因此，就哈耶克对芝加哥的影响而言，他影响了像我自己这样参加他的研讨会并与他有过互动的个人，他的影响不是通过经济系，哈耶克对芝加哥的影响更多是通过他带的学生，通过创立“个人主义评论”的小组——他在那里的影响非常大。

问：他曾经参加过货币银行研讨会吗？

答：没有……事实上，他与我在对待货币政策观点上有天壤之别。这真正是奥地利-冯·米塞斯——

问：他是货币主义者吗？

答：他不是货币主义者。事实如此，他摆脱了那方面的业务……别误解我。他不是人们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货币学家，但是他懂，他真正了解货币体系。他十分了解货币在社会中的作用。他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过度发行货币就不会有通货膨胀。问题是货币运行的方式。他和他的追随者——与冯·米塞斯的所有追求者一样——从根本上相信，它是通过生产周期概念改变生产结构来运行。有高阶商品，有低阶商品——这就是它运行的方式。因此，货币如何进入系统关系重大。它进入哪里，它没进入哪里。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观点与它不冲突，但是不重要。关于货币，真正重要的只是它会让人们花更多的钱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产出，但是之后

会转变为价格上的压力。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滞后。

米塞斯赞成金本位，哈耶克对此一再拐弯抹角。他一度出来支持商品标准……后来又表示支持自由银行制度。他认为，在该制度中银行会建立商品或金本位。但他不像冯·米塞斯那样对金本位痴迷。他强烈反对像货币数量和国民收入这样的集合性概念。他说，如果不把它们分解，去看它们的成分和过程，只有这些集合性概念，是什么也做不成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毫不怀疑，综合概念既隐晦又鲜明，但是它们的确鲜明很多。他在英国提到的是货币政策，如果我有影响力，我会敦促英国人建立货币数量方面的货币目标，这是他所反对的。他不喜欢货币数量的概念，因为这是一个集合性的东西。

问：您怎么看凯恩斯的《条约》？

答：……《条约》是一本巨著，分为两卷，其中内容很好，与刚写成的时候一样好。但是凯恩斯不再相信他在其中描写的特别原理……他抛弃这个原理。《条约》包含的基本概念是：根本的波动是在价格上而不是在产出上。《通论》是让行动进入产出，而不是价格。这有点简化，但我认为是正确的陈述。

不要误解我。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是一个时代的伟大经济学家。我只是碰巧相信——《通论》提供了世界运行方式的一个假设。与每一个科学的假设一样，它或许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考虑周全的假设，但却可能是错的。我反对这个假设不是基于其理论基础，是因为它的预测没有经过现实的确认，因为有迹象否认它。它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巧妙的假设，但结果是错的；它是一种试图为一个复杂的现象提供一个简单的解释的合适的假设，只不过它是错的，它行不通。我想强调的是，我非常崇拜凯恩斯，就那个特别的假设而言，我持反对意见。我强烈地反对他关于公共政策的方法……

问：《哈耶克论哈耶克》有一段引文，大意是说，1946年当凯恩斯去世的时候，他和哈耶克是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答：我不能评论它，因为他是在英国写的，在美国肯定行不通。在美国，我从未将凯恩斯的名字与哈耶克的联系在一起，他们在经济学中不会有一样显赫的地位。事实上，我想说，在美国，更可能把罗宾斯与凯恩斯联系在一起。当然，我说的是芝加哥大学。我没有全部的阅读清单。

我什么时候读的《价格与生产》？它一定是与我的一门课程相关。一定是在阅读清单上。在明茨的阅读清单上。他什么都有。

在美国他不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与凯恩斯不在一个层次上。我不是说在英国，英国是另外一回事。

问：在《致命的自负》中，有两种思想派别，哈耶克如何将它们糅合在一起？您的观点是什么？

答：他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总是让我很困扰。我无法给你答案。我认为它不是哈耶克更好的著作。这是被迫的。是将它置于这样的形式："我打算一劳永逸地向你展示，上帝作证，在你听到之后，无论如何你将不能回答我。"它达不到哈耶克的最佳状态。

---

1. 弗里德曼在另外一次采访中说："不管怎样，米塞斯主义者们停止说了整整50年的话吗？没有停。他们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废话。他们所谓的科学研究很荒谬。因为他们认为，事实是阐释理论的方式，而不是检验理论的途径。所以从任何角度看，他们的研究都毫无意义［J.丹尼尔·哈蒙德，《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方法论的一次访谈》，见萨缪尔斯和比德尔主编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第10卷（格林威治：JAI出版社，1992），p.102］。

   在2000年11月作者对弗里德曼的另外一次采访中，他说：

   弗里德曼：……哈耶克不像米塞斯那么狭隘。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米塞斯的行为学方法。这种方法认为知识来自我们的内心；我们拥有可以依赖的数据源；这些数据源可以让我们获得真理。正如米塞斯所说，事实可以阐释理论，但是它们不能检验理论。

   埃布斯泰因：我认为这是个荒谬的观点。

   弗里德曼：我认为它荒谬至极。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接受它。

附录二 保罗·萨缪尔森关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函

（下面这封保罗·萨缪尔森写给作者的信写于2005年6月30日）

研究的最后期限迫使我在回复您有关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函时长话短说。

已经认识他70多年了，虽然我们在思想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我们一直相处融洽。我必须宣称，他是将现代人推向自由主义右倾思想的一名最重要的学术经济学家。这种自由主义思想不惜以严重的个人不平等为代价去颂扬经济效益。

哈耶克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世界各地经济学学术界的影响很小。（从左派来说，加尔布雷斯对学术界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在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1931年）发表后的一段时期，人们高估了他作为理论经济学家的价值。对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鹿特丹大学、东京大学的学生来说，哈耶克的名声在1932—1975年坠入了一个黑洞。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在这些对混合经济持敌对态度的非专业读者中更为流行。然而，1939—2005年的经济政治历史却没能印证该书的论点，即平稳的社会改革是通往残酷的集权主义国家的大门。很少有人翻阅他这本关于资本理论的令人失望的巨著。

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此书对1920年的经济理论没有贡献，但是它阐明了什么是自由主义。它的阐述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讲是自由主义的极端版本。（没有驾照、没有外科医生执照……）粗心的读者会认为，他证明了涉及交通灯的无谓的损失。

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设理所应当地在现代经济学家中间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他在1950—1990年的MV＝PQ货币主义发展得不好。卢卡斯-萨金特-普雷斯科特的理性预期主义与埃克斯坦-格林斯潘-莫迪利亚尼的宏观模型从右、左两派使得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信条的预计性、实用性黯然失色。在经济实证方法方面，自从考利斯委员会的大批成员撤离芝加哥……这些方法的作用体现在：协整、单位根和无数的诺贝尔奖。

作为一名老师，米尔顿·弗里德曼能获得A＋的成绩（典型范例：1951年在

普林斯顿大学，一名经济学本科学生的能力一般。在芝加哥大学上了米尔顿第一节课后，这名学生获得了重生。他简直“等不及要上接下来的每一堂课”。这是加里·贝克尔说的话。他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弗里德曼所授课程大纲是在世界其他国家被摒弃的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范式。这对他毫无影响。在伯恩斯和米切尔的国家经济研究局濒临解散时，弗里德曼给予极大的支持。国家经济研究局受到广泛的批评，它与现代繁荣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时代关系甚微。

亚伦·迪雷克托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也是他把我带进了经济学领域。我很早就看出他妹夫的高智商。弗里德曼选择了远离位于我们学科前沿的错综复杂的未解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损失。

我仔细地阅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其原因是，我能从与我思想相左的学者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在某个关键点上，我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不再赞同固定汇率，转而赞同弹性汇率。在各种“货币供给”的定义中，我认为双管齐下的泰勒规则完胜预先设定增长的弗里德曼-施瓦兹规则……

谨上
保罗·萨缪尔森

文献篇

关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历史的一系列名副其实的优秀著作在近些年才出现。这些作品不完全受到主要芝加哥经济学人物的思想观点影响，但它们引发了广泛的档案研究。这些作品包括：安格斯·伯金的《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罗伯特·范·霍恩、菲利普·米卢斯基和托马斯·A.斯泰普尔福德共同编写的《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最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罗斯·B.埃米特编写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埃尔加指南》（切尔滕纳姆，英国：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2010）；菲利普·米卢斯基和迪特尔·普勒韦编写的《自朝圣山之路：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的产生》（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约翰·范·奥弗特韦德的《芝加哥经济学派：芝加哥大学如何汇集那些革新了经济学与商业的思想家们》（芝加哥：阿加特出版社，2007）。

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伯金的《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如果人们想要弄清楚瓦伊纳、奈特与赛门斯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本必读文献。我同意伯金关于弗里德曼在职业生涯中激进的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以及伯金所强调的弗里德曼在国际新自由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独特、重要以及激进的作用。关于哈耶克，伯金论述道，“他非常赞成国家的积极作用”（p.90）。关于弗里德曼，伯金说：“在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成为公众舞台上一位强有力的放任主义支持者。他形成了一套论证框架。这套框架将为接下来数十年里的很多共和党政策纲领提供依据。”（p.187）《伟大的说服：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吸引了全世界大量的档案研究，是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著。

范·霍恩、米卢斯基和斯泰普尔福德编写的《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最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是帮助人们理解芝加哥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重要著作，其中收集了很多学者的文章。编者们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时期，芝加哥学派的教义原则与政策方针在美国政治上达到了全盛时期”（p. xx）。杰米·派克这样评论里根的对外经济顾问委员会：“整整一半的成员……与芝加哥有重要的联系。”（p. xliv）爱德华·尼克哈认为，在弗里德曼去世后而被终止的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学院存在着争议。范·霍恩、米卢斯基和斯泰普尔福德写道：“战后芝加哥学派的创始者们（包括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亚伦·迪雷克托）迅速远离了古典自由主义，激起了像弗兰克·奈特和亨利·赛门斯等芝加哥大学导师们的热情。”（p. xix）

埃米特编写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埃尔加指南》同样收集了很多好文章。其中，第二章中讨论了19世纪的芝加哥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埃尔加指南》不但提供了主要芝加哥经济学家们的信息，还介绍了很多芝加哥经济学界的小人物。埃米特笔下的芝加哥学派的概念很宽泛。要特别阅读谢莉尔·D.卡斯珀关于亨利·赛门斯的文章：赛门斯“建议从根本上改变联邦税收结构，使其更加累进化，从而减少给予社会某些成员更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收入与财富的集中”（p.333）。

米卢斯基和普勒韦编写的《自朝圣山之路：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的产生》是一本涉及广泛领域的作品，对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思考，但是过于强调朝圣山学社，该学社并不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有影响力。此外，在其成立的早期，从哲学上来看，学社比作品中所描述的还要多元化。关于该书，可以阅读布莱恩·多尔蒂在《自由人》（2011年9月21日）上所写的评论。

或许有关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的最受关注的作品是范·奥弗特韦德的《芝加哥经济学派:芝加哥大学如何汇集那些革新了经济学与商业的思想家们》。范·奥弗特韦德这本书耗时多年，他进行了100多次采访。这本书提供了1892年芝加哥大学建校至2005年期间在该校经济学和商业领域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原始材料并对这些人物做了详细介绍。范·奥弗特韦德强调了劳克林的作用：“在19世纪后10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是杰姆斯·L.劳克林创造了这种差异。”（p.3）

范·奥弗特韦德写道，“奈特一直认为，经济自由是包括宗教、政治、学术等自由在内的所有形式自由的关键”（p.61）。在奈特之后，弗里德曼力图将自由的作用最大化，认为它是高于其他任何利益的社会秩序的成果。范·奥弗特韦德还说道，“奈特从未盲目地为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体系辩护”（p.61）。在书中，范·奥弗特韦德分主题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阐述，他提供了很多人物的大量相关信息。他写道，到2004年，5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24位主要隶属于芝加哥大学，或者他们曾在职业生涯的重要阶段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此外，在1951—2005年获得克拉克奖章的29位经济学家中有10位与芝加哥大学有重要联系或在那里工作。同样，在1947—1977年，美国经济学会每5年为一位在经济学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在世的经济学家颁发沃克尔奖章。7位获奖者中有5位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分别是：前四届的获奖者韦斯利·米切尔、约翰·莫里斯·克拉克、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瓦伊纳和第六届获奖者西奥多·舒尔茨。

范·奥弗特韦德在书中提到：“芝加哥大学发展起来的学派有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学派包括：20世纪初约翰·杜威实用主义哲学；1920—1950年繁荣起来的威廉·托马斯、罗伯特·帕克和欧尼斯特·伯吉斯的城市社会学；受到查尔斯·梅里安启示在1910—1940年兴盛起来的政治科学研究方

法；继查尔斯·H.阿诺德作品之后的神学派；以及20世纪50年代罗纳德·克兰领导的英语系方法”（p.43—44）。他称赞劳克林，认为他“为新系招贤纳士的主要标准是科学卓越，不是服从性”（p.49）。范·奥弗特韦德引用埃米特的话：认为他“汇聚了当时很多顶尖的经济学家，不论他们的政治和理论倾向是什么”（p.49）。范·奥弗特韦德引发了人们对威廉·雷尼· 哈珀作为芝加哥大学的首任校长在创立大学传统中所起作用的关注。这些传统在政治经济系以及后来的经济系中得到了体现。有关“芝加哥学派”的评论，请看沃伦·J.萨缪尔斯、杰夫·E.比德尔和罗斯·B·埃米特编辑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第26卷-A（宾利，英国：JAI出版社，2008），该书包括三篇评论。2009年版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第27卷-A提供了四篇评论。

沃伦·J.萨缪尔斯的《政治经济芝加哥学派》（新不伦瑞克，新泽西：业务出版社，1993）收集了原来刊登在1975年12月和1976年3月版《经济问题杂志》上的文章。萨缪尔斯写道：“不管学派的成功是因为其优秀的理念、艰苦的工作……学派成员的个性还是时代的精神……该学派无疑是‘二战’以来经济学领域最为成功的学派”（p.xi）。他将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以及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加里·贝克尔归为芝加哥学派。很多作者强调奈特在学派创立过程中的作用。

约瑟夫·道夫曼的《美国文明中的经济思想》第5卷（纽约：维京出版社，1959）是一本关于美国经济学通史的书，该书提供了有关芝加哥经济学的大量信息。当时还没有明确的芝加哥学派，但是奈特和瓦伊纳被认为是两位主要的“传统主义者”。道夫曼这样描述瓦伊纳：“他与古典大师们类似，有能力在经济学的很多不同领域做出贡献，尤其在经济原则、价值理论、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以及公共财政学等领域。他对古典传统和新古典传统的坚持并不意味着盲目的接受。”（p.488）

马尔科姆·卢瑟福的《美国经济学制度主义运动，1918—1947年：科学和社会控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是该领域的主要著作，其中，“芝加哥内外的制度主义”一章尤为珍贵。还可以阅读大卫·塞克勒的《托斯丹·范伯伦和制度主义者：社会经济哲学研究》（博尔德：科罗拉多联合大学出版社，1975）。莱昂内尔·罗宾斯为该书写了信息丰富的前言部分。另外还有约瑟夫·道夫曼等人所著的《制度经济学：对范伯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的再思考》（伯克利、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4）。

瓦伊纳更加重要和大众化的作品还包括《远观与近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格兰克，伊利诺伊州：自由出版社，1958）和《宗教思想与经济社会》（达拉谟，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1978）。第一本书中的佳作有“亚当·斯密与放任主义”和“边沁与J.S.穆勒：功利主义的背景”。还

可以阅读在瓦伊纳去世后由道格拉斯·A.欧文编辑的《经济学学术史文集》（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欧文在引言部分写道，瓦伊纳所写的关于斯密的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更正人们把亚当·斯密当做放任主义的教条式支持者的错误观点”（p.17）。莱昂内尔·罗宾斯的《雅各布·瓦伊纳：1892—1970年》（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是一本简要的回忆录。关于瓦伊纳的个人主义和个性特质，罗宾斯评论道：“他不属于任何学派，并且否定任何想要建立一个学派的意图。”（p.10）

肯尼斯·R.胡佛在胡佛研究所从前秘书夏洛特·库比特处获得哈耶克的文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佛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和当代政治学的诞生》（马里兰，马里兰州：罗曼和小菲尔德出版社，2003）中写道，1947年夏，瓦伊纳“拒绝了参加朝圣山学社的邀请，他鄙视带有‘政治目的’的活动”（p.190）。胡佛还记录道，在哈耶克从沃克尔基金会获得在美国任职的基金后，瓦伊纳在1948年7月30日给他致信说，由于外部资助的原因，虽然哈耶克希望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当局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可能接受’。瓦伊纳认为‘任何有声望的机构’都会同样地反对，作为某种独立的‘客座教授’……或许争议更小”。胡佛指出，亚伦·迪雷克托同样在1948年7月致信哈耶克，认为“到约翰·奈夫教授领导的社会思想委员会任职或许会得到哈钦斯的支持……哈耶克回信说这样的前景让他很高兴。事情进展顺利。奈夫写道，哈耶克的任职得到了他同事们的同意”（p.191）。胡佛关于哈耶克离婚事件的讨论（pp.190-195）是关于该事件的最佳讨论。

1972年1—2月版的《政治经济学期刊》刊登了弗里茨·马赫卢普、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鲍莫尔等人关于瓦伊纳的纪念文章。另外在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主编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1）中收录了亨利·斯皮格尔的“雅各布·瓦伊纳”。尤金·罗特温在《政治经济史》（1983年夏）中的“雅各布·瓦伊纳和芝加哥传统”唤起人们对瓦伊纳很多之于自己的思想和哲学原理的陈述。很多的思想和哲学原理在本书中也被提及。罗特温认为，瓦伊纳“认为‘公共物品’是‘社会福利中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成分’”（p.269）。与他的一些芝加哥自由主义继承者相比，瓦伊纳不情愿地倾向于采取更为强硬的家长式措施。他专门反对对穷人提供现金，他“并不坚定地相信人的理性，他认为……风俗习惯会导致对个人有害的消费行为形式”（p.271）。同样，保罗·奥斯林顿的“雅各布·瓦伊纳关于宗教和学术历史的讨论”是一篇信息量大、未标明日期的网络文章。

在沃伦·萨缪尔斯、杰夫·E.比德尔和罗斯·B.埃米特编写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研究年鉴》（宾利，英国：JAI出版社，2009）中，卢卡·菲奥

里托和塞巴斯蒂安诺·内若兹的名为“雅各布·瓦伊纳忆新政”的文章提供了瓦伊纳在政府任职期间的相关宝贵资料，其影响力超出人们公认的程度。菲奥里托和内若兹写道：“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的经济思想历史学家和普通历史学家对瓦伊纳作为经济顾问时的各种举动仅仅给予了微乎其微的断断续续的关注。”（p.81）

虽然瓦伊纳、奈特和赛门斯都是有价值的传记撰写的对象，但没有关于他们三人的长篇传记，有关奈特的作品比瓦伊纳的多，其中包括著名的研究奈特的学者罗斯·埃米特的作品。埃米特的作品包括《弗兰克·奈特和美国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牛津郡，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2009）；她作为主编编写的《1892—1945芝加哥经济学传统》共八卷（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2）和《弗兰克·奈特文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此外，埃米特还编写了《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第29卷-B，1919—1928年，弗兰克·奈特在爱荷华城》（宾利，英国：爱墨瑞得出版集团，2011）和《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第31卷-B，芝加哥的制度主义与弗兰克·奈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相关文献》（宾利，英国：爱墨瑞得出版集团，2013），后者关注奈特与弗雷德里克·克什纳之间的关系。

八卷本的《1892—1945年芝加哥经济学传统》包括埃米特所作的引言文章以及很多芝加哥经济学家的著名文章和章节，为读者提供了大量信息。戈登·图洛克在第8卷中为“赛门斯教学大纲”所做的序言是一个宝贵的历史文献。埃米特在《弗兰克·奈特文选》中所写的前言内容翔实、发人深省。他写道：“考虑到奈特给自己下的大任务，总的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理论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好的批评家。”（第1卷，p.x.）沃伦·萨缪尔斯在《弗兰克·奈特和美国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前言中，这样描述早期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他们不和政策玩游戏。他们既不过于简化也不过分夸张”（p.xxi）。《文选》第2卷包含了奈特对哈耶克《自由宪章》的批判及甚至怀有敌意的评论。

1973年版的《政治经济杂志》刊登了华纳·维克、T.W.舒尔茨和乔治·斯蒂格勒在一次追悼奈特的活动上的发言稿。相关文章还包括：詹姆斯·布坎南，“弗兰克·奈特”，收录于理查德·霍威，“弗兰克·奈特和经济思想史”，收录于沃伦·萨缪尔斯主编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第一卷（格林威治，康涅狄格州：JAI出版社，1983）。最后这篇文章提供了奈特的重要个人信息。

威廉·S.克恩发表在《政治经济史》（1987年冬）上的“弗兰克·奈特的三条戒律”是关于奈特伦理思想的一篇好文章。爱德华·希尔斯的《知识分子群像》（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包含了有关奈特、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和约翰·奈夫的精彩文章。罗伯特·纳尔逊的《作为宗教的经济学：从萨缪尔森到芝加哥及其他》（尤尼弗西蒂帕克：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出版社，2001）非常正面地评估了奈特的影响。（p.114）

奈特的作品包括他的文集《自由与改革：经济学与社会哲学文集》（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州：自由出版社，1982[1947]）。在书中他这样评价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真理观的多方面革命，这也是把自由主义与其他人生观区别开来的关键。我们没有必要试图去回答彼拉多的著名问题，“什么是真理”，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在形式上和意义上给自由下一个正式的定义。我们假设，有两种信仰，一种以事实、推理、对证据的批判性评价及“偏见”为基础，一种体现为对某种传统教条、传说或者权威声明的信念，这两种信仰间存在可理解性差异。（p.468）。詹姆斯·布坎南在介绍这本书时，评论奈特拥有“知识和道德勇气，不把任何东西神圣化”（p. x）。

J.布拉德福德·德龙在《加图期刊》（1990年冬）上的文章《为亨利·赛门斯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身份辩护》认为赛门斯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20世纪50—7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立场变得更加教条化。他们对赛门斯观点的评价是错误的。这是历史经济复苏中的一篇非凡之作。德龙写道：“我认为亨利·赛门斯的确是一位纯粹的、始终如一的、有深刻思想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被科斯看作‘干涉主义’的政策方针源自彻底的自由主义原则。这些政策方针并未表明对市场缺乏信念或者背离支持自由市场的目标取向。”（p.603）德龙阐述了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另外，还可以阅读德龙2011年6月1日的博客，“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知识坍塌在继续”……

罗伯特·L.巴特雷发表在《华尔街日报》（1996年1月18日）上的文章“杰克·康普与亨利·赛门斯”认为，“赛门斯是1927—1946年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他是一位坚定拥护放任主义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同时还是利用税收制度重新分配收入观点的教父”。虽然巴特雷强烈反对赛门斯对累进税收制的倡议，但他仍然把赛门斯称作“世界级经济学家”。 赫布·斯坦在后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赛门斯考虑的或许是累进的适当程度，对此我不甚了解。但是，我通过从上他的课以来至今60年的观察得出一条定律：无论现有的累进税收是什么程度，按最高税率纳税的人们会认为税率太高”［“关于亨利·赛门斯，”《华尔街日报》（1996年1月30日）］。

乔治·J.斯蒂格勒的《不受管制的经济学家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提供了有关芝加哥的背景知识，并表达了斯蒂格勒自己的思想。他的《经济学布道者和其他文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包含了很多值得借鉴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赛门斯。关于穆勒、斯密、边沁和经济学的演变，斯蒂格勒阐述了很多。他把经济学的演变追溯到边沁学派哲学上的功利主义。

詹姆斯·M.布坎南的《优于耕作及其他文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回忆了1945—194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的那段时间，强调了奈特。托马斯·索威尔在自传《个人旅程》（纽约：自由出版社，2000）中回顾了他在芝加哥大学度过的学生时期。与弗里德曼一样，索威尔的学术作品比他的大众作品更有价值。值得推荐的是索威尔的《视界冲突：政治斗争的思想渊源》（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87）《征服与文化：一部国际史》（纽约：基础图书出版公司，1998）和《论古典经济学》（纽黑文市，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早期芝加哥经济学家的自传包括保罗·道格拉斯的《成熟之时》（纽约，1971）和约翰·奈夫的《意义探究：一名另类分子的自传》（华盛顿，1973）。

另一部给人们带来启示，提供消遣的作品是赫伯特·斯坦恩的《另一方面……经济学、经济学家和政治学文集》（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95），这是一部自传。斯坦恩写道："如果我们综观当今世界，并且宣称资本主义幸存下来并成功了，那么我们说的资本主义是新政改造后的资本主义，而不是1929年的资本主义。"（p.37）他在另一部作品《管理5万亿美元的经济》（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中说道："联邦政府的影响将继续。政府应当有多大的影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虽然极大地削减政府的作用是不可能的，但很多人想要减少政府的作用。归根结底，在20世纪，里根政府比其他政府做出了更多的努力减少联邦政府的影响，但收效甚微。联邦政府的影响不可能沦落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威廉·布赖特和罗杰·兰塞姆的《学术文人》第三版（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8）中有关于奈特、赛门斯和弗里德曼的章节。布莱特和巴里·T.赫希主编的《诺贝尔之路：18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第5版（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9）收集了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自传体讲座。这些获奖者包括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科斯、贝克尔、罗伯特·卢卡斯和詹姆斯·赫克曼。赫克曼对20世纪7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学做了精彩的评述。

H.劳伦斯·米勒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62年2月）上的《论"芝加哥经济学派"》阐述了弗里德曼和早期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在评论政府作用时的主要差异。斯蒂格勒的"评论"与马丁·布朗芬布伦纳的"有关'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论述"讨论了同样的问题。后来关于该问题的著作还有A.W.科斯的"'芝加哥经济学派'起源"（摘自1963年10月《政治经济学杂志》）。文章对不同时期不同的芝加哥思想之间存在关联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我认为，在1916年J.L.劳克林从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之前的早期与近期没有学说上的连贯性。"（p.487）

J.罗尼·戴维斯的《新经济学与旧经济学家》（爱荷华：爱荷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71）详细论述了大萧条时期芝加哥经济学家的思想。戈登·图洛

克在前言中写道："戴维斯巧妙地论证了在大萧条时期多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都持有的在现代被外界称作'凯恩斯主义'的观点。"（p.487）在大萧条时期，芝加哥与美国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家赞成更多的政府行为，因为世界范围的经济下滑情况在美国尤为严峻。另外还有戴维斯的《和奈特相处的三天：一篇个人回忆录》（摘自1974年冬《内布拉斯加州经济学与商业杂志》）。

唐·帕廷金的《芝加哥传统论文集》（达勒姆，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1981）是一本值得关注的文集。帕廷金1941—1947年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作品提供了关于芝加哥经济学历史的大量信息。作品以帕廷金的个人回忆录开始，紧随其后的是关于奈特的章节。帕廷金用数个章节展示自己后，在《芝加哥传统、数量理论和弗里德曼》（最初发表于1969年）一文中回归到历史主题上。

梅尔文·雷德写过两篇关于芝加哥学派历史的有价值的文章：一篇是《芝加哥经济学：永恒和改变》（发表于1982年3月的《经济文献期刊》）；一篇是收录在伊特韦尔、米尔盖特和纽曼主编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的"芝加哥学派"条目。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回顾起来，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学或许看上去是六七十年代经济学的先驱。可以预料，这似乎不是唯一的发展历程，甚至不是最可能的历程"（p.2）。在第二篇文章中，他把学派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30年代的创立时期；40年代早期至50年代早期的过渡时期和50年代至今的现代时期（p.413）。

蓝尼·埃布斯泰因主编的《不可或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政治学和经济学论文集》（华盛顿：瑞格纳瑞出版公司，2012）中收录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文章论述了弗里德曼在1974年芝加哥大学董事会上的一次发言中的观点。为了弄清他的观点多年来有何变化，读者可以阅读弗里德曼1951年的文章《新自由主义及展望》。文章说："按照19世纪个人主义的标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集体主义者。"（p.4）

威廉·鲁格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纽约：Continuum出版社，2011）用优美而深刻的语言描述并总结了弗里德曼的生平和思想。亚伯拉罕·赫希和尼尔·德·马奇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纽约：哈维斯特·惠特谢夫出版社，1990）关注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并提供了关于弗里德曼的著述的书目。埃蒙·巴特勒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思想指南》（纽约：Universe Books出版社，1985）是专门介绍弗里德曼技术经济学领域研究的著作。上述作品都是关于弗里德曼的著述。

威廉·弗雷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大逆转》（盖恩斯维尔，佛罗里达州：海湾大西洋出版社，1988）是一套关于弗里德曼生平、职业和影响的两卷本著作。弗雷泽引发人们关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执政期间英

美两国政策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了弗里德曼的影响力。他引用米尔顿·费欧斯特的话：“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典范。他未在政府机构任职，在华盛顿也没有任何可以仰仗的势力。他靠思想的力量征服一切”（第一卷，p.21）。

J.丹尼尔·哈蒙德的《理论与实证：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精彩地总结了弗里德曼《货币史》的发展并描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对该书的反应。J·丹尼尔·哈蒙德和克莱尔· H.哈蒙德主编的《芝加哥价格理论：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的信件，1945—1957年》（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6）生动地展现了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经济学家渊博的学识。

理查德·科克特的《迎难而思：智囊团与经济反革命，1931—1983年》（伦敦：Fontana出版社，1995）精彩地展示了英国保守自由主义智囊团的发展，重点强调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科克特认为，当《自由选择》在英国电视上播出时，它对“英国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p.154）。经济事务研究所（IEA）的长期主编阿瑟·塞尔登提及到文章“IEA发起的弗里德曼反凯恩斯运动”，文章收录在塞尔登主编的《重访哈耶克的奴役》（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1984）（p.xxii）。

理查德·M.艾伯林在2006年12月《自由人》上的文章《米尔顿·弗里德曼与芝加哥经济学派》里有如下论述：

> 在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相继加入经济学教学团队后，芝加哥学派逐渐发展成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派。
>
> 弗里德曼彻底改革了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勒则同样颠覆了微观经济学。弗里德曼挑战了战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统治地位；斯蒂格勒的著作则逐渐削弱了很多政府管理商业的理论基础。
>
> 他们共同的分析方法成为了芝加哥学派的一个标志。这种方法是用数学模型与统计研究结合的方式来证明经济理论或政策方针的经验正确性或错误性。（p.2）

另一篇艾伯林的文章《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德国ORDO自由主义者》收录在艾伯林主编的《经济学家时代：从亚当·斯密到米尔顿·弗里德曼》（希尔斯代尔，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大学出版社，1999）。文章讨论了“二战”后盛行的德国ORDO学派，推荐了很多古典自由主义政策，包括“通过税收制度重新分配收入，从而改变让人难以忍受

并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财富不均状况”和“采纳一系列社会保险计划使社会的某些成员能够满足某种最低的生活需要”以及“城乡规划”（p.154）。哈耶克十分仰慕ORDO自由主义者。

在2006年秋季版的《胡佛文摘》上，乔治·舒尔茨、加里·贝克尔、托马斯·索威尔和威廉·F.巴克利等人发文缅怀弗里德曼。罗伯特·巴洛在文章里写道：“60年代中期，当我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生在哈佛大学就读时，我的教授们认为米尔顿是一名右派的中西部怪人。”（p.25）

罗伯特·李森的《凯恩斯主义的衰落：芝加哥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学》（纽约：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00）收录了作者之前大部分的文章，是一部颇具煽动性的著作。李森的《凯恩斯、芝加哥与弗里德曼》（伦敦：皮克林与查托出版社，2003）围绕在弗里德曼到来之前的芝加哥大学是否存在货币数量理论传统的问题展开讨论。这部作品有两卷，共约900页，李森完成了其中的150多页，弗里德曼为作品作序。

克雷格·弗雷德曼的《反垄断竞争的芝加哥学派——斯蒂格勒针对张伯伦的焦土策略运动》，与戴维·科兰德和弗雷德曼的《芝加哥反革命和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丧失》两篇文章均为日期不详的网络文章。这两篇文章大部分基于对芝加哥有关人物的访谈。第一篇文章引用弗里德曼在1997年的话：“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术界在宏观和微观两个领域的经济理论著述非常活跃。其中，很大程度上有数学倾向的纯经济理论的相关著作备受推崇。事实上，这样的著作并没有历史。如今，改变、发展和动人心魄的时期已经不复存在。我想说，我们现在处于发展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p.6）此外，弗雷德曼的著作《芝加哥原教旨主义：经济学思想和方法》（新加坡、哈肯萨克，新泽西：世界科学出版社，2008）关注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

有关弗里德曼及其著作的优秀论文集还有马克·A.韦恩、哈维·罗森布鲁姆和罗伯特·L.福尔马伊尼主编的《弗里德曼夫妇〈自由选择〉遗产：21世纪之交的经济自由主义》（达拉斯，得克萨斯州：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2004）。詹姆斯·格沃特尼和罗伯特·劳森对数值数据的价值做了很好的论述。当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彼得·柏特克在引文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比较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科学上的影响力……弗里德曼更胜一筹……弗里德曼影响了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坎南、科斯和斯蒂格勒）及更资深的米塞斯和奈特一代。”（p.148）J.丹尼尔·哈蒙德主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老师的遗产》共两卷（切尔滕纳姆，英国：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1999）收录了弗里德曼学生的文章，前言中描述了弗里德曼的导师身份。哈蒙德的介绍很好地呈现了弗里德曼作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角色。

胡安·加布里埃尔·巴尔德斯的《皮诺切特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在智利》（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对相关主题进行了公平客观的论述。除了提及弗里德曼和阿诺德哈柏格1975年之旅外，巴尔德斯未提供任何弗里德曼参与智到奥巴斯托皮诺切特政权的证据。巴尔德斯未提供任何弗里德曼参与智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政权的证据。著作指出，20世纪70年代当学术界其他人都在谴责智利滥用政治权力时，弗里德曼和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却称赞其经济改革。布雷·斯蒂芬斯发表在2010年夏季版的《胡佛文摘》上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如何拯救了智利”正面地阐述了弗里德曼对智利的影响。关于弗里德曼的智利之旅，可以阅读J.丹尼尔·哈蒙德的“芝加哥的市场、政治和民主：重视经济学”。该篇文章收录在范·霍恩、米卢斯基和斯泰普尔福德编写的《建设芝加哥经济学：美国强大经济学计划历史新视角》中。

娜奥米·克莱因的《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崛起》（纽约：大都会出版社，2007）是一部不切实际的作品。它试图将弗里德曼简洁的文章解读为，需要等到合适的时机将思想运用到智利、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的“休克”经济学说上。克莱因没有准确提出论点，而是写出了一场论战。约翰·诺伯格的《克莱因主义：灾难论战的兴起》（2008年5月14日卡托研究所简报）是一篇回应克莱因的文章。

保罗·克鲁格曼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谁》（收录于2007年2月15日《纽约书评》）是在弗里德曼去世后一篇精彩的批判性文章：“世界已经沿着弗里德曼的方向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比起他与实际政策改变有关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传统思想的转变。”克鲁格曼的《经济学家怎么错得如此离谱》（2009年9月2日《纽约时报杂志》）讨论并批判了芝加哥经济学立场。

在弗里德曼去世后，对他最正面的一篇缅怀文章是劳伦斯·H.萨默斯的“伟大的解放者”（2006年11月9日《纽约时报》）。萨默斯是保罗·萨缪尔森和肯尼斯·阿罗的侄子，他写道，弗里德曼是“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任何一位诚实的民主党人都会承认，我们现在都是弗里德曼的支持者。弗里德曼先生从未在政府任职，但是他在经济政策领域的影响力大于其他任何现代人物，因为今天弗里德曼的经济政策在全世界得到了实施……世人失去了一位英雄，他的成功表明，有说服力的先进而伟大的思想能够改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

1993年10月版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是一期纪念专刊，刊登了弗里德曼、沃利斯、贝克尔和索威尔等人纪念斯蒂格勒的文章。弗里德曼在为国家科学院撰写的一篇纪念斯蒂格勒的长文中写道，“我从未听说他对任何人做过任何一件刻薄、有害或毫无意义的事情”，“乔治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同事。他为后来被称作芝加哥学派的芝加哥经济系、商学院以及法学院各

成员间的交往和互动注入了能量和动力”（埃布斯泰因《不可或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pp.217-218）。这表明，弗里德曼也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斯蒂格勒回到芝加哥大学之前，还没有一个受到认同的芝加哥学派。

艾德蒙·W.基奇编写的“真理之火：纪念1932—1970年芝加哥法律经济学”（见1983年4月版《法律经济学期刊》）是一次聚集了30位原芝加哥大学学生和在职教师的特殊聚会的录音文本。聚会关注亚伦·迪雷克托和罗纳德·科斯在法律经济学领域的贡献。与会者除了迪雷克托和科斯外还有弗里德曼夫妇、斯蒂格勒、沃利斯、贝克尔和罗伯特·伯克。弗里德曼说：“在芝加哥大学，与瓦尔拉斯经济问题分析相反的真正的马歇尔式传统始于雅各布·瓦伊纳。瓦伊纳在芝加哥教授经济学理论多年，从而形成了基本的传统。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乔治（·斯蒂格勒）、艾伦·沃利斯、亚伦（·迪雷克托）以及作者都受到该传统的影响。”（p.211）弗里德曼说他忘记了赛门斯早期作品的细节。他提出，他的一些有关芝加哥经济学家思想连贯性的陈述或许是错误回忆的结果。

2004年9月在迪雷克托去世后很多人为其撰写讣告，其中包括理查德·M.艾伯林的《货物和思想市场上的亚伦·迪雷克托》（见2004年11月《自由人》）；亚当·伯恩斯坦的“亚伦·迪雷克托享年102岁；推动了经济学与法律的融合”（见2004年9月14日《华盛顿邮报》）。艾伯林认为，迪雷克托“最大的影响来自他的教学……他在教学中帮助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和律师改变了对政府管控和反垄断法对市场竞争影响的看法”（p.2）。其他相关文献还有收录在《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和法律大辞典》上的科斯所撰写的迪雷克托传记条目以及本书作者发表在2004年版《自由》上的为迪雷克托写的讣告。

罗纳德·科斯的《芝加哥法律经济学》（见1993年4月《法律经济学期刊》）讨论了赛门斯、迪雷克托和科斯自己的作品。科斯写道，“作为一名导师，迪雷克托在课堂内外都极富影响力。他影响了一些学生和同事的观点”（pp.246-7）。另外的文献还有史蒂芬·斯蒂格勒的《铭记亚伦·迪雷克托》和萨姆·佩兹曼的《亚伦·迪雷克托对反垄断政策的影响》。上述两篇文章都刊登在2005年10月的《法律经济学期刊》上。

罗伯特·皮托夫斯基主编的《芝加哥学派如何弄巧成拙：保守经济分析对美国反垄断法的影响》（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收集了很多不同视角的有价值的文章。F.M.谢勒尔写道：“迪雷克托鼓励芝加哥大学的法律经济学者对重要的反垄断学说背后的事实、假设和理论展开批判性的调查。这些调查经常会发现基础性的弱点，有时还会揭露真相。这些学术工作使我们所有人都获益匪浅”（p.31）。

罗伯特·史纪德斯基的作品中有关于哈耶克的短小精悍的阐述，包括他的凯

恩斯传记第二、三卷：《作为救世主的经济学，1920—1937年》（纽约：企鹅出版社，1994）和《为英国而战，1937—1946年》（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0）。在第二本书中，史纪德斯基将凯恩斯描述为一位“自由主义哲学家”（p.550）。史纪德斯基在1996年9月20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了一篇对安德鲁·甘布尔《哈耶克：自由的铁笼子》的评论文章。他在评论里写道，哈耶克是“20世纪最后25年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自发秩序理论是哈耶克的最大成就”（pp.4-5）。

相比较，尼古拉斯·韦普肖特的《定义现代经济学的凯恩斯-哈耶克冲突》（纽约：W.W.诺顿出版社，2011）完全误解了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关系，并对他们做了错误的陈述。该作品大肆宣扬与政治哲学相对立的哈耶克的技术经济思想，哈耶克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并不起眼。2001年的《经济学家》说：“与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相比，哈耶克算不上一位技术经济学家，但是他是一位具有罕见条理性和能力的社会哲学家。”（见沃伦·J.萨缪尔斯、杰夫·E.比德尔和约翰·B.戴维斯主编的《经济思想史指南》（莫尔登，马萨诸塞州：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3）（p.335）。

或许目前有关哈耶克全面思想的最佳作品是爱德华·费泽主编的《哈耶克剑桥指南》（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该书收录的文章多数都很优秀，其中一些尤为出色。这些由安德鲁·甘布尔、坎德兰·库卡萨斯和杰拉德·高斯所作的文章值得研究哈耶克的学生认真研读。这是一本关于哈耶克学术研究的标志性著作，涵盖了他的生活和事业。

哈耶克的最后一位长期秘书夏洛特·库比特的《哈耶克生平》（贝德福德郡，英国：作家在线出版社，2006）生动形象地勾勒出哈耶克的晚年时光。有关哈耶克的作品有罗伯特·李森主编的《哈耶克：一本协作的传记，第一部、从米塞斯到巴特雷的影响》（贝辛斯托克，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3）。布鲁斯·考德威尔的《哈耶克的挑战：一个知识分子传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对哈耶克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考德威尔是一位著名的哈耶克学者，他写的很多关于哈耶克的文章都值得一读。

在关于哈耶克的早期作品中，其中最好的一本是格雷厄姆·沃克的《哈耶克的道德》（兰哈姆，马里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在该书中，沃克保持着一名保守的天主教徒的视角。他既被哈耶克思想的某些方面吸引又对其思想的某些方面感到反感。沃克注意到，从哲学视角上看，哈耶克更接近于他嘲笑的集体主义者而不是受他称道的自由主义者。沃克写道，哈耶克是“一个彻底的自然主义者。他坚决反对任何超越观念……道德完全是人们与生俱来的现实世界的东西，是文化演进的结果。道德不是超然、永恒、不朽的东西”（p.35）。然而，与多数沃克称作的“自然唯物主义者”不同，哈耶克不相信个人理性的力量能替代上帝。因此，他的思想不像很多

其他自然唯物主义者的思想那样容易受到政治过剩的影响。哈耶克认为，自生秩序既代替上帝又代替神圣的个人理性。

雅各布·瓦伊纳的《哈耶克论自由和强制》（见1961年1月《南方经济期刊》）是一篇对《自由宪章》的评论。瓦伊纳论述道，哈耶克“对政府在‘福利’方面行为的积极提议……足以破坏哈耶克对放任主义的任何可能论断”（p.236）。

阿瑟·塞尔登主编的《自由社会议程：关于哈耶克〈自由宪章〉的论文集》（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1961）是一本评论哈耶克著作的早期作品。这本书收集了10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评论，其中一些人与哈耶克熟识。亚瑟·申菲尔德在他的论文中写道，《自由宪章》是“我们时代一部最伟大的作品，它有着深刻的分析、充分的学识和高贵的灵魂……世界上少数人能对相关问题做出如此完整的研究”。（p.51）关于社会福利，迈克尔·福格蒂指出，哈耶克“毫无疑问地赞同最低公共援助和扶贫救济的需要”（p.121）。

收录在安东尼·德·克雷斯皮尼和肯尼斯·米诺格主编的《当代政治哲学家》（伦敦：梅休因出版社）中的德·克雷斯皮尼的“哈耶克，进步的自由”大部分基于《自由宪章》对哈耶克的思想做了精彩而简洁的介绍。德·克雷斯皮尼评论道，对哈耶克而言，“自由的价值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角度而非个人的角度来定义”（p.57）。弗里茨·马赫卢普主编的《关于哈耶克的论文集》（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76）是一部很有趣的作品。亚瑟·申菲尔德总结道：“在我们时代很少有其他学者像哈耶克一般为社会科学增光添彩。”（p.176）

卡尔文·M.霍伊的《个人自由哲学：哈耶克政治思想》（韦斯特波特，康涅狄格州：绿林出版社，1984）是一部篇幅虽小却发人深省的作品，强调了哈耶克的道德观。霍伊对哈耶克的作品做了简明扼要的小结，他的论述颇具煽动性：“人们如果没有理解哈耶克政治哲学价值的重要性，就不能理解他的观点”（p.81）；“只有在市场秩序中，自由才可能存在……只有当个人受到法律，也就是对行为的抽象规则的制约时，这种秩序才可能持续”（p.119）；“哈耶克对公民自由的问题关注甚少……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哈耶克没有过多地讨论有关反抗、叛乱和革命的思想”（pp.122-123）。

吉姆·汤姆林森的《哈耶克与市场》（伦敦：普卢托出版社，1990）是一位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哈耶克所做的有洞察力的论述。汤姆林森在书中既有与哈耶克惺惺相惜的一面，又有批判性的一面，“（哈耶克）进化论存在的根本悖论是：在过去100年里，据说历史在集体主义的崛起上出了问题，但是这伴随着有史以来最快的人口增长，这种增长据称是进化过程的

措施。上述悖论未被解决”（p.122）。西奥多·布尔兹扎克的《哈耶克之后的社会主义》（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6）是一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哈耶克知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为创造一种“社会主义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观”而写成的作品（p.3）。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芝加哥大学全面的历史文献。芝加哥大学相关历史信息可以从这些有价值的作品中获得：爱德华·希尔斯主编的《铭记芝加哥大学：导师、科学家和学者》（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和汉纳·霍尔本·格雷《精神之校：百年校庆之际回顾芝加哥大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希尔斯是芝加哥大学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同样也为其历史编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这些对芝加哥大学的各个学术领域贡献感兴趣的人们来说，阅读希尔斯的《铭记芝加哥大学：导师、科学家和学者》很关键。萨缪尔森所作的关于瓦伊纳的文章对于该书从总体上阐述芝加哥经济学家具有重要的意义。《精神之校：百年校庆之际回顾芝加哥大学》的价值在于展示了芝加哥大学通史，而不是具体的经济学历史。格雷在前言中评论道，芝加哥大学“改变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任何一所其他大学都没有做到这点”（p.ix）。

荣·切尔诺的《工商巨子：洛克菲勒的一生》（纽约：古典书局，1998）有这样的论述：“在20世纪早期，洛克菲勒与其他美国公民相比，激起了学界更多的创作激情。有关他的书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涌现……他是当时最有名的美国人。”（p.xiii）关于洛克菲勒与芝加哥大学的关系，切尔诺写道：“作为一名慈善家，洛克菲勒明智地选择不干涉哈珀和大学事务。他将自己视为大学运行中一位无声的合伙人。”（p.126）

威廉·H.麦克尼尔的《哈钦斯大学：1919—1950年芝加哥大学回忆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提供了有关哈钦斯时代的有价值的信息。莫提默·J.艾德勒的《改革教育：开发美国思想》（纽约：科利尔出版社，1990）收录了艾德勒在1941年珍贵的文章“芝加哥学派”。在当时按照艾德勒的说法，文章提及了源自芝加哥大学的全部思想，但没有提到明确的芝加哥经济学派。

玛丽·S.摩根的《经济实证思想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R.J.爱泼斯坦的《经济实证学历史》（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出版社，1987）和克利福德·希尔德雷斯的《1939—1955芝加哥考利斯委员会》（柏林：施普林格出版公司，1986）三部作品除了介绍一般的历史，还提供了芝加哥考利斯委员会的背景知识并介绍了委员会与经济系的互动情况。此外，还可以阅读卡尔·F.克雷斯特的“1939—1955年考利斯委员会对芝加哥实证经济学的贡献”（见1994年3月《经济文献期刊》）。

在本·塞利格曼的《现代经济学的主要趋势》（纽约：自由出版社，

1962）中，“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一章是关于弗里德曼的早期论述。在此，塞利格曼在讨论了阿尔文·汉森的凯恩斯主义后写道：“汉森所代表的观点在某些学术圈里未受到好评，尤其在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瓦伊纳、亨利·赛门斯、劳埃德·明茨、乔治·斯蒂格勒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建立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强调纯粹竞争美德的传统……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该观点最高调的倡导者。”塞利格曼首先对弗里德曼的观点进行阐释，他颇具洞察力地评论道：“现在，货币数量理论引领了反对凯恩斯的反革命运动，弗里德曼将经济不稳定性视为根本上的货币不稳定性。”（pp.673、678、681）

马克·布劳格的《经济理论回顾》第5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第1版，1962）是一本已经使用了50多年的经济思想史课本。布劳格将斯密的政府观总结为：“斯密不满足于争论说自由市场经济确保一切尽善尽美。他全神贯注于对确切的制度结构的详述说明中。这种制度结构能保证市场力量的有益影响……《国富论》应当提醒我们，竞争效益需要的不只是放任主义。亚当·斯密特别提及，政治经济学不是没有原因的。”（p.62）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发展》第3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第1版，1962）是一本著名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斯皮格尔也采用下述亚当·斯密在恰当政府行为上的立场观点：

> 虽然他（斯密）赞同放任主义，但是仔细阅读《国富论》就能发现，他为政府分配了各种各样的大量任务……他赞同对纸币和银行业的管控，赞同公共交通企业、专利和版权、重利法、公共教育，以及授予寻求在偏远地区开展新贸易的公司拥有暂时的垄断权。（p.256）

斯皮格尔还写道：“斯密没有教条主义式地倡导放任主义。这是他与瓦伊纳共有的一种品质。”（雅各布·瓦伊纳，见伊特韦尔、米尔盖特和纽曼主编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p.812）

乔治·H.纳什的《自1945年以来的美国保守知识分子运动》（威尔明顿，特拉华州：美国院际研究协会，1996；第1版，1976）是相关领域的权威著作。在1945年写道：“在不同的学术古典自由主义者中，最著名的或许是芝加哥大学的亨利·C.赛门斯和弗兰克·H.奈特教授，他们是新生代芝加哥经济学派核心人物。”（p.14）纳什将很多位居共和党及其会员组织高位的人们的正统哲学前辈描述为“激进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p.313）。米塞斯、罗斯巴德和兰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无论术语是什么，不能将他们的思想与古典自由主义混淆。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展望：一部批判史》（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米夫林出版公司，1987）提到，20世纪30—40年代中期奈特和赛门斯是“当时最著名的美国古典正统支持者”（p.188）。关于斯密，加尔布雷斯说：“虽然斯密没有看到或者完全预测到工业革命充分的资本主义表现形式，他却清晰地察觉到旧秩序的矛盾、陈旧以及受社会约束的自我利益。他是新秩序的预言家，更是旧秩序的敌人。所有读过《国富论》的人都会感觉到，他的乐趣在于折磨安逸的人以及对这些声称信奉当时方便、传统思想政策的人们造成困扰。”（p.59）

穆瑞·N.罗斯巴德的《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经济思想史的奥地利视角》第1卷（切尔滕纳姆，英国：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1995）同样赞成有关斯密的观点。罗斯巴德写道，对于斯密而言，放任主义“只是一个合格的假设而非硬性规则”（p.465）；斯密支持公共教育、航海条例（条例要求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通过英国航运进行）、货币调控、公共工程、邮政、某些建筑规范，以及对税率的限制。罗斯巴德记录了“亚当·斯密提倡的特别冗长的税收清单”和“他对奢侈消费征收重税的提议。斯密呼吁对豪华车征收比货车更多的高速养路费，尤其对‘富人的懒惰和虚荣’征税”，罗斯巴德还写道，“斯密主张对酿酒厂征收重税，从而达到打击烈性酒的目的”（p.466）。斯密不是当今的自由主义者，他是在250年前写的著作。

当代自由主义者呼吁社会根本的革命性变革。他们在社会变化的范围上更接近马克思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但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不能认为当代自由主义者是这些古典自由主义者和历史自由主义者如洛克、休谟、斯密、边沁、穆勒、马歇尔、凯恩斯、瓦伊纳、奈特、赛门斯以及中青年时期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的正统哲学后裔。憎恨政府从来不是历史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属性。历史古典自由主义者是科学真理的有力捍卫者，尤其是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真理。他们是社会的先锋，不是反动派和传统分子。罗斯巴德还把斯密称作“放任主义的可疑伙伴”（p.532）。他指出，德国文学中有关于“亚当·斯密问题”的广泛讨论。“亚当·斯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斯密的早期著作中的“自然权利—放任主义观点”与《国富论》当中“更加合格的观点”（p.471）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济思想史》（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8）同样认为，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相对立。作品评论道，斯密不是“国家夜警理论”的“教条主义般支持者”。事实上，罗宾斯甚至说凯恩斯“几乎用了和斯密一样的话来对国家功能下定义”（pp.152-153）。罗宾斯责备哈耶克将边沁和其他功利主义者概括为大陆理性主义激流中“虚假的”个体：“我坦然地承认，我认为19世纪英国

功利主义思想的主旨有自由主义的倾向。我的观点是，这种自由主义应当得到‘虚假’的称谓。”（“哈耶克论自由”，1961年2月《经济学刊》，p.71）

艾玛·罗斯柴尔德的《经济情绪：亚当·斯密、孔多塞和启蒙运动》（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用优美的语言描写了启蒙传统中的斯密。她引用斯密的话并提出下述评论：

> 斯密容许……一些工资管制：“当管制……有利于工人时，它总是公正合理的；但是有时候与其相反，有利于主人。”……斯密支持高工资，更广泛地说，以公平为根据：“如果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这个社会肯定不会繁荣幸福。此外，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基本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pp.61-62）

她还写道，斯密在其去世前几周出版的《道德情操论》最终版中评论了“人们道德情操的堕落”，这种堕落是由于“人们崇拜富人和强权”（p.56）的倾向所引起。在他未发表的有关法学的报告中，斯密认为“贫穷的劳工‘支撑整个社会结构’，然而‘他自己拥有极少的社会财富份额并被淹没在默默无闻中’；‘可以很公正地说，给全世界提供衣服而自己却衣衫褴褛’，或者说‘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把法律和政府看成富人欺压穷人的联合体’。他接受政府干涉，尤其是当政府干涉的目标是减少贫困的时候”（p.69）。

萨缪尔·弗赖莎克的《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阐述了与罗斯柴尔德类似的观点：

>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很多人呼吁急剧减少财产继承权利。不足为怪，斯密的学生和崇拜者们是呼声最高的……他为道德观的变化做出了贡献。这种道德观的变化使得公平分配的现代观念以及用来证明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自由主义的观念成为可能……在18世纪90年代，是斯密的学生和崇拜者提出了使用政府基金帮助穷人的一些重要的计划（pp.198，201）。

相关的解读还有伊安·麦克林的《亚当·斯密，激进与平等：对21世纪的解读》（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在书中，麦克林论述道，“斯密抗议长子继承权和限制继承权”（p.93）。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主编的《亚当·斯密和现代政治经济学》（埃姆斯：爱荷华州立大学出版社，

1979）是一部优秀的有关斯密的文集。本书编于《国富论》出版200周年之际。多数文章都曾在圣巴巴拉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展示。

谢莉尔·戴维斯·卡斯珀的《放任主义在美国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复苏》（切尔滕纳姆，英国：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2002）介绍了弗兰克·奈特、亨利·赛门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和罗伯特·卢卡斯等人的作品。她着重强调卢卡斯，“最终，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选择用……卢卡斯创立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代替凯恩斯经济学”（p.145）。同时，她并没有宣称卢卡斯和布坎南的著作在公共政策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卡斯珀的原创性研究非常宝贵。

戴维·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中论述道：

> 新自由主义运动一直处于政策和学术影响的边缘地带，直到动荡不安的70年代。从那时起，在各种资金充足的智囊团（朝圣山学社的分支机构，例如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和华盛顿的遗产基金会）的孕育下，它开始登上了中心舞台，尤其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它在学校的影响力也不断增长，尤其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占主导地位的芝加哥大学。在1974年和1976年，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人的获奖也让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学术界得到了认可和尊重（p.22）。

马克·斯考森的《维也纳与芝加哥：朋友还是对手两个自由市场经济学派之争》（华盛顿：首都出版社，2005）对奥地利经济学与芝加哥经济学作了比较。他写道：“如果奥地利学派不在学术界摒弃凯恩斯模型的话，谁会站出来接手凯恩斯？最终的答案来自一位非凡的人物，他单枪匹马发动了一场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运动’，推翻了凯恩斯主义，帮助恢复了亚当·斯密古典主义模型”（p.61）——他就是弗里德曼。斯考森的《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第2版（纽约阿蒙克：夏普出版社，2009）中也有一章是关于弗里德曼。斯考森在《经济学三巨头：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伦敦：夏普出版社，2007）中写道，斯密“为普通劳动者的福利写了一本书。他在这部代表作中向读者保证，他的经济成功模式将会带来‘能扩展到最底层人们身上的普遍富裕’”（pp.6-7）。

莫妮卡·普拉萨德的《自由市场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兴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是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大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流视角出发所做的精辟论述。普拉萨

德指出：“在里根任期内的新自由主义时期最重要的遗产是引入了大规模赤字作为美国政策一个持续的特点”（p.11），并且：

> 有一个民间理论，将学术经济学家置于新自由主义革命的中心。但是历史记载表明，绝大多数学术经济学家都反对里根和撒切尔政府实际实施的政策。相反，实际的过程是：政治家们出于自身原因制定出具体政策，然后寻求能为这些政策提供知识合法性的人，即使这些人只是处于专业的边缘地带（p.21）。

这部作品是对以胜利者自居的自由主义者和时代保守主义者的一剂有效的解毒妙剂。毫无疑问，真理介于二者之间。

阿里桑德洛·荣卡格利亚《思想财富：一部经济思想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是一位著名意大利经济思想历史学家的一部著作。荣卡格利亚呼吁人们关注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传统发源地）的瓦伊纳所著的关于斯密的著作（p.125，n.23和p.151，n.64）。瓦伊纳在著作中指出，斯密支持政府发挥相当的作用。关于后来的发展，荣卡格利亚写道：“有一些学派信任市场的平衡能力并且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其中，芝加哥学派尤为突出。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公认的该学派领导人。”（p.484）

布莱恩·多尔蒂的《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现代美国自由主义运动的自由史》（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7），是一部关于战前自由主义历史的最佳著作。多尔蒂在书中提供了与很多问题相关的信息和观点，这些信息和观点不但发人深省而且非常有趣。该书的标题揭示了当代自由主义的“激进”本质。他转述了卡托研究所的汤姆·帕尔默所说的一桩颇有启发作用的轶闻，关于当代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支柱——米塞斯研究院：“米塞斯研究院院长罗克韦尔的个人网页上……全是各种支持联盟，反美资料……还有不受欢迎的种族主义者或者是呼吁按照旧约规则对罪人实施石刑的传统基督徒所写的东西。”（p.607）在2013年的一篇兰德·保罗传记中，《纽约时报》记者萨姆·塔恩豪斯和吉姆·鲁滕堡写道，当他俩其中一人与米塞斯研究院联系去参观时，罗克韦尔“让他离开，说他是‘政权的一部分’”（“兰德·保罗的混合遗传性”，《纽约时报》（2014年1月26日），p.21）。米尔顿·弗里德曼将米塞斯研究院描述成一个“众所周知的偏狭的群体”（见J.丹尼尔·哈蒙德，“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方法论的一次访谈”，萨缪尔斯和比德尔主编，《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第十卷，p.102）。

《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中包含很多罕见的信息。多尔蒂精彩地论述了当代自由主义运动朝着这里所称作的古典自由主义方向可能的演变，

（pp.584-586）。多尔蒂对作者编写的弗里德曼文集撰写了一篇书评“愈发自由主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reason.com，2012年11月20日）强调，弗里德曼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激进。

卡伦·伊尔丝·霍恩，《通往智慧之路：和十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对话》（切尔滕纳姆，英国：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2009）。在很多有趣的采访中，有一篇是对保罗·萨缪尔森的采访，“虽然说我也能理解，但有一件事让我很不高兴，那就是学界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右倾。你猜谁最应该对此负责……米尔顿·弗里德曼”（p.53）。霍恩想方设法从萨缪尔森嘴里套出了他对老朋友的评价，“米尔顿·弗里德曼一生中从未犯过任何错误。他是你能见到的最聪明的人。但是我想，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p.49）。

史蒂文·F.海沃德的《里根时代：1980-1898年保守主义反革命》（纽约：三河出版社，2009）对里根的税收削减政策评论道，里根“遵循的是他最喜欢的当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态度。弗里德曼常常说，他在任何时候支持出于任何原因的税收削减”（pp.66-67）。有关弗里德曼自己对上述立场的陈述，见“弗里德曼论顺差，”《胡佛文摘》（2001年春）（p.163）。

安格纳·桑德默的《经济学演变：经济思想史》（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阐述道：“在凯恩斯的批评者中，没有人能超越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力……弗里德曼是普通大众中最有名望的20世纪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政策建议对很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pp.417,419,420）

杰弗里·A.迈伦的《自由主义从A到Z》（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基础图书出版社，2010）是当代自由主义的一部典范之作。迈伦写道：“自由主义原则指向毒品和妓女合法化，用教育券取代公立学校，消除农业补贴，限制贸易和中产阶级福利。自由主义反对枪支管控、童工、竞选资助、工会、金融市场及其他。自由主义将堕胎政策留给州政府，终止干涉外交政策并使政府离开婚姻中的买卖市场。”（p.1）

艾伦·H.梅尔策的《为何是资本主义》（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是同一类型的又一力著。梅尔策认为，“10多年来，很多国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加了，其主要是教育回报造成的”（p.81）。她的评论不准确。当代自由主义者及盟友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增加的不平等是学校教育的结果，与当时的联邦税收政策毫无关系，这样的看法是自私的。重视学校教育，值得获得更多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十年来富人收入增加主要是学校体系变化所造成。其主要原因是税收政策的变化，尤其是减少了边际收入和房产税率。

关于当代自由主义的一部更加全面、专业的作品是汤姆·帕尔默《认识自由：自由主义理论、历史和实践》（华盛顿：卡托研究所，2009）。另外帕尔默的《福利国家之后》（渥太华：詹姆森图书出版社，2012）对当代自由主义做了更加简洁的介绍。

大卫·鲍兹《自由主义思想：对自由的宣言》（纽约：赛门斯·舒斯出版社，2015）是一位真正诚实的自由派新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著作。鲍兹写道："税收能被削减到什么程度？自由主义目标是实现一个自由的社会……因为税收是强制性的，所以最终的自由主义目标是消除它……在我们实现唯一剩下的税收是被用来支持政府的合法功能的目标之前，需要削减大量的政府支出和税收。在目标实现时，或许我们还能再琢磨一下，如何将这剩下的强制性税收取消。"（pp.283-284）他在作品中建议，作为一个临时目标，税收和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是政府和国防的一个恰当的程度。

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宇宙的大师：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诞生》（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这部作品雄心勃勃地对1950-2000年的政治经济思想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负面评论。琼斯认为："在看似不可能的技术经济政策领域有了新古典主义的突破性进展……替代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和调节理论的一致性，系统的、重要的经济策略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建立的货币主义理论"（pp.180，201）；"残酷的战后芝加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通过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给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和美国的社会结构留下了痛苦的印迹"（pp.268-269）。琼斯指出，"新自由主义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p.87）。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吉洛克斯出版社，2011）中写道，正如"重要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所阐述的那样，与对人类理性的信仰紧密相关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没有必要违背人们的选择去保护他们。理性的人们需要自由，他们也应当有责任照顾好自己"（p.411）。

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克林顿总统时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不平等的代价：今天分化的社会将如何危害我们的未来》（纽约：诺顿出版社，2012）中写道，在他看来，虽然有不良影响，"但是不应当低估芝加哥学派带来的影响"（p.44）。斯蒂格利茨这样评价弗里德曼："虽然他因为消费的决定性因素的伟大创举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他的自由市场信仰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而非经济分析。"（p.257）关于斯密，斯蒂格利茨说："亚当·斯密……与他后来的跟随者相比，对市场带来高效结果的能力持怀疑的态度。"（p.363）在《大鸿沟：不平等社会我们能做什么》（纽约：诺顿出版社，2015）中，斯蒂

格利茨写道，“不该惊讶的是，一些富有的美国人正在为了一种经济梦想而努力，他们希望富足能使所有人受益”（p.421）。

布林克·林赛的《人类资本主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对鼓励经济增长的做法进行了相关评论，“真正的问题不是‘大’政府对‘小’政府。经济能够与较高的社会支出和强大的监管机制共存。没有‘大政府’的表现也不能保证经济的活力与繁荣”（pp.75-76）。

布林克·林赛的《巨龙看守的低垂之果：改革递减条例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华盛顿：卡托研究所，2015）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提倡针对版权和专利法的改革并鼓励高技能人才移民美国。他对自己的一些提议评论道：“我建议这些政策举措的目的是对早期状况的回归，而不是激进的改变。”同样的评论大致可运用到本书所提及的政策建议上。

埃德蒙·福克特的《自由主义：一个理念的生涯》（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4）指出，“公众辩论的焦点从保持高就业率转向维持低通货膨胀。就这点而言，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做出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p.373）。托马斯·皮克迪《21世纪的资本》（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做了这样的论述：“要挽救资本主义并不需要福利国家或者触手政府，唯一必要的东西是运转顺畅的联邦储备……弗里德曼等芝加哥经济学家的作品增加了人们对日益庞大的政府的怀疑，并且营造出了一种恰当的学术氛围，使得1979-1980年的保守主义革命成为可能。”（p.549）

罗伯特·范·霍恩近年来确立了自己作为主要档案研究员的地位，研究了与芝加哥经济学有联系的多位人物。值得一读的是他的“亨利·赛门斯之死”（见2014年秋季《政治经济史》）；“不被承认的哈耶克弟子：F.A.哈耶克与亚伦·迪雷克托的政治学术关系探究”（见2013年3月《经济思想史杂志》35）；“芝加哥对商业力量集中化的态度转变（1934-1962年）”（2011年夏《西雅图大学法律评论》）。他在“不被承认的哈耶克弟子”中写道，不应该把《通往奴役之路》“看作对计划的简单批判，它只是批判了破坏有效竞争的计划，”他指出“哈耶克支持为了竞争的计划”（p.278）。范·霍恩引用迪雷克托对《通往奴役之路》的评论说道，自由主义社会需要政府增强“游戏规则来提高竞争的有效性；增强货币管理来促进经济的稳定性”，并且“加强措施来安抚许多‘在人生大抽奖中一无所获的人们’”（p.282），这是古典自由主义观点。

在序中，本书作者提到了关于20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发展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传记》（纽约：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01）、《哈耶克的旅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思想》（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3）、《米尔顿·弗里德曼

传记》（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以及我作为主编出版的《不可或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政治经济文集》（华盛顿：瑞格纳瑞出版公司，2012）。前三部作品包含广泛的文献文章。要了解弗里德曼思想的演变，还可以阅读我的《日益自由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思想概要》（见2014年1月《经济学期刊观察》）。